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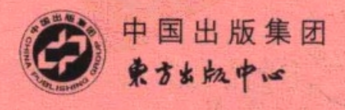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孟加拉国史

威廉·冯·申德尔 著　李腾 译

A History of Banglades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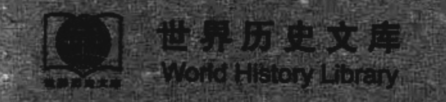


A History of Bangladesh


ISBN 978-7-5473-0439-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ww.cambridge.org

定价：40.00元



孟加拉国史

威廉·冯·申德尔 著　李腾 译

A History of Bangladesh



上海市版权局合同登记：图字 09－2011－245 号
A History of Bangladesh (ISBN:9780521861748) by Willem van Schendel,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加拉国史／申德尔著；李腾译．—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11.11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5473－0439－6

Ⅰ．①孟… Ⅱ．①申…②李… Ⅲ．①孟加拉国—历
史 Ⅳ．①K3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6892 号

责任编辑：张芝佳
责任印制：尚小平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26.75
字 数：350 千
版 次：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439－6
定 价：40.00 元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致　谢

我没有办法去公正地感谢那些在孟加拉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影响到本书的写作，以及在这么多年里给予我指导的人们。或者最好的办法就是感谢他们所有人——朋友们、同事们以及那些相识的人——而不是只感谢其中的一位。朗布尔(Ranpur)区高保加利(Goborgari)村的穆音威丁(Md Moyenuddin)在我学生时代最初想要研究孟加拉社会时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他讲授的课程对我影响深远，我欠他许许多多的感谢。

对本书作出直接贡献的人们——以建议、评论、支持、准许和殷勤接待等各种方式——我最要感谢的是拉赫努玛·艾哈迈德(Rahnuma Ahmed)、沙希杜·阿拉姆(Shahidul Alam)、阿卜杜拉·奥法瑞克(Md Abdullah Al-Faruque)、卡莫兰·阿里(Kamran Ali)、简内柯·阿伦斯(Jenneke Arens)、山吉布·巴汝拉(Sanjib Baruah)、拉特纳巴里·查特吉(Ratnabali Chatterjee)、舍布·桑卡尔·查特吉(Shib Shankar Chatterjee)、萨迪克· 雷扎·乔杜里(Sadek Reza Chowdhury)、阿尼玛·达斯(Anima Das)、梅克纳·古哈萨库塔(Meghna Guhathakurta)、多莉·哈利杰斯(Dory Heilijgers)、洛特·霍克(Lotte Hoek)、伊夫泰哈·伊克巴尔(Iftekhar Iqbal)、萨德库·伊斯拉姆(Sadequl Islam)、内文·科绍尔(Naveen Kishore)、沙里阿尔·卡比尔(Shahriar Kabir)、卢

比·拉尔(Ruby Lal)、蒙塔西·曼穆恩(Muntassir Mamoon)、纳雅尼卡·穆柯基(Nayanika Mookherjee)、穆尼拉·玛诗德·穆尼(Munira Moshed Munni)、塔蒂娜·奈泽·尼巴(Tahdina Nazneen Nipa)、贾南德拉·潘迪(Gyanendra Pandey)、玛巴布·拉赫曼(Md Mahbubar Rahman)、塔帕斯·鲁德罗(Tapas Rudra)、艾哈迈德·萨利姆(Ahmed Saleem)、萨密塔·森(Samita Sen)、高塔姆·桑古塔(Gautam Sengupta)、狄娜·马哈纳兹·希蒂奇(Dina Mahnaz Siddiqi)、托尼·斯图尔特(Tony Stewart)、马里尼·苏尔(Malini Sur)、马切尔·冯·德尔·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劳拉·冯·申德尔(Laura van Schendel)、托比亚斯·冯·申德尔(Tobias van Schendel)以及两名匿名审稿人。

我要特别感谢希拉竺·伊斯拉姆(Sirajul Islam)、尼克·克拉姆梅克(Nienke Klompmaker)和戴维·卢登(David Ludden),他们仔细阅读了全部手稿并给予我大量精细有益的反馈。当然,他们无须为最终作品负责。

国际社会历史研究中心和阿姆斯特丹社会科学研究所慷慨地资助我在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和英国的研究旅行。我要感谢荷兰科学研究会(NWO)在我写作的最后阶段所给予的津贴,感谢我的同事玛乔林·科内里森(Marjoleine Cornelissen)、马里奥·卢腾(Mario Rutten)、罗桑纳·卢腾(Rosanne Rutten)、沙里卡·斯莱纳伽马(Sharika Thiranagama)、桑德林·维斯塔本(Sanderien Verstappen)和斯寇·维舍(Sikko Visscher)使我能享受到这份津贴。

最后,我感谢玛丽格尔德·阿克兰(Marigold Acland)委托我写这本书,并感谢海伦·沃特豪斯(Helen Waterhouse)准备将之付梓。

大事年表

前 1500 年	开始种植灌溉水稻并驯养动物。出现木材行业。
前 5 世纪	出现城市中心、远距离海运贸易以及具有相当规模的国家。印欧语系和梵语文化开始从西方传播过来。孟加拉的区域和民族被划分为罗哈,奔德来,婆连陀罗,高尔,万加,三摩呾咤和诃利鸡罗。*
前 3 世纪	摩诃斯坦婆罗米铭文。
约 640 年	中国朝圣者玄奘描述了东孟加拉。
8－12 世纪	穆斯林势力首次进入沿海区域。
9 世纪	孟加拉西北的帕哈普尔的建设。
10 世纪	孟加拉语发展;现存最早的诗歌为《察雅帕达》。
12 世纪	拉克瑙提-高尔成为森纳国的首都。
13 世纪	伊斯兰教经陆路进入孟加拉三角洲地区。穆罕默德·巴克蒂亚建立了一个穆斯林

* 以上地名多采用《大唐西域记》及《佛学大词典》中的译法。——译者注

	统治的国家,首次由非孟加拉人占据主导地位,包括突厥人、北印度人、阿富汗人、阿拉干人和埃塞俄比亚人。
1346 年	伊本·巴图塔造访锡尔赫特的沙阿·贾拉勒。
16 世纪	孟加拉三角洲出产的稻米销往众多地区,从印度尼西亚东部的摩鹿加、马尔代夫,到印度西部的果阿。出现大型纺织产业,出口棉花和丝绸。
16 世纪 20 年代	最早的欧洲人(葡萄牙人)在孟加拉三角洲定居。
16 世纪 80 年代	葡萄牙人在达卡建立了第一个欧洲商站(随后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分别在 17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和 80 年代建立商站)。
16 — 17 世纪	伊斯兰教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在孟加拉三角洲地区盛行。
1610 年	莫卧儿帝国占领达卡,改名为贾汉吉尔纳加尔,成为孟加拉的首都。
1612 年	莫卧儿帝国统治了孟加拉三角洲大部分地区。
17 世纪 50 年代	孟加拉翻译诗人阿洛尔活跃在阿拉干宫廷。
1666 年	葡萄牙人和阿拉干人再次将吉大港拱手让与莫卧儿帝国。
1690 年	英国人建立了加尔各答(Calcutta,今天称为 Kolkata)。
约 1713 年	孟加拉在穆尔希德·库里·汗统治时期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体。首都迁往穆尔希

	达巴德。
1757年	普拉西战役;在一系列冲突之后,尤其是经过1764年的布克萨尔战役,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成为孟加拉的统治者。
1757—1911年	加尔各答成为孟加拉以及英属印度的首都。
18世纪60—90年代	托钵僧-苦行者反抗。
1769—1770年	大饥荒导致了孟加拉1/3的人口死亡。
1774年	神秘主义包尔诗人拉龙·沙哈(又称拉龙·法基尔)出生。
1790年	地税的新体系("固定赋额法")建立。1793年正式编入法典,它一直沿用到20世纪50年代。
1782—1787年	地震和洪水使布拉马普特拉河改道进入新河道,并造成了粮食匮乏。
19世纪30年代	英语取代波斯语成为官方语言。
19世纪30—60年代	伊斯兰"净化"运动激起了农民的暴动。
1840年	达卡人口到达最低点的5万人。
19世纪50年代	贯通孟加拉的铁路修建起来。
1857年	叛乱("印度兵变")对孟加拉三角洲影响甚微。
1858年	东印度公司被解散,该地区由英国政府直接进行控制。
1860年	英国吞并了孟加拉的最后一部分——吉大港山区。
1897年	8.7级地震袭击了孟加拉和阿萨姆。
约1900年	凤眼兰开始在孟加拉水域中扩撒。
1901年	未来孟加拉国的土地上约有3 000万居民。

1905－1911年	东孟加拉和阿萨姆成为独立省。以达卡为首府。斯瓦德希运动。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组建政治派别。
1905年	洛克亚·萨克哈瓦特·侯赛因著《苏尔塔纳之梦》。
1906年	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在达卡建立。
1910年	瓦利达拉研究博物馆在拉杰沙希建立。
1921年	达卡大学建立。
1940年	穆斯林联盟接受《巴基斯坦决议》(又称《拉合尔决议》)：要求建立印度穆斯林的独立国家。
1943－1944年	孟加拉大饥荒导致350万人死亡。
1946年	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在诺阿卡利、加尔各答和比哈尔等地发生骚乱。
1946年	选举后穆斯林联盟成为第一大党。
1946－1947年	台布哈加运动。
1947年8月14日	英国统治结束,英属印度被分割。孟加拉三角洲地区成为新生国家巴基斯坦的一部分,称为“东孟加拉”。达卡为省会。
1947－1948年	大约80万移民从印度抵达东巴基斯坦;大约100万移民离开东巴基斯坦去往印度。跨越国境的迁徙持续数年。
1948－1956年	为抵抗将乌尔都语作为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发起了孟加拉语运动。
1949年	阿瓦米穆斯林联盟(1955年更名为阿瓦米联盟)由巴沙尼毛拉建立。
1950年	《东孟加拉税收与租地法案》废除了柴明达尔(地主或收税人)在“固定赋额法”中的特权。

1951 年	未来的孟加拉国领土上有4 400万居民。
1952 年 2 月21 日	依库舍："语言殉道者"被杀害；第一座烈士纪念碑绍黑德塔树立起来。
1952 年	引入护照和签证系统。
1953 年	V-AID 社区发展计划。
1954 年	东巴基斯坦省选举。穆斯林联盟被击败。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成为初级内阁成员。
1954 — 1962 年	四所新的大学分别在拉杰沙希、迈门辛、吉大港和达卡建立。
1955 年	阿达姆吉麻纺厂在纳拉扬甘杰投产。
1955 年	巴基斯坦乡村发展学会在库米拉建立。
1955 年	东、西巴基斯坦首次实现直航。
1955 年	孟加拉学会和布尔布尔艺术学会在达卡建立。
1955 年	首个可进行商业应用的气田在锡尔赫特的哈里普尔发现。
1956 年	"东孟加拉"更名为"东巴基斯坦"。
1957 年	巴沙尼毛拉和其他人共同建立了全国人民党。
1958 年	军队政变。阿尤布·汗在 1958 — 1969 年间领导巴基斯坦军事政权。
1960 年	世界银行援助巴基斯坦财团成立。
1961 年	开普泰水力发电工程结束。在吉大港山区形成了开普泰湖，造成难民的"大迁徙"。
1963 年	查哈亚诺特第一次公开庆祝孟加拉新年。
1965 年	印度-巴基斯坦战争。从此与印度相连的列车就再未恢复通车。

1966 年	阿瓦米联盟制定六点计划。
1968 — 1969 年	民众起义反抗阿尤布·汗。军队以叶海亚·汗(1969 — 1971 年掌权)取而代之。
1970 年	飓风导致孟加拉三角洲 35 万至 50 万人死亡。
1970 年	巴基斯坦第一次全国普选。阿瓦米联盟赢得多数席位。
1971 年 3 月 25 日	孟加拉解放战争爆发。
1971 年 12 月 16 日	战争结束。东巴基斯坦成为独立的孟加拉国。
1972 年	谢赫·穆吉布·拉赫曼领导阿瓦米联盟政府。
1972 年	孟加拉国宣布自己为人民共和国,引入宪法体系并宣布“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和世俗主义”为指导原则。
1972 年	《比奇特拉》(1972 — 1997)周刊首发。
1972 年	联合人民党建立,山提-巴希尼在吉大港山区活动。
1973 年	孟加拉国第一次普选。宪法与议会政体。
1974 年	孟加拉国人口为 7 100 万。
1974 年	饥荒导致 150 万人丧生。
1975 年 1 月	宪法体制被推翻,谢赫·穆吉布·拉赫曼实行独裁。
1975 年 8 月	军事政变。谢赫·穆吉布·拉赫曼及其家人在达卡被杀。
1975 年 11 月	又发生两次军事政变。齐亚乌尔·拉赫曼在 1975 至 1981 年间领导军事政权。
1975 — 1997 年	吉大港山区战争。
1975 年	国家博物馆开馆。

约 1975－1990 年	绿色革命技术开始在农业领域中扩大运用。
1976 年	巴沙尼毛拉(约 1880－1976)去世。
1978 年	伊斯兰大会党领导人被允许从巴基斯坦的流亡中回国,并重新开始政治活动。
20 世纪 80 年代	成衣工业迅速发展。
1981 年	齐亚乌尔·拉赫曼在吉大港被暗杀。
1982 年	H. M. 艾尔沙德将军成为独裁者(1982－1990 年掌权)。
1982 年	为在沙瓦牺牲的烈士建立的国家纪念碑竣工。
1983 年	孟加拉国国会大厦竣工。
1985 年	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开馆。
1988 年	大洪水肆虐孟加拉国 60%的土地长达 15 至 20 天。
1988 年	孟加拉国印度教徒、佛教徒、基督教徒联合委员会成立。
1990 年	民众起义。艾尔沙德被迫让出权力。重新回到议会民主政体。
1991 年	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赢得大选。卡莉达·齐亚担任总理(1991－1996 年在位)。
1991 年	飓风导致孟加拉国东南地区 14 万人丧生。
1992 年	尼姆尔委员会设立人民法院。
1993 年	针对塔斯里玛·纳斯林的法特瓦(伊斯兰教法裁决)。
1993 年	地下水砷中毒案告破。
1996 年	阿瓦米联盟赢得大选。谢赫·哈西娜当选总理(1996－2001 年在位)。

1996 年	解放战争博物馆开馆。
1996 年	克尔普纳·查克玛失踪。
1996 年	与印度就恒河水域的划分达成 30 年协议。
1997 年 12 月	在吉大港山区与联合人民党达成和平协议。
1998 年	大洪水肆虐孟加拉国 60%的土地长达 65 天。
1998 年	贾木纳大桥开通。
21 世纪	4/5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 2 美元,1/3 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少于 1 美元。
2000 年	孟加拉国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粮食生产剩余。
2001 年	孟加拉民族主义党赢得大选。卡莉达·齐亚当选总理(2001－2006 年在位)。
2001 年	孟加拉国土著人民论坛成立。
2006 年	诺贝尔奖授予格莱明银行和穆罕默德·尤努斯。
2006 年	成衣业占孟加拉国外贸份额的 3/4。
2007 年 1 月	大选延期,军人支持的临时政府上台。
2007 年 11 月	飓风袭击西南海岸,造成数千人死亡并破坏了松达班湿地。
2007 年	孟加拉国共有 1.5 亿人口。达卡有 1 400 万人口。

导　言

这是一本关于当代孟加拉国社会建立的令人着迷的曲折回转过程的书。主要针对一般读者和刚走进这一研究课题的学生。对于那些熟悉这些历史的人来说,他们会发现我的叙述是极有选择性的。我的目的在于呈现一个概貌,以帮助读者弄懂孟加拉国是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如何来写作一本《孟加拉国史》呢？初见之下,会感到这个国家似乎没有太多历史。1930 年时,甚至最大胆的空想家也无法想象它的存在,到 1950 年,也仅仅有少数几个活跃分子对其轻轻一瞥。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孟加拉国才成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这并非是注定要发生的——事实上,这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即使如此,如果你不了解孟加拉国在最近几十年之前的历史,你就无法了解当代的孟加拉国。这个社会经过了怎样长期的塑造才成为我们今天所知的孟加拉国？即使你只追溯几条主要的线索也会深感其故事的复杂与宏大,就像我一样。我已经大大地压缩了这些故事。我希望读者树立这样一种观念：这本书的每一页纸都代表着历史上曾居住于此、今天被称之为孟加拉国的一百万人口。这就是说,以任何标准来看,都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被塞进了一片狭小的区域里。孟加拉国的人口比俄罗斯或者日本的还要多,是世界第七人口大国。

我决定将其历史进程分为三部分，这些仍在孟加拉国起着重要作用。第一卷着眼于长期的历史，解释在超过千年的时间里，自然力量和地理条件是如何塑造孟加拉社会的。当我谈及“孟加拉三角洲”时，我所指的地区大致与现代孟加拉国相同，并且我论证了其在很早的时候就发展出了独特的地域认同。第二卷描述了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这些古老的趋势与一些中长期因素的冲突，尤其是外国的统治及其持久的影响。第三至第五卷对本书进行了总结，并考察最新的发展。这些章节说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孟加拉三角洲发生了什么，即其先作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1947 — 1971)，后成为独立的孟加拉国的过程。

在孟加拉国，历史研究很活跃，争论激烈，研究广泛。因此存有数量极多的历史文献。我没有尝试去概括这些大量的知识，因为这有可能会造成信息过多。相反，我参考一些选读作品，它们对于一些我只是顺便提及的主题能够提供更为精微和细致的理解。我选择将本书以英文出版，是因为我认为这样对于大多数读者最为通俗易懂。本书也从孟加拉国的民族语言——孟加拉语的大量且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中获取了一些信息，但参考得不多。注释和参考文献显示我的研究建立在许多专家和学者的基础之上，我对他们表示感激。

任何写孟加拉国的人都要对于名字和音译做出决定。有两个原因导致孟加拉语不易于译为英语。首先，一些孟加拉语中的发音在英语中并不存在，语言学家们要标上各种点、画。在本书中我使用的是当地文字的简单版本，大略地以其孟加拉语发音追溯其早期先驱梵文的标准音译。因此，“孟加拉语”这个单词的发音为“bangla”，但是音译却为“*bāṃlā*”。本书最后的术语表提供了不同的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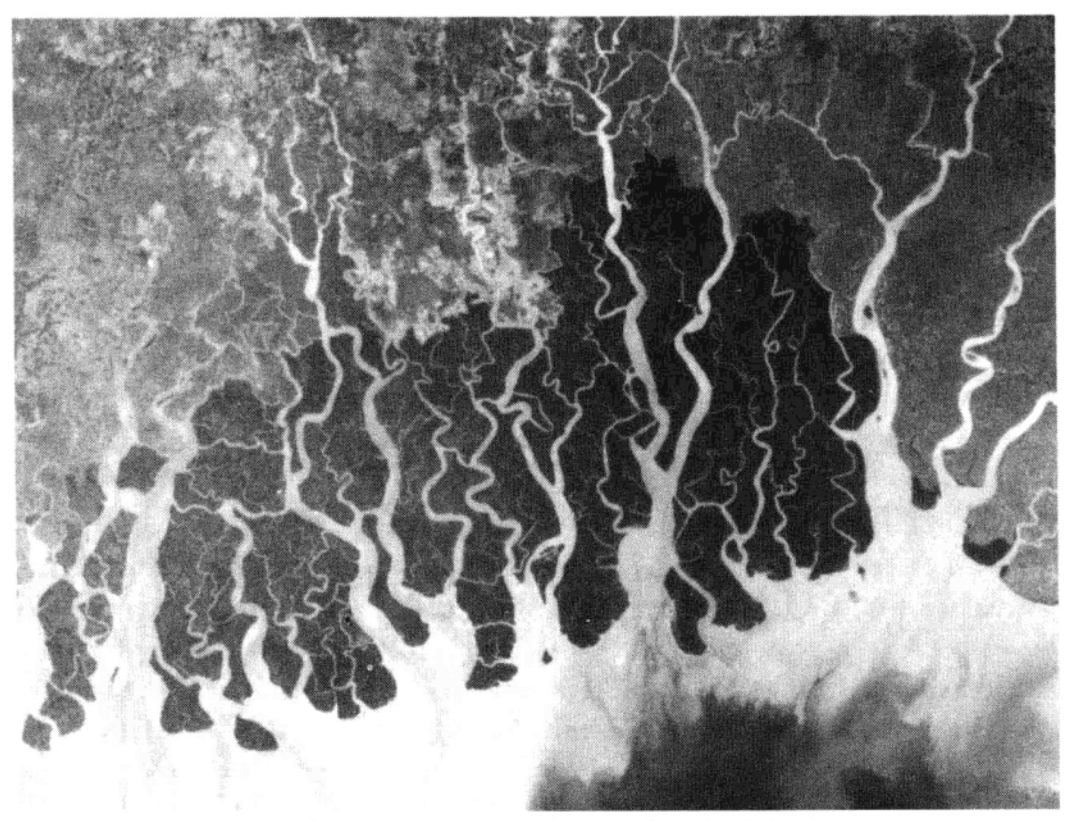
第二个造成孟加拉语难以正确地拼写为英文的原因在于很多孟加拉语词汇有多种形式。经常是一种形式在历史上更为常用，而另一种形式则更为正确。这在地名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就有了普拉西(Plassey/Polashi)、博里萨尔(Barisal/Borishal)和锡尔赫特(Sylhet/Shilet)。由于缺乏始终如一的或官方的指南，选择就常常是个人性的。

然而,有两个词存在官方的标准。孟加拉国的首都过去在英文文本中常常被写做"Dacca",而在20世纪80年代则采取了更为正确的拼写方式,即"Dhaka"(*Ḍhākā*)。类似的是,"Calcutta"也在2001年变成了"Kolkata"(*Kalkātā*)。为了不使读者对于地名的改变感到困惑,我将在全书都使用Dhaka(达卡)和Kolkata(加尔各答)。

目录 Contents

第一卷

鸟　　瞰



第一卷　松达班湿地航拍。承蒙 NASA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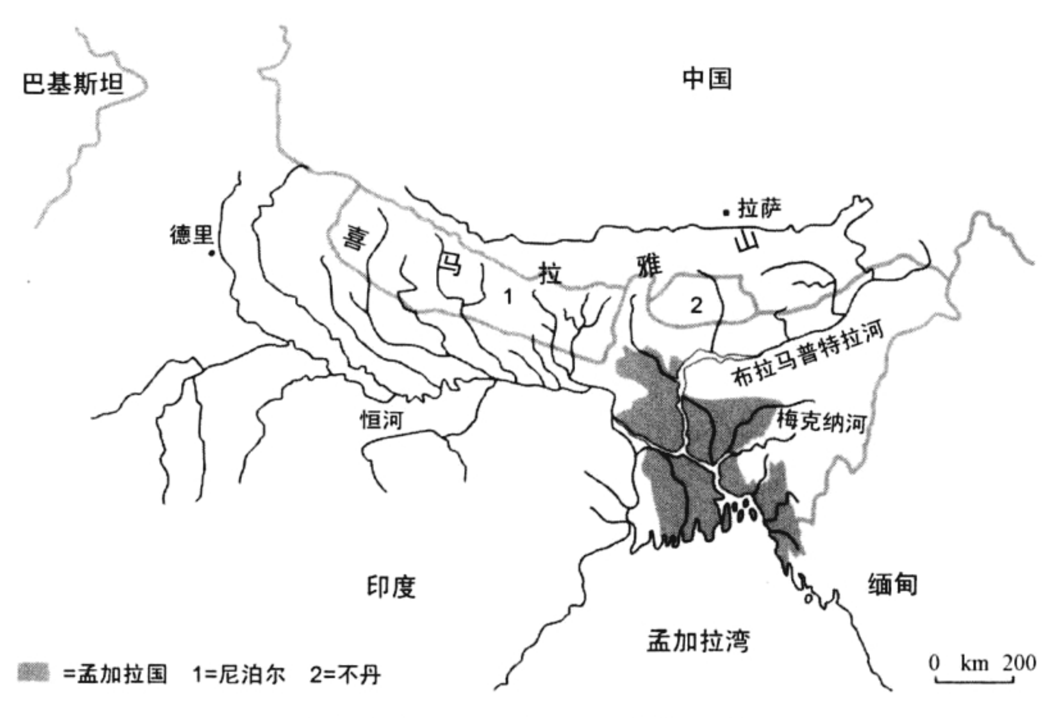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水脉与淤泥之地

想象你高高地站在喜马拉雅山上。向下望去，你见到一片白雪覆盖的山脉和植物贫瘠的令人生畏的景象。但现在，继续向东南方看去，将会发现一大片在山脉与大海之间延伸的泛滥平原。这一片闪耀着绿色光芒的广袤区域就是孟加拉国。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一本关于孟加拉国的书要从喜马拉雅山开始。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如果没有喜马拉雅山脉，孟加拉就不会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孟加拉正是喜马拉雅山脉的水流冲积而成的。每年春天，山上积雪融化，冰水就顺流而下冲刷泥土汇入河流，并最终奔向大海。当这些河流流经低地时，就会减慢速度，从而使泥土沉淀，形成一个三角洲。这亘古以来的过程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孟加拉国的领土——这片领土每年都因新的泥沙沉淀而将大海向后推一点。

这片三角洲非常巨大，因为几乎所有从喜马拉雅山这座世界最高山脉流出的河流都要流经此处（地图 1.1）。在南部，无数小溪与河流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水势浩大的恒河（Ganges），其向东流经数百公里的印度领土而后进入孟加拉国西部，在那里它被称为博多河（Padma）。[1] 在喜马拉雅山北部，一条同样水势浩大的河流——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或者 Tsangpo 雅鲁藏布江）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形成。它同样也向东奔流，经过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之后急转，穿越崇山峻

岭，远至印度的东北角。其后向西流动进入孟加拉国北部，在那里它被称为贾木纳河(Jamuna)。在孟加拉国中部，它与恒河相汇并一起流进大海。这两条河流都是非常巨大的：恒河有近 8 公里宽，而布拉马普特拉河竟然有 18 公里宽。



地图 1.1 孟加拉三角洲的集水区。

这是一幅大图。当你仔细观察时，就会注意到还有许多河流在孟加拉国交汇。第三大河是梅克纳河(Meghna)，它从东部进入孟加拉国。还有五十多条河流从印度越过边界流进孟加拉国。它们在河道、沼泽和湖泊中不断地汇流、分流、再汇流(插图 1.1)。历史上，水流有逐渐转往更东部的河道的趋势，而三角洲的西部河段(现在印度境内)有变得更为干涸的趋势。这些河流汇聚在一起后沉积成了深厚的肥沃土地，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河谷三角洲。虽然，并非所有的泥土都最终沉积在孟加拉。每年有十亿多吨泥沙被冲入印度洋，从而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水下三角洲，亦即孟加拉扇形地(Bengal Fan)。孟加拉三角洲东、北、西三面为高地和群山环绕；它就像一个漏斗的狭窄底部，通过这里，一个超出其面积十倍的区域每年都要排出令人难以置信的 6 500 亿立方米的水。5 至 10 月，当河水上涨的时候，几乎所有这些高含沙

4

水都要流经这个三角洲。

这些巨大的力量塑造了孟加拉的自然环境,并且继续对今天人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但这些宏伟的河流并非水源的唯一来源。还有两种水一直在孟加拉起着重要作用:雨水和海水。每年6月河水暴涨时,孟加拉的天空就会发生变化。冬季的天空是蔚蓝的,且很少下雨,但是在5月末或6月初,随着气温的上升,在南部会形成巨大的云团。当其从海上逐渐漂浮过来时,将会造成倾盆大雨,并一直时断时续直到9月下旬。当湿季风(wet monsoon)到来时,这片热带亚洲地区将变得非常壮观。持续数日的大雨不仅将松软的土地变为齐膝深的泥泞之地,并且大量的水涌出孟加拉的景象也令人惊叹。正是降雨使乞拉朋齐(Cherrapunji)成为在全世界气象学家中广泛使用的词。这个恰好在孟加拉国东北部和印度交界地方的小村庄据说是世界上最潮湿的地方。这里,季风云团受到梅加拉亚(Meghalaya)群山的阻挡会形成长达数月的降水。这里的年降水量令人震惊,达到11米;曾经记录下的最高降水量是在24小时内超过了1米。



插图1.1　"无论做什么,都在齐膝深的水中(*hore-dore hatu jol*)。"孟加拉国中部旱季航拍。

海水是孟加拉生活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在旱季(10－5月),孟加拉湾的海水将倒灌入内陆达100公里,地势较低的三角洲就成为海泽之国。此外,处于低处的三角洲非常平坦:其海拔位于海平面以上不到3米。结果便是不得不屈服于热带季风所带来的涌潮,这个季风每年都会登陆一次。这些对于孟加拉海岸边缘的许多岛屿和淤泥地区尤为艰难。覆盖着沿海三角洲的红树林松达班(Sundarbans)提供了一些保护,但这片树林从18世纪开始就因为人类活动而有所减少。而且,这片世界上最大的红树林并未能全然抵抗热带台风的力量。其在2007年遭受了台风的直接袭击,许多植物遭到摧毁。

这三种形式的水——河水、雨水和海水——给予了孟加拉一副天然的雅努斯(Janus)之面。冬天,河水缩在河床里,天空蔚蓝,海水也温柔地流淌。大自然显得善良而温顺。然而一到夏天,自然便失去了控制,孟加拉就变成一片水陆两栖的土地。河水泛滥,大量降雨和海上风暴将会阻碍所有这些水的排出。其结果便是洪水的爆发。[2]

夏季洪水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个国家每年约有20%的地区被淹没,主要是因为降雨。河流也可能造成洪涝。大型河流通常在不同的时候达到洪峰水位,但如果洪峰在同一时期出现,河水就会漫出河堤,淹没平原。河流就是以这种方式在被认为是活跃三角洲(active delta)的地方创造出新的河道。当一条河流多年在同一河道里流淌时会因为泥沙沉积而变浅,流速也将减缓甚至出现阻塞。两边的淤泥堤岸将使河流保持在同一条河道里流动,即使河床会逐渐升高,接近或高过周围的泛滥平原。但在水量特别大的情况下,大水将冲出自己的道路,河堤逐渐被侵蚀,那时河水就会漫出来,寻找一个更低的新河道。而原来的河道则可能成为一个牛轭湖或为植物所覆盖。孟加拉的土地上便点缀着这样一些游荡性河流的遗迹。虽然大多数的洪水是因降雨和三角洲河流泛滥所造成的,但也有由于山区大量降雨之后冲击到三角洲的山洪或热带风暴潮所造成的洪水。[3]

降雨、河流泛滥、山洪和风暴潮组合的影响使孟加拉夏季的洪水无法控制。即使在今天,洪水的时间、位置和广度都非常难以预测,更不必说加以控制了,并且洪水每年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每隔几年就会

发生大洪水,偶尔发生特大洪水时,整个国家的70%都被淹在水里。

从人们生活的角度来看,洪水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每年的洪水给土地持续带来一些最肥沃的土壤。而肥沃的土壤则总是能使种植物生长繁茂,并使早收和成功的农业生产成为可能。但洪水不受控制的本性,以及平均每十年左右必会发生的严重洪涝,对于人们的生活也是一场浩劫。然而,并非是水量决定了洪涝破坏的程度。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孟加拉人很早就适应了处理这种定期的泛滥。一些洪灾造成比其他洪灾更具破坏性的影响,取决于洪水的推进力量(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和停留在陆地上的天数(毁灭庄稼)。因此山洪和风暴潮的破坏力相当巨大,即使其水量及所影响的区域并不非常大。1991年,一次台风袭击了孟加拉国东南部的吉大港。巨浪穿过河道冲上陆地,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尽管进行了早期预警并疏散了300万人,沿海村庄仍有70%的人口受灾。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有将近14万孟加拉人死亡。1970年的伤亡人数更加触目惊心,当时还没有全国台风预警系统。台风在诺阿卡利(Noakhali)海岸登陆,据信其风暴潮至少造成了32.5万人丧生。[4]

7

和这些具有极大破坏性的风暴洪水相比,降雨或河流造成的洪水虽然影响面积大得多,但如果只持续几天的话,造成的破坏就很小。事实上,在这样的洪水之后总会迎来一次大丰收。但长期的淹没却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1988年的大洪水在长达15至20天的时间里淹没了孟加拉国60%的土地,使农作物、财产、渔业资源和其他资源遭受了巨大损失,并危及到人们的生命。十年后,又一次大洪水淹没了这个国家60%的土地,因为这次洪水持续了65天,其危害也更严重。[5]

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生活,就等于生活在常年移动的水陆边界上,而正是这种移动的边界对孟加拉国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历史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尽管经常遭受挫折,人们还是相当成功地利用了危险的三角洲环境中的各种资源。今天,孟加拉国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生活着1 000人,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土地承受的这种压力使得古老的环境边界直到今日仍有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水边的遭遇已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孟加拉人从未像现在这样被迫拓展他们的生活边界,

在低洼地、沿海地区以及岛屿上定居，直接暴露在风暴和洪水之中。如此一来，一些孟加拉人就不得不一直危险地置身于水边(插图 1.2)。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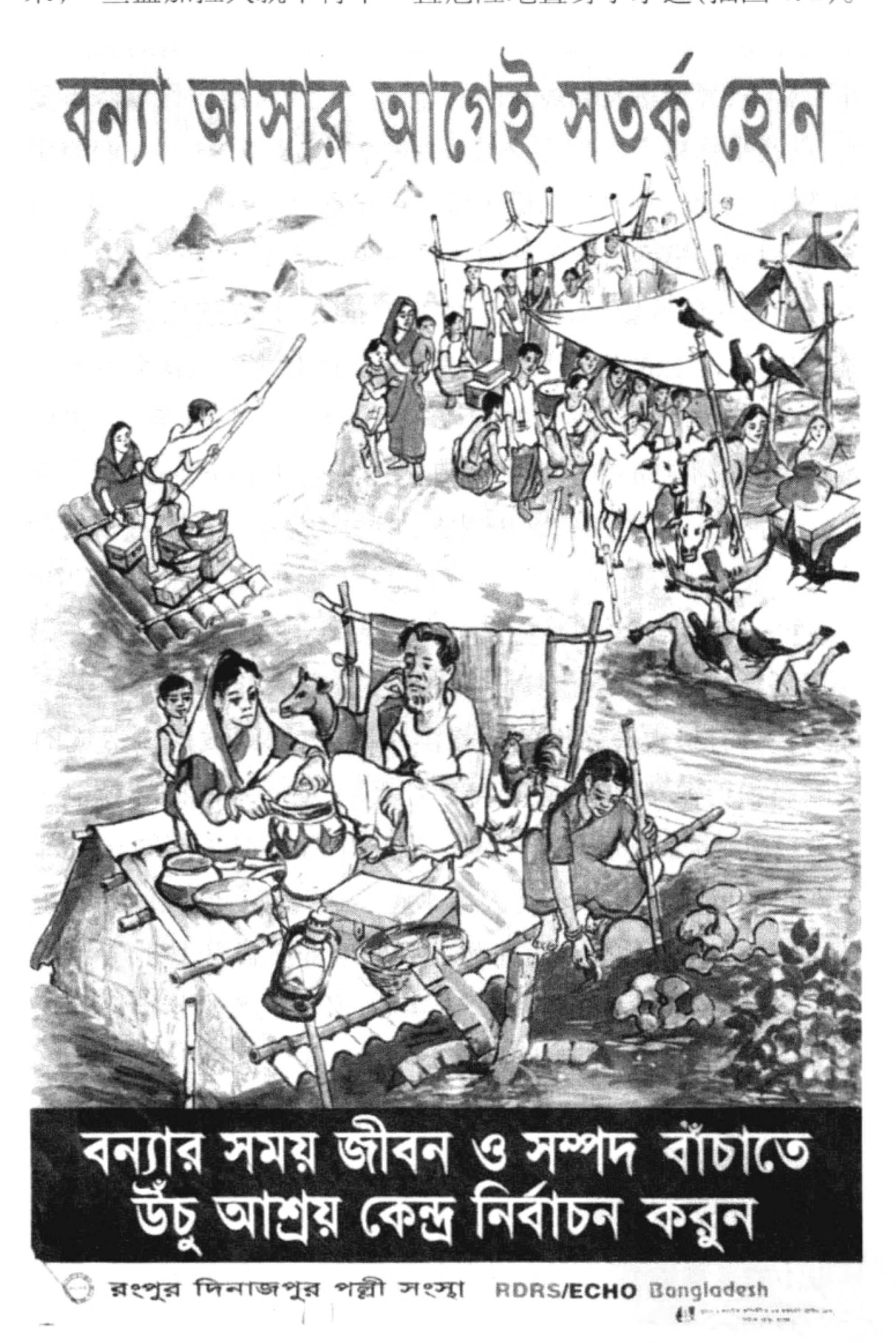


插图 1.2 “为洪水做准备！寻找一片高处的避难所，拯救你的生命与财产。”教育海报，20 世纪 90 年代。承蒙 Archives of Bangladesh History，Rajshahi 提供。

9

泛滥平原大约占全国领土的80%,主导了孟加拉人的生活。但并非孟加拉所有地区都是平坦的。东部边缘一些围绕着三角洲的陡峭山地也在国土之内,那里的地形则完全不同。这些山(在吉大港山区和锡尔赫特)表明,在孟加拉平坦的地表下,大地深处正进行着复杂的地质过程。构造板块在这里碰撞:喜马拉雅山和孟加拉群山(除此之外还有缅甸和印度东北部的山脉)都在这些碰撞中形成褶皱带。这些冲进孟加拉下部的断层同时也推高或降低了三角洲的某些部分,造成了一些轻微提升的阶地,看起来像是泛滥平原上的小岛——尤其是孟加拉西北的巴林德(Barind)和中部的毛德胡普尔(Madhupur)地区,还使部分地区下陷为低地(*hāor* 或者 *bil*),形成巨大的时令湖(seasonal lake)。孟加拉地下不稳定的地质构造导致了频繁的地震,虽然大多数很轻微,但一些大地震也足以造成大范围的破坏。

在孟加拉,自然环境从来不仅是人类历史展开的背景。实事上,正是时间和自然力而非社会分层或最高统治者在历史上扮演着主角。例如,18世纪80年代的一次地震和洪水造成布拉马普特拉河冲出一条新河道,毁灭了沿途的村庄,并导致旧河道沿岸商贸中心的衰落。更近的一次是在1970年,对风暴灾害的处理不当使政府丧失了其合法性并引发了解放战争。而1988年的洪水所造成的损失超过了当年全国的发展预算。

管理自然环境是所有掌管孟加拉三角洲的社会和国家的核心关注点。孟加拉人民从来未自欺欺人地以为他们已经控制住了自然界。在他们居住的环境中陆地和水混在一起,而其边界更是不断变化。结果便形成了他们一直以来灵活且经常迁徙的定居模式。孟加拉的村庄被描绘为难以捉摸的。[6]它们并非聚集在一个中心周围,由防御墙来保护,或联合维持灌溉作业。相反,它们由分散的宅地和小型村落(*pārā*)组成,位于稍微凸起的高地上,当一般的洪水来临时,那里就变成了小岛。很少有建筑物是为长期使用建造的,传统的灌溉耕作几乎不需要任何联合协作,因为这里会有大量的降雨。当活跃三角洲的地形发生改变时,村民就常常被迫迁移并重建他们的房子。因此大自然的地形变化

10

就成为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原因,而这种定居的易变性和碎片化也塑造了乡村政治。孟加拉的村庄并不是一种紧密地组织在一个单一村庄首领之下的群落。相反,它们由不断改变的家族联盟和村落领袖们所领导。当国家想要控制乡村人民时,总是不得不想办法去处理这一适应水陆边界上的生活的灵活的权力共享模式。

对未来的预测表明,有必要再次灵活改变进行适应。大洪水之间的间隔在变短(根据一些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森林滥伐[7]),气候变化专家预言孟加拉国将成为因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而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对水源匮乏的关注在全球范围内增长,孟加拉国丰富的淡水资源也可能变成一种关键性的资源。



第二章　丛林、旷野、城市与国家

11

几十万年来，肥沃的孟加拉三角洲被茂密的雨林和沼泽所覆盖，形成了生物高度多样化的环境。其中多数生物都很好地存活到了人类历史时期。然而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这片世界上野生生物最丰富的地区迅速衰落了。许多动植物物种从孟加拉消失了——其中有许多较大型动物：犀牛、野水牛、爪哇野牛、印度野牛、蓝牛，许多种类的鹿、狼、恒河鳄、粉头鸭以及孔雀。其他的如大象、老虎和豹子等也变得十分稀少(参见“发现希舒”)。

孟加拉热带雨林的衰落与人类的胜利直接相关。从很早以前开始，人类就走遍了孟加拉的森林和河流，充分利用其资源。然而，几乎没有发现人类早期的遗迹，专家们就人类何时出现也未能达成共识。一些人认为，他们是在大约 6 万年前从中国穿越群山由东北部进入这一地区的。然而，还有一些人提出，早在公元前 10 万年，一种独立的区域文化就已经在孟加拉发展起来了。[1]

任何声称孟加拉有史前人类的说法基础都是很薄弱的。一方面，这里有频繁被淹没的泛滥平原的自然环境以及潮湿的热带气候，两者对于那些并非用最坚固的物质制作的人类定居遗迹的保留都是不利的。因为石头在孟加拉三角洲不是自然存在的，早期人类可能主要依赖于木头、竹子和泥土作为原材料，而这些都极难保存。另一方面，由

于南亚地区的考古学家长期对这一地区漠不关心，而更关注印度半岛的其他地区，也导致孟加拉史前记录的缺乏。即使是近来那些在孟加拉三角洲工作的考古学家们，也主要对于更近的时代感兴趣。

12

发现希舒(shishu)

如果你足够幸运，将会在孟加拉经历一种罕见的遭遇。这个国度有无数条河流，当你的船只在其中一条的浑浊水域中航行时，一个滑溜溜的东西突然从水下蹿出来，片刻之间冲破水面。你只来得及看到它狭窄的喙、弯曲的灰色背部和宽大的尾鳍——其后又从混浊的水面消失了。祝贺你：你刚刚第一次见到了希舒。

希舒是什么？它是一种只生活在恒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水系的淡水海豚。这种生物的学名是恒河江豚(*Platanista gangetica gangetica*；见插图2.1)，在孟加拉称为希舒或者舒舒克(*śiśu*；*śuśuk*)。希舒是游泳健将，身长近2.5米，主要以鱼虾为食。它觅食时侧身游动，用鳍肢沿着河床探路，而其长长的喙则搅动河底的淤泥。希舒的视力很差。它们发出声音，通过从水里传回的回声来感知周围环境，以此导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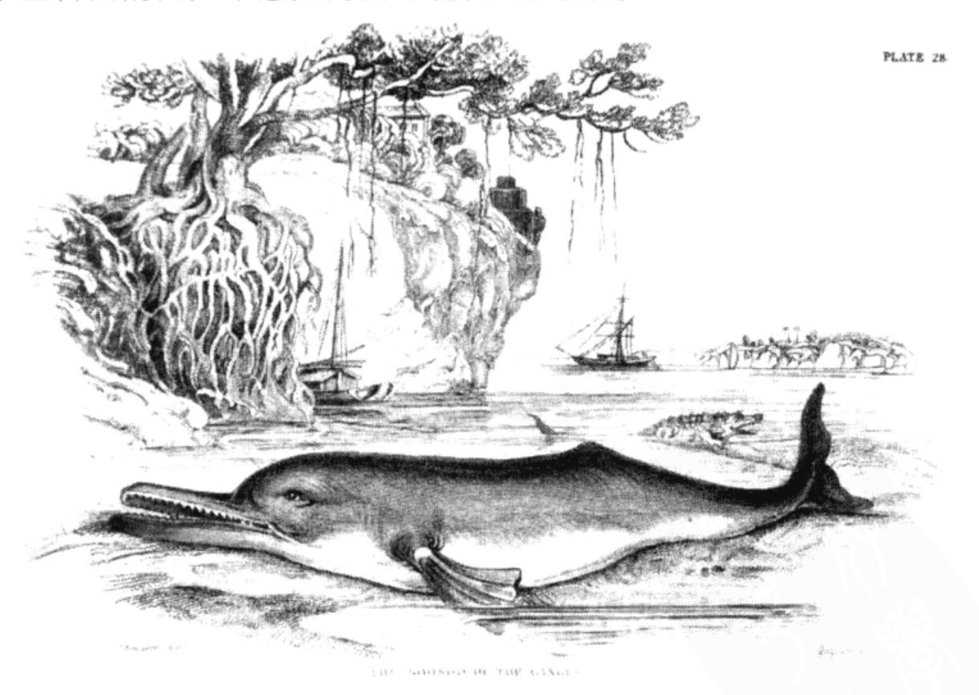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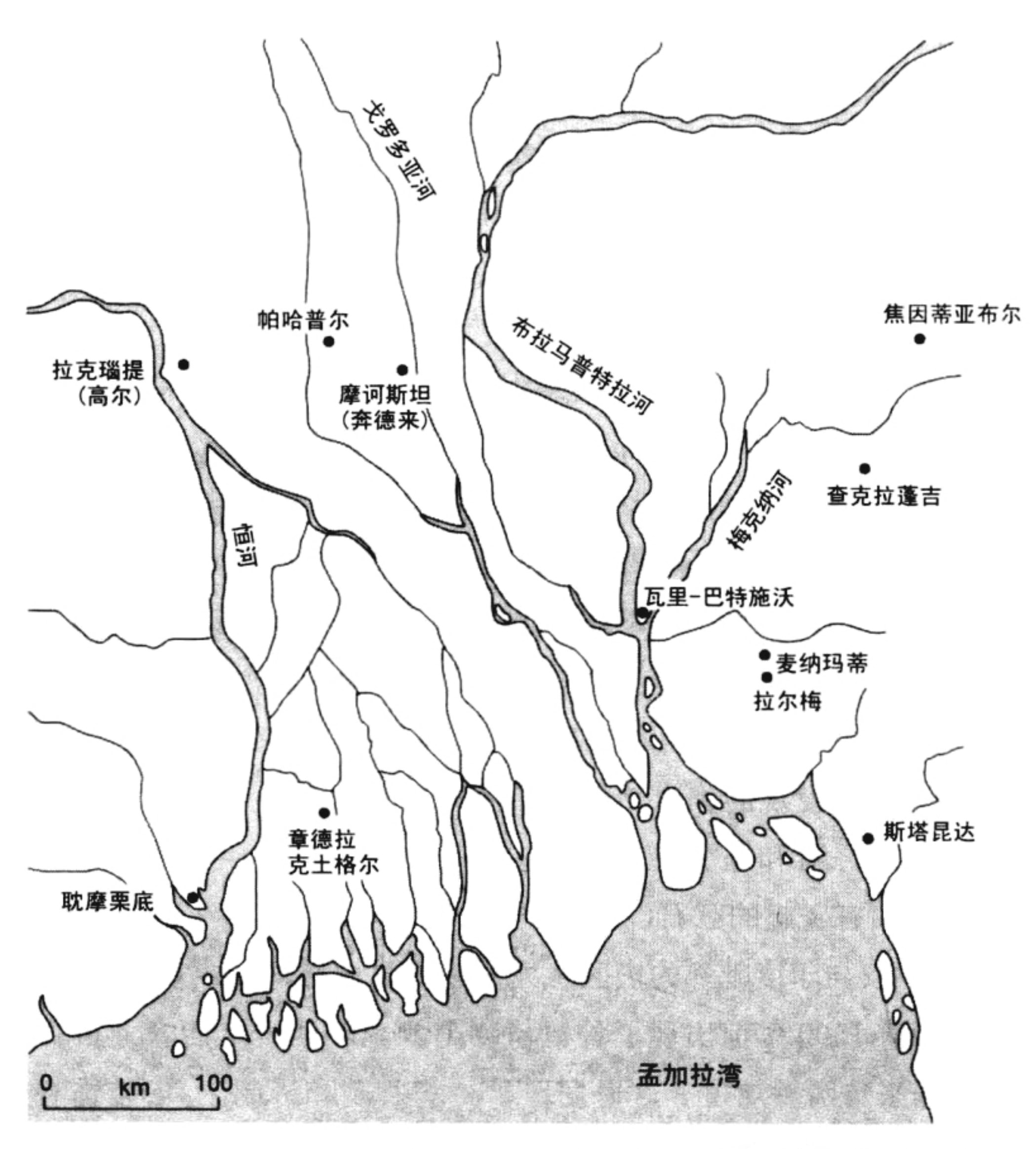
插图2.1　早期希舒的画像。出自Jardine (ed.), *The Naturalist's Library*, 254。

江豚的数量原本极多。1781年，著名孟加拉生物学家威廉姆·罗克斯堡(William Roxburgh)在报告中记录："恒河流域发现大量江豚，它们栖息在加尔各答东部和南部的那片恒河三角洲上，在缓慢流淌的河流与溪湾迷宫中看起来十分惬意。"数年之后，它们的数量减少了。如今可能只有几千条幸存(包括在印度和尼泊尔发现的)，它们的生存受到了威胁。水坝和堤围隔离了它们的育种群体并阻碍了季节洄游。河流的疏浚与发展破坏了它们的栖息地，水污染使其生命变短。许多希舒因为被渔网缠住而溺死——作为哺乳动物它们需要浮上水面呼吸空气。保护计划却落实得极为缓慢。

迄今为止的史前发现几乎全部都在泛滥平原周围的高地上。今天，孟加拉的东部山区和西部高原(现在属于印度的西孟加拉邦)提供了这一地区早期居民的最佳线索。在这里能找到石头、鹅卵石、硅化木(木化石)。在库米拉(Comilla)地区的小山区拉尔梅(Lalmai)、斯塔昆达(Sitakund，吉大港地区)和查克拉蓬吉(Chaklapunji，锡尔赫特地区)发现了生产手斧、刀刃和刮刀的硅化木手工业，考古学家们将这些与从印度西孟加拉、比哈尔(Bihar)、奥里萨(Orissa)以及缅甸伊洛瓦底三角洲(Irrawaddy)发现的相似工具联系在了一起。这些早期工具的制造者可能依靠狩猎和采集植物为生。在孟加拉东北的焦因蒂亚布尔(Jaintiapur)有竖起的巨石(石柱纪念碑和石牌坊)，其中一些被认为是史前时代的；与印度毗邻的山区也发现了大量这样的石头。[2]

公元前1500年前出现了种植植物与驯养动物。定居农业群体的最早证据来自西孟加拉。这里发现了一些石制和骨制工具，装饰有几何图案的陶器，铁制农业工具，种植水稻以及山羊、牛和水牛等家畜的骨骼。根据这些发现，在这片较为贫瘠的高原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似乎是以合作农业、动物饲养与狩猎为生活基础的，而那些居住在更为肥沃的三角洲冲积土地上的人们则更依赖于农业和渔业。这一地区的关键变化是从迁移农业演进为永久耕地上的灌溉水稻种植。这种类型的农业产量极高，从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定居点的增加以及各种手工业的

繁盛。从那时开始,水稻就塑造了孟加拉的历史。直到现在,灌溉水稻的稳定生产仍是三角洲地区所有社会和国家的基础。该地区居民的主要职业是从事水稻生产,而大米也是他们的主要食物。持续数千年的水稻种植的奇迹也许就是孟加拉历史上最大的壮举。



地图 2.1　古代遗址。河道是粗略估计的。请注意当时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主河道和现在的河道有所不同。

最初作为一种沼泽植物的水稻非常适应孟加拉的生态环境,在那里,当稻子在地里或者未脱壳时称为"达罕"(*dhān*),脱壳后称为"考尔"(*cāul* 或 *cāl*),煮熟之后称为"布哈特"(*bhāt*)。还有许多不同的词语来形容水稻的其他形态:半熟的、压扁的、磨碎的或者膨胀的。一代

代的种植者对水稻进行选择，使其适应自己的需要，尤其要考虑到抵御病害、生长季节和口味等方面。他们以这种方式发展出数千种品种（栽培品种）以适应当地农业生态状况的多样性。[3]三角洲地区培养出的特殊品种针对不同程度的洪水。可能其中最不同寻常的就是种植在低洼地区的"浮稻"(*jalidhān*)。当洪水开始的时候，这些植物的茎会以令人吃惊的速度生长，高达 5 至 6 米。这就使它们能够浮游在很深的水中得以存活。

15

一种土地的使用模式很早就已成形。最高的地方作为宅地和果园（种植芒果、榴莲、椰子和槟榔），稍低的地方种植稻秧和蔬菜，中间地带和低地则种植水稻。中间地带的土地往往种植两种稻类作物：春稻(*āuś*，3－8 月)，其后是秋稻(*āman*，6－12 月)。在每年都发洪涝的低地地区则主要种植秋稻，其后是冬稻(*boro*，2－4 月)。乡村点缀着一丛丛宅地，建在人工的，用于喝水、洗衣和养鱼的池塘(*pukur*)周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从世界其他地方引进了新的农作物(比如马铃薯、番茄、辣椒和从美洲传来的烟草)，而一些农作物(比如靛蓝、甘蔗、黄麻)也在商业上变得日益重要时，种植模式也发生了变化。

城市生活的出现

以水稻为基础的三角洲农业的成功为定居的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这也使公元前 5 世纪前后出现了城市中心、长距离海上贸易和孟加拉第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国家。考古学家在孟加拉东部的瓦里-巴特施沃[Wari-Bateshwar，诺尔辛迪地区(Narsingdi)]已经开始发掘一个与东南亚和罗马世界进行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迄今为止，他们发现了有防御工事的城堡、铸有标记的银币、许多铁制和陶制的器具，以及一条以陶瓷碎片和碎砖铺成的路。这些发现表明瓦里-巴特施沃是布拉马普特拉河畔(其后便改道远离了)一个重要的行政中心，有着繁盛的冶铁业和宝石业。有很充分的证据显示其对陶土的使用，这在当地是易得的原料。在一个少有石块的环境里，墙由陶土和砖块垒成，因此制陶技术非常重要。[4]孟加拉的艺术家和匠人从那时候起就开始用陶土展

现他们的想象力,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赤土陶器(terracotta,烧黏土)。[5]正是这些早期艺术家的赤土陶作品为我们提供了自古以来孟加拉日常生活最生动的信息(插图 2.2)。



插图 2.2 收获。赤土饰板残片,章德拉克土格尔(Chandraketugarh),公元前 1 世纪。[6]承蒙 West Bengal State Archaeological Museum, Kolkata 及 Centre for Archaeological Studies and Training, Eastern India, Kolkata 提供。

公元前 3 世纪,在孟加拉泛滥平原上已经建成了复杂的城市中心,比如西南部的耽摩栗底[Tamralipti,亦即现今的塔姆鲁克(Tamluk)]、北部的摩诃斯坦(Mahasthan)和东部的麦纳玛蒂(Mainamati)。孟加拉最早的书面记录是在博格拉(Bogra)地区的摩诃斯坦发现的一份石刻铭文。它表明这座城市[当时称为普塔纳格

拉(Pudanagala)或者庞德拉纳格拉(Pundranagara)]在孔雀帝国统治北印度时期曾是一个重要的城市中心。有人提出,摩诃斯坦可能是当时孔雀帝国的行省首府。这份铭文以帕拉克里语(Prakrit)写成——孟加拉语就是在10世纪时从这种语言中发展而来的。它好像是一道命令,要求以大米、油、树木和钱币装满仓库,从而防备由大水、火灾或者鹦鹉对粮食的破坏等引起的紧急状况。其文本所用的是婆罗米文字,因此这一重大发现被称为"摩诃斯坦婆罗米铭文"(插图2.3)。

17



插图 2.3 摩诃斯坦婆罗米铭文,公元前3世纪。
承蒙 *Banglapedia — The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提供。

摩诃斯坦[或称莫霍斯坦戈尔(Mahasthangarh)]在这个时期之前就已经有人居住,从那时至今也一直有人居住。这处大型遗址为6米高的防御墙所围绕,迄今其上已经发现了18层建筑遗迹。

早期的赤陶饰板显示出,对陶土的使用是对城市文化的精致诠释。最著名的是三角洲西南部一地区的华美饰板,考古学家称此地为"章德拉克土格尔"(Chandraketugarh),现在孟加拉国西部与印度的边境上(插图2.4)。[7]这些饰板上描绘了神明与有权者、交媾的夫妇、自然的风景以及日常生活的景象。



插图 2.4 “贵族家庭”。赤土饰板，章德拉克土格尔，公元前 1 世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Purchase，Florence 与 Herbert Irving 捐赠，1992 年(1992.129)。Image ©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York.

谁是这些孟加拉三角洲早期村庄和城镇的定居者呢？有各种各样的群体，如耕种者、渔民、手艺人、宗教人士、商人和统治者，他们当然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孟加拉人。孟加拉的地名及孟加拉语各种方言中的词汇，表明当时人们使用的语言属于完全不同的语系：藏缅语族(Tibeto-Burman)、南亚语系(Austro-Asiatic)和达罗毗荼语系(Dravidian)。[8] 印欧语系(孟加拉语属于其中)的语言只是在公元前 4 世纪左右才开始传播，可能是统治者的语言。操这种语言的人将他们在孟加拉碰到的语

18

言称为"卑劣的"(*āsura*)。[9]在现代孟加拉语中，许多和水、土地、自然、农业、渔业以及定居相关的词语被认为是从这些早期语言中演化出来的，比如低地(*bil*)、高地(*ḍāṅgā*)、开阔地(*kholā*)、泥造的(*kā̃cā*)、水坑(*ḍobā*)、宅地(*bhiṭā*)、村庄(*paṭṭi*)、犁(*lāṅgal*，*hāl*)、渔网(*jāl*)和森林(*jaṅgal*)等。今天，这些古老的语言仍在孟加拉有存在，但是就使用的人数来说，与孟加拉语相比就相形见绌了。藏缅语族中包括卡西语(Khasi)、格罗语(Garo)或阿本语(Abeng)、科赫语(Koch)、阿拉干语(Arakanese)或若开语(Rahkain)、姆鲁语(Mru)和马尔马语(Marma)；南亚语系中有桑塔尔语(Santal)、蒙达语(Munda)和马罗语(Malo)；达罗毗荼语系则以库鲁克语(Kurukh)或奥朗语(Oraon)为代表。

19

孟加拉的语言史解释了考古学家长期回避其史前阶段的原因。我们对于南亚考古的了解最详尽的是通过那些用印欧语系的语言，尤其是梵文和帕拉克里语写成的大量早期文献。用这些语言写作的人来自恒河河谷更西的地方，而他们对今天孟加拉国这一带知之甚少。在大多数史诗当中，孟加拉三角洲被视为遥远的蛮人之地，超越了梵文文化的边界，而且任何一个从那里回来的人都不得不经历"赎罪仪式"(expiratory rites)。随着时间的推移，梵文作家也在某种程度上修订了他们的观点。随着他们的文化中心从恒河三角洲上游向东移动到中部，他们获得了更多关于西孟加拉的知识，虽然仍认为那是一片未开化民族统治的地区，但却是一个值得去征服、劫掠和索贡的地方。东孟加拉在更长的时间内仍然不为他们所知。认识这一地区是个很缓慢的过程。到7世纪——可能是他们到达三角洲西岸一千年之后——他们将东孟加拉的锡尔赫特描述为"在人类居住的界限之外，在这里自然的和人造的没有区别，到处都出没着野生动物和有毒爬虫，并被森林植被所覆盖"。[10]事实上，可能直到11世纪末的时候，梵文学问才开始在孟加拉地区广泛传播。[11]

对梵文作者来说，孟加拉不是一个界定清晰的地区。他们有一系列的名称来称呼我们今天所知的孟加拉的地区和群体，这些名称在不同的文本中也有所不同。今天，学者们常常无法确定这些地区和群体

究竟在哪里。罗哈(*Rāṛha*)是西孟加拉一个地区的地名,奔德来(*Puṇḍra*)、婆连陀罗(*Varendri*)、高尔(*Gauṛa*)则是孟加拉北部地区的地名。万加(*Vaṅga*)被认为曾位于中孟加拉,而三摩呾咤(*Samataṭa*)和诃利鸡罗(*Harikela*)则在东孟加拉。梵文文献中也提到了奔德来、万加、罗哈这些民族可能占据了现在的孟加拉国地区。[12]

丰富的梵文文献将学界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那些操这种语言的作家最熟悉的地方。很明显,孟加拉并不属于这些地区,由于在操印欧语言者到达这一地区之前并无有关孟加拉的书面记载,早期南亚的考古学家们就倾向于忽视孟加拉。另一方面,孟加拉的考古学家们也常常为想证明这一地区并非蛮荒之地的愿望所激励。因此,他们后来集中精力要证明那些不朽的遗迹为"高度文明"。

20

但为了了解早期孟加拉,我们需要超越"梵语视角"或为了自吹自擂而探寻往昔荣耀的视角。从公元前 5 世纪起,当梵语文化第一次从西部来到孟加拉三角洲时,孟加拉就成了梵语与非梵语世界观交汇、冲突和融合的边界。这种互动充满了孟加拉的历史,只从分界线的任何一方面来讲述就会使其不完整。这个边界既是文化的也是领土的,对于整个孟加拉三角洲的群体和个体特征都深具影响。自梵语文化的影响力辐射到这里后,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里,它向东传播得非常缓慢,并在这个过程中为大量的非梵语因素所改变。而且,这条边界从未消失过。甚至直到今天还能在孟加拉文化中看到梵语文化与非梵语文化的冲突,在东孟加拉甚至还存在着领土上的争议。

关于孟加拉是如何展现梵语与非梵语世界观在这千年中的交汇的,考古的新方法可以提供很多重要信息。幸运的是,这些新方法现在正首次被引入孟加拉。对早期孟加拉三角洲考古层和日常生活的严谨的科学发掘已经表明,这仍是一个有待于探索的世界。[13]

国家的兴起与衰落

孟加拉三角洲的农业生产使早期社会发展为分层社会与经济多样化的社会成为可能。如同我们所看到的,考古记录表明,城市中心早在

公元前5世纪就兴起了。在其后数个世纪里，大城镇在大河沿岸而非暴露的海岸边发展。这些城镇的命运与三角洲河流的喜怒无常密切相关：每一次河流改变河道和港口淤积，城镇也会随之走向衰落。早期的牺牲者是耽摩栗底，它曾是印度最大的港口之一并可能是“中国与亚历山大之间广袤区域内的首要贸易中心”（地图2.1）。[14]在驰名了一千年之后，其命运因为8世纪时三角洲向南扩展造成的港口淤塞而改变。今天，这里是一个内陆城镇，名为塔姆鲁克。

拉克瑙提-高尔（Lakhnauti-Gaur）也证明了沿河城镇的变迁。当这座繁忙的港口在三角洲西北恒河三股河道的交接口上建立时并不为人所熟知，但很明显它经历过数次发展与衰落的轮回（地图2.1）。12世纪时，这里是森纳（Sena）王朝的首都，摩洛哥旅行者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h）曾在150年后参访过这里。15世纪时，它是南亚最大的城市之一。1521年，一位葡萄牙旅行者发现，这里宽敞笔直的街道上挤满了车子和行人以致难以移动。房子是单层的，并带有庭院和花园。许多墙壁和楼梯上铺有装饰用的蓝色和金色瓷砖，这可能是中国的舶来品。这座城市大约有20万人口（还有一种估算认为当时的人口是120万）。

21

就像孟加拉历史上所有的沿河城市一样，高尔也受到河流赐予其繁盛或将之拿走的力量的影响。在其全盛期（13世纪早期至1575年），高尔被建立和废弃了数次，都源于恒河向西移动然后又流回来。当河流移走时，不仅是经济上的灾难（即使修造了引水渠，船只也无法进港），也是健康上的灾难，因为随着沼泽的形成，疟疾和其他热病就会爆发。1575年，一场严重的传染病敲响了高尔的丧钟：河流再一次移走了，这次，政治上的不稳定以及与东南亚贸易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决定了它的命运。今天，河流在距离高尔遗址大约15公里处流淌。这个遗址延展在180平方公里（即长为30公里，宽为6公里）的区域内，包括壮丽的城门、防御工事、宫殿、寺庙、桥梁、堤道、水渠、装货台和地下排水沟（插图2.5）。[15]这个遗址一部分位于孟加拉国境内，而另一部分则越过了边境属于印度。



插图 2.5　北部通往高尔要塞的关隘遗迹，约建立于 1425 年。

高尔的兴起与衰落只是三角洲长期易变的城市历史中的一个插曲。像孟加拉三角洲的河流与村庄一样，城市中心的力量和商业也总是相当易变的，他们所服务的居民和商路也是如此。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统治三角洲的政治组织和国家。

孟加拉三角洲国家形成的早期历史可以被描述为地方性或区域性政治体的持续出现与衰落，偶尔才会整合为大的王国。这样的整合有多牢固，其怎样影响地方上的统治者以及对全体民众意味着什么，这些我们至今仍不清楚。许多学者认为，孔雀王朝（Maurya，约公元前 324 —187）和笈多王朝（Gupta，约 320 — 570）的影响范围覆盖了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然而证据却是支离破碎的，西三角洲（现在的印属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的西部）比东三角洲更常成为大国的一部分。以印度为中心区域的国家向东扩展它们的影响力，这种情形只是偶尔才会逆转，出现一个孟加拉区域性国家向西扩张。这可能在 7 世纪时发生过，孟加拉北部国家高尔的统治者萨桑卡（Sasanka）曾闯入北印

22

度，而帕拉(Pala)的统治者则在8世纪和9世纪时更成功地重复了这件事。三角洲东部和吉大港南部地区一系列地方小国和短暂整合体曾形成国家，其权力中心向东到特里普拉(Tripura)，向南到阿拉干(Arakan)。

然而，大多数时候，孟加拉的政治体都看起来相对较小且短暂，早期资料里面很恰当地将这种情况形容为"鱼吃鱼"(*mātsyanyāyam*)。在这些政治分裂的时期内，"每一个刹帝利、贵族、婆罗门和商人在自己的家里都是国王……而这里并没有一个统治全国的国王"。[16]

很难去评估统治者对于农业人口的实际权力。什纳·潘加(Sheena Panja)认为，诸如帕拉王朝(Pala dynesty)的统治者在泛滥平原上建造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遗迹，事实上正是控制力薄弱的标志。这些高耸的砖结构建筑[比如帕哈普尔(Paharpur)，约公元800年，见插图2.6]意欲铭写他们在泛滥平原易变的土地上的不朽权威，而当地那些习惯于暂时性生活的人们，可能对此根本不以为意。[17]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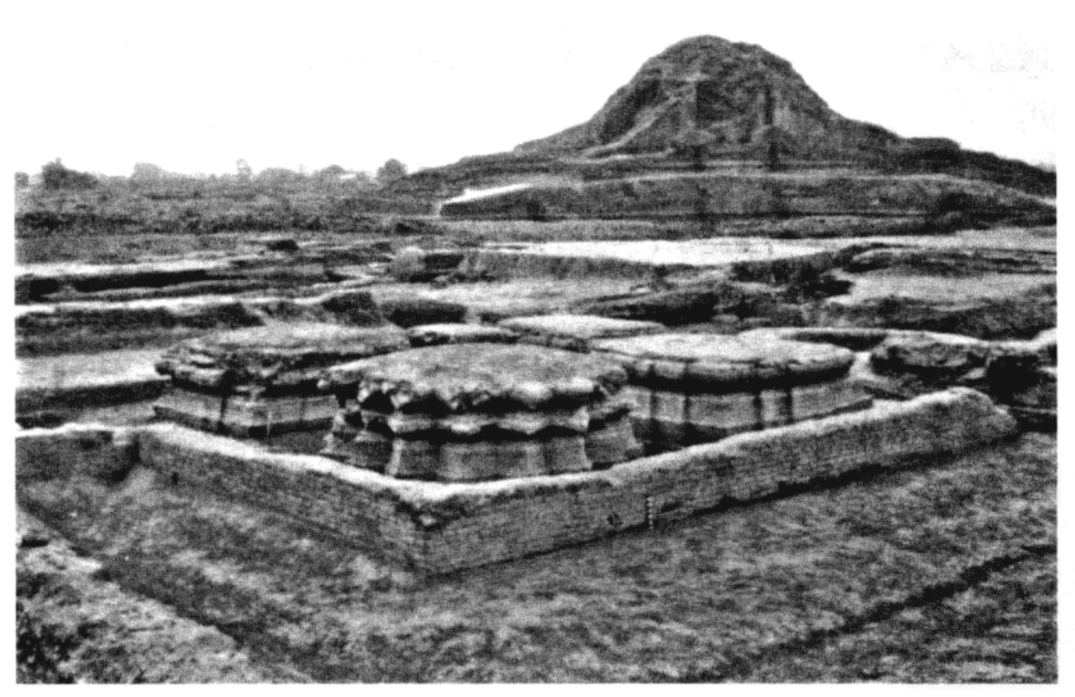


插图2.6　孟加拉西北部帕哈普尔遗迹。承蒙 Instituut Kern，Universiteit Leiden 提供，P-040408。

虽然关于孟加拉三角洲的考古记录十分零碎，其仍显示出一种贯穿这一地区整个历史的模式：即三角洲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并不符合整个南亚的，甚至北印度的模式。虽然三角洲与其周边地区存在着各种各样经济和政治的联系，但它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向行进，想将其整合入更大政治实体的努力常常是失败的。

第三章　多重边界的地区

24

孟加拉的历史就是一部边界的历史。从最初开始，孟加拉就是各种对立物的汇集之地，正是这些遭遇、冲突和调节赋予了孟加拉鲜明的特色。在这一章里，我将详述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的观点，他认为，孟加拉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系列移动的边界的历史。[1]

我们已经看到了陆地与水的边界——主要是从北向南移动，以及梵文的边界——从西向东移动。这些都很古老，但又在今天的孟加拉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在本章中我们将看到另外四条边界，其在历史上都是向东移动的。

耕地边界

这一边界将灌溉土地的耕作者与迁移农业的耕作者和森林地区区分开来。在三角洲，至少2 500年前就出现了筑堤围绕的耕地，其依靠季风降雨灌溉，以犁来耕作。从那时开始，这种作物生产的模式便逐渐扩展到低地地区，取代了在暂时的小片土地上进行锄耕劳作的旧模式。今天，后一种生产方式仍能在孟加拉看到，但仅限于山区，因为在那里无法维持灌溉耕地。[2]

灌溉农业的传播是缓慢且不均衡的，因为其形成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耕种者必须清除森林、平整土地、修筑堤围和灌溉水渠。维持灌溉

农业的运作甚至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然而，一旦成功的话它将能够长期供养稠密的人口。只有灌溉农业建立起来并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不仅可供给耕作者本身，并且能供应新出现的不耕作的消费阶层时，早期孟加拉的城市中心才可能发展起来。

25

与耕地边界向东进军并行的，是对孟加拉繁茂雨林的逐渐破坏。到 19 世纪末，这一进程使大多数雨林都变成了农田。雨林的消失也加速了农业上的危机。孟加拉的农业体系基于一种扩张性的力量；为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必须推进耕地边界。随着森林的消失，三角洲农业遇到了瓶颈。孟加拉的耕作者再也无法开垦新的土地，他们试图通过两种策略来与这一正在逼近的停滞做斗争。第一种是被称为“耕地轮作”的方法。[3]他们利用更多的劳动力以加强耕作、增加产量，在一片土地上一年中种植两到三种作物，并引进更多的经济作物。第二种策略便是通过移民来自救。三角洲的耕作者试图到先前被认为过于危险的地区(比如大河里的或者孟加拉湾以外的岛屿)或过于遥远的地区进行耕作，以保持耕地边界的移动。从这一时期开始，有相当数量的定居者迁移到孟加拉三角洲东部边境以外的地区，尤其是阿萨姆(Assam，现属印度)、特里普拉(现属印度)和阿拉干(现属缅甸)。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给孟加拉历史带来了一种新的因素。通过迁移到其他种族所占领的地区，他们开创了一种具有民族色彩的政治力量。在 20 世纪，像阿萨姆、特里普拉和阿拉干这些地方的民众和国家政权都会发起抵制孟加拉国移民的运动。

国家边界

孟加拉三角洲的第二条边界是国家和其他统治形式之间的。我们已经看到国家最先在南部和西部出现，逐渐扩展覆盖了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但是这并非唯一的领土组织形式。其他统治方式也盛行于三角洲部分地区和周围山区，包括小型且常常不稳定的村庄领导联盟。对于三角洲的大部分历史来说，正是这种联盟占据着统治地位，偶尔会被大型国家的出现所打断。有时这些大国会兼并小国及其首领属地，

但它们却无法“爬上山去”。[4] 直到成为殖民地国家这一国家边界才消失，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打进了山区并将其吞并入自己的殖民地。

26

孟加拉最后一块被归入国家统治范围的地区是东南山区，其在1860年被英国占领，并称为吉大港山区(Chittagong Hill Tracts)。今天，这里的国家统治形式仍与平原地区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边界仍旧存在于吉大港山区的行政安排中，孟加拉国政府在那里继续采用殖民时代形成的地方性法规和政治形式。其中包括非直接统治的痕迹[由三个首领或拉加(raja)共管]、地方性税收系统，以及土地权利和代表形式(比如“地方议会”)，这些都与孟加拉国其他地方不同。[5]

宗教边界

第三条是将居民按不同宗教划分的边界。我们对孟加拉宗教认同的早期历史仍然所知甚少。考古学家们发掘了许多绘有女性和男性形象的画像，认为其表现了强有力的女神和神祇，但我们对赋予这些画像意义的社群宗教所知极少。这幅图景大约在两千年之前变得较为清晰可辨，神明所展现出来的肖像特点使其置身于南亚和东南亚其他地区更为宽广的宗教信仰内。在孟加拉三角洲，这些信仰——今天所知的有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似乎在数个世纪里共存，并成为梵文文化东进过程中的一部分。早期中国的朝圣者将孟加拉的城市描绘为进行宗教学习的地方。比如玄奘——也被称为唐僧(Hiuen Tsiang)——曾在大约公元640年游历过东孟加拉的三摩呾咤国。他这样描述道：

> 三摩呾咤国周三千余里。滨近大海，地遂卑湿。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稼穑滋植，花果繁茂。气序和，风俗顺。人性刚烈，形卑色黑，好学勤励，邪正兼信。伽蓝三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并皆遵习上座部学。天祠百所，异道杂居。露形尼乾，其徒甚盛。[6]

虽然像玄奘这样的宗教专家能够清晰地区分这些信仰，但我们并不知道孟加拉普通信众在多大程度上将这些宗教形式理解为分离的，

或是一种混合的整体。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宗教如何与先前存在的宗教相互影响，或者它们在何种程度上超出城市中心向外扩散。然而，很明显，许多当地的神明逐渐被合并进梵文宗教中，并赋予其一种特别的宗教意味。一个典型的宗教特色便是对强大的女神的持久崇拜：摩奴刹(Monosha)保佑信徒不被毒蛇咬伤；坎迪(Chondi)是森林生活与狩猎的守护神；施妥拉(Shitola)保佑人们不得天花；迦利(Kali)则是严酷与复仇之神。[7]

27

早期的孟加拉文献提供了多种边界——梵文的、耕地的、国家的、宗教的——重叠的证据。一些赞颂神明的叙事诗(*maṅgalkābya*)描绘了不同神明的信徒之间在公元 1300 至 1500 年前后发生的斗争。早期农业人口信奉的主神是湿婆(Shiva)：

> (湿婆)是仁慈与善良的神明，是能搅动乳海并能饮尽毒药的潮汐的崇高存在。对他的人民来说，他是高赛(*gosāi*)——人群的所有者，以及帕布(*Prabhu*)——主人，这是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普通神祇的简单称谓。他的标志是犁而非三叉戟。[8]

他的信徒同两位女神的追随者相对抗。其中之一的摩奴刹可能起源于和妇女、牧人以及渔民相关的家内神。[9]而另一位坎迪则与猎人、森林相关。这两者都被认为是前梵文文化时期与非犁耕文明相连的本土神明。两者都没有专门的祭司，然而对她们的崇拜逐渐在讲孟加拉语的水稻种植者中流行起来，这些人后来逐渐处于现在称为婆罗门印度教(Brahmanical Hinduism)这一国家支持的宗教影响下。[10]通过这种方式，这些神明不仅跨越了梵文边界，也越过了耕地、国家与宗教的边界。

正是在这样一个宗教认同多元、变化的复杂世界里，一种新的教义——即伊斯兰教又分两波进入了这一地区。第一次是在 8 至 12 世纪，伴随海上运输贸易来到了孟加拉沿海地区。那时，阿拉伯和波斯的旅行者和商人都是穆斯林。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沿东南海岸定居。阿拉

伯文献中提到的萨满达尔(Samandar)这个港口城市,可能就是今天吉大港早期的名字。[11]在13世纪早期,伊斯兰教也通过陆路到达孟加拉,这次则是作为强大征服者的宗教到来的。理查德·伊顿这样描述了这一事件:

> 大约在1243—1244年,孟加拉西北部城市拉克瑙提(Lakhnauti)的居民向来访的历史学家讲述了一个大约40年前发生在那里的戏剧般的事件。他们告诉他,那时,一帮由数百名突厥骑兵组成的队伍从恒河平原向着孟加拉三角洲方向疾驰而来。他们由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巴克蒂亚(Muhammad Bakhtiyar)的彪悍长官率领,蹂躏了比哈尔附近历史悠久的佛教寺庙,然后将注意力转到了三角洲西北部。当时那里正由文雅而仁慈的印度教君王所统治。巴克蒂亚及其随从假扮成马商溜进了奴底亚(Nudiya,可能就是现在的拉杰沙希区)的皇城。他们一进城就直奔国王的宫殿,在那里遭遇到了挥舞着武器的卫士。这位印度教君王刚准备用晚膳,他完全不知所措,匆忙从后门逃走,同他的众多侍从逃往东孟加拉的森林深处,完全放弃了自己的首都。[12]

28

这些新移民的到来最终被证明意义重大,因为其标志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里,伊斯兰教是统治孟加拉大部分地区(事实上,更是整个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所信仰的宗教。这一常常被称为“苏丹时代”(Sultanate period,一直持续到16世纪[13])的时期大约持续了5个世纪。其后则是莫卧儿时代(Mughal period);它直到英国人在18世纪中期征服孟加拉才结束。之所以说穆斯林在孟加拉统治的建立意义重大,是因为这里始创了一个在印度其他地区没有发生的过程:在孟加拉,大多数人逐渐皈依伊斯兰教(参见“圣人沙·贾拉尔”)。当时没有人会想到,有一天这将会对国家的形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没有占孟加拉人口大多数的穆斯林,也就永远不会有一个21世纪称为孟加拉国的国家。

圣人沙·贾拉尔

回顾1346年两位来自地中海的探险家在孟加拉三角洲的相遇，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主人是土耳其人。在三十几年前他曾定居在三角洲一个遥远的角落里。旅行者来自摩洛哥(Morocco)。他已经在亚洲旅行了二十多年。在去中国的路上，他的船只在印度洋上沉没，后来他来到了孟加拉。主人沙·贾拉尔(Shah Jalal)已经非常著名，客人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h)也注定要因其旅行的记载而闻名。

沙·贾拉尔从他的故乡科尼亚(Konya，在土耳其*)经陆路抵达锡尔赫特(孟加拉东北部)，当时邻近国家的军队占领了这一地区。他可能曾在军队中服役，但这并不是使他成为传奇的地方。在他定居锡尔赫特之后不久，关于他具有非常精神力量和神迹行为的传说便开始传播。沙·贾拉尔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穆斯林宣教士。

在14世纪的孟加拉找到一个土耳其传教士并不像其可能看起来那么罕见。沙·贾拉尔属于苏菲派(sufi)，这一伊斯兰教派的成员期望通过冥思、苦行和讲道建立与安拉的直接关系。苏菲派在整个南亚的伊斯兰教传播上非常积极。第一个宣教者大约在沙·贾拉尔之前150年就来到了孟加拉，并且苏菲派的宣教士还将在数个世纪里继续慢慢进入这一地区。他们大多数来自中亚、阿拉伯半岛、伊朗和土耳其。

正是沙·贾拉尔作为一名苏菲派圣人的声誉使得伊本·巴图塔沿孟加拉河流水路长途跋涉。伊本·巴图塔将这位老人描述为高大、瘦削，并留着稀疏的胡须。在锡尔赫特待了三天之后，伊本·巴图塔又到了附近的霍比甘杰(Habiganj)——这里现在是一个不起眼的城镇，但当时在那位目击者眼中，这里是"最大与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从那里到索纳尔冈(Sonargaon，达卡附近)，顺着"蓝河"(可能就是梅克纳河)而下是十五天的行程。伊本·巴图塔对孟加拉水稻的丰富印象深刻。[14]

沙·贾拉尔在次年去世，他的坟墓就成为其追随者聚集并向他祈求保

* 关于沙·贾拉尔的出生地存有争议。这里我依据Karim(2003)的观点。他的观点建立在一篇于锡尔赫特发现的碑文上。

佑的地方(插图3.1)。虽然更为正统的伊斯兰教经文解释对将一位灵性导师的墓穴作为崇拜对象并不赞同,但在苏菲派中却是受到鼓励的,且直到今天在孟加拉三角洲地区都相当流行。沙·贾拉尔圣祠是其中最大且最受崇拜的。它吸引了来自整个孟加拉乃至南亚其他地区成千上万的信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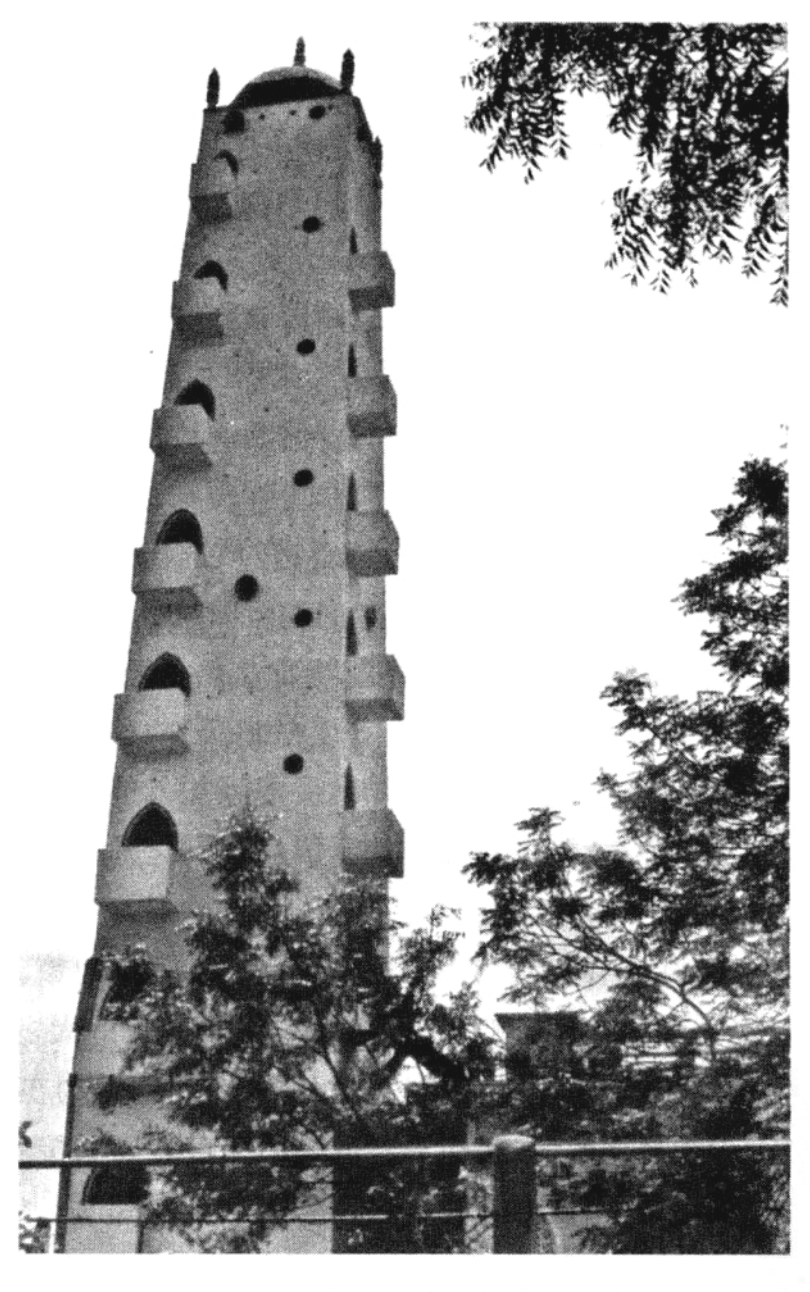


插图3.1　沙·贾拉尔在锡尔赫特的圣祠。

伊斯兰教怎么会在这样一个远离中东，并且其周围地区都未受到如此深远影响的地区成为主要宗教呢？它如何成为乡村人口的主要信仰，而在南亚其他地区则主要只是城市中的教义？皈依伊斯兰教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伊斯兰教在东孟加拉比西孟加拉成功得多？理查德·伊顿详细地考察了这些问题，认为答案在于在东孟加拉地区历史的关键阶段中，耕地边界、国家边界和宗教边界是共同移动的。

16世纪，当莫卧儿王朝统治今天孟加拉国的大部分地区时，耕地边界决定性地向三角洲东部移动。国家官员们正好碰上了一次生态巨变的顶峰：孟加拉盆地逐渐向东倾斜（这一运动迄今仍在继续），恒河于是改道向东（现在的博多河），结果，三角洲东部的农耕潜力增加了。莫卧儿官方急于提高其课税基础，便鼓励民众砍伐森林，建立犁耕水稻农业。为了这一目的，他们颁发许可并拨款以激励殖民者去开垦三角洲东部的土地，然后交纳土地税。殖民者需要动员劳动力，而这给予了那些享有宗教权力与虔诚荣誉的"克里斯玛式先锋"（charismatic pioneers）极大的优势。他们招募追随者，在政府支持下建立一个圣祠，并使其在周围定居。这个以圣祠定向的组织[在穆斯林中常称为舒玛兹（shomaz）]提供了一种社会秩序。新建立的社区常常由大量来自孟加拉西部和北部（那里的土地远没有以前肥沃）的移民组成，他们砍伐森林并开垦稻田。当地的游耕者和渔民或者加入他们，或者选择向森林、沼泽的更深处迁移，以使自身处于国家控制之外，但仍与那些定居的水稻种植者保持贸易关系。

31

莫卧儿王朝并没有实行在孟加拉推广伊斯兰教的政策，许多受到国家支持的克里斯玛式先锋都是印度教徒。然而移民的大多数却是穆斯林，其中许多被认为是精神导师（*pīr*）。因此，伊顿认为在三角洲东部——由"很少相互接触，即使接触也只是同印度教文明接触的社区"占据着——伊斯兰教开始与国家认可的控制土地开垦以及水稻耕作和扫盲活动的扩展结合起来。[15] 当伊斯兰教发展成一种开拓森林与推进定居农垦的意识形态，耕地、宗教和国家边界就融合在一起了。在这个创造性的接受与转化过程中，东孟加拉的宗教传统和礼仪与新村庄里

的清真寺、圣祠开始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孟加拉和伊斯兰世界观的混合物。[16]伊斯兰教在孟加拉三角洲的胜利奠基于其教化。伊斯兰教的超人类存在首先被加入到当时的万神殿中，其后被等同于当地的强大神明，最终它们上升到一个如此显耀的位置以至于成功地吸纳了孟加拉文化——或者是被其吸纳。简而言之，"当亚当、夏娃和亚伯拉罕这些形象被认同为孟加拉历史和文明的主旨，伊斯兰教已经深深地、切实地扎根于孟加拉人心中了"。[17]

重要的是，伊斯兰孟加拉认同仍然牢牢植根于三角洲东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仍是一种低地认同，与西部——也就是梵文与伊斯兰教的中心地区相连，而从未成功传到高山或深入森林。居住在孟加拉三角洲周围山区与山脉中的人们从未接受孟加拉或伊斯兰认同。[18]这些山区的一些部分现属于孟加拉国，尤其是吉大港山区。当你从平原进入这些山区时，你将会立即感到已经越过了一道文化的边界。山区的建筑、食物、性别关系以及其他许多要素都倾向东方，接近东南亚地区。宗教是多种多样的：在姆鲁(Mru)、库米(Khumi)和钦(Khyeng)族人中是社群宗教；地方形式的佛教则存在于马尔马(Marma)、查克玛(Chakma)、塔乌昌戈雅(Taungchangya)和萨格(Sak)族人中；地方形式的印度教存在于特里普拉(Tripura)和梁/布荣(Riang/Brong)族人中；而且从20世纪初开始，多种形式的基督教也在巴乌姆(Bawm)、庞克华(Pangkhua)、钦、姆鲁以及卢萨(Lushai)族人中流行。这些团体中没有一个认同自己是孟加拉人。除了查克玛语以外，他们所讲的语言没有一种与孟加拉语有关。[19]

32

类似的是，伊斯兰孟加拉认同直到近来才在三角洲森林覆盖地区取得胜利。那里有许多非伊斯兰、非孟加拉认同的抵抗，比如三角洲中部的格罗人(Garo)；东北部的卡西人(Khasi)、格罗人和哈琼人(Hajong)；西北部的桑塔尔人(Santal)、奥朗人(Oraon)、科赫人(Koch)、马罗人(Malo)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的人；还有就是位于南部与东南部海岸的若开人(Rahkain)或阿拉干人(Arakanese)。[20]划定孟加拉国当今边界时，所有这些大不相同的人群都被归入到一个单独的分

类中：与在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族群——伊斯兰孟加拉人相对的少数民族。

语言边界

国家/农业/宗教边界与语言变化密切相关。今天这个国家常常被等同于“孟加拉语的”——“孟加拉国”表示“孟加拉人的国家”——这反映出孟加拉语在20世纪下半叶被赋予的政治意义。但从历史上看，孟加拉语成为这一地区的统治语言是个缓慢的过程。就语言方面而言，孟加拉国历史上显然是多种语言并存的。有些语言现在被视为边缘或者“山区”的，曾在数个世纪里在平原地区广泛使用：孟加拉中部[达卡和迈门辛(Mymensingh)]的格罗语、东北部(锡尔赫特)的卡西语、南部[吉大港和博杜阿卡利(Patuakhali)]的阿拉干语以及北部[朗布尔(Rangpur)和迪纳杰布尔(Dinajpur)]的科赫语。

现在被称为孟加拉语的语言是从帕拉克里语(Prakrit)的一些区域形式中发展出来的，操这些语言的人最早在公元前几个世纪来到了孟加拉。这些语言的使用逐渐向东扩展，据信它们在公元500年左右就在三角洲地区获得了广泛的使用。最早的孟加拉语著作大约出现在公元1000年，因此孟加拉的民族语言常常被认为是在约10个世纪之前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后来的历史则为人所知，因为精英阶层使用这种语言，创造了相当丰富且多样的书面文献。[21] 然而，一位译者在四十多年前的感叹在今天看来仍大部分是正确的：“这一文学传统是完整的，从9世纪或10世纪的佛教秘传文本……直到今天。有些令人吃惊的是，西方对于这一如此古老而又如此丰富的文学却知之甚少。”[22]

33

孟加拉语传播成为这一地区主要语言的过程历经数个世纪。然而，这不仅是因为其他充满生命力的语言团体的存在。同样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孟加拉语并非一直是统治、礼仪或者贸易的语言。在数个世纪里，孟加拉三角洲的国家权力一直为一系列非孟加拉人所掌控，其中包括阿富汗人、突厥人、北印度人、阿拉干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这些上层人士更倾向于用突厥语、波斯语和印度斯坦语而非孟加拉语处理事

务。这一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礼仪语言是梵语、巴利语(Pali)和阿拉伯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和英语则是海外贸易中的重要语言。因此这里有非常鲜明的语言多样性,许多孟加拉居民也必然要懂多门语言。孟加拉语最初是作为一门通用语出现的,其后作为一种母语的分布却非常不均衡。例如,在孟加拉东南部,阿拉干语直到进入19世纪前还保持着其作为一种联系语言的地位,并且许多群体从未接受孟加拉语为他们的母语。[23]甚至直到今天,在孟加拉的某些群体中(如在姆鲁),也并非每个人都会讲或能听懂孟加拉语。

随着新的使用者接受孟加拉语,这种语言便发展出区域性的方言。今天,孟加拉国人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方言来判断彼此的故乡。有三种方言对操标准孟加拉语的人们来说是不能理解的,因此这些方言应被视为另一种语言。第一种是锡尔赫特语(Sylheti),在孟加拉国东北部以及跨过边界接壤的阿萨姆地区(Assam,在印度)约有1 000万人使用这种语言——英国也有大量的锡尔赫特语定居者。第二种是吉大港语(Chittagonian),在孟加拉国东南部和毗邻的阿拉干地区(在缅甸)也大约有1 000万人使用这种语言。第三种是查克玛语(Chakma),在吉大港山区和毗邻的米佐拉姆地区(Mizoram,在印度)有几十万人使用这种语言。查克玛人从前使用的是一种藏缅语族的语言;后来在18世纪发展出了他们现在的语言。查克玛语和吉大港语虽然在结构上相关联,但却有独特的词汇和发音。

多重身份

这些不同边界的长期相互影响赋予了当代孟加拉文化一种特别多层次的结构。常常表面的意思与其内在含义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在分析孟加拉文化时了解这种复杂性十分必要。让我来举两个例子。

34

第一,当代孟加拉的性别关系还是按照男女之间力量的不同进行简单的描述。有很多证据支持许多妇女过着一种选择受限制的生活这个观点,但这并非全部。认为孟加拉妇女是父权制下无力牺牲

品的惯常表述，未能承认妇女通过文化传统挑战性别角色的事实。我们已经看到，从早期开始，孟加拉三角洲宗教中强大的女神就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中几个仍是文化中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地区的文学创作出来的许多女性形象，实在无法用“遭受压迫”来形容：

> 这些女英雄们身披战甲与盗贼(*dacoits*)作战，杀死狂暴的犀牛(并自然地以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方式完美地砍下它们的角)，骑着飞马去拯救自己的爱人，激情之下便将无知的人们变成公山羊充当良种家畜……通常以其治国才能来辅佐世界之王或王子。[24]

这样有担当的妇女——毕乎拉(Behula)和拉尔芒(Lalmon)是孟加拉的著名典型——便为挑战当下性别关系、否定父权制控制占主导地位的实践提供了大众的文化资源。[25]就如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将会看到的，三角洲历史上有许多深有影响力的妇女——特别是在政治、教育、倡议和艺术方面。任何要分析孟加拉性别关系变化的人都需要超越陈旧的观念，评估这些典范角色的力量。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宗教边界的，其通常被表述为一神论的伊斯兰教与多神论的印度教之间的明确界限。伊斯兰教对孟加拉三角洲居民的先验世界观的教化使这种简单的对比显得不堪一击。[26]对于大多数认为自己是穆斯林的孟加拉人而言，区别更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将对伊斯兰精神之神安拉的信仰与对其他超人类保护者的信念结合了起来。比如，孟加拉南部居民不敢在没有向邦比比(*banbibi*)——仁慈的“穆斯林”森林女神——祈祷前就进入松达班沼泽，就像人们对这位女神的男性对应者嘎兹·皮尔(*gāji pīr*，插图3.2)祈祷，能保护他们免遭猛虎与鳄鱼的伤害一样。孟加拉东部大河上的旅行者祈求神明博多(*badar*)保佑旅途平安。博多的伊斯兰教身份通过有时被称为博多·皮尔(*badar pīr*)得到了强调，表明他被视为某位传说中的皮尔或伊斯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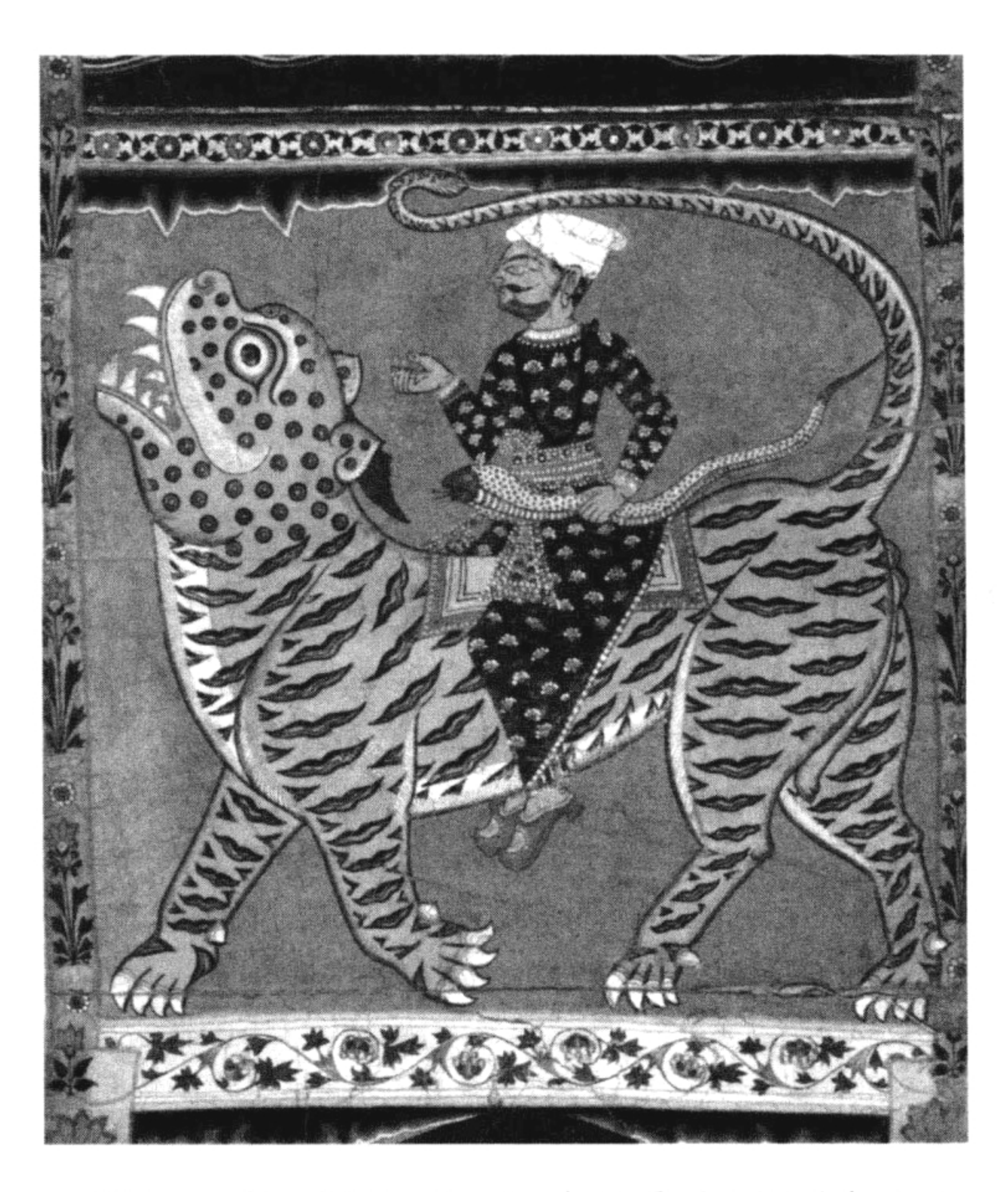


插图 3.2　嘎兹·皮尔(Gazi Pir)传说中的场景,展现皮尔骑着一头猛虎。卷轴画,19 世纪初。承蒙 British Museum, London 提供。

兰精神导师的神化形象。通过这种方式,孟加拉穆斯林采取实用主义将对众多神明(有些是以动物或鸟的形态)的崇拜加入到了他们的宗教实践中。[27] 许多神明受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共同祭拜。邦比比和博多与其他许多流行的神明联系在一起——比如潘池·皮尔(*pāch pīr*,插图 3.3)、沙陀·皮尔/沙陀·纳里安(*satya pīr/nārāyan*)、丛林神巴德沙阿(*bādsāh*)和霍乱女神奥拉比比/奥拉黛比(*ōlābibi/devi*)——它们仍旧跨越着宗教边界。[28]

36



插图 3.3　女朝圣者在潘池·皮尔(五圣人)圣坛献花，莫格拉帕拉(Mograpara，中孟加拉纳拉扬甘杰区)。

关于神明的事实也同样适用于一系列其他仪式和活动。孟加拉的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信徒们分享着许多仪式和活动。比如，一个 1907 年左右在吉绍尔甘杰(Kishorganj)的小村庄长大的小男孩后来对“在城镇的南郊进行的克利希那(Krishna)秋千节的大集市”描述道：

> 它在每年的 9 月到 10 月间举行。来到这里的不仅有当地的商人和所有东迈门辛的手艺人，还有从达卡和纳拉扬甘杰来的大商贾……我们进入集市左边的第一排都是书籍装订的柜台。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去都会发现那里非常繁忙。全年所有新购置的《古兰经》和用坏、损坏了的《古兰经》都拿来这里装订、重装并压印银花纹……这个集市虽然是为了庆祝印度教节日举办的，但同时吸引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另一活动)便是穆斯林的开斋节，我们这些印度教男孩也满怀最强烈的期待……我们所期待的是……去往祈祷者之地的当地民众游行，穆斯林柴明达尔(zamindar，地主)家族(其中的高级成员是祈祷者们的领袖)的大象队伍，以及民众和大象回来的时候。[29]

37

这种宗教活动分享的特别意义在当今孟加拉研究的主流认识中并未获得重视。在分析孟加拉社会时，作者们一边倒地对“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相互排斥、反对与独立等加以特别关注。认识到在孟加拉一直存在着对这种两级分类方法的强大文化抵制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关乎社会成规，还建立在最基本的宗教层面上。坚持精神统一而非相互反对的最强音可能就是包尔(Baul，*bāul*)这一团体的虔诚之歌所发出来的。他们自认为是一群非正统道路(*bartamān-panthi*)的追随者。[30]虽然他们的团体很小，但其音乐在孟加拉十分流行。每年在库什蒂亚(Kushtia)都会举办会演，这里是包尔最著名作曲家之一的拉龙·沙哈或称拉龙·法基尔(Lalon shah/Fokir)的故乡。他生于1774年，其歌曲(*lālan-gīti*)创造了孟加拉流行音乐的一种流派。另一位18世纪的作曲家莫顿·包尔(Modon Baul)这样表达了一种在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分离状况下呼吁孟加拉人宗教统一的思想：

> 那条引向你的道路凌乱地布满寺庙与清真寺，
> 哦，神啊！我听到了你的召唤却无法行动：
> 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导师堵住了我的路……
> 在你的门上挂满了许多锁：《往事书》、《古兰经》和各种诗文。
> 唉，主啊！这是多么可怕的折磨，莫顿绝望地哭喊。[31]

虽然包尔派自身在孟加拉社会中是边缘群体，然而其诗歌的广泛吸引力展现了他们所依据的各种信仰传统(尤其是密宗、外士那瓦和苏菲派)是如何在今天继续在持有各种宗教信仰的孟加拉国人之间回响的。

区域文化

渐渐地，多元而又时常相反的文化类型在孟加拉三角洲东部孕育出了一种特别的区域文化。一部分由于受到历史上各种国家兴衰的促进，一部分归因于三角洲农业群体的生活以及那些移动着的边界的综

合效应,逐渐产生了两种主要的身份认同。活跃三角洲的大多数居民与周围的人们不同,他们将自己同时视为穆斯林和孟加拉人。诚然,这个过程从未是均一的。何为穆斯林孟加拉人或何为孟加拉穆斯林,其含义在不断变化。这两种身份的意义相当不同,部分是空间上的,部分是时间上的。比如,孟加拉东部的穆斯林认同就比孟加拉西部的更为严谨。而对于孟加拉人身份的认同则在后来才为西北部的一些大型群体所接受,比如在拉杰邦什(Rajbongshi)直到19世纪才被接受。甚至直到今天,孟加拉国许多人仍只承认这两种认同中的一种或两种都不认同。有数百万生活在孟加拉国的孟加拉人不是穆斯林,而将自己看做是孟加拉印度教徒、基督徒或佛教徒。也有些穆斯林不认同自己是孟加拉人,比如若干说乌尔都语的穆斯林群体。还有许多群体既不认为自己是孟加拉人也不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例如查克玛人和加罗人。

无论如何,孟加拉人和穆斯林在这一地区确实有着重要的联系,这种联系已成为三角洲现代历史的主旋律。何为孟加拉穆斯林或穆斯林孟加拉人?对其意义进行的持续的创造性改进为文化表达、政治动员和社会组织提供了动力。这种认同的内在稳定性极大地提高了区域的归属感:只有在当今孟加拉国这个地方,孟加拉意识与伊斯兰教才融为了一体。如同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一系列统治精英都没能估计到这一融合认同在大多数民众中的中心地位,但这进一步加强了它的重要性。19世纪和20世纪有许多解放运动坚持了这一点。他们与国家精英的斗争使得国家形成的道路坎坷,同时也造就了我们所称的孟加拉国。

第四章　作为十字路口的三角洲

39

孟加拉三角洲的人口一直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这经常会导致定居人群的领土权与其他流动群体权利之间的紧张。这些紧张反映在多重移动边界和动态经济上。孟加拉三角洲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地方。相反,这一地区的一个基本特点便是朝巨大宽阔的印度洋和广袤腹地开放。一直追溯到我们能够重建的历史时期,其便形成一张远距离贸易、朝圣、政治联盟、文化交流与旅行的巨大网络。它为来自西面内陆的恒河平原、北面的中国西藏和尼泊尔、东面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人员和货物提供了一个通往外面更广阔世界的出入口。同样,贸易商、佛教朝圣者、政治特使和冒险家等想探访上述地区的人也必须经由孟加拉通过。正是在孟加拉沿海的水路上,东南亚人、北印度人、斯里兰卡人、中国人、阿拉伯人、中亚人、波斯人、埃塞俄比亚人和吐蕃人在很早的时候就相遇了。这一交通枢纽的地理延展范围十分广大,这可以根据1346年伊本·巴图塔的访问来说明。当时这位摩洛哥旅行者离开了印度南面的马尔代夫群岛,沿着商路经由斯里兰卡到孟加拉。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决定离开并搭乘了一艘开往爪哇的中国舢板船。[1]

孟加拉三角洲的居民招待着许多来访者,但他们自身也充当着长途贸易、旅行与海战中的重要角色。[2]海运贸易、财产与船只密切相关。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章德拉克土格尔和瓦里-巴特施沃等古代城市发

现的早期钱币上印有船只的图案。[3]我们在早期传说中找到了关于一个由商人澶多(Chando,*cāndo*)所率领的孟加拉贸易船队的描述,他那支由名为“蜜蜂”(*Honeybee*)的旗舰带领着的 7 至 14 艘船只组成的舰队启程驶往斯里兰卡。[4]

40 在三角洲,水路运输远比陆路运输重要得多。孟加拉是船只与水路的国度。早期的铭文常常以河港和船只码头(*ghāṭ*)来定义陆地边界。重要的官员被委任管理恒河沿岸的安全与通行费用,且主要城市往往都建在通航河流的岸边。[5]船舶也是流传下来最早的孟加拉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尤其是 10 世纪时的《察雅帕达》(Charyapada,*caryāpada*)。这些诗歌提到了三角洲地区的一种古老职业:在许多河流上将人们摆渡过去。“排队,女士,排队”,一位诗人催促一位妇女,很明显顾客们要付给摆渡者货贝(cowries,即小贝壳)作为费用。[6]

对货贝的提及说明了三角洲经济的开放性及其早期的货币使用。货贝并非在当地找到的;其必须从约有 2 000 公里之遥的马尔代夫群岛进口。这一贸易有古老的根源:公元前 3 世纪摩诃斯坦婆罗米铭文(插图 2.3)便提到了一种用来支付的东西,称为“*gaṇḍakas*”,可能就是指货贝。直到 19 世纪末,货贝还在孟加拉一些乡村作为货币使用。

孟加拉三角洲的位置允许其城市中心成为辽阔贸易网络上的节点,这些城市中心得益于它们的腹地、海上贸易线和当地生产的资源而兴旺起来。比如,与希腊的古代联系就由一枚银币所证实。这枚银币是在达卡附近发现的,约公元前 300 年的银德拉克马(drachma)。[7]下面便是一篇公元 1 世纪的希腊文本对孟加拉海岸的描述:

> 在大洋上靠右航行,海岸仍在左侧,恒河进入了视野,在其旁边是向东的最后一片陆地——克律塞(Chryse)。这附近有一条河流叫恒河,像尼罗河一样涨潮退潮。岸边是一个商贸城镇,和河流的名字一样,也叫甘吉斯(Ganges)。* 在这里能得到马拉巴斯卢

---

* 一般认为就是章德拉克土格尔(参见第二章)。

> 姆(malabathrum,肉桂*)、恒河甘松(Gangetic spikenard)** 和珍珠,以及被称为恒河式的最好的平纹细布。据说在这些地方附近有金矿,这里的金币被称作卡提斯(caltis)。就在这条河的对岸有一座大洋中的小岛,是向东最后一片定居者的世界,就在升起的太阳下方;它被称为克律塞(Chryse);*** 这里有厄立特里亚海(Erythraean Sea,即印度洋)地区最好的玳瑁。[8]

41

这里所描述的路径是两条主要的安全海上贸易商路之一。从孟加拉三角洲向西而行,沿着印度海岸到斯里兰卡,然后从那里到马尔代夫、印度西部、东非、阿拉伯和地中海。一系列三角洲西部的港口城市控制着这些贸易——最早且最为知名的是耽摩栗底(Tamralipti,地图 4.1)。另一条海路向东,沿着阿拉干和缅甸的海岸,其后向东南亚和东亚行进。控制这条海路最重要的古代港口是萨满达尔(Samandar)或称撒提港(Sattigaon),就是今天的吉大港——或者在其附近。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港口,但大多数都早就被遗忘了。例如,10 世纪的铭文提到一个叫沙瓦(Savar)的城镇,现在位于孟加拉国中部,其名字便源于其作为提供仓储服务的港口的功能。[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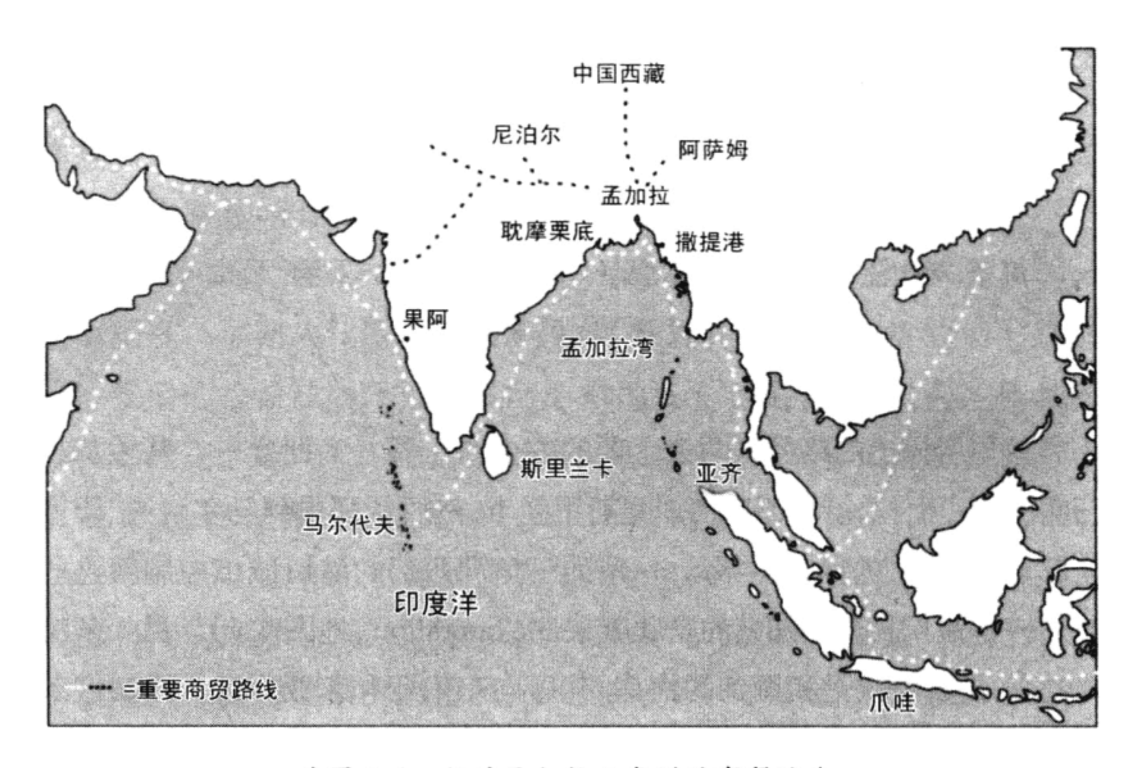
沿着这些商路来回交换着的商贸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从孟加拉出口的最古老的海运货物大概是来自喜马拉雅山脉的肉桂和甘松,来自阿萨姆的沉香木和犀牛角,从中国经陆路运来的丝织物、纱线和丝绵,来自北印度的战马以及来自三角洲地区自身的河珠和棉织物,尤其是精纺的平纹细布。农业产品中尤其是稻米、槟榔和蒌叶可能也都是古代出口的商贸货物。到 14 世纪时,孟加拉稻米出口到马尔代夫以换取货贝,而 16 世纪的资料更表明来自三角洲的稻米为从印度尼

---

* 肉桂,一种植物,其叶子的味道像桂皮,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被发现用于调酒、烹饪和榨油。其现在仍在孟加拉菜肴——叫做泰兹帕塔(tejpātā)——中广泛使用。

** 甘松是一种生长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植物。其根茎含有在古埃及、西亚(在《圣经》中有所提及)和罗马的香水和香的制作中必需的强烈芳香油。

*** 克律塞岛可能指孟加拉湾的任何一个岛屿。现在海龟仍在其中一些岛屿上栖息,比如孟加拉东南部的圣马丁岛(St Martin's Island)。历史学家们有时认为克律塞指的是阿拉干或者缅甸。



地图 4.1 经过孟加拉三角洲的商贸路线。

西亚东部的摩鹿加群岛(Moluccas)到印度西部的果阿(Goa)等大片地区的人口提供了粮食。[10] 那时,三角洲其他重要的出口货物还包括细棉布和粗棉布、糖、纯净黄油、油、丝线以及织物。大多数同东南亚、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之间的贸易掌握在孟加拉的商人和官员手中,其中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和亚美尼亚人。[11]

早期的海上贸易进口货物是货贝、海螺壳(用来制造手镯)和白银。[12] 这些进口货物一方面在三角洲使用,同时也与孟加拉的商品(包括纺织品和奴隶,尤其是阉人)一起与腹地进行贸易。[13] 在十五六世纪时,中国商人带来了黄金、白银、瓷器、绸缎和丝绸,缅甸商人据说只给孟加拉带来了"白银和黄金,没有其他的商品"。[14] 他们用这些贵金属向孟加拉人购买提供给他们的东西:主要是大米和纺织品。那时,孟加拉的出口制造业已经有了很久远的历史,并在古代世界享有盛誉。根据北印度、希腊和罗马的文献,这一地区通过亚洲的陆路和海路进行细棉与丝织品的贸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 至公元前 1 世纪。孟加拉的纺织业基于该地区不同地方的棉花种植与桑蚕喂养。纺织业遍布乡村地区,因为便宜的水路

42

交通可以将成品从各地从事编织业的村庄运到城市市场,然后销往海外。[15]一些最大的棉纺制造中心位于达卡附近。1586 年,一位欧洲的旅行者认为产于达卡附近的索纳尔冈(Sonargaon)的细棉布是全印度最好的。[16]这些奢侈的棉布与丝织品——其相对便宜是因为孟加拉拥有充足的高度熟练的劳动力——远销到海外和南亚、中亚的高级市场。

三角洲的资源吸引了大量的外国商人,同样,孟加拉商人也在海外的商业中心如苏门答腊岛北部的亚齐(Aceh)定居。孟加拉的城市是世界性的,在那里商品与货币转手,而整个已知世界的观念也在相互交织。然而,1500 年之后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已知世界随着遥远西北方的新来者的登场而显著地扩大了。沿着多年形成的环非洲航线,葡萄牙商人进入了印度洋的海运商贸网络。到 16 世纪 20 年代,他们开始在孟加拉定居,尤其是在高尔(当时是孟加拉的首都)、吉大港和山特维克(Sandvip)的岛屿上。[17]新来的葡萄牙人被轻蔑地视为法兰克人(Firingi, *phiringi*)。他们是十分混杂且各不相同的一群人,包括国家资助商和私商,还有些冒险者和海盗。他们对于打进亚洲商业贸易以及建立权力基础很感兴趣。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从事奴隶贸易,被许多国王雇佣为海盗,并卷入了这一地区的政治斗争。他们在吉大港建立起了对孟加拉东南部的控制,并于 1537 年在此设立了一处海关。当时吉大港利用周围山区的木料,是孟加拉的主要港口和重要的造船业中心。这座城市长期以来就是阿拉干、特里普拉和孟加拉的国王们联系的中枢。葡萄牙人占领吉大港——他们称为大港(the Great Port)——30 年后,一位旅行者看到有 18 艘葡萄牙船在那里停泊着。

43

葡萄牙人后来被证明只是从欧洲不同地区来的长串商人名单中的第一个,欧洲各地区的商人都为孟加拉三角洲的机遇所吸引。该地区的统治者一般都对他们表示欢迎,因为能从他们的贸易中收取关税,同时也因为这些商人带来的是货币系统所日益依赖的贵金属,并且他们的贸易也有助于孟加拉经济的实际收益和输出。[18]欧洲人的商栈开始出现在大河沿岸。其中大多数在三角洲西部地区,但在当今的孟加拉国境内也有重要的定居点。葡萄牙人于 16 世纪 80 年代在达卡建立了一个纺织品贸易商栈,荷兰人(他们将物产丰富的孟加拉称为“肥沃的草场”)也于 17 世纪 50 年代跟随

而来,此外,英国人在17世纪60年代、法国人在17世纪80年代也先后进入这一地区。这里有许多更小的定居点("商站")。其中有些建筑至今仍能见到,比如在博多河边的萨达哈(Sardah)的荷兰丝织商站[现在是孟加拉国警察学院(Bangladesh Police Academy)]以及另一个在拉杰沙希的商站。从孟加拉带来的货物(主要是生丝、织物、鸦片和硝石)对于欧洲人进行亚洲内地贸易或销回欧洲的贸易都变得必不可少。因此,到17世纪60年代,几乎半数荷兰运往日本的货物都来自孟加拉,到18世纪早期,荷兰从亚洲销往欧洲货物的2/5都是从孟加拉采购的。[19]而欧洲人带到孟加拉的绝大多数是贵金属——来自日本、苏门答腊岛和帝汶岛的黄金,来自日本、缅甸和波斯的白银,以及来自墨西哥和西班牙的银币——但还包括铜、锡和胡椒、丁香、肉豆蔻、肉桂皮等多种香料。

44

来自孟加拉的商品维持着欧洲新的生活方式,并且使欧洲人开始认识世界上的这一地区。这种认识也包括对孟加拉自然资源的惊奇。其中最为著名的可能就是克拉拉(Clara),一只1738年生于孟加拉东北部或阿萨姆的犀牛(插图4.1)。它于1741年运抵欧洲,它的主人安



插图4.1　犀牛克拉拉。这幅雕刻是它于1747年在曼海姆(德国)展览时制作的。

排它在欧洲宫廷巡展并将它展示给那些愿意购票参观的人，从而发了一笔小财。那时很少有欧洲人听说过犀牛，甚至许多人怀疑这种动物的存在。因此克拉拉就变得家喻户晓。[20]

45

三角洲的居民仔细地观察着欧洲商人，并且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充分利用他们。有时这些新来者显得具有危险性和掠夺性（旧孟加拉语词条以 *olandāj* 来称呼荷兰人，其意思就是海盗），有时却是便利的贸易伙伴。在 16 至 18 世纪时，欧洲人在印度洋贸易中的地位愈加显著，他们与当地商人之间的关系有合作也有冲突。南亚、亚美尼亚和欧洲的私商合作出资往来于亚洲各港口之间，偶尔南亚的商人也会包租欧洲的商船并雇佣其船员来运输货物。[21]然而从总体上来说，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冲突，因为欧洲人试图通过护照体系管理公海的航运。新来者试图取消南亚商人在亚洲水域自由贸易的权利，并企图加强对亚洲贸易中的特殊商品和品种的垄断。这种护照体系由葡萄牙人引进，也被荷兰人和英国人所接受。今天，在孟加拉海岸和梅克纳河河口活动的那些海盗组织，对经过他们所控制水域的船只都采用了与这种护照体系十分相似的系统。[22]

除去这些在规范上的尝试，“这一体系在印度海运商人管理操作上的负面影响相当小，并且仅限于特殊和有限的时间段和贸易种类中”。[23]印度海运贸易的一些路线，比如与东南亚之间的，确实从 17 世纪后期开始衰落了，但这并非与欧洲的竞争或干涉相关，而这实际上是南亚政治经济变化的结果。与此同时，孟加拉与其他地区，比如马尔代夫的贸易却在增加。孟加拉三角洲贸易的大宗仍掌握在当地商人手中，他们的间接成本更低且更熟悉亚洲市场。[24]换句话说，不应夸大欧洲人对前殖民地经济的影响。很有可能欧洲贸易形成的网络促进了这一地区海上贸易的增长。孟加拉有高度多样化的社会，市场交换和现金交易在海上贸易高涨之前就在多种层面上存在。[25]与农业相比，贸易和制造业组成的部分在经济整体中要小得多，而欧洲贸易公司只参与了其中海上贸易的某些种类。甚至在他们极为看重的丝绸这一商品上，他们也只不过是“小伙伴”而已。他们无法像南亚的商人那样，可以

借助其在海路、陆路上的丝绸出口特权控制丝绸市场。[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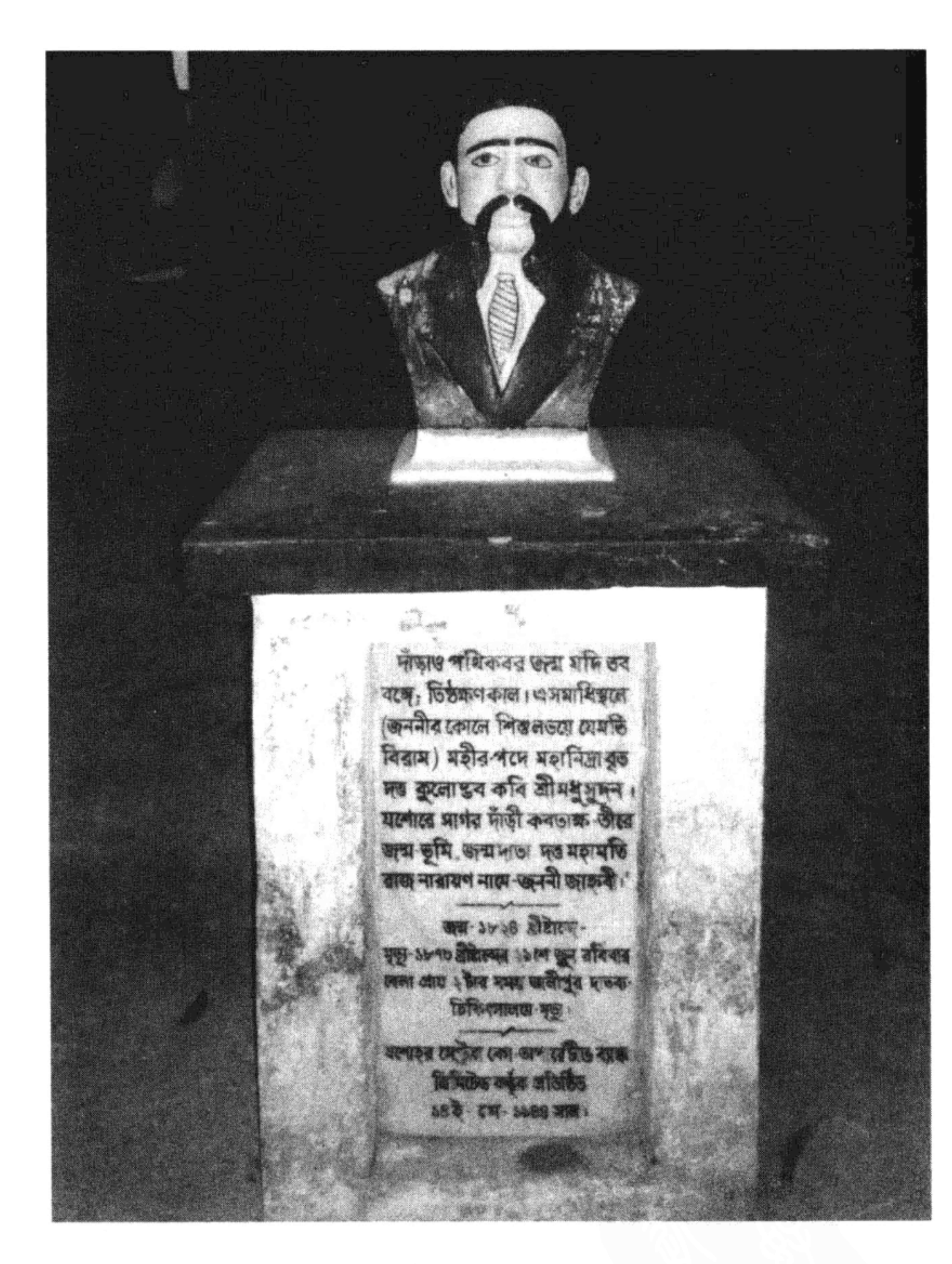
46

欧洲人在孟加拉三角洲的活动影响不仅仅涉及经济和政治领域。1611年,一艘荷兰船只遭遇海难,其船员被冲到诺阿卡利(Noakhali,在孟加拉东部)岸边,他们发现当地的渔民和村民对他们讲的是葡萄牙语。[27]那时,还有许多讲葡萄牙语的非洲人在孟加拉三角洲的许多军队中服役。[28]葡萄牙人在博里萨尔(Barisal)、博杜阿卡利(Patuakhali)、诺阿卡利、吉大港和达卡有许多小定居点,传教士在那里积极地推行基督教,也不是没有成功。[29]这里的居民在发展基督宗教认同的同时,三角洲其他地区的伊斯兰教认同也在形成。

简而言之,开放性是三角洲的基本特点,给经济增添了源源不断的商品,并对当地工业益处良多。孟加拉人流动性很强,他们以多种身份——商人、船员以及稻米、纺织物、船只等出口产品的制造者——参与到海外贸易中。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三角洲的这种开放性也使人们面临着许多不同文化和新观念的影响。

第三卷

殖民遭遇战



第二卷　卓越的诗人和伯德鲁洛克(bhodrolok)阶层中的一员，迈克尔·玛德胡苏丹·杜特(Michael Madhusudan Dutt，1824 － 1873)塑像，沙格达理(Shagordari，杰索尔区)。

第五章　从莫卧儿帝国到大英帝国

49

1757 年 6 月的一个晴天，数千人在靠近今天孟加拉国边境的一处芒果园激战。这场战斗作为南亚历史的转折点而闻名于世。其发生在一个叫做普拉西（Polashi 或 Plassey，*palāsi*）的村庄，这一冲突使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成为孟加拉领土的新领主。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个贸易联合大企业将占据整个南亚。历史学家们经常将普拉西战役（the Battle of Polashi）描述为英国在南亚殖民统治的开始，这一统治将持续到 1947 年。

从很多方面来看，普拉西都是一个标志着变化的有用标记。它结束了莫卧儿王朝在 150 多年前建立的统治模式。英国的统治带来了新的理念、设置和高压政治，将对孟加拉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些变化并非同时发生的，也非密集地发生在 1757 年左右。

在印度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中，普拉西经常作为南亚蒙受耻辱的标志，那时外国人控制了这个国家，剥削的殖民体系开始实施。根据这种叙述，那么，当 1947 年殖民国家被解散，主权又回到本地统治者手中时，便是用反殖民斗争抹去了国家名誉上的污点。然而，从孟加拉国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对于普拉西的解释并没有什么用处。首先，在英国征服之前很久，三角洲地区就有了外国统治者。以遥远的德里（Delhi）为中心的莫卧儿帝国在与当地反抗者进行了多次战役之后，于 1612 年便

控制了这一地区。三角洲成为莫卧儿征服的附庸之一,并且是大量税收与战利品的来源地。换句话说,英国在孟加拉的势力上升之前,当地居民已经长期处于被一个外国劫掠性行政机构所统治的状况。其次,孟加拉历史学家们强调,殖民统治并未随着1947年英国的撤退而结束:那些统治着作为1947年后巴基斯坦国家一部分的三角洲的人也应当被视为外国殖民者。在某种程度上,巴基斯坦国家按照西巴基斯坦人的利益统治,造成了三角洲的分裂战争,并最终在1971年建立了孟加拉国。1971年后的孟加拉国精英无疑是本土的,但是根据许多观察家的看法其几乎没有主权,因为其生存要大量地依赖海外的捐赠与指导。普拉西战役所结束的并非孟加拉三角洲的本地统治,而是莫卧儿王朝的旧政权(*ancien régime*)。普拉西标志着欧洲在孟加拉殖民统治的开始。欧洲殖民主义在1947年停止,但其后是巴基斯坦人的殖民统治(1947－1971),而描述1971年之后时代的一个方式就是称之为新殖民(neo-colonial)统治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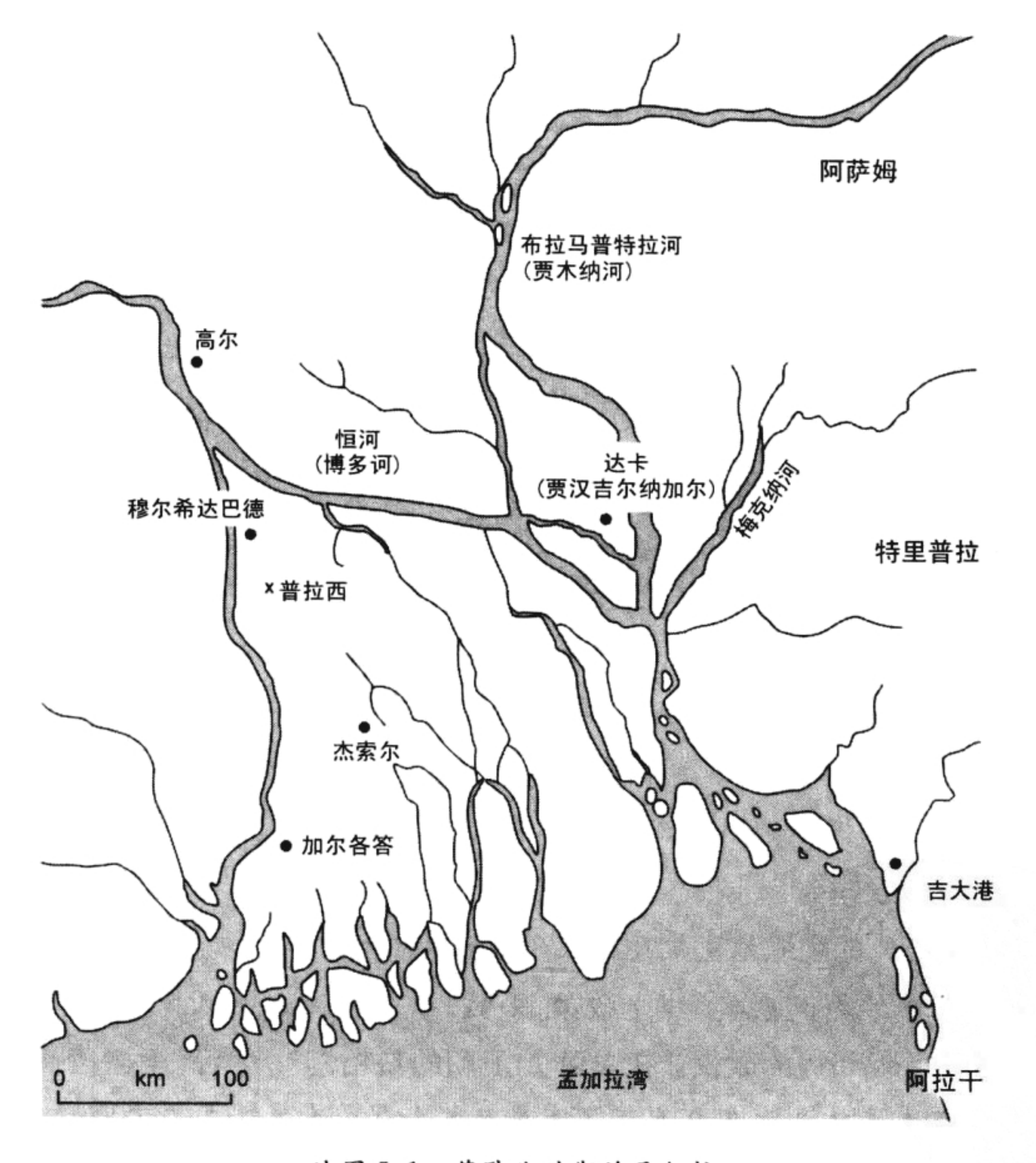
50

莫卧儿的遗产

当第一位欧洲探险家到达孟加拉三角洲时,他们成了见证国家分裂的混乱过程的旁观者。他们见证了莫卧儿王朝试图从北印度的核心地带扩张到孟加拉濒河地区若干不成功的尝试,以及三角洲如何陷入到混乱战争的时期。[1] 1538年,区域性的胡赛因-沙希(Husain Shahi)王朝覆灭了,莫卧儿皇帝胡马雍(Humayun)一度占据了其首都高尔。然而不久之后,胡马雍的军队就被击败,他也不得不向西撤退。其后的一个时期,许多当地的首领或地主——他们被统称为巴罗-毕辉亚(Baro Bhuiya,*bāra bhũiyā*)或“十二头领”——控制着三角洲较小的地区。这些人多是阿富汗和孟加拉印度教贵族,有些出身于古老的统治家族,另外一些则是新生的夺权者。他们组成了反莫卧儿的集团,一直抵抗莫卧儿王朝意欲兼并孟加拉的企图。莫卧儿王朝在1576年赢得一场重要战役之后加强了进攻,但又过了40年其军队与舰队才战胜了三角洲中部、南部的强烈抵抗,他们将这一地区称为巴提(Bhati)。最终到

1610 年，莫卧儿孟加拉总督一直向东打到了达卡，他加强了城防工事并根据莫卧儿皇帝查罕杰(Jahangir)的名字将之更名为贾汉吉尔纳加尔(Jahangirnagar，地图 5.1)。[2] 他将之作为孟加拉首都的主要原因在于，这里是镇压三角洲地区反抗、遏制东南部葡萄牙人和阿拉干人势力增长的最佳位置。到 1612 年，他使当地的首领屈服，将他们降为地主并使其承认莫卧儿的宗主权。如此，莫卧儿王朝覆盖了除吉大港东南部地区(直到 1666 年仍为阿拉干人和葡萄牙人占据)和吉大港山区(独立的首领国)之外的整个孟加拉地区。

51



地图 5.1　莫卧儿时期的孟加拉。

就此，约一个世纪的莫卧儿王朝的统治在三角洲地区开始了。莫卧儿王朝在孟加拉的政府结构不如其在印度北部和中部的中心地带那样整齐划一。其并未引入一种相对综合性的政治制度，新的统治者在迥异的地方性控制之上强加了一层集权权威。结果便是，在城市区域之外，由当地各级权贵掌管法律和秩序。在三角洲的许多地区，这些领主——在莫卧儿王朝称为柴明达尔（zamindars，*jamindār* 或 *jamidār*）——仍旧是半独立的。他们组成了“世俗的贵族——凭借其军事和政治力量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从大众中分离出来。这是一个对成功的冒险家开放的贵族阶层”。[3]他们与那些来自孟加拉以外以及那些不定居在孟加拉的帝国委任官员和平共处。这些官员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稳定的税收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德里的帝国宫廷。对于孟加拉三角洲的人民而言，这是新时期最重要的活动。掌管孟加拉省税收的最高长官称为迪万（*diwan*），由莫卧儿皇帝亲自任命。

52

无论何时莫卧儿王朝征服了三角洲的一个地区，他们就会用一支卫戍部队（*thānā*）设置若干岗哨以维护稳定。一旦稳定下来，这个地区就会被合并到莫卧儿王朝的行政领土系统中。在这个系统中，一个省（*subā*）包括若干行政区（*sarkār*），其下又包含几个居住区（*parganā*）。最小的领土单位是“征税村”或者叫木扎（mouza，*maujā*），并依据这个来确定征税税额。这些古老的术语中有三个仍在今天的孟加拉使用：沙卡（*sarkār*）现在意为政府，萨那（*thānā*）意为警察局，而木扎仍保留着征税村的原义。当今许多孟加拉姓氏——比如沙卡（Sarkar）、汗（Khan）、乔杜里（Choudhuri）和塔鲁克达尔（Talukdar）——都是从前面提到的那些莫卧儿地主贵族的职务上衍生出来的。

莫卧儿的征服给孟加拉带来了灾难和暴行。帝国力量与当地反抗之间反复的战争充满了焦土政策、杀戮、抢劫和强奸，比如莫卧儿镇压杰索尔（Jessore）的战役。[4]在莫卧儿王朝的统治建立之后，孟加拉许多地区变得更加安定，但叛乱仍不时发生。此外，阿拉干和葡萄牙侵略者也在掠夺沿海地区。根据当代作家施哈卜丁·塔利什（Shihabuddin

Talish)的记载,他们在 1621 至 1624 年间从孟加拉各地带到吉大港的奴隶多达 4.2 万名(插图 5.1;参见“阿洛尔,翻译诗人”)。[5]

对于莫卧儿官员而言,孟加拉始终是“一处‘充满面包的地狱’,一个不称职官员的流放地,以及在伟大的帝国衰落时哺育整个次大陆饥饿的军队和行政系统的奶牛”。[6]然而在另一个方面,莫卧儿的征服确实给三角洲地区带来了政治统一,成为一个更规范化的剩余提取(surplus extraction)系统,并缓和了持续的战争。更稳定和平的局势促进了农业耕作的扩展,并带来了更多的农业和工业财富(参见“穷人与富人”)。孟加拉政治中心的重心逐渐向东移动到达卡地区,使此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并吸引了大量商人。

53



插图 5.1　17 世纪 60 年代,阿拉干强盗在比普利(Pipli,现在印度境内)将从孟加拉三角洲抢来的奴隶卖给荷兰商人(局部)。[7]

阿洛尔，翻译诗人

显然，17 世纪早期不是一个航行在孟加拉海岸附近的安全时期。一个艰难地学会了这一课的男孩就是阿洛尔。他于 1607 年生于加拉普尔村［Jalalpur，福里德布尔(Faridpur)区］，是一位为当地统治者服务的官员之子。[8]一天，当他和他的父亲乘船去吉大港时，遭到了葡萄牙和阿拉干海盗的拦截。这一次袭击导致他身受重伤，父亲丧生。海盗将阿洛尔带走了。在阿拉干，他被安排做警卫或骑兵的工作，并最终死在那里。

然而，阿洛尔并非一个普通的奴隶。他受过良好的教育，通晓孟加拉文、波斯文、梵文和印地语。他幼年时还受过音乐教育。这些能力使他能够避免那些卑微的工作：他被派担任音乐教师，并作为诗人和歌曲作家开始知名。不久之后，阿拉干宫廷的重要诗人廷臣梅甘·塔库尔(Magan Thakur)使其处于自己的庇荫下，阿洛尔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

阿拉干宫廷是一个世界性的地方。其势力迅猛扩展，从孟加拉沿海抢劫奴隶，是其获得急需的熟练劳动力的重要方式。此外，这个宫廷也吸引了大量的雇佣兵，尤其是基督徒与穆斯林去充当海军。结果这个宫廷便成为一个文化熔炉。虽然其坚持东南亚佛教宫廷的皇室传统，但也接纳孟加拉穆斯林宫廷的贵族传统。这些因素保证了阿洛尔的才华受到赏识。

阿洛尔写了一篇论音乐的著作，并用阿拉干宫廷语言之一孟加拉语谱写歌曲，其后便着手将一些文学作品翻译成孟加拉文。大约在 1650 年，他翻译并改写了一首名为《帕特马瓦蒂》(*Padmavati*)的浪漫诗，原作为印地语，讲述的是一位德里苏丹与一位斯里兰卡公主的孽缘(doomed love)。其后他专注于翻译波斯浪漫传奇。他以宫廷和典雅的风格写作并用他自己的歌曲加以润色，其作品为孟加拉诗歌和音乐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方向。

穷人与富人

在孟加拉三角洲的居民中，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异。穷人穿着粗棉

布和黄麻制作的缠腰带和莎丽服。他们以大米、盐、蔬菜和扁豆为生，有时也补充一些鱼和牛奶。即使他们吃肉，也可能只是鸡、獴、蜥蜴、鸭子或者豪猪（插图 5.2 和 5.3）。[9]

富人则身穿以细棉布或丝绸精心制作的衣服，穿鞋子，并佩戴黄金饰品和珍贵的宝石。他们精致的食物包括各种鱼类、禽类、肉类和蔬菜以及奶制的甜点（插图 5.4 和 5.5）。

莫卧儿政府积极地鼓励欧洲贸易，主要是因为其能够给帝国提供相当可观的关税收入。与此同时，莫卧儿的精英上层也消费了大量来自孟加拉三角洲的货物。除了大米、纺织品、糖和盐之外，三角洲也向莫卧儿宫廷提供来自迈门辛、锡尔赫特和吉大港的芬芳的沉香木和木材，来自杰索尔、库尔纳（Khulna）、博里萨尔和吉大港的大象和水牛，来自朗布尔和锡尔赫特的阉人，来自拉杰沙希和博格拉（Bogra）的槟榔；来自朗布尔和不丹（Bhutan）的马匹，来自松达班的虫胶以及从孟加拉各地森林里捉来的能言鸟。[10]

55



插图 5.2　一个卖鱼人和一个渔民；男性和女性。[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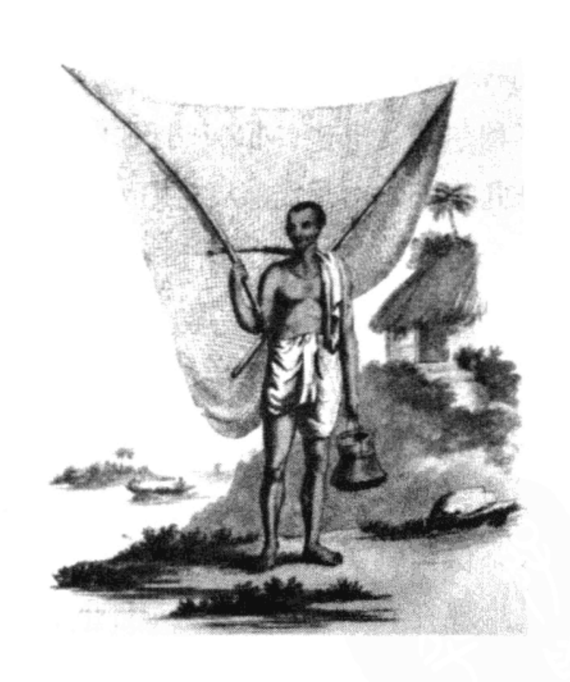


插图 5.3　一个卖鱼人和一个渔民；男性和女性。



插图 5.4　显赫家庭中的妇女和男人。[12]



插图 5.5　显赫家庭中的妇女和男人。

56

莫卧儿王朝的衰落

1700 年后,莫卧儿帝国宫廷在孟加拉的影响迅速衰落了。一位名叫穆尔希德·顾利·汗(Murshid Quli Khan)的新迪万(diwan,最高收税官)实现了与德里的和平交接而独立,其后继者们将自己定位为纳瓦布(nawab,*nabāb*,意为行政长官)或者独立王公。他将行省都城从达卡迁到了穆尔希达巴德(Murshidabad),并改革了税收体系。到 1713 年,随着莫卧儿王朝走向崩溃,从德里的委任也停止了。虽然孟加拉在名义上仍是一个省,但其在纳瓦布们的统治下实质上是独立的,纳瓦布们构成了一个非孟加拉人的王朝。孟加拉最后一任纳瓦布西拉杰达乌拉(Sirajuddaula)曾试图封锁该地区的非法贸易。这就导致了与英国商人之间反复的冲突,而他最终在 1757 年的普拉西战役中被击败了。[13]在持续的衰落,尤其是在 1764 年的布克萨尔(Buxar)战役之后,英国人不仅控制了孟加拉三角洲,还控制了恒河河谷西岸的大片土地。

现在,欧洲的贸易公司,也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统治亚洲最富饶的地区之一。这个公司在形式上成为孟加拉(还包括比哈尔和奥里萨)的迪万,但事实上是它完全不受莫卧儿的影响。这是个相当有利可图的位置。这个公司现在可以将在孟加拉的其他欧洲和亚

洲竞争者边缘化,对至关重要的商贸货物发挥更大的控制力,并从孟加拉良好的地税系统中获利。因此,英国人在普拉西的胜利,不仅仅标志着他们在这里比在英国享有大得多的商业、军事和行政控制权;也意味着一个帝国的开始。他们利用孟加拉的财富征服了印度和亚洲的其他地区。对于孟加拉人民而言,英国人在普拉西的胜利也不仅意味着一个新的霸主的出现。它意味着欧洲统治的开始,新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开始,一个划分种族的社会的开始以及深远的文化变迁的开始。

57

第六章　英国的影响

英国人与莫卧儿王朝不同——他们不仅仅想榨取孟加拉的大米，他们还希望改变孟加拉的经济，从而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将英国和爱尔兰的经验与南亚的实践相结合，使孟加拉人民受制于一系列的行政与经济实验。其中一些被证明是成功的，还有一些是灾难性的。他们早期引入的增加税收征集系统就被证明在自然环境不稳定的孟加拉是具有灾难性的。即使在1769至1770年间的干旱和之后的洪水时期，其仍不顾人民收入的急剧减少而严苛施行。这些与粮食市场上未加限制的暴利一起，导致了至今仍为人们所记忆犹新的深刻痛苦和史无前例的饥荒，即"1176年大饥荒"（*chhiyāttarer manbantar* * ）。据估计，竟有1/3孟加拉人口，亦即1 000万人死亡。以下是一位19世纪的研究者对那场饥荒的描写：

> "在整个1770年令人窒息的夏天里，人们奄奄一息。农夫卖掉了他们的家畜；他们卖掉了农具；他们狼吞虎咽地把粮食种子都吃

* 孟加拉历法与通行历法在起始点上不同。它有太阳年，每年开始于4月中旬。因此公元2000年等同于孟加拉历的1406/1407年，1176年的大饥荒也就是1769/1770年。详细信息可参见冯·申德尔的"近代孟加拉国"。

掉了;他们卖掉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直到最后都找不到买孩子的人了;他们吃树叶和田地里的草;在1770年6月,杜巴(Durbar)的居民报告说已经有活人开始吃死人了。大批饥饿与身患重病的人群日夜不停地涌入大城市。这年年初,爆发了鼠疫。3月份时,我们在穆尔希达巴德发现了天花……街道都被一堆堆垂死挣扎的人和尸体所堵住了。安葬工作也根本赶不及;即使狗和豺狼,这些东方众所周知的食腐动物,也无法完成这项令人反感的工作。那些撕裂和溃烂的尸体最终影响到了居民的生存……1770年,雨季带来了一些安慰,在9月底之前,这个省获得了大丰收。但是这种安慰来得太晚以至于无法阻止人口减少。饥饿且无处藏身的人群绝望地从一个荒废的村庄爬到另一个村庄以寻找食物或者一处休憩避雨的地方,却徒劳无功。由于季节的原因,流行病蔓延到了整个国家,直到年底,流行病仍十分普遍以至于成为孟加拉政府与东印度公司理事会(在伦敦)之间交流的一项主题。数百万可怜的饥民在离丰收还有几个星期的时候在垂死挣扎中死去,他们最后一眼可能聚焦在茂密的田地上,对他们而言,那些庄稼的成熟只是晚了一点点。"[1]

58

这一肆无忌惮的灾难迫使英国领主去寻找一种更为稳定的方式来剥削这块新殖民地上的资源。他们发展出了一些塑造新殖民地社会的政策。那些大多数将自己的研究主要关注于殖民地时代的孟加拉历史学家,在1757至1947年间孟加拉在英国统治下复杂的社会、经济变化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和大量细致的理解。[2]在这里,我们只是强调一些对后殖民时代孟加拉国的出现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影响。

固定赋额法

早期殖民时代最重要的决定便是新地税系统的创立,其后被称为"固定赋额法"(permanent settlement)。[3]它在1790年引入,1793年立法通过,其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税收体系。它形成了殖民体系的控制核心;像是行政管理、司法和治安等其他行政事务都与固定赋额

法的正常运转相关。[4]其经过多次修正后一直存在到20世纪50年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建构了三角洲的社会与经济关系，以至于不提它也就不能理解今天的孟加拉国社会。

固定赋额法是英国人针对收税的乡村上层，也就是柴明达尔的措施。英国人（他们霸占了孟加拉所有土地的最终所有权）使柴明达尔成为实际的土地所有者，将其税收永久地确定下来：国家在未来不会增加税率。作为回报，柴明达尔必须按时缴纳税赋，否则将会遭到土地被拍卖的处罚。通过这种方式，柴明达尔对当地社会的控制就为殖民国家所利用，柴明达尔也就成为殖民控制与剥削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他们被威胁一旦拖欠了国家的税赋，将被没收土地，这也使其权利受到了限制。

59

固定赋额法背后的期望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柴明达尔会成为改良的地主，投资于农业发展。固定的政府税收、上升的产品价格以及新开垦的土地会在柴明达尔手中留下越来越多的财产。通过对农业的再投资，他们将促进三角洲的经济发展。然而，这些并没有发生，部分是由于柴明达尔在农业发展、更好的交通、技术创新和市场控制方面缺乏政府的支持，部分是由于有一条更便捷的致富之路。通常的措施就是通过（不合法地）提高税收来压榨农民，或者强迫那些佃户在结婚、节日、朝圣和葬礼时给柴明达尔送礼金。

随着收入的增加，柴明达尔们就使自己远离了农业与收税。他们逐渐变成了靠收租生活的人，并把他们的责任移交给了那些中间人。孟加拉的农民生产出了如此多的财富，以至于那些中间商也经常能够效仿柴明达尔的做法，再指定他们的中间人。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悠闲的土地所有者复合体系就发展起来了，全都以土地上的财富为生。这一体系被称为封土分赐（sub-infeudation）或婆陀尼达里（pottonidari，*pattanidāri*），在位于现今孟加拉国南部的地区最为发达。比如在博里萨尔区，你需要经过五到七层中间商才能找到土地的耕种者。[5]正是以这种方式，固定赋额法促成了一个由大量有闲阶级统治的等级非常森严的社会结构。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固定赋额法这一体系造成了那么多影响：它否认农民拥有任何的土地权利。此前，存在既可授予生

产农民又可授予地主的复杂而地方化的一系列财产权利。现在这些权利只为地主所拥有，他们可以自由地出卖、抵押或者赠送他们的土地。从法律角度来看，耕种者成为只拥有在土地里耕种的权利的佃农——如果他们按规定缴纳租金的话——但是他们只能通过继承来转让这种"使用权"(occupancy)，而不能买卖。并非所有的佃农都获得了这种使用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耕种者成为任意佃农(tenants-at-will)，地主可以随时赶走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殖民地时期的乡村变成了柴明达尔土地拥有者所统治的社会，他们的土地由拥有使用权的佃农——在这里他们被称为拉亚特(*rāiyat*)——或者没有这种权利的佃农来耕种。柴明达尔阶层从殖民地政府的支持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他们中的许多人变得非常富有，还在他们的土地上建立了宫殿式的宅邸(插图 6.1；并参见"乡村里的一流艺术")。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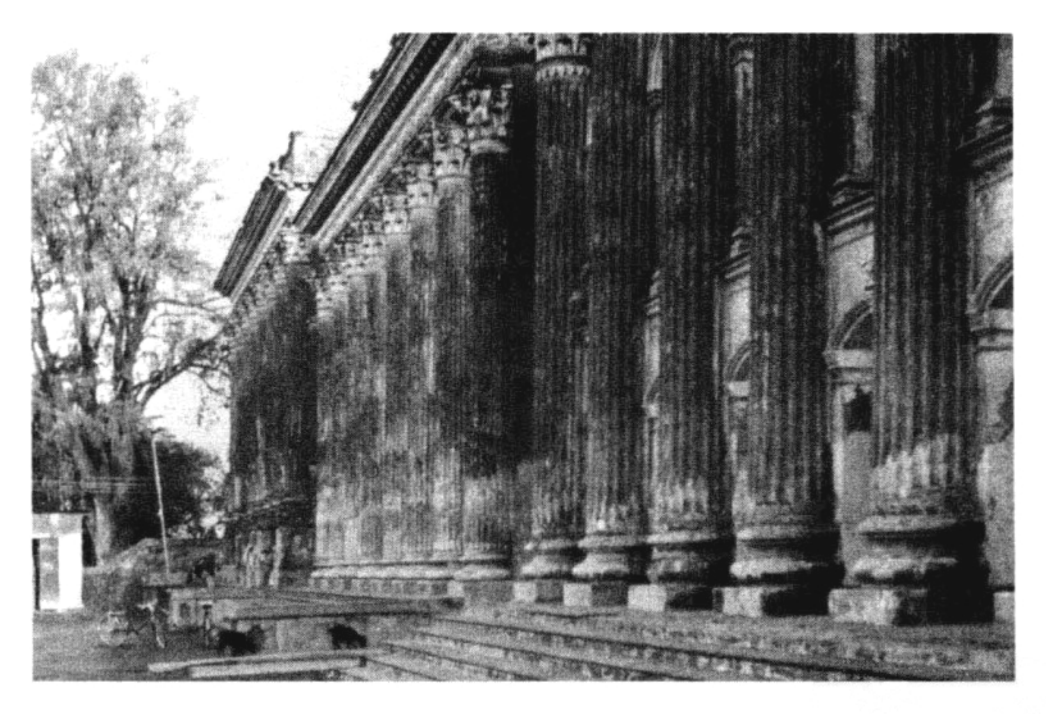


插图 6.1 孟加拉中部一所柴明达尔豪宅的遗址[巴里阿提(Baliati)，马尼格甘杰区(Manikganj district)]。[6]

与此同时，柴明达尔阶层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穆斯林曾在莫卧儿王朝开拓东三角洲地区时占据领导地位，我们在殖民时代也可以看到，印度教地主的地位在逐步上升。尽管穆斯林柴明达尔和印度教佃农也都不是

少数,在三角洲东部的许多地方,宗教与阶级身份开始融合,印度教地主处于社会顶端,底下是大量穆斯林耕种者。三角洲西部地区也是由印度教柴明达尔统治,但大多数耕种者也是印度教徒。这一区域性差别在殖民时代早期并没有产生政治分歧,但是到最后,它会成为极为突出的政治问题。

为辽阔市场生产的农作物

殖民时代第二个巨大变化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作物的大量引入。此前的孟加拉农业已经相当商业化了,为许多市场生产棉花、大米、蔗糖、桑葚、槟榔以及许多其他作物。这些作物在孟加拉加工并经常出口。换句话说,商业型农作物生产并不是什么新事物。然而,经济作物的组织形式、产量规模以及一系列为海外市场生产的新作物的引进都使殖民时代有所不同。欧洲和南亚的资本投入到大规模的鸦片、靛蓝、茶叶、丝绸和黄麻生产中。其中一些作物是在一种强制劳动体系中进行的,另一些则在种植园中——由欧洲人经营的资本主义农业企业——还有一些是由负债的小佃农所进行的(插图 6.3)。

61

乡村里的一流艺术

在当代孟加拉,柴明达尔主要是作为一个专横、寄生的阶层为人们所忆起。他们奢侈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对农民劳动的压榨剥削之上的,并且事实上他们给予的回馈相当少。然而,也有些例外:地主建立乡村学校、图书馆和诊所,推进其土地上的基础设施建设,捐资兴建供水系统或在物资短缺时对佃户予以帮助。

柴明达尔首创精神的无价遗产便是在孟加拉西部城镇拉杰沙希的瓦利达拉研究博物馆(Varendra Research Museum)。这是孟加拉最古老的博物馆,1910 年由一群意在推进北孟加拉研究的贵族历史爱好者所建立。他们以该地区的古老名称(Varendra)为其博物馆命名,这一专有名词仍旧存留于“巴林德”(Barind)中,后者是这一覆盖孟加拉北部许多地方的区域的现代名称。瓦利达拉博物馆的发起者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旅行以收集具有古文物研究价值的物品,甚至还资助和组织考古挖掘。不久,这

一博物馆就充满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美收藏品。

62 在 1947 年其主要捐赠者去世或逃往印度之后，这个博物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严重忽视。幸运的是，其藏品度过了那一段黑暗时期得以保存下来，现在也已经重获了曾经的荣耀。今天，博物馆中最为知名的是 9 至 12 世纪印度教、耆那教和佛教神明的壮美雕塑，其石刻铭文、硬币、赤土陶器和大量古代贝叶经手稿(插图 6.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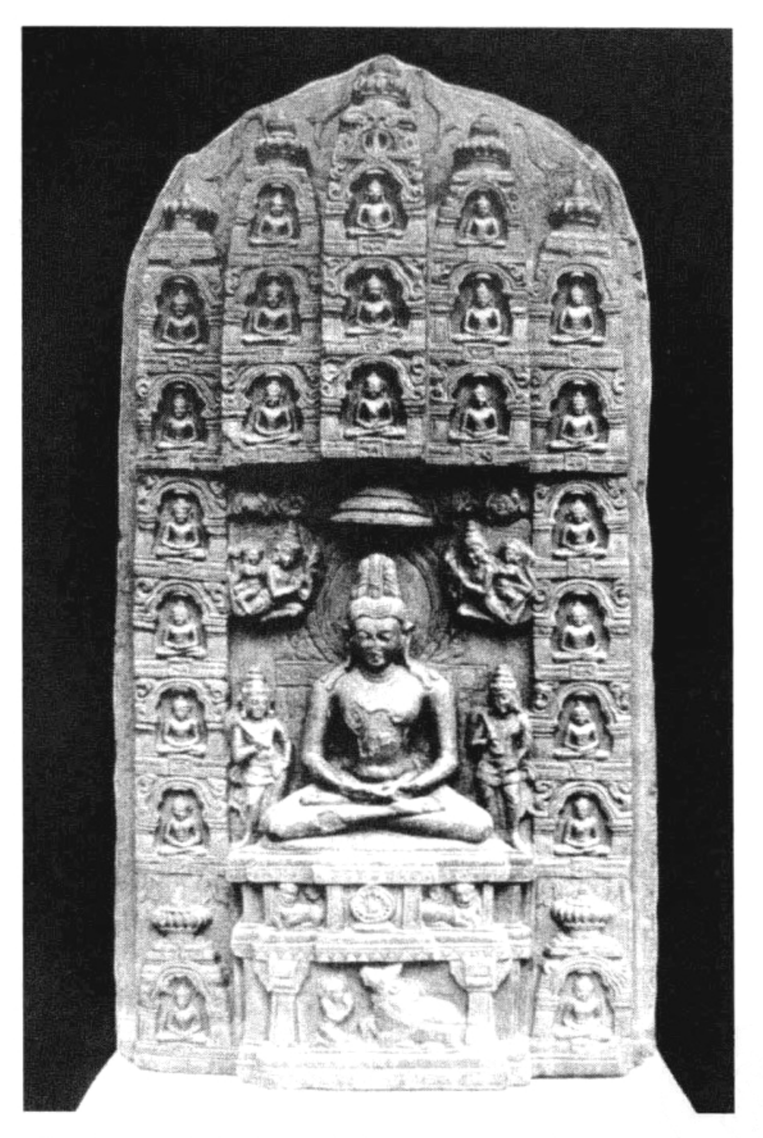


插图 6.2　来自迪纳杰布尔区的二十四光明苦行者石刻像。这是耆那教的祈祷对象，可追溯到 9 世纪。瓦利达拉博物馆在 1933 年接受其为捐赠藏品。出自 *Annual Report of the Varendra Research Society*。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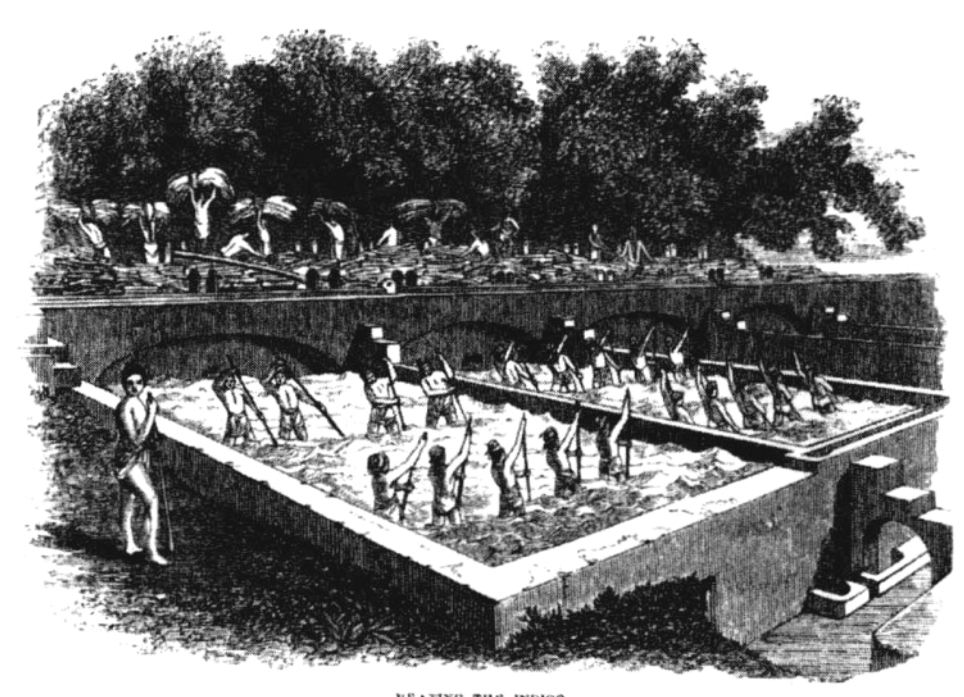


插图 6.3　生产靛蓝，一种蓝色染色剂，用于出口欧洲。出自 *Rural Life in Bengal*。

殖民地经济作物的重要性在于，其锻造了孟加拉乡村经济和欧洲、亚洲市场的新联系。大英帝国在南亚和大陆其他地方的扩张，要以孟加拉生产的财富为支撑。与此同时，经济作物也对三角洲社会产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影响。它也导致了孟加拉经济新的区域专业化：孟加拉东部成为黄麻生产的中心地带；丝绸和蔗糖生产集中在孟加拉西部；烟草则在北部。社会组织和土地控制的特殊形式都与这些作物相关。[8]孟加拉东部的小佃农面临着因人口压力和遗产分割所带来的财产减少。他们不能仅靠生活作物维持家庭生计，被迫进行市场型生产。随着外国资金涌入支持农业出口——尤其是黄麻——这一区域经济变得越发货币化，信贷依赖的(credit-dependent)农民生产者就完全暴露在不确定的国际市场之中。相比之下，在孟加拉北部和西部，乡村精英阶层是农业信贷的主要提供者，经常是以稻米的形式交给佃农，这就使得初级生产者避开了市场力量的直接影响。[9]

这两种区域体系都受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因为黄麻市场的衰退，孟加拉东部遭受的打击尤其沉重，信贷已经枯竭，且因缺少土地也无法回到19世纪的生活作物农业。社会与政治控制的旧式关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农民与由放债者、贸易商和地主组成的当地精英之间日益升级的暴力冲突。在孟加拉北部和西部，危机首先增强了佃农与劳工对借贷谷物的精英阶层的依赖，但大约十年后土地与粮食价格开始恢复时，佃农便开始要求更好的条件，并在英国统治末期达到了广泛反抗的顶点。 64

新统治制度

莫卧儿王朝的统治给孟加拉三角洲带来了重要的行政革新。英国的统治则带来了更为重大的变化，其中一些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法律和财产权利的新观念被引进到司法制度当中。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宣布废除波斯语——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语言——作为国家官方语言的地位。英语语言学校和学院培养了一小部分孟加拉精英，使其能够担任殖民体系中的低层或中层职务。在加尔各答(1857)和达卡(1921)建立了两座现代的大学，并迅速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制度变化的第三个领域是健康卫生方面。英国统治时期人口的增长，主要应归功于人们了解了更多卫生方面的知识，能更方便地获得药品和就医。公路、桥梁和铁路使孟加拉三角洲对水路运输的依赖有所下降，电报、电话和广播等其他的技术进步使信息传递也变得更加便利。国家控制的范围随着警察和军队获得了更多的资金和更好的组织而增大。虽然这个国家仍旧坚持独裁专制，但政治压力使英国人在其统治的最后时光里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尝试民众代表的限制形式。殖民框架结构被证明是长寿的：尽管在英国统治的时代，国家形成期间曾出现过骚乱，今天仍能在孟加拉国司法、教育、卫生、工程和军事制度中清晰地看到其影响。

加尔各答的兴起

殖民时代最后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加尔各答作为政治权力与文化复

65 兴的新中心的出现。这座城市在1690年由英国人建立，成为殖民地孟加拉的首都，后来随着英国势力的扩展，也成为整个殖民地印度的首都。这里是1757至1931年印度政府的所在地。直到19世纪中期，这个政府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所任命的一系列地方行政长官(governors-general)所领导的。从1858年开始，由英国国王任命印度政府的首脑，称为印度副王(Viceroy of India)。加尔各答作为殖民地行政系统的神经中枢，发展非常迅速。怀有各种雄心的孟加拉人涌入了这座城市；其中拥有地产的富庶家族后裔——他们多来自三角洲东部——奠定了这里的文化基调。许多人很快接受了英语教育，在殖民地国家中供职。历史学家后来把这个高等种姓(upper-caste)的印度教徒占支配地位的群体称为“伯德鲁洛克”(bhodrolok，*bhadralok*，意为名门世家)。[10]他们成为孟加拉人及其英国主人之间优秀的文化中间人，不仅在加尔各答，还包括在一些小城镇和东孟加乡村拉柴明达尔的宅邸内。[11]在整个孟加拉，许多人力图效仿加尔各答伯德鲁洛克阶层独特和高雅的生活方式，但在与地主所有制(在外地主)、精英主义和种姓制度存在着密切联系的东孟加拉地区，这一生活方式却被深恶痛绝。

殖民地加尔各答不仅是孟加拉首要的行政与文化城市，它还是商业和经济中心。像是鸦片(提供给中国市场)、靛蓝和茶叶(提供给欧洲市场)这些值钱的经济作物都在这个港口装船；来自东孟加拉田地里的黄麻在出口之前也在这里的许多黄麻厂进行加工。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的由加尔各答向外辐射的铁路网，提高了从内陆地区运输货物的速度。然而，与此同时，许多东孟加拉的工业中心开始衰落或停滞。最具戏剧性的例子就是达卡，其直到18世纪初都是孟加拉的首府，在英国人占领时也是最大的纺织品出口中心。然而1800年左右，英国的商业政策和加尔各答的兴起使其迅速走向衰落。[12]达卡的优质纺织品出口减少了一半，并且很快消失；人口迅猛下降到20万左右，到19世纪40年代仅剩5万人左右，是达卡历史上的人口最低点(插图6.4)。[13]其后达卡逐渐开始恢复，这主要得益于黄麻贸易和行政扩展，

但其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达到1800年的人口水平,并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恢复了其工业实力。

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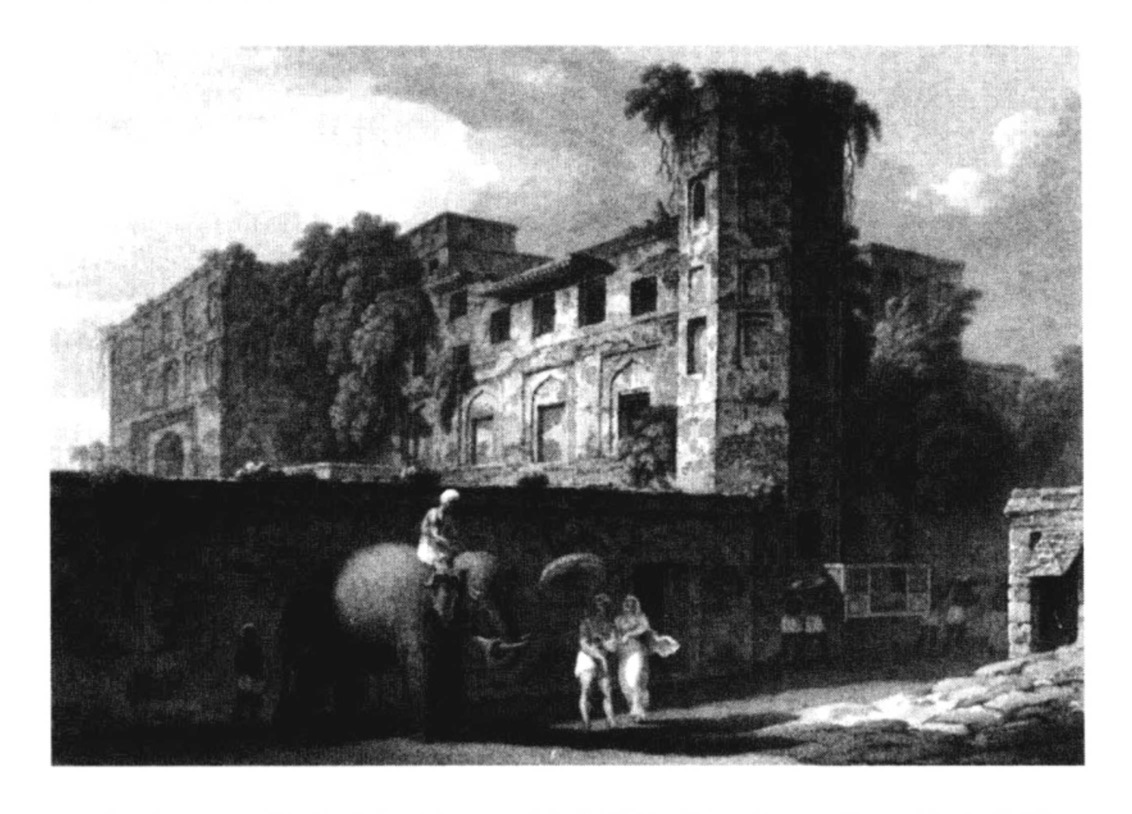


插图6.4 1823年达卡的景象。《大库特拉》(*The Great Kuttra*),查尔斯·德·奥利(Charles D'Oyly)作。承蒙British Library, London提供。 Shelfmark X628(6).

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胜利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将孟加拉作为其扩展不列颠印度殖民地的中心。一个世纪之后,整个南亚都由加尔各答(当时是大英帝国的第二大城市)所统治,印度洋也成为不列颠之海。孟加拉三角洲与世界经济联系密切,但处于其居民无法控制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之中。一小部分人从殖民特权中大发横财,但是对许多与殖民者没有紧密关系的人们而言,这却是一段艰难岁月。

67

第七章 关闭的耕地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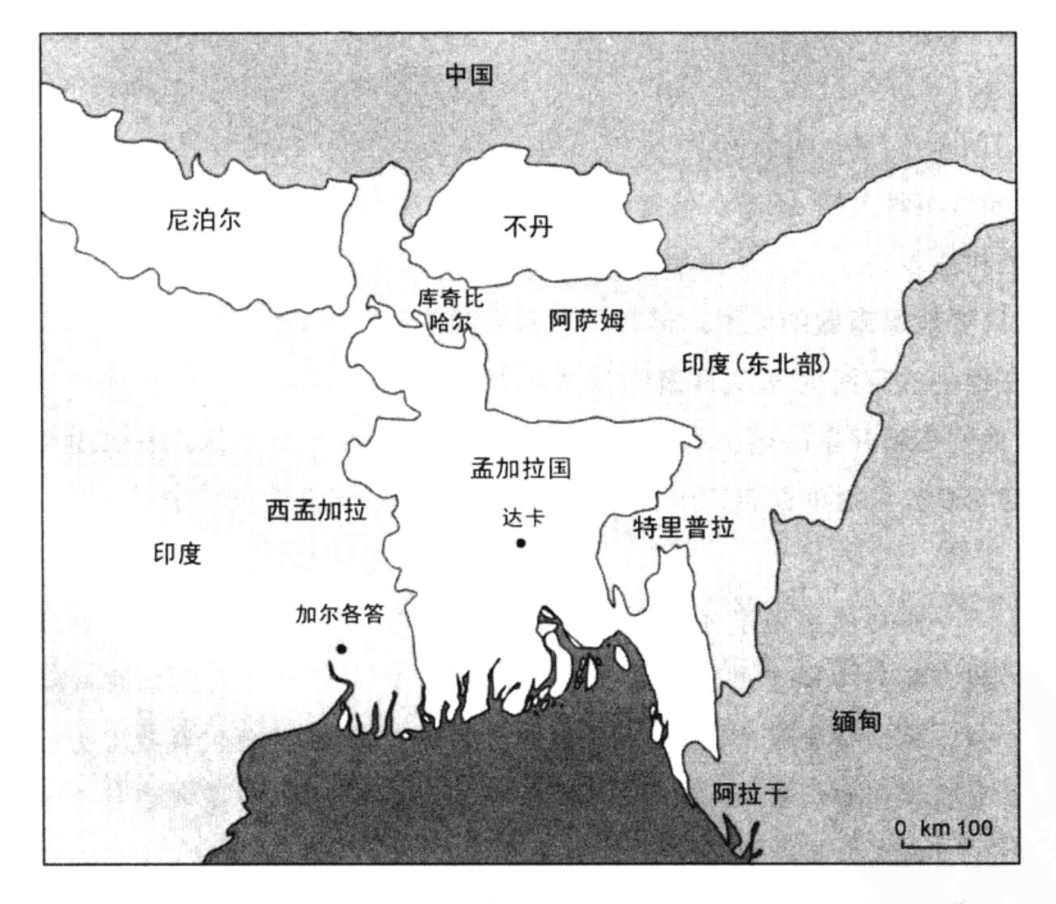
当英国人在 1757 年吞并东孟加拉时,那里基本上就是个乡村社会。当他们在一百九十年后离开的时候,其仍然绝对是乡村型的——96%的人口居住在乡村。然而,与此同时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在 18 世纪后期人口下降之后,东部和南部更肥沃的土地养活了比西部和北部更稠密的人口。随着工业的消失,乡镇和城市也走向衰落。孟加拉的乡村化直到 19 世纪中期才结束,此后城镇再次开始兴起,但却十分缓慢。到 1901 年,后来孟加拉国的领土上约有 3 000 万居民,但只有 2.5%(约 70 万人)居住在乡镇和城市里。虽然到 1947 年大约有 4 200 万人口,但四个最大的城市人口都很少——达卡大约有 25 万居民,吉大港有 20 万,库尔纳有 6 万,拉杰沙希有 4 万——城市人口只占总体人口的 4%。换句话说,在殖民统治末期,东孟加拉几乎所有人都在乡村谋生。他们大多数从事农业劳动。

在殖民时代,农业经济经历了巨大变化。[1]随着东孟加拉产业出口的衰落,农业出口扩大了。农业产量的提高主要是由于耕种区域的稳步扩张而非更新技术或提高产量获得的。地主们更乐于用农业产出的剩余来维持他们舒适的生活方式,而并非投资于农业当中。而不得不养活好几层盘剥者的耕种者,根本无法引进如增进种子质量、商业肥料、灌溉系统或更优质的工具等新技术。结果便是这种“平面式的”扩展:农业产量的提高源于耕种者开垦了越来越多的土地。然而到 19 世纪末,耕种的

扩展达到了其自然极限。大部分仅存的森林都被开垦了——有时是被一些特殊的群体,比如孟加拉西北的桑塔尔人和奥朗人移民——其中包括沿海和河流中的岛屿,以及南部松达班红树林沼泽的许多地方。 68

向外迁移以自救

如此,孟加拉的耕种者正快速地耗尽土地。他们利用多种方式抗击这场危机:通过复种农业(在一小块土地上每年种两三种不同的作物)增加农业产量,强化耕作(投入更多劳动力以增产)以及减少收割后的粮食损失。他们同时也削减消费,并通过季节性地从事雇佣劳动和小商业使收入来源多样化。许多人从人口稠密的孟加拉东部迁徙到了孟加拉西部和北部,在那里他们仍能找到可供耕种的土地或者做劳工(参见地图7.1和“移民诺齐尔”)。他们也开始移民到三角洲以外的地区——到阿 69



地图 7.1　孟加拉人 19 世纪以来向外移民地区:阿拉干、阿萨姆和特里普拉。这幅地图显示了今天的国家边境。

拉干、阿萨姆和特里普拉。这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始。这一趋势直到今天仍在继续，数以千万的孟加拉人背井离乡以寻求更好的生活。[2]

移民诺齐尔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场普通的灾难袭击了孟加拉东南部诺阿卡利区的楚尔-莫兹里什普尔(Chor Mozlishpur)村。临近的河流改道并淹没了许多田地，摧毁了许多耕种者的生计。怎么办？当地没有工作的机会，因此受到影响的家庭就决定到别处谋生。首先出去的是男人。他们向北游荡到迈门辛和阿萨姆，并从那里到朗布尔，充当日工和宗教教师。他们组织了一个非常松散的团体，有时一起迁移，更经常的是单独一人，但是经常通过其他移民的口信赶上彼此。一个团体决定待在阿萨姆，"因为这里的人们不像我们那么聪明，我们能从他们这里挣到很多钱"，他们中的一个后来这样写道。另一个团体更喜欢孟加拉北部的朗布尔，他们认为那里的气候比阿萨姆更健康，而当地居民在他们眼中也同样是头脑迟钝的。第三个团体迁移到了邻近的迪纳杰布尔区。

朗布尔的小团体在许多村庄里做日工。他们中的一员便是诺齐尔(Nozir)，当时大约35岁。他在一个叫做高保加利(Goborgari)的印度教徒居住的村庄发现了一大片未耕种的土地。当地地主愿意把这块土地租给任何人，只要他愿意缴纳地税。诺齐尔准备冒险尝试一次，他和他十几岁的儿子便在他们的空闲时间从事清除灌木和树木的费力工作。当他们最终成功后，他们在新开垦的地上种植了大蒜，很快就获得了丰收。用这些钱他们动身回450公里之外的诺阿卡利召集族人。30年后诺齐尔回忆道：

> 那时我有两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当时他们的妈妈很年轻也很健康。我们在清理出来的地上搭了一间小屋。当地的人们就在一边看着。他们需要我们，因为那时候劳力并不易得，因此他们喜欢劳力就在自己家门口。第一年非常艰难，要养活这么些张嘴，但是我们尽力做到了。然后我邀请我妻子的兄弟也加入我们。他非常虔诚，并想在这里建一座合适的清真寺。他也租了一块地，在另一个村里做宗教教师，其后不久就建起了他自己的小屋。此后，侄子们和表兄弟们就开始来了。



高保加利原住民和新来者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诺齐尔的对策就是召集尽可能多的亲戚和远亲来这里定居在他周围，以保证安全和受到尊重。他非常成功：到20世纪70年代，诺阿卡利的移民几乎占了村庄人口的一半，诺齐尔则成为他们备受尊重的族长(插图7.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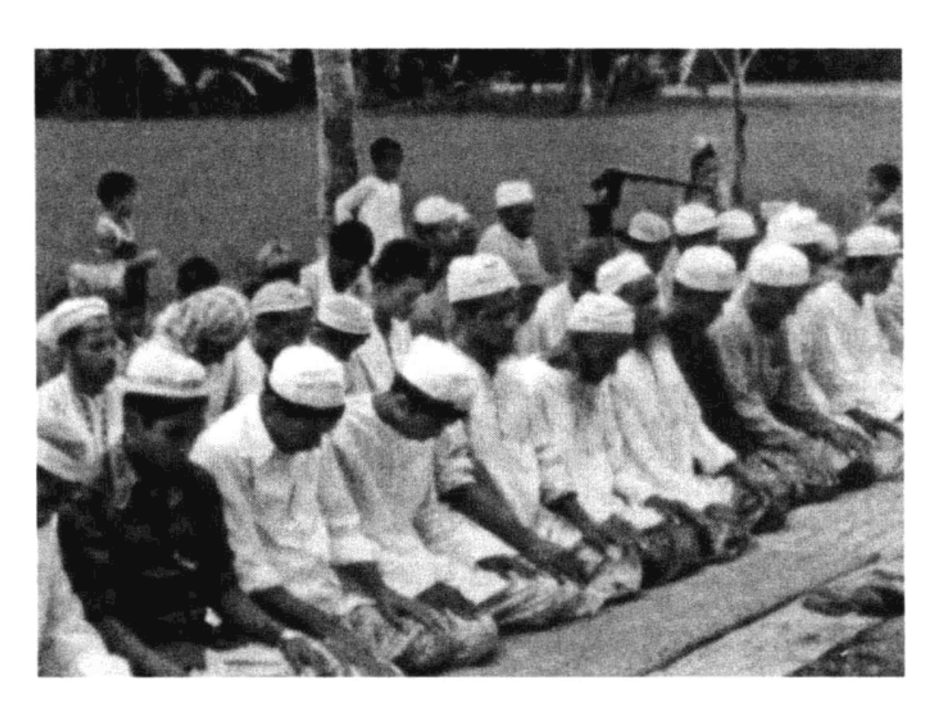


插图7.1　诺齐尔(第一排，最右边老者)在他的儿子们、侄子们以及表兄弟们中间，在高保加利村进行开斋节祈祷，1975年。

人口增长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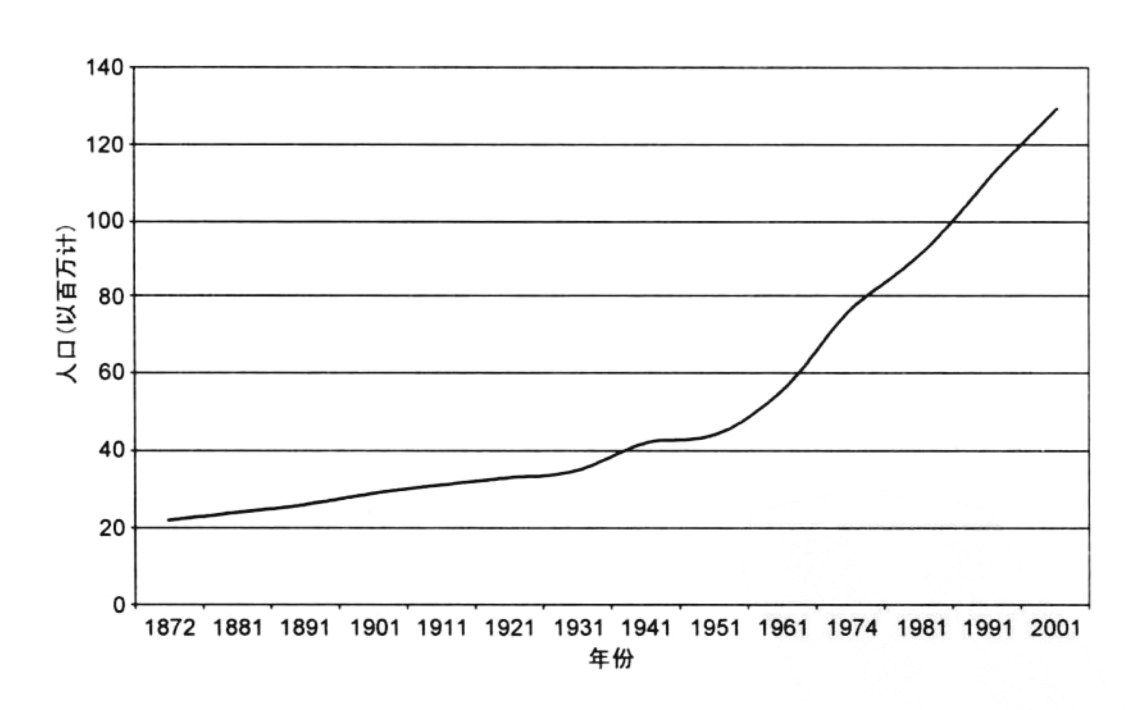
除了迁徙之外，孟加拉耕种者也加强了另一个重要策略：高生育。与其他一些农民不同，他们不进行大规模的生育控制：妇女出嫁的年龄相当小，未婚成年人所占的比例可忽略不计，节育很罕见，收养也不广泛地用于孩子的“再分配”。在19世纪，高生育是应对高死亡率和地主需求的有效方式：其保证了家庭劳动力供应的有序增长，这使耕种更多的土地并加大劳动强度成为可能，从而得以增加家庭收入。孟加拉人口以每年约1%的速度稳健增长。然而，从长期来看，正是这种当时非常成功的策略造成了对自身的毁灭。这种躲避贫穷的措施逐渐变

71

成了一个导致贫穷的原因。随着开放的土地边界安全阀的关闭,耕种者们继续大量生育后代,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替代方式,还因为高生育提供了短期利益,尤其是在增加家庭劳动力方面。[4]

从 19 世纪中期人口开始增加,增长率也逐渐加速。[5] 1872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在今天的孟加拉国领土上约生活着 2 300 万人,这一数字到 20 世纪中期翻了一番,到今天几乎变成了七倍。

今天的孟加拉国确实是一个塞在狭小区域里的巨大社会。孟加拉国的面积大约相当于威斯康星州或希腊,但其人口比俄罗斯或日本的都多。它是世界第七人口大国。它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其领土为 14.4 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为 13.3 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有 1 064 人,而全世界的这一数据是 48 人,全亚洲是 124 人,印度是 345 人。[6]这对孟加拉国人意味着,只能在急剧减少的空间和资源内凑合。今天,每个孟加拉国人所占有的空间还不足其一百年前的先辈的 1/4;到 2050 年(根据一些预测,届时孟加拉国人口将达到两亿五千万)可能就只有 1/10 了(图表 7.1)。



图表 7.1　孟加拉人口,1872－2001 年。

乡村拥挤成为重要问题,因为农业产量的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

速度。相反，20 世纪以来，人均产出下降了。随着乡村财富的减少，对于许多人而言，生活变得越发没有安全感，贫困状况明显变得更加严重。还有环境方面的变化也使生活越发艰难(参见“有害的舶来品”)。

有害的舶来品

1939 年 4 月，可以看到整个孟加拉三角洲的人们都在从河流、水道和池塘里拔出一丛丛开着淡紫色美丽花朵的鲜绿色植物。政府制定了“凤眼兰周”以集中力量铲除这种漂浮水生植物。

凤眼兰*的原产地在巴西，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向全球蔓延。它可能是由一位来自纳拉扬甘杰的苏格兰黄麻商人在 1900 年前后从澳大利亚向孟加拉进口货物的时候，作为装饰性珍稀植物运进来的。其扩散速度相当之快，利用“气囊式的叶柄和帆式的叶子”在风中传播，甚至逆着水流，以难以置信的速度传播繁殖。它在孟加拉多雨、温暖的气候中找到了理想的环境，很快就塞满了三角洲的河道和稻田，并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传到了阿萨姆。到 20 世纪 20 年代，它被认为是一种顶级的环境、经济和健康灾难。在许多地方，种植水稻和捕鱼变得困难，内陆航行受到阻碍，并且这种野草还被谴责导致了霍乱和其他疾病。

应该做什么？这是有害植物还是机会呢？其是否能够被有效地利用还是应当被彻底消灭？一些人认为这种植物的灰烬可以当肥料使用，其纤维也可用于商业目的，或者这种植物能够压制成坚实的建筑用砖。另一些人则认为彻底根除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后者赢得了这场辩论。1936 年通过了《凤眼兰法令》，决定在孟加拉三角洲彻底根除这种有害的舶来品。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植物实在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它在化学喷雾剂、“凤眼兰周”的群众动员以及一系列后殖民国家的努力中轻易生存下来。今天，其在孟加拉国已经彻底扎根下来，静静地、顽强地漂流在几乎所有的水域中——像以往一样美丽、无用和难以控

* 即水葫芦——译者注。

制(插图 7.2)。[7]





插图 7.2　诺多尔(Nator,孟加拉西部)一处河道中的凤眼兰。

然而,经济作物的出现也带来了一些缓解。非常肥沃的东孟加拉土地尤其适合黄麻的种植。这是一种本土的季节性作物,能产出一种用于麻袋、绳索、地毯底布、工业包装和帆布的纤维。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东孟加拉就成为世界上这种纤维作物最主要的生产中心,行销世界各地。从地里收获后,它们被用船或火车运到加尔各答和苏格兰的工厂。其后就变成数亿的麻袋,用以装运巴西的咖啡、加纳的可可、泰国的大米、俄罗斯的燕麦等任何东西。整个三角洲的小佃农都种植黄麻,尤其是在达卡、迈门辛和朗布尔地区。

甘蔗是西部的另一种重要经济作物。数百万家庭生产的大米不仅供给它们自己消耗,也逐渐增加了商业价值;到殖民时代末期,大约有 2/5 的大米已经实现了市场化。所有这些作物都要求基于季节变化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在劳动力需求达到顶峰的那几个月里,从三角洲其

74

他地区和来自“内地”[印度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和比哈尔邦]的移民就会来帮助收割。[8]除了生长在锡尔赫特和吉大港山区的茶叶之外,作为全世界殖民地农业特色的种植园作物在孟加拉三角洲并不占重要地位。这里的茶叶种植园大约建立于19世纪50年代,在此前就已经开始了生产;今天的孟加拉国约有150个茶叶种植园。这些种植园中的劳动力并不来自邻近地区。相反,他们是从印度的中部、南部招募来的,并仍旧是个十分与众不同的群体。[9]

到英国人统治末期,古老的耕地边界已经关闭,三角洲再也不能继续进行农业扩展了。边界的关闭受到了殖民时期新发展的驱使。柴明达尔税收体系与寄生地主阶层阻碍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商业种植基于大量小佃农以简单技术进行的劳动,而他们靠借债才能从一次收获坚持到下一次收获。普遍的高生育策略导致了人口的扩张,人们试图在一片日益拥挤的土地上谋生。在英国统治开始的时候,乡村生活水平是很低的;当统治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一水平变得更低了。

1943 年大饥荒

生活的普遍不安定在英国统治即将结束时,以一种极为可怕的方式展现了出来。在1943至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场严重的饥荒袭击了孟加拉。其导致了大约3 500万人丧生,其中绝大多数在东孟加拉乡村。[10]这是一场人为的灾难,因为并非食物短缺而是粮食市场的崩溃导致如此多的人死亡。

饥荒的背景相当复杂。战时,日本先遣队阻塞了英国在香港和新加坡的要塞,并在1942年5月迫使英国从缅甸撤军。大约有30万难民逃到了孟加拉。到7月份,日本军队与反英的印度国家军队逼近印度东北部,英国人预计他们要在1942年晚些时候攻打孟加拉。随着日本军机反复轰炸吉大港和加尔各答,已经失去了孟加拉湾制海权的英国人感到了恐慌,并计划要撤退。为了预防日军进犯,他们摧毁了沿海地区超过6万艘载客量在十人及以上的船只。这次沉舟计划“使数十万农民丧失了生计。渔民再也无法到他们的渔场,岛屿田和沙洲田的

75



插图 7.3 《饥荒》(*Famine*),泽努尔·阿比丁(Zainul Abedin)作。出自 B. K. Jahangir, *The Quest of Zainul Abedin*。

耕种者也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庄稼,制陶工人也再无法将他们的货物带到市场上去出售了"。[11] 当局又驱逐了 15 万农民离开他们的土地,匆忙地为飞机跑道和军营腾出空间。除此之外,1942 年 10 月,一场飓风袭击了(现属印度的)西孟加拉的梅迪尼布尔(Medinipur)和二十四帕格纳斯(24-Parganas),造成 1.4 万人丧生,且摧毁了已经成熟的水稻。

76

事态发展加深了"当地需要,甚至包括生活必需品对官方和军事优先的从属地位"。政府难以解决加尔各答供给的紧张局势,"试图强迫然后诱骗低层生产者将他们自己的口粮拿出来"。政府拿出大量资金以快速收购稻子和大米,并制定了最高限价,切断了当地的贸易商,最终只剩下耕种者自身谨慎地售卖粮食。粮食市场系统崩溃了,"乡村数

百万依赖市场的消费者，不能像他们在首都的同胞们那样受到保护，只能在市场上以极高的价格换得极为有限的大米”。几百万人因无力支付而最终饿死。在福里德布尔(Faridpur)、库米拉和吉大港一些地方，有1/10的居民饿死，在宝拉(Bhola)这个大岛上，七人中就有一人饿死。[12]“50年大饥荒”(孟加拉历1350年，即公元1943/1944年，*pañcāśer manbantar*)作为一个重大悲痛经验蚀刻进了集体意识当中。其恶名尤其被泽努尔·阿比丁(Zainul Abedin)的诸多“饥荒素描”所保留下来。这位来自迈门辛的年轻画家后来成为孟加拉最著名的画家之一(插图7.3)。[13]

1943年大饥荒是孟加拉社会在一代人内所要承受的三次重大震动的第一次。其后，1947年，在英国统治的最后时刻，发生了印巴分治；1971年，又发生了孟加拉国解放战争。后来的两次剧变，都源于殖民时代形成的文化与政治转变。

77

第八章　殖民地的冲突

殖民时代带来了政治和文化上的重大革新变化。建立英国的权威，不仅仅是在普拉西打败先前的统治者和实现控制柴明达尔这样一些简单问题。一个奠基于同乡村贵族形成联盟的独裁国家必然会招致反对。事实上，殖民统治时叛乱常常发生。一开始，英国统治者就措手不及地受到了数以千计武装宗教托钵僧的严重挑战，后者被缺乏考虑的禁止征集施舍金的政府政策所激怒。这次反抗赢得了备受强加的新赋税体系之苦的乡村人民的广泛支持，并转向反抗收税官和军队。这被称为托钵僧-苦行者反抗(Fakir-Sannyasi resistance)——托钵僧和苦行者分别是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宗教人士——其将游击战略和数千人参与的大型战役结合起来。这些反抗从 18 世纪 60 年代早期至 18 世纪 90 年代席卷了英国人统治的整个孟加拉和比哈尔。[1]对殖民政府的愤恨也在众多地方性的反抗中体现出来——比如在吉大港和迈门辛[2]——这些运动采取的是保护社区权利的形式。

然而到 19 世纪中期，英国的统治在孟加拉三角洲就不再受到威胁了。[3]1857 年大起义——英国人称之为“暴动”，一些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则称之为“第一次解放战争”——几乎造成英国统治在印度北部、中部许多地区濒临崩溃，孟加拉三角洲却置身事外。当然，在吉大港发生过一次兵变，居住在达卡的英国人也感到了恐慌，但是由于

地主和中产阶层乃至农民都没有支持这次反抗，在几次小规模冲突之后就失败了。那时，在孟加拉三角洲，对政治的不满集中在商业化农业的影响和耕种者的合法权利上。反抗主要出现在耕种者和正在兴起的中产阶层当中，一方面是反对柴明达尔，另一方面是反对欧洲企业和殖民政府。

78

若干反对强迫靛蓝种植的运动，最终成功地结束了孟加拉三角洲令人厌恶的靛蓝产业。这些运动的领导者是伊斯兰教传教士，他们曾去麦加朝圣并受到了当时阿拉伯瓦哈比派（Wahhabism）思想的影响，其思想主张献身于反对伊斯兰世界的道德堕落和政治缺陷，并且不赞成大众流行的对圣人及其圣祠的崇拜。他们回来之后，就开始着手“净化”孟加拉穆斯林宗教实践，但很快就变成了农民阶层利益的拥护者。结果就是对柴明达尔、种植园主和英国统治的武装反抗。提图·米尔（Titu Mir，1782－1831）在麦加待了五年，其后成为孟加拉塔里夸-伊-穆罕马迪亚（Tariqah-i-Muhammadiyah）起义的领袖。哈吉·沙里阿图拉（Haji Shariatullah，1781－1840）在麦加生活了十九年，回来后领导了法莱兹（Faraizi）起义。他的儿子兼继承者杜杜·米阿（Dudu Miah，1819－1862）也在麦加待了五年后领导农民投入“蓝色暴动”（Blue Mutiny，1859－1862），这次暴动彻底摧毁了孟加拉的靛蓝产业。然而，并非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受到宗教激励的。帕布纳起义（The Pabna Revolt，1873）强调更单一的阶层利益。它与另一种经济作物黄麻的胜利相联系，新出现的乡村中产阶层开始主张反对柴明达尔。

19 世纪末期见证了伯德鲁洛克与农民激进分子之间政治联合的开端。下面是这一时期一个恼怒的西孟加拉地主的描述：

> 他们大部分来自东孟加拉，一些从英国回来的本地人也加入其中，其多数也出生在那一地区。他们曾经见过或读过更多爱尔兰煽动者的行为或事迹……他们到佃农那里去，假装要成为他们的朋友，在他们和柴明达尔之间撒下了纠纷的种子，因此使一个阶层反抗另一个阶层。[4]

这种农民激进主义与上层阶级主张之间的政治联合成为孟加拉三角洲20世纪许多运动的重要模式。结束经济剥削和实现自决的希望融入层出不穷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这些斗争许多都与全印度性的组织相关。英国以暴力镇压和让步相混合的手段进行回应。让步包括,一定程度上放松政府与柴明达尔之间的联盟,给予耕种者更多的权利和允许更多的伯德鲁洛克代表参与到政策制定中。但让步最终还是做得太小且太晚。殖民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一直很混乱,民族主义者进行非暴力不合作反抗运动,要求英国人离开印度;与此同时,共产主义所激起的佃农运动也在反抗土地压迫。

79

1905年分治

在孟加拉三角洲,事态的状况由一次行政变化所预示。1905年,英国将庞大的孟加拉省分为西部("孟加拉",Bengal)和东部("东孟加拉和阿萨姆")(地图8.1)。这一决定导致了整个孟加拉(事实上也是整个印度)思想的迅速分裂。许多人认为,1905年的孟加拉分治是为了瓦解反殖民运动的深思熟虑的举动(这一观点尤其在孟加拉盛行)以及"划分和统治"讲孟加拉语的人。[5]

80

一个强大的反对声音也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加尔各答的中层和上层阶级当中。他们害怕失去经济权利(茶叶和黄麻的出口现在可能通过吉大港)、不便利(东孟加拉的在外地主定居在加尔各答)以及竞争(东孟加拉新的法庭体系可能将加尔各答的律师排除在外,新的报纸可能会限制加尔各答报社的发行量)。然而,将这种地方性反对转化成一股重要力量的是民族动力。它激起了民族主义运动并赢得了大众的支持。它同时也表明了传统稳健的反抗形式(新闻宣传、请愿、集会和协商)已经不起作用了。结果是,反对者发展出了新的策略。第一个为人所知的是斯瓦德希(Swadeshi,意为"本国")运动。[6]它呼吁人们联合抵制英国的货物、教育和行政体系,并提倡以建立印度自己的工业,复兴手工和工艺生产,建立民族学校以及发展乡村改善计划等方式来自力更生。



地图 8.1　1905 年孟加拉省划分。

第二个策略是政治暗杀——随着联合抵制和自力更生运动的限制越来越明显,其也成为反对孟加拉分裂的激进分子的选择。这一策略被称为“孟加拉恐怖主义”,其首先在革命青年团体中发展起来,他们学习的是俄罗斯、意大利和爱尔兰秘密社会的榜样。他们采取公开的暴力行为刺杀地位高的英国人和当地投敌者作为反对殖民统治的武器。这一行动相当成功,因为不仅袭击本身,就连其后的审判也受到了广泛的宣扬。[7]这些行为创造了革命英雄,许多人至今都在孟加拉国被作为烈士纪念,尤其是库迪拉姆·巴苏(Khudiram Basu,他在 1908 年被处以绞刑)、“老师兄弟”苏利耶·森(“Mastarda”Surya Sen,他精心策划了 1930 年对吉大港兵工厂的袭击,在 1934 年被处以绞刑)



插图 8.1 普里提拉塔·瓦迪达(Pritilata Waddadar)。承蒙 Archives of Bangladesh History, Rajshahi 提供。

以及普里提拉塔·瓦迪达(Pritilata Waddadar)——这个来自吉大港的年轻女子曾参加对吉大港兵工厂的袭击,她在1932年被警察围困时以自杀结束了21岁的生命(插图8.1)。[8]

1905年的孟加拉行政分治开启了整个南亚反殖民组织的新时期。然而在孟加拉,其也是另一种种类的分水岭:它暴露了宗教团体之间政治团结的弱点。1905年之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成为清晰的政治类别,而这种区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给孟加拉政治生活打上了显著的印记。

一系列事件导致了这种状况的发生。首先,在东孟加拉和阿萨姆新省,穆斯林明显占人口的多数。新的首府设在达卡,为了安置行政机构建立了许多威严壮观的建筑,比如总督府邸(the Governor's Residence)和寇松广场(Curzon Hall)(插图8.2)。许多受过教育的穆斯林希望在省行政机构中或达卡日益增长的服务部门中谋职。这些受过教育的穆斯林将新省视为一次职业机会。

81

第二,虽然在两部分孟加拉最初都有一些穆斯林参与到反对行省分裂的活动中,但因为这些反抗运动受到文化政治的影响,其热情很快就衰落了。伯德鲁洛克阶层在反分裂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然而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群体主要是来自加尔各答的高级种姓的印度教徒。他们特殊的社会宗教定位奠定了斯瓦德希运动的基调:反分裂运动是被一种浪漫的、反殖民的孟加拉民族主义所持续推动的。[9]他们试图将这一运动与印度教信仰复兴运动联系起来以动员民众,将祖国视为迦梨

女神并采用《祖国,我向您致敬》(*Bande Mātaram*)这首歌曲作为整个运动的赞歌,对于这些,许多穆斯林拒绝接受。民族教育的计划也基于复兴印度教光辉传统的需要,革命青年俱乐部为印度教精华所鼓舞,而低等种姓的印度教徒也通过传统的种姓规则被劝说加入到联合抵制当中。[10]这种宗教特性使运动扩展到数百万印度教徒当中——但却引起了非印度教徒的反感。 82



插图 8.2　寇松广场,原为达卡市政厅建筑,现在是达卡大学的一部分。

第三,孟加拉的穆斯林当时开始自觉地将自己界定为一个团体。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英国将穆斯林视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团体,鼓励其发展基于宗教认同的政治意识。[11]然而这并不容易,因为孟加拉的穆斯林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个特殊的团体。在各种各样的穆斯林群体中,任何统一的观念都会受到他们之间深刻分歧的阻碍。主要的区别是在社会文化方面。直到 19 世纪后期,绝大多数孟加拉穆斯林“更像是由印度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和万物有灵论者组成的孟加拉人团体中的一部分,而非一个独特的伊斯兰团体”。[12]他们所信仰的伊斯兰教有着深 83

厚的区域乡村文化根源。人数少得多却更有力的共同信仰者团体，则取向一种城市的和上层的文化。他们认为自己是贵族，有阿拉伯、波斯或中亚人的血统(*ashraf*)。这些孟加拉阿什拉夫(ashraf)中的许多人都尝试效仿北印度的伊斯兰文化模式——基于波斯语和乌尔都语，面向德里、拉合尔(Lahore)、阿格拉(Agra)和勒克瑙(Lucknow)——并且他们认为自己是东部内陆地区真正的伊斯兰文化的守护者。他们看不起当地耕种者和工匠们的伊斯兰教，认为他们只是些狭隘的本地皈依者(*ājlāph* 或 *ātrāp*，意为"出身低贱的")，其宗教活动、语言和生活方式都是缺乏教养的，并受到了非伊斯兰影响的污染。在19世纪，这些自封的伊斯兰公正的仲裁者在孟加拉乡村(那里生活着孟加拉95%的穆斯林)尝试了各种"阿什拉夫兴起"(ashraf-rising)的伊斯兰教实践。由于通讯方式的便利和识字率的提高，这一进攻性的教化变得更为容易。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孟加拉穆斯林受到了教育，在他们中间又出现了大量的各种新观念和文字表达(参见"讽刺作家洛克亚")。

虽然许多受过教育的穆斯林仍然不愿将浸淫在孟加拉文化中的下层农民——他们将其归类为非伊斯兰的——视为"真正的"穆斯林，普通穆斯林身份的想法却随着英国决定分裂孟加拉和选举政治的发展而生根了。[13]因此，成立一个代表全体穆斯林的党派的想法就有了实现的可能。1906年在达卡的一次会议上，一个阿什拉夫政治家团体建立了全印度穆斯林联盟(the All-India Muslim League)。这一新政党反对反分裂运动及其背后的印度国民大会党(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他们向穆斯林团体——不仅是孟加拉的，而且是全印度的——的呼吁成为基于宗教团体的政治动员新时代的先驱。这种政治——印度教和穆斯林政治家都在同等地使用[14]——被描绘为"社群"政治或"社群主义"。

84

讽刺作家洛克亚(Rokeya)

1905年，一位孟加拉妇女下笔创造了一个女儿国。那是一个女权主义的乌托邦，在男人因不断的战争几乎全部死去之后，就由更聪明、更具

有科学思想的妇女来统治一个完美的国家。叙述者是苏尔塔纳,一个来自孟加拉的旅行者,一位名叫萨拉的教友带着她各处游览,苏尔塔纳对所见感到震惊:

> 当我在那里行走的时候,遇到了一百多个妇女,却没有看见一个男人。
>
> "你们的男人到哪里去了?"我问她。
>
> "在适合他们的地方,在他们应该去的地方。"
>
> "请让我知道,你所说的'适合的地方'指的是什么。"
>
> "哦,我知道我的错误了,你不知道我们的风俗,因为你此前从未来过这里。我们把男人关在家里。"
>
> "就像是我们被关在闺房里一样?"
>
> "确实如此。"
>
> "多么有趣啊。"我不禁笑起来。萨拉也笑了。
>
> "但是亲爱的苏尔塔纳,将无害的妇女关起来却让男人随心所欲这多不公平……你为什么允许自己被关起来?"
>
> "因为反抗没有用,他们比女人强壮。"
>
> "一头狮子比一个人强壮,但是它却无法统治人类。你忽视了你对自己的责任,你对自己权益的闭上眼睛就是丢掉了你的自然权利。"
>
> "但是我亲爱的萨拉姐妹,如果每一件事都要我们自己做,男人又干什么呢?"
>
> "对不起,他们应当什么都别做;他们干什么都不合适。只抓住他们把他们扔进闺房里去吧。"

这便是洛克亚·萨克哈瓦特·侯赛因(Rokeya Sakhawat Hossain)——现在以洛克亚女士(Begum Rokeya)而闻名——所创造的社会讽刺梦幻,在那里"妇女统治整个国家并管理所有的社会事务,而男人则被关在马达纳斯(Mardanas,男人的闺房)中去照顾孩子,做饭以及料理所有的家务"。

洛克亚(1880 — 1932)生于朗布尔(孟加拉北部)一个富裕的穆斯林家



插图 8.3 洛克亚·萨克哈瓦特·侯赛因。承蒙 Archives of Bangladesh History, Rajshahi 提供。

庭。在她生活的圈子里，女性教育不被赞成，因为其打破了女性隔离的严格规矩。无论如何，她的哥哥姐姐秘密地教她读写孟加拉文和英文。她在 16 岁的时候嫁给了一个比她年长很多的帕戈尔布尔（Bhagalpur，比哈尔邦）的高官，并在他那里得到了进行女性解放写作的支持，其后作品很快刊登在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的杂志上。29 岁那年她成了寡妇，创办了一所为女孩提供教育的学校。她的两个身份——一面是咄咄逼人的女权作家，另一面又是试图劝说家长放心将女儿交给自己教育的教育家——经常发生冲突。

今天，洛克亚被广泛称为南亚妇女运动的先驱之一；她的作品在孟加拉和印度都继续被翻译和出版。[15]

最后，随着经济不平等的增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也随之加强。在东孟加拉的佃农（几乎全部是穆斯林）开始向地主和借贷者（大多数是印度教徒）面对面地要求他们的经济权利。与此同时，新出现的穆斯林中间阶层在社会和政治上的雄心壮志也因印度教显贵倨傲的态度而受挫。那些印度教显贵始终认为，穆斯林在威望和身份地位上远远低于自己。1906 至 1907 年，印度教斯瓦德希激进分子及穆斯林反对者开始在东孟加拉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迈门辛和库米拉利用群众暴动互相攻击。[16]这些“社群暴乱”及其所制造出来的不安全感被证明是加强宗教团结的有力工具。它们创造并培育出了“社群成见”（communal stereotypes）。许多印度教伯德鲁洛克现在不仅将乡村

85

穆斯林视为地位低下的人,更将其视为危险的反斯瓦德希恶棍,是英国的间谍。另一方面,在穆斯林当中,印度教徒越发被描述为自大、狡猾和麻木不仁且想要永远统治穆斯林的剥削者形象。

1911 年,英国取消了 1905 年孟加拉分治的决定,同时宣布将帝国首府从加尔各答迁到印度北部的德里。建设新的行政首府用了 20 年时间,正式的落成典礼直到 1931 年才举行。无论如何,从 1911 年起,大多数孟加拉政治家因其政治舞台从国家层面缩小到区域层面而失去了权力。许多人认为,1911 年的搬迁措施相对容易地达到了 1905 年分治的主要目的:破坏印度持鲜明民族主义政策的孟加拉政治家的根基。1905 至 1911 年孟加拉分治没有达成的目的,是将孟加拉人分离成区域的形式。如果说它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加强了跨区域的孟加拉意识。但其真正的效果,却是创造了一个特别的区域政治结构,其中宗教身份超过了地域和阶层身份。因此不考虑地域和阶层的多样性的话,对于整个孟加拉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来说,孟加拉地区现在成为活跃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分裂的和对抗性的——身份政治的中心了。 86

在殖民统治结束之前仅剩的这些年里,我们能看到抵制与推动社群政治的两股力量的复杂争斗。前者中有全印度民族主义者、全孟加拉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后者中有印度教和穆斯林沙文主义者,以及那些认为只有创立聚焦于孟加拉穆斯林利益的组织才能最好地实现穆斯林经济解放的人。农民激进主义与上层、中层主张之间的政治联合在这一时期所有成功的运动中——从共产主义者激励的罢工和佃农起义到整个孟加拉三角洲对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广泛支持——都能看到。

同时,代议政治也在孟加拉有所发展。在 19 世纪后期,选举首次在城市中根据“限制连记法”(limited vote)进行。在民众的压力下,这一系统逐渐扩展包括了乡村区域、省和中央的立法会议以及更大的选民团体。[17] 然而其从未实现普选权,1909 年穆斯林领袖获得了一个在其之下穆斯林可以为保留席位单独投票的系统。这种分别选举的结构后

来进一步扩展,包括为低等种姓的印度教徒("贱民")指定席位,并一直持续到殖民统治结束。

直到1920年,候选人的竞争都是独立于党派联盟的。甚至在政党提名候选人之后,独立候选人仍然十分重要:在1937年的选举中,250个孟加拉议席中有1/3被独立候选人夺得。但随后不久,政党政治就有了迅速的发展。分别选举和政党提名候选人两种方式的组合,保证了社群趋势牢固地嵌在孟加拉的代议政治中:1946年的选举中只有3%的独立候选人。如此,两大政党清晰地控制着这个舞台:穆斯林联盟和印度国大党(图表8.1)。选举政治凸显了孟加拉的区域特性:国大党几乎在印度赢得了所有地区的控制权[除了旁遮普(Punjab)],却从未在孟加拉地区取得这样的成功。

87

	1937年	1946年
独立候选人	32	3
穆斯林联盟	21	46
印度国大党	16	34
其他政党和团体	31	17
总计(250席)	100%	100%

图表8.1 孟加拉1937年和1946年省议会选举结果(席位百分比)。

20世纪前几十年的政治动荡表明,英国统治可能比以往预期的要结束得更快。也使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作为政治派别之间的芥蒂比以往更加根深蒂固。然而,到1940年,孟加拉三角洲的政治未来看起来还是完全开放的。当时没有人能想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三十年后竟会出现一个名为孟加拉国的国家。

第九章　走 向 分 治

88

在 20 世纪 40 年代，孟加拉三角洲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进攻和 1943 — 1944 年大饥荒的打击动摇了业已建立的秩序。此后不久，社会和政治秩序就开始崩溃了。在各种相关因素中，有三个对后来孟加拉国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两个政治类别之间的竞争迅速加剧，阶级起义席卷乡村，以及英国霸主决定从他们长期占据的殖民地中脱离出来。

印度教徒—穆斯林竞争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许多印度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在盘算通过将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区域和其他部分分离开来的办法以保护印度穆斯林的权利。这些主意很快在 1940 年穆斯林联盟做的一项决议中具体化了。其声明：

> 本次全印度穆斯林联盟会议提出以下经过深思熟虑的看法，认为在这个国家无法使宪法计划有效运转或被穆斯林所接受，除非其按照以下的基本原则进行设计，亦即将地理上邻近的单元划分区域……（并且）在穆斯林占多数的（英属）印度西北部和东部区域应当分组形成"独立国家"，在那里选民集体应当是自治且享有主权的。[1]

这一《拉合尔决议》(或《巴基斯坦决议》,Lahore Resolution 或 Pakistan Resolution)符合许多英属印度穆斯林的想象。结果是,这一从殖民地切出一个或更多个穆斯林家园的观念第一次成为政治事件。它挑战了国大党运动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所有印度人组成一个国家为获得自治而战。寻求穆斯林祖国的运动始于这样的主张,即穆斯林不仅仅是一个在印度国家中的团体,而是一个有自治权的分离出来的国家。因此在英属印度有两个国家,穆斯林的和其他人的。这就是著名的"两国论"(two-nations theory)。

89

然而,穆斯林祖国的观念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它将成为一个还是多个国家?它将是完全独立的,还是包含整个过去殖民地的联盟中的一个自治部分?在《拉合尔决议》中"伊斯兰"一词的忽略是否意味着巴基斯坦将不会成为一个由伊斯兰法律和制度统治的国家?这些事情一直到殖民统治完全结束后才尘埃落定:一个想象的祖国中包含着许多不同的想象。[2]印度穆斯林的祖国被称为"巴基斯坦"——这个首字母缩写词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就被创造出来,但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才流行起来。它代表着宣称为祖国组成部分的若干区域:P 代表旁遮普,A 代表阿富汗(普什图人),K 代表克什米尔,S 代表信德(Sindh)而"tan"代表俾路支(Baluchistan)。其完全没有提到孟加拉。

这样便开始了殖民统治下民族主义政治的最后一局。两大党在关于未来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裂,他们之间的分歧通常理解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或者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竞争。从这时开始,突出整个孟加拉统一的尝试失败了,社群政治开始主宰孟加拉(以及南亚)的进程。

乡村起义

当城市中的政治家正在为国家的未来而斗争时,孟加拉乡村社会也在发生剧变。20 世纪 30 年代末就爆发了数次反对地主的运动,而在大饥荒之后,发展成席卷整个孟加拉的佃农起义。声势最大的台布哈加(Tebhaga,来自 *te-bhāgā*,意为"一分为三")运动的核心要求是允

许佃农保留 2/3 的粮食而非通常的一半或更少。[3]这一运动在 1946 至 1947 年达到顶峰,当时许多地方的志愿者组织以竹棍武装,对稻田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并进行集体收割,将粮食运到佃农而非地主的打谷场中(插图 9.1)。其后他们向地主发告示,让其来领自己的那 1/3 的粮食并书面签收。小部分地主做出了让步,但大多数地主都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或者诉诸武力来解决。

因为政府政策的不清晰,地方官员的回应是多种多样的。许多地方发生了佃农、地主家仆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最先的骚乱发生在农民组织克里萨克—萨布哈(Krishok Shobha,一个全国性的共产主义

90



插图 9.1 台布哈加运动分子在集体收割时拿着共产主义者的旗帜和竹棍,1946 年 12 月,朗布尔区。Somnath Hore 素描。[4]

者领导的组织的地方分支，其坚持维护农民的利益）曾经积极动员过的孟加拉部分地区。其后扩散到其他许多有同样要求的地区。地方的反抗在策略、强度和结果上都有所差异。在杰索尔、迪纳杰布尔、朗布尔和迈门辛等地区，在运动衰弱为更地方化和有限的反抗之前，佃农强大到足够在一定时期内建立一个“自由区域”(liberated areas)，某些情况下还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参见“革命者伊拉”）。与此同时，其他的乡村冲突也在发生。佃农起来反对他们的地主，如在迈门辛的坦卡运动（Tanka Movement）和锡尔赫特的南卡尔运动（Nankar Movement）。

91

革命者伊拉

1950年1月，一个24岁的妇女在拉杰沙希西区被警察询问、拷打并奸污了。她是伊拉·密特拉（Ila Mitra），一个加尔各答受过教育的有地位的妇女（*bhadramahilā*），她的丈夫莱曼（Ramen）是这一地区一个富有的柴明达尔（地主）家庭的子孙。她与一群同伴在向西逃亡时被捕。

伊拉·密特拉（1925－2002）不是一般的地主妻子。她和她的丈夫是革命组织者，他们希望上层社会的革命者与大众革命者联合起来，共同寻找适合孟加拉的模式。她在学生时代，就已经是妇女自卫联盟（Women's Self Defence Association）和全印度共产党的成员，在嫁给莱曼之后，加入了他在农民组织（克里萨克-萨布哈）从事的活动中。1946年，她去了诺阿卡利（孟加拉东南部），看到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杀戮，并帮助组织了一个反对印度教徒-穆斯林暴力的运动。回家后，她又积极参与当地的台布哈加起义——后来以那考尔起义（the Nachol Rebellion）而闻名。当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分治，那考尔起义仍在继续。主要原因是这里的上层共产主义组织者和起义农民并不像这个国家其他大部分地方一样因宗教认同而分离。在那考尔，农民和领袖绝大多数都是非穆斯林。大多数农民是桑塔尔和孟加拉印度教徒，而大多数试图组织起义的共产主义者骨干也都是孟加拉印度教徒。

伊拉在1948年左右巴基斯坦政府禁止共产党时——该党大多数在孟

加拉的成员选择了东巴基斯坦而非印度[5]——地位日益提高，那考尔运动也变得越发激进。在短暂的去往加尔各答生下儿子之后，她又回来投身于一个更为暴力的运动。到 1949 年末，这一地区大多数地主都被迫接受了运动的要求：2/3 的粮食留给佃农，1/3 的糙米作为工资给劳动者。此时，台布哈加运动在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地区都趋于衰落了，当局也计划在那考尔将之彻底击败。[6]事情在 1950 年 1 月达到紧急关头，暴怒的村民以竹棍、长矛、弓箭为武器袭击了一队警察并杀死了五个人。巴基斯坦军队开到这一地区，洗劫、奸淫并放火烧毁村庄。那考尔起义被粉碎了，数百人被杀。许多人想要通过边境逃走。伊拉·密特拉是不幸被捕者中的一员。尽管她假扮成桑塔尔农妇，还是在与一群桑塔尔流亡者一起的时候被认了出来；他们都被拘留了，只有伊拉·密特拉成为轰动一时的讼案。1951 年她在拉杰沙希法庭上的陈述暴露了警察和军队的暴行，并加深了东巴基斯坦居民中对穆斯林联盟政府的普遍不满。虽然被判处终身监禁，但她从 1954 年的政府更迭中受益。鉴于她极端虚弱的身体状况，新政府允许她前往加尔各答接受医疗护理（插图 9.2）。在孟加拉国独立之前她都没有回去过。每一次她回去，都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92



插图 9.2 1954 年，伊拉·密特拉在达卡医学院医院。承蒙 Archives of Bangladesh History，Rajshahi 提供。

这些乡村冲突动摇了自 18 世纪后期以来支撑殖民统治的经济框架。到处都在广泛地讨论废除柴明达尔税收体系，并合法地取消地主

93 们的特权。这很清楚地表明,殖民统治的结束也意味着乡村经济的巨变。这加强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身份之间的分歧。孟加拉享有特权的有地阶层、自信的伯德鲁洛克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以及有权势的商人看到了对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统治的根本性挑战。这些精英上层中的大多数是印度教徒,他们的政治领袖决定通过从民族主义策略性地转移到地方自治主义政策,以增加他们的力量。他们开始招募低等种姓和"贱民"以及一些有名无实的印度教团体加入他们的主要政党——印度国大党孟加拉分部,并在演讲中承诺保卫"印度教徒的利益"。逐渐地,这些政治领袖得出结论,认为孟加拉的分治比穆斯林的统治更为可取——在孟加拉省内穆斯林占大多数——并且在1946年开始了一场要求将西孟加拉(印度教徒占多数)从穆斯林统治的东孟加拉中分离出来的运动。[7]

另一方面,在大量的穆斯林农民当中,即将到来的地主体系的崩溃成为希望的源泉。东孟加拉的农民认识到,国大党对于这一期待并不能做什么。它表现得并不愿声援佃农的需求,而认为自己只是代表印度民族雄心的政党。其拒绝支持其他民族主义政党,并且排斥能够吸引农民支持的政党联合。因此,作为唯一一个能与国大党相抗衡的区域性政党的穆斯林联盟,就在殖民统治的最后岁月里作为最好的选择出现了。大多数东孟加拉的农民都认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基斯坦"是将他们从地主统治下解救出来、建立耕种者自有土地的"农民乌托邦"、实现平均主义和正义的最佳选择。[8]正是因为这些经济原因,而远非任何宗教上的动机,他们最终选择同宣称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基斯坦国的穆斯林联盟共命运。

然而,穆斯林联盟并不像印度教地方自治主义者那样争取孟加拉的分治。当然,他们想要创造一个穆斯林的家园——但在其看来,巴基斯坦应包括整个孟加拉。国大党坚持孟加拉分治以将穆斯林联盟从印度后独立时代的政治平衡中排除出去。很明显,随着殖民时代走向终结,对战利品的分割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没人知道那将会是什么情况或谁将从中获益。

英国的撤退

94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英国以镇压和让步结合的做法满足了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他们推动了宪法改革——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使省政府部门归于选举出的印度大臣管理,但保留了英国在全印度层面上的决定性权力。这一法案想要通过转移民族主义者的挑战来维护英国的统治。其在孟加拉运行良好:它创造了一个省级的政治舞台,社群之间的内斗纷纷上演。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的政策迅速发生了改变。印度的事件(大规模公共抗议、武装力量的兵变)、财政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从印度的债权国变成了负债国)、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英国的新政府昭示着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末路。在1946年初,一个来自英国的内阁使团讨论了印度独立的问题。它建议在后殖民时代建立一个松散的联邦结构。政治温度迅速升高。数千人在加尔各答、诺阿卡利、库米拉以及比哈尔附近地区的冲突中丧生,导致孟加拉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紧张关系迅速恶化。一些在孟加拉的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领袖进行着最后的努力,他们提议统一的孟加拉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以避免正在逼近的分裂灾难。这一倡议受到了许多有全国影响力的政治家们(尤其是M. K.甘地和M. A.真纳)的支持,但却被国大党的领导阶层否决了,他们想要孟加拉分治。孟加拉的命运现在是未知的:其西半部将要并入独立的印度,而东半部则并入独立的巴基斯坦。将之视为巴基斯坦分裂主义或分离的结果会产生误导。毋宁说,国大党的领导阶层“对实质的省自治和(对穆斯林联盟)承认要实质地分享中央权力都同样的厌恶,这表明用专断的排他性而非分裂主义可能会更好地解释1947年的结果”。[9]

1947年早期,英国急于想从日益难以控制的事务中尽快脱身。2月份,他们宣称将在一年半内离开,但到了6月份的时候又改到了1947年8月15日。狂热的竞选活动和行政准备的几周里,夹杂着日

95 益增加的政治激进主义和暴力。在英国统治即将结束的 6 周之前,建立了两个决定如何划分巴基斯坦和印度新边界的边界委员会(分别为了对旁遮普和孟加拉进行划分)。这两个委员会——都由同一位主席,西里尔·拉德克里夫(Cyril Radcliffe)所领导——被那些试图改变裁定的说客们所包围。最终,这两个委员会都没有做出全体一致的决议,因此主席就不得不担负起分割殖民地领土的责任。

第十章　分　　治

96

20 世纪 40 年代早期的大饥荒给三角洲的社会结构造成了巨大破坏。现在,1947 年的印度分治将社会结构撕成了碎片。没有对分治及其影响的理解,就无法理解当代孟加拉国社会。虽然 1947 年的震荡不再是大多数孟加拉国人的鲜活记忆——但是其所创造的经济现实、历史神话和政治思想仍与今天的社会相缠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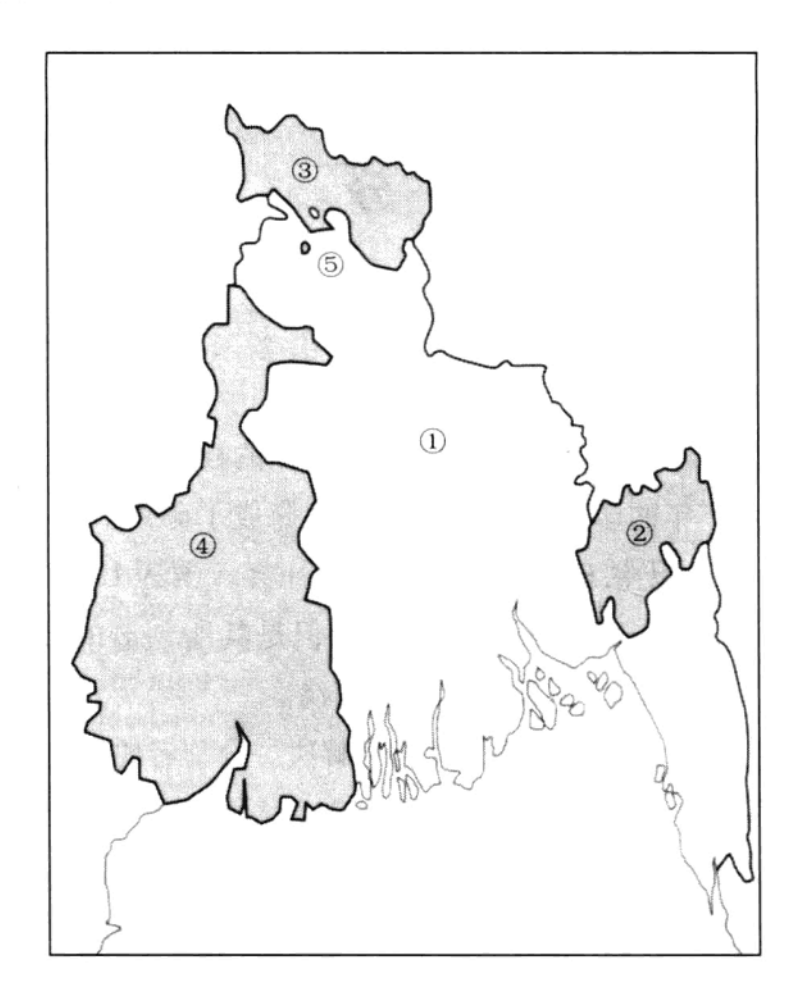
印度的分治是对政治惨败的地理性解决。分割者的刀切割了三个省(孟加拉、阿萨姆和旁遮普),以及无数的商业路线和家庭纽带。它造出了两条长长的边界并把分治的社会留在蹒跚之中,摧毁了数百万生命,搅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许多影响都是无意的、不曾预料到的但却是长期的。

孟加拉省饱受所有的冲击:它被分给了两个新的国家。一般通常认为孟加拉被一分为二。但事实远远复杂得多:它被分割为不少于 201 个部分(地图 10.1)。巴基斯坦获得了这个省领土的最大部分(64%)以及人口的大多数(65%)。西部、北部和东部更小的部分并入了新建立的印度共和国。这两个国家瓜分了 197 块小飞地(参见“夹缝中的生活”)。

巴基斯坦的领土通过并入锡尔赫特大部而得以增加,这一地区原来被指定为阿萨姆的一部分。这些并入的领土通常称为东巴基斯坦(虽然从 1947 至 1955 年其官方名称为东孟加拉)。它和印度之间有着

4 000公里的边境线。当东巴基斯坦1971年从巴基斯坦分离出来成为孟加拉国时，其领土的形状也没有发生变化。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知的孟加拉国的地理单位早在1947年，在任何人能想到一个独立的孟加拉国之前就形成了。

97



地图10.1 分治的孟加拉的201个部分，① 东孟加拉(1947年16个孟加拉区加入了巴基斯坦)；② 特里普拉土邦在1949年加入印度；③ 北孟加拉(1947年两个区加入印度，库奇比哈尔土邦在1950年加入了印度)；④ 西孟加拉(12个区在1947年加入了印度)；⑤ 197块飞地。

夹缝中的生活

印度分治最奇异的后果是在北孟加拉产生了197块飞地。对于北部边界上的人们而言，分治意味着现行公民权利的终结。虽然他们在各个方面

都和其邻居相似,这些居民碰巧居住在——因为一些可以追溯到前殖民时代的古怪历史原因——那些分划入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村庄里,尽管他们完全被对方国家的领土所包围。因此在 100 公里的范围内,有 123 块被巴基斯坦领土所包围的印度飞地,还有 74 块分布在印度领土中间的巴基斯坦飞地。更糟糕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没有良好的合作并拒绝对方官员经过自己的领土进入他们的飞地中。结果在飞地中,国家的存在终结了。这里没有税收,但是也没有警察、学校、卫生服务、土地登记、银行、邮政服务或道路维护。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对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不满,因此开始进行交换飞地的谈判。然而,其证明不可能达成共识,直到今天也只交换了很少的一点。只不过巴基斯坦的飞地已经成了孟加拉国的飞地。

98

飞地的居民们被迫过着一种模糊不清的生活。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违反无数法律规定。比如,想象你是阿卜杜勒·巴里(Abdul Bari),孟加拉国飞地诺格莱姆(Nolgram)的一位年轻居民,周围全是西孟加拉的领土(属印度)(插图 10.1)。当你想要去另一个村庄拜访你的叔叔或是到市场上去的时候(这块飞地上没有市场),你穿越了(诺格莱姆和印度之间)的国界线,且没有适宜的护照或者签证,也没有你跨国买卖任何东西的许可,或者实际上就是使用印度的货币,那你就是一个非公民,一个非法入境者,一个走私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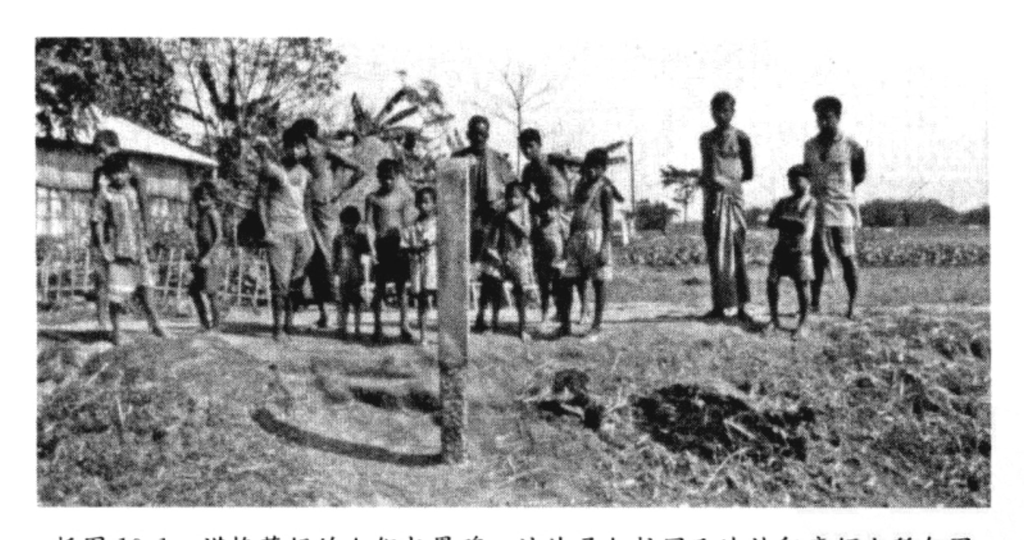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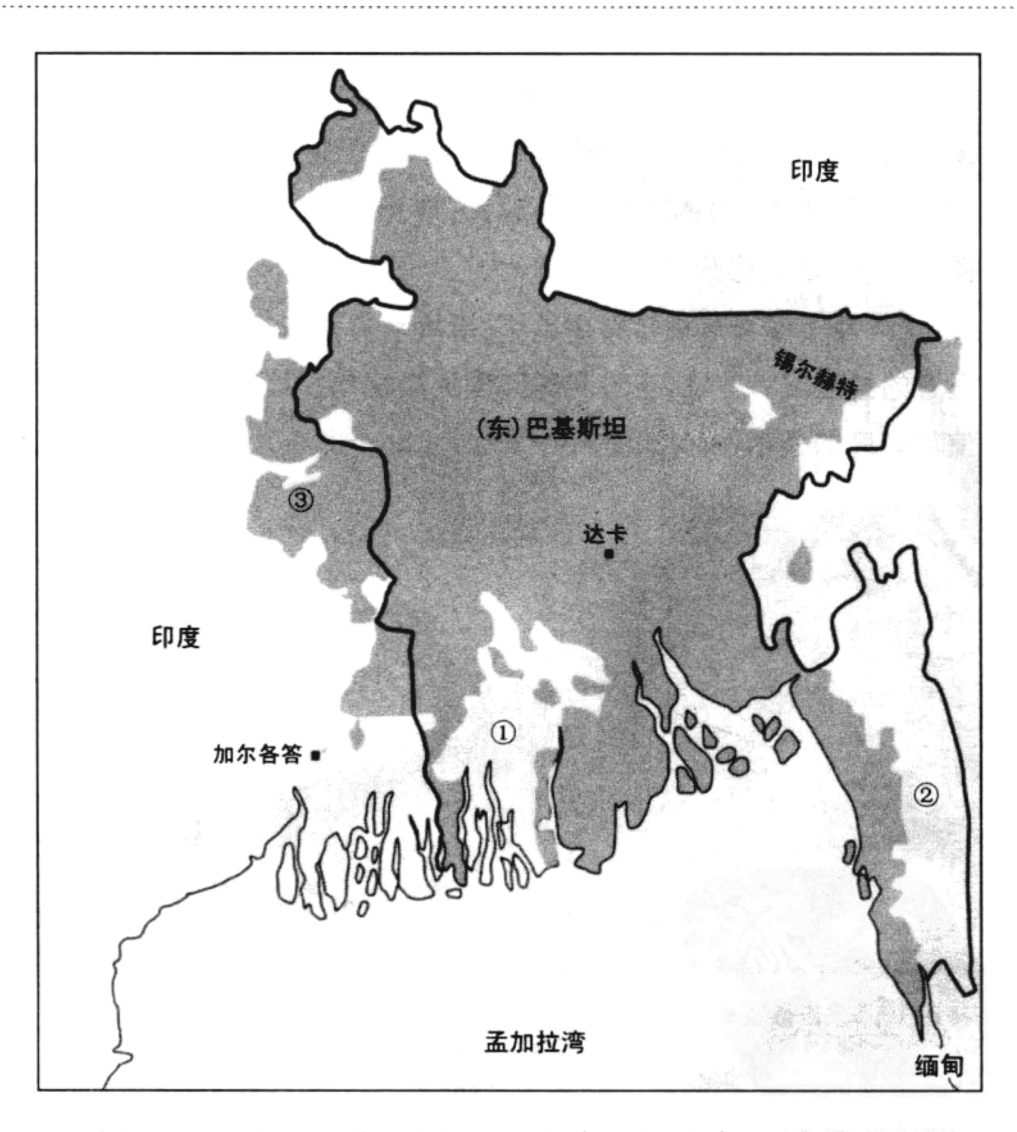
插图 10.1 诺格莱姆的人们与界碑。这块孟加拉国飞地被印度领土所包围。

阿卜杜勒·巴里可能是一位孟加拉国公民,但只在最模糊的意义上是:他从来没和孟加拉国官员打过任何交道(那些官员无法进入飞地,也不知道他的存在),并且他也没有任何文件证明他的身份。他从(未注册

的)出生起就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如果没有伪造的(印度)身份,他的兄弟姐妹就不能进入学校或就医。谁来保护他及其财产免受强盗的威胁?在诺格莱姆没有警察,印度警察也不能进入这一地区。

为了适应这种由官僚们的突发奇想和政治僵局所造成的荒谬生活,飞地居民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地方制度,比如飞地公民委员会、土地注册系统或通过强制劳动建立一些公共设施。虽然这些在各个飞地中都不相同,但所有的飞地居民对生活在夹缝中60年所培养出的顺应力都具有一种自豪感:"我们这些在飞地上的人能应付任何事情。"[1]

99



地图 10.2　分治边界,以及 1947 年穆斯林(灰色)和非穆斯林(白色)占多数的聚居区。① 库尔纳;② 吉大港山区;③ 穆尔希达巴德。

地图 10.2 表明很难将穆斯林祖国的理念转化为地理现实。边界委员会将一些明显非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划给了巴基斯坦(比如西南部的库尔纳和东南部的吉大港山区),相反地,却将一些像穆尔希达巴德这样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划给了印度。边界委员会的成员从未对这些反常现象做出解释或辩护。然而历史学家们估计,穆尔希达巴德划归印度的一个原因——其穆斯林占人口总数的 57%——是试图保持加尔各答港口同恒河/巴吉拉蒂(Bhagirathi)河流系统的联系,以便服务于内陆腹地。类似的是,吉大港山区——其穆斯林人口仅占 4%——也是为了保证吉大港港口与戈尔诺普利河(Karnaphuli)系统的联系。边界划分还制造了许多其他的令人意外、惊讶和费解的事,这些很快就导致了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相互指责。随着时间的推移,有部分分歧得到了解决,但今天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仍旧为许多领土纠纷而喋喋不休。这些摩擦表现在频发的边境事件上,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而所有这些都是沿着这条分治的边界发生的。[2]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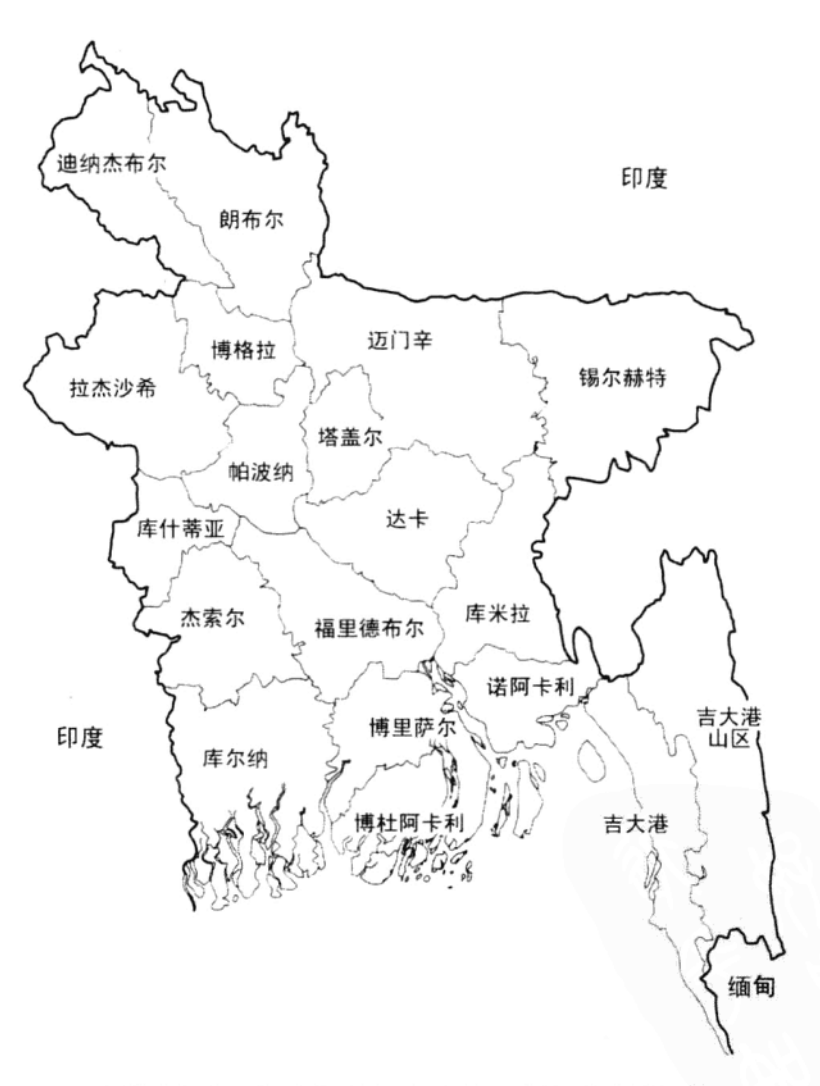
部分新国界线是沿着过去低地与山区的界线或者以前存在的各区行政边界划分的——但是其他新边界的扩展分开了部分地区,需要重新加以安排。[3]因此巴基斯坦获得了半个迪纳杰布尔和纳迪亚[Nadia,更名为库什蒂亚(Kushtia)];一些地区的土地得到扩展(比如拉杰沙希),一些地区的土地被分割出去(比如杰索尔、锡尔赫特)。当分治尘埃落定后,东巴基斯坦有了 16 个行政区。1969 年这一数目增加至 18 个,因为又创造了两个区:从迈门辛分出来的塔盖尔区(Tangail)和从博里萨尔分出来的博杜阿卡利(Patuakhali)(地图 10.3)。

分治的目的是为创造一个穆斯林的家园。在孟加拉,当肥沃的三角洲东部地区被开垦之后,伊斯兰教在莫卧儿王朝时期成为了大众宗教。因此,东巴基斯坦的重心放在活跃的三角洲东部,以及那里的人口绝大多数居住在乡村,就毫不令人惊讶了。达卡,这座现在被选为首府的城市,正是莫卧儿王朝建立起来以控制他们称为“巴提”(Bhati)的沼泽和水域地区、而英国人其后称为“下孟加拉”(Lower Bengal)的城市。

孟加拉三角洲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现代的国界线,这是当地居

民从未经历过的现象。新边界围绕着孟加拉大多数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地区,在这个意义上,东巴基斯坦成了大部分孟加拉穆斯林的家园。但是还有数百万孟加拉穆斯林生活在印度领土上,数百万非穆斯林继续生活在东巴基斯坦。未分割的孟加拉地区的非穆斯林人口中,至少有42%发现他们成了巴基斯坦公民;他们占东巴基斯坦人口的1/5。这使得最初引起分治的政治惨败——无力克服地方自治主义政治——开始在新形式下继续。在孟加拉,其过程不同于旁遮普,后者在分治前后的几个月里发生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居民迅速、血腥以及几乎全部的互换流动。孟加拉的情形中也有大量的人口互换迁移,但却是一个更为缓慢、长期和复杂的过程。[4]

101



地图 10.3　东巴基斯坦行政区,1947 至 1971 年。

五重公民印塔兹

102

印塔兹·阿里(Intaz Ali)生于1947年，在楚尔-玛德哈布尔(Chor Madhobpur)一个穆斯林家庭长大。他的故乡是恒河南岸的一个乡村社会。当他还是个婴儿时，孟加拉分治了，他所生活的村庄成为东巴基斯坦领土的一部分。印塔兹成了一个巴基斯坦男孩。不久，村民听说新建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了他们的归属而争执不下。印度宣称拥有印塔兹的村庄以及恒河其他许多河岸和岛屿(chor; *car*)(插图10.2)。发生了一些边境冲突也进行了一些协商，但是毫无作用。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自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便决定诉诸仲裁。他们将之上诉至国际仲裁法庭，并承诺遵守仲裁法庭的裁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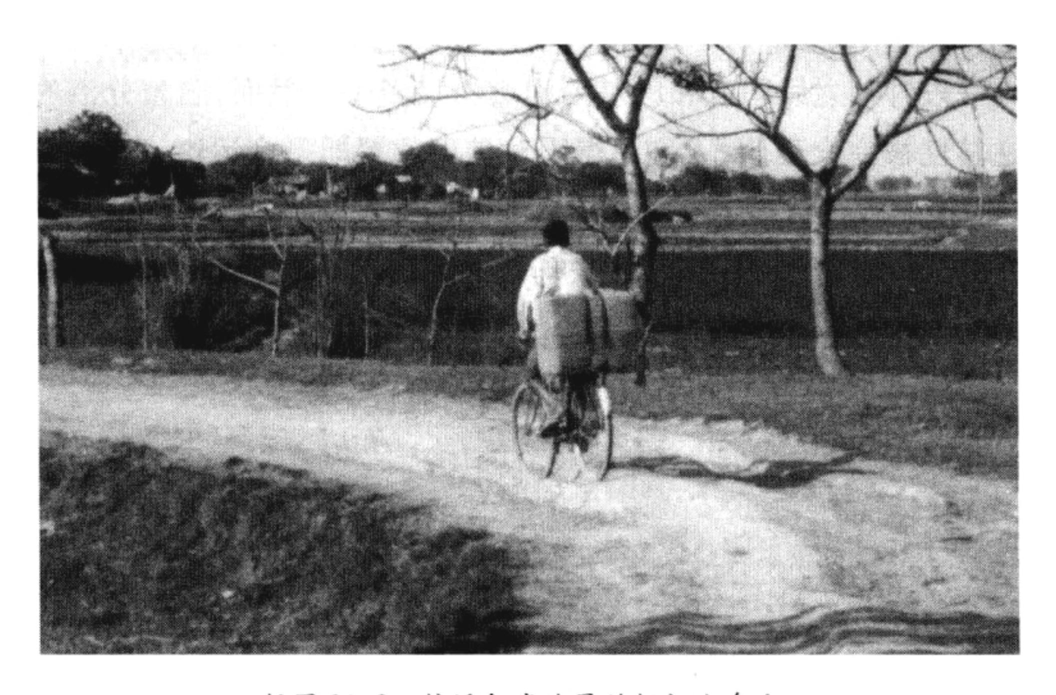


插图10.2　接近印度边界的恒河小岛上。

当印塔兹上小学时，他及其乡里获悉巴盖仲裁法庭(Bagge Tribunal)——以其瑞典主席命名——将他们的村庄判给了印度。怎么办？他们是印度人还是巴基斯坦人？更关键的一点是：他应该上邻近镇上的巴基斯坦中学还是印度中学？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没人知道仲裁法庭的决议是否会得到实施。他们并不清楚这块地方是仍旧属于巴基斯坦还是已经成为印度的一部分。1959年末，印塔兹的父亲再也等不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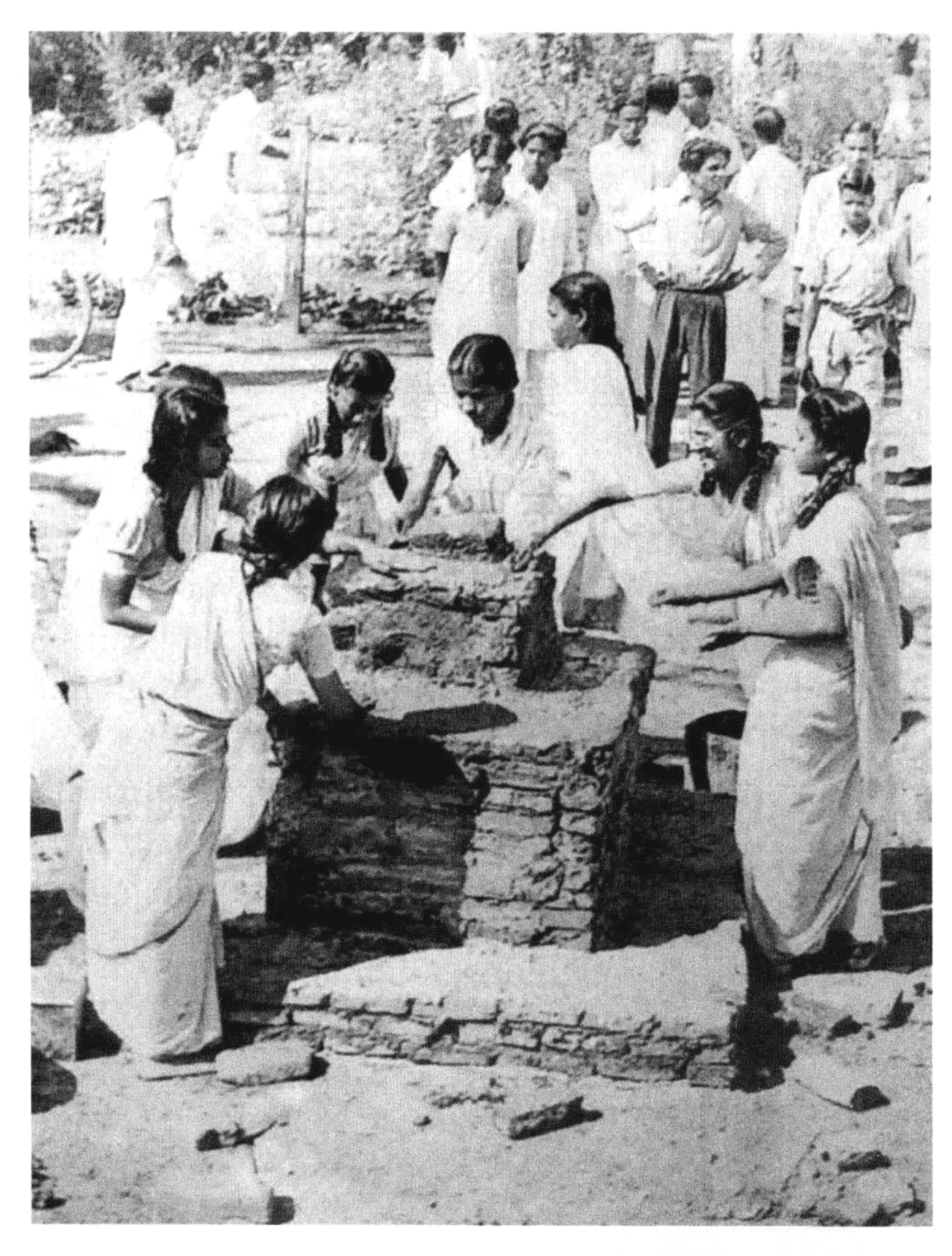
他作了决定，送印塔兹去印度那边的中学。同时，他也变更了儿子的公民身份以便能上那所印度中学。但三年后，印塔兹的村庄爆发了反穆斯林的骚乱，他的父亲为了他的安全又将他送到了巴基斯坦一边。就是在那里，在拉杰沙希附近的边境小镇上，印塔兹完成了他的中学学业，并且再次成了巴基斯坦公民。然而几年之后，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分离出来，成为孟加拉国。印塔兹在其24岁时经历了第四次"国籍变化"。作为一个接连拥有五重国籍的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纪录保持者——从英属印度到巴基斯坦，到印度，再到巴基斯坦，再到孟加拉国。

103

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开始着手划分边界，并对己方新的边陲地带采取控制。[5]与此同时，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渐渐地才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起初，他们认为对社会的活体解剖看似是不真实的，许多人认为一段时期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会再度统一。然而，随着分治的不可逆转性被完全理解，人们不得不对地理位置即是命运这一事实做出妥协：他们现在被指定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以及有争议的——国家之一的公民身份(参见"五重公民印塔兹")。巴基斯坦这一新国家控制了东孟加拉的领土和人口。其建立了新的制度并开始推动新的进程，许多制度到1971年巴基斯坦交出权力后还得以保留。

第三卷

成为东巴基斯坦



第三卷　1952 年 2 月，学生们纪念在保卫孟加拉语斗争中牺牲的人们。Rafiqul Islam 摄，发表于 C. M. Tarek Reza，*Ekush: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Movement*（*1947－1956*）（Dhaka：Standard Chartered Bank，2004）。

第十一章　巴基斯坦实验

107

在新名字之下——东巴基斯坦——孟加拉三角洲现在加入了一种国家形成的特殊实验当中。* 有三个原因表明巴基斯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首先，它建立于宗教民族主义之上。宗教被认为有助于巩固新的国家认同，这是此前从未尝试过的——此外唯一一个将国家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的现代国家是以色列，比巴基斯坦建国晚一年。其次，巴基斯坦是一个统治着两块独立领土的国家，彼此之间为1 500公里的印度领土所分隔(地图 11.1)。西巴基斯坦在这两部分中要大得多，但在东巴基斯坦有更稠密的人口。事实上，大部分巴基斯坦公民生活在东巴基斯坦：1951 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巴基斯坦共有7 800万居民，其中4 400万(55%)居住在东巴基斯坦。

这两个事实构成了第三个原因：巴基斯坦没有继承任何殖民时代的中央国家机构。而另一方面，印度则继承了首都新德里，以及大多数文官系统、武装力量和警察。大部分的殖民地资源和工业，以及孟买(Mumbai)和加尔各答等大港口也都归属于印度。相比之下，巴基斯坦所获得的多是原材料生产的区域。印度的新统治者代替了原来英国人

---

* 最初，巴基斯坦东部被官方称为“东孟加拉”(East Bengal)，在 1956 年改为“东巴基斯坦”(East Pakistan)。

地图 11.1　巴基斯坦两翼，1947－1971 年。

殖民权力的中心，而巴基斯坦的新统治者则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去建立这种统治。换句话说，巴基斯坦是一个特别的实验：没有任何其他的后殖民国家像它一样，失去了行政中心，统治着两块不相连的领土，并怀有将国家认同建立在同一宗教上的雄心。

这个国家东部的情况尤为困难。在 1947 年 8 月，新成立的东巴基斯坦政府匆忙地在一所女子学院（达卡的艾登学院，Eden College）里安置下来，用大量临时准备的竹子搭建了小棚屋以增加房舍。分治之后，东巴基斯坦只接受了一个属于这一地区的前印度行政参事会（Indian Civil Service，殖民官僚体系中最优秀的团队，维持殖民地的“钢铁骨架”）人员。其余六人都是匆忙从省公务系统（Provincial Civil Service）晋升而来。[1]结果是，东孟加拉的公职人员大多是非本地的，而那些掌握决定权的官员则对东巴基斯坦的需要几乎一无所知。一份官方出版物以夸张的笔调来描绘了这些行政人员的窘况：

108

> 根本没有地方给那些长官办公，他们被安排去偏远的地方。一位大臣在布里甘加河（Buriganga）上的一条船上处理文件和政务。数百名官员挤在摇摇摆摆的房子里。甚至连帐篷都是奢侈的。用竹子搭建了大量的房屋，以给那些习惯了舒适的加尔各答

公寓和房间的官员和职员们一处栖身之地。[2]

(东孟加拉的)总指挥官在1948年1月抵达这里,其事后追忆说:

> 省政府……刚刚建立且人员匮乏。但更糟糕的,是政治上的疲弱和不稳定。这里没有军队。刚刚独立时,我们在东巴基斯坦只有两个步兵营(其中一个有三个连,另一个则只有两个连)。我们的条件相当恶劣:在指挥部里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文具……我们事实上什么也没有;甚至连一张东巴基斯坦的地图都没有。[3]

109

这些最初的不确定因素和巴基斯坦的人为统一激起了人们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愿望。执政党穆斯林联盟从巴基斯坦的普遍情绪中获益——那是一种极度高涨的情绪。穆斯林们现在获得了一个享有主权的祖国,可以保卫他们的政治、宗教和文化权利,并能够实现他们的经济解放。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就意识到,前面的路绝不平坦:大多数巴基斯坦人所共同具有的两大基本要素——穆斯林身份和对印度的恐惧——并不足以保证他们的统一。很快就在资源的(无论是实际资源还是象征性的)公平分配上发生了争夺。独立后仅仅3个月,第一场关于国家语言的严重冲突就在巴基斯坦大地上爆发了。这是关于新国家应当如何组织的众多冲突问题的第一个预兆。这些压力将会逐渐消解建立一个巴基斯坦国家的前景。从最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巴基斯坦两部分关于语言、自治、食品安全和经济政策等问题的冲突。在渐渐展开的巴基斯坦政治中,孟加拉三角洲扮演着一个被剥夺了公民权利后一直对权利受限大声疾呼却不成功的角色。在巴基斯坦实验的24年里,这个国家的许多统治者都经历过两个噩梦:被印度羞辱,以及看着对国家的控制以民主的方式转到了东巴基斯坦。后一种恐惧就是其毁灭的原因。其催生的极端政治强硬最终使他们发动了一场针对大多数巴基斯坦公民的战争。这一政策破灭了,导致他们被印度彻底

羞辱,使他们除将自己从东巴基斯坦分离出来并紧握巴基斯坦西部留给他们的权利之外别无选择。

语言

1947 年,新巴基斯坦的精英面临着如何将人民融入一个统一的巴基斯坦国家的难题。很快,选择何种语言作为处理巴基斯坦国家事务语言的问题就出现了。1947 年 11 月的巴基斯坦教育会议主张以乌尔都语为国家语言,这一提议受到来自东巴基斯坦代表们的反对。几个月后,一位东巴基斯坦的制宪会议成员提交了一个修正案,要求允许在会议中使用乌尔都语的同时也可以使用孟加拉语。他受到了总理里亚克特·阿里·汗(Liaquat Ali Khan)的激烈反驳,其断言:

110

> 巴基斯坦因生活在这片次大陆上的 1 亿穆斯林的要求而建立,这 1 亿穆斯林使用的就是乌尔都语……一个国家只有一种语言是十分必要的,这种语言就是乌尔都语而不是其他语言。[4]

这一表态相当令人讶异,从事实上看,巴基斯坦人讲几十种语言,而只有 3%的人讲乌尔都语。很明显,孟加拉语是这个国家的主要语言:其使用者占所有巴基斯坦人的 56%。[5]那么,为什么总理如此坚持乌尔都语呢?

语言问题在一个新生的国家里代表着更广泛的文化和政治分裂。孟加拉的穆斯林政治家对巴基斯坦的想象不同于他们在北印度的对手。孟加拉人曾经梦想一片脱离印度教徒经济控制的土地,并曾想象他们自己成为巴基斯坦大多数公民的代表。另一方面,北印度的穆斯林政治家将自己想象成巴基斯坦的天然领袖,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南亚穆斯林复兴的捍卫者,因此也就是所有穆斯林未来的裁决者。他们坚持自己对巴基斯坦的观点理所当然要占据主导位置。

从一开始,"北印度"观点就统治着整个国家制度。有两个区域团体对其表示支持。第一个就是著名的穆哈吉尔(Muhajirs,意为"移

民”)。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北印度的讲乌尔都语的知识分子和商业精英,他们以几十万之众迁到巴基斯坦城市中,并迅速对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远超过其人数比例的影响力。使这些移民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希望当地民众适应他们而非相反。他们几乎占据了所有的行政高位并掌握行政权力。这些移民大多数定居在西巴基斯坦,但是也有超过10万穆哈吉尔在东巴基斯坦建立了他们的新家。另一个区域性团体是来自旁遮普的穆斯林。他们在军界也有远超过其人数比例的代表,操纵着国家的管理并控制着最有价值的灌溉地。旁遮普人逐渐击败了穆哈吉尔成为巴基斯坦的主导力量。其象征性事件就是1959年将首都从卡拉奇(Karachi,巴基斯坦穆哈吉尔居住的首要城市)迁到了旁遮普要塞城市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并于10年后在那里新建立了伊斯兰堡(Islamabad)(地图11.1)。

111

孟加拉政治精英反对北印度对巴基斯坦未来的观点。这个国家的新统治者集中在西巴基斯坦,以伊斯兰教作为政治特征来证明他们行动的合理性,这使孟加拉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他们的抗议可以被轻易地作为非伊斯兰或反伊斯兰的意见打发掉。这不仅仅是西巴基斯坦政治家的战术策略。在西巴基斯坦,一种广泛的认识是,孟加拉穆斯林不仅在社会地位上低下,同样也是次等的穆斯林,因为他们并不遵循北印度人认为适宜的伊斯兰教的文化实践。来自西巴基斯坦的信息是,无论孟加拉人有多么热忱地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他们都是不达标的,除非他们去除身上大部分的孟加拉特色,否则无法成为一个整体成熟的巴基斯坦人。在这种氛围中,来自东巴基斯坦的政治家所面临的两难局面就是,一方面要不断强调他们的伊斯兰教真诚,同时又要捍卫区域的利益。

语言成为这场争夺的焦点问题,因为强制推行乌尔都语是“伊斯兰教化”东巴基斯坦任务的一部分。许多西巴基斯坦人对孟加拉语所知甚少,却认为需要“净化”其中的印度教影响。对他们来说,孟加拉文字(从梵文演化而来)、孟加拉语中的梵文词汇和印度教徒在孟加拉文学经典中的统治地位是令人厌恶的(参见“孟加拉文字”)。[6]孟加拉穆斯林对他们

语言和文学的珍惜令人疑惑，他们对乌尔都语的拒绝也是相当可疑的。

当东巴基斯坦的学生知道要将乌尔都语作为国家语言的计划时，他们举行了集会和示威，并于 1947 年 12 月组成了第一个语言行动委员会。事情在 1948 年 3 月发展到紧急关头，东巴基斯坦城镇到处出现罢工，运动的领导者遭到了逮捕并受伤。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ad Ali Jinnah)当时是巴基斯坦总督，在数日后访问了达卡。他面对大量民众讲演，阐明在东巴基斯坦能够使用孟加拉语：

> 但是让我向你们解释清楚，巴基斯坦的国家语言必将是乌尔都语而非其他语言。任何想要误导你们的都是巴基斯坦的敌人。没有一种国家语言，国家就不能坚固地团结在一起和运行。看看其他国家的历史皆是如此。因此，就国家语言来说，巴基斯坦的语言将是乌尔都语。就像我曾说的，它迟早会到来。[7]

112

孟加拉文字

南亚次大陆不仅有许多语言，也有许多种不同的文字。大多数语言都有他们自己的字母表。孟加拉语(*bāṃāl*)也不例外。其从左至右书写，优雅的圆体字母挂在顶线上(与英文字母不同，后者处于一条基线上)(插图 11.1)。孟加拉文字是经数个世纪由婆罗米文字演化而来的(参见第二章)。它比英文字母表的字母还多(有 11 个元音以及 36 个辅音)，这使其发音很难用英文书写表达。因此音译孟加拉文就要使用不甚方便的点和横杠(变音符号)以区别不同的发音，比如 n /ṅ/ṇ、s /ṣ /ś以及 a /ā 等。

আমার ভাইয়ের রক্তে রাঙানো একুশে ফেব্রুয়ারী
আমি কি ভুলিতে পারি

插图 11.1　孟加拉书写体示例。“我怎么能忘记 2 月 21 日，飞溅着我兄弟的血……？”这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一首著名歌曲的头几行，由阿卜杜勒·贾法尔·乔杜里(Abdul Gaffar Chowdhury)创作，其可以被转写为“Amar bhaier rokte rangano ekushe February ami ki bhulite pari”；其标准音译是“Āmār bhāiyer rakte rāṅāno ekuśe phebruyārī āmi ki bhulite pāri”。

孟加拉文手写体的视觉效果对于受过教育的孟加拉人而言总是一种享受和欣赏。然而，在巴基斯坦出现之后，它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含义。语言运动使其具有了政治象征意义。现在它已经不是语言本身，而成为一种反抗和文化骄傲的标志。每一个孟加拉文字母都可以作为文化游击战中的徽章。结果是，直到今日，孟加拉文字都不仅仅是一种书写语言的方式，其已经成为深深的认同与自尊的情感标志。

这一不妥协的态度使东巴基斯坦的知识分子、公职人员、政治家和学生们迅速对穆斯林联盟政府感到幻灭。这不仅仅是地域自豪感、文化认同和民主原则的问题，同时也是事业雄心挫败的反应。讲乌尔都语的候选人更适合在国家官僚体制的工作；在东巴基斯坦，这几乎排除了几乎所有的当地人（只有不到1%的人将乌尔都语作为第二语言使用），而更倾向北印度的移民。

113

语言运动或者称为巴沙－安道伦（Bhasha Andolon, *bhāsā āndalan*）使一批新型政治家在东巴基斯坦兴起：亦即讲孟加拉语的学生鼓动者。整个巴基斯坦时期，学校、学院和大学里的学生常常充当将政治不满转变成民众抗议以强迫巴基斯坦政府改变其政策的决定性角色。语言运动的最高潮以及巴基斯坦实验的关键时刻发生在1952年初。那时东巴基斯坦弥漫着一种遭剥夺和失望的情绪，一种新型殖民统治代替了英帝国主义的感觉正在扩展。1948年之后走向衰落的语言运动，在新总理卡沃杰·纳齐姆丁（Khwaja Nazimuddin）上台之后再次点燃。他到达卡并在中心绿地对大量群众演讲。当他宣布东巴基斯坦民众有权选择他们的地方性语言，但乌尔都语将成为巴基斯坦的国家语言时，出现了非常愤怒的反应。学生们高喊“我们要求孟加拉语作为国家语言”。达卡大学开始罢课，一系列组织号召一次抗议大会，由阿卜杜勒·哈米德·汗·巴沙尼（Abdul Hamid Khan Bhashani）毛拉主持。巴沙尼长期以来一直是巴基斯坦理念的支持者，1949年与穆斯林联盟决裂后，组成了一个新的政党，即阿瓦米（Awami，意为“人民的”）穆斯林联盟。[8]大会坚决否决了将乌尔都语作为国家语言的决定，也拒

绝了引入阿拉伯文字书写孟加拉语的政府计划。大会决定在 1952 年 2 月 21 日在整个东巴基斯坦发起广泛的罢工和示威活动。

政府发布了对达卡示威活动的强制禁令,虽然一些组织者犹豫是否要违抗这些禁令,但学生们决定坚持到底。全达卡数千名学校和学院的男生女生与大学生一起聚集在达卡大学的校园里。他们开始游行并呼喊口号。当他们穿过校园大门时,武装警察用警棍殴打他们。学生们以砖块回击,于是警察使用了催泪瓦斯并向人群开枪。许多人因此受伤,有五人包括一个九岁男童被杀害。其后几天里,更多的示威、杀戮和逮捕发生了,在第一次杀害学生的地方仓促地竖立起了一座纪念碑(插图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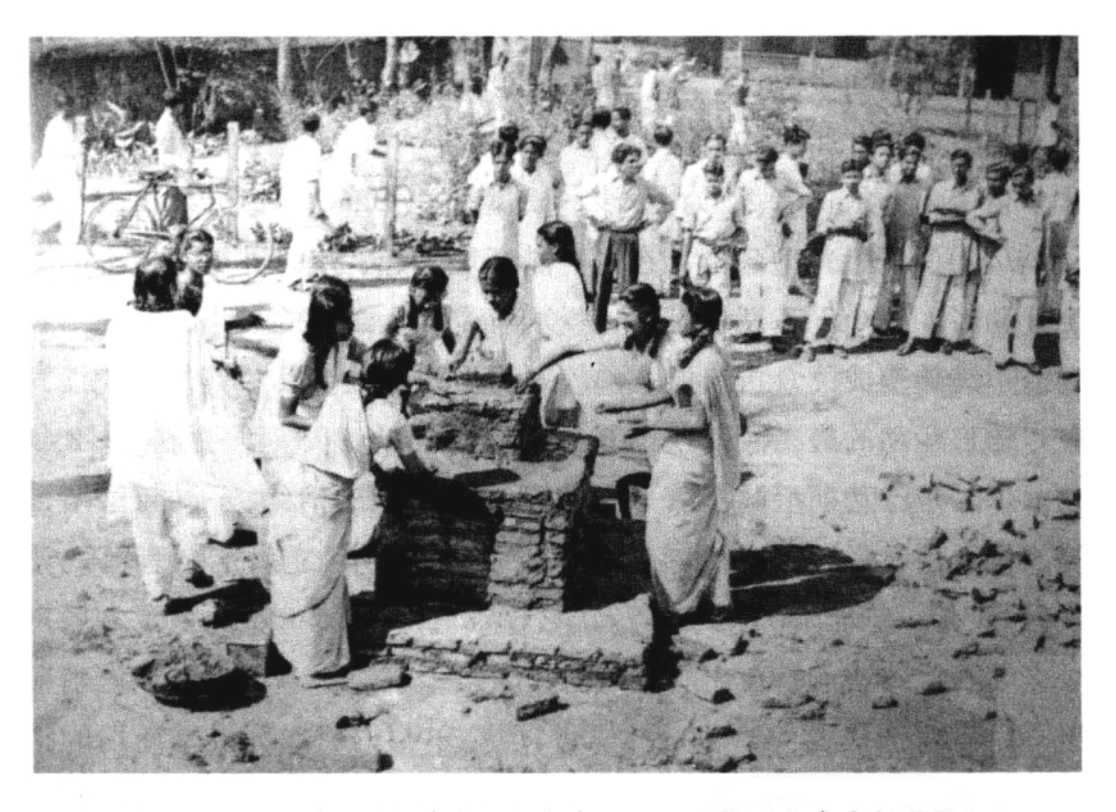


插图 11.2　1952 年 2 月,学生们纪念在保卫孟加拉语斗争中牺牲的人们。

这座纪念碑被当局移走了,在其最终为在 1962 年所建的混凝土的中央烈士纪念碑(Central Martyrs' Memorial)或绍黑德塔(Shohid Minar)所替代之前再造了若干次(插图 11.3)。[9] 今天,这座纪念碑仍是国家认同政治的焦点,而且在每一个三角洲的城镇都有烈士纪念碑。

2 月21 日依库舍(*Ekushe*)成为国家的主要节日，1999 年在孟加拉政府的倡议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立了国际母语日，定于每年的 2 月 21 日庆祝。



插图 11.3　中央烈士纪念碑或绍黑德塔，达卡。

1952 年的事件相当重要，不仅仅因为巴基斯坦武装力量采取了杀戮性的暴力来镇压巴基斯坦人通过示威争取他们的权利，也因此暴露了国家领导阶层的残忍本性。这在以前也曾发生过，比如 1948 年 7 月军队镇压达卡的警察反抗时。使 1952 年成为典型时刻的原因是其造成了尖锐的心理创伤。对于许多孟加拉三角洲的人们而言，它标志着巴基斯坦梦的破碎和一个新政治计划的开始，虽然其仍旧模糊不清且只有很少的人对其全力支持：寻求巴基斯坦政治中社群观念的世俗替代物，以及重获三角洲地区最近一次曾在莫卧儿王朝之前所经历过的自治。[10]

巴基斯坦政府完全没有理解潜藏在语言运动以及(在 1950 年的宪法讨论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的)东巴基斯坦区域自治要求背后的深层情

115

感。政府将运动歪曲为“自作聪明的政治家、穆斯林社会内部的分裂势力、印度教徒以及来自加尔各答和巴基斯坦内部的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1]巴基斯坦政府在揭露任何东巴基斯坦的反抗为受“巴基斯坦的敌人”操纵或与“巴基斯坦的敌人”——主要描绘的是印度教徒、共产主义者、印度人——共谋时，一次次地使用这一“阴谋论”。

选举政治

1952 年 2 月的事件使得东巴基斯坦坚决地反对穆斯林联盟政府。这在 1954 年东巴基斯坦举行第一次省级选举(直到 1970 年巴基斯坦的统治者才敢于进行全国普选)的时候就变得非常明显了。[12]1954 年的选举也是孟加拉三角洲首次实现成年人普选。在整个东巴基斯坦，执政的穆斯林联盟遭受了深深的羞辱：在总共 309 个席位中只赢得了 7 席。语言运动一直持续到 1956 年，直到巴基斯坦制宪会议最终同意接受孟加拉语和乌尔都语都作为国家语言，巴基斯坦最终也有了一部宪法。[13]然而到那个时候，东巴基斯坦追求自治的斗争已经超越了语言问题。

116

1954 年的选举由一个名为联合阵线(United Front)的联盟赢得，从那时起它的政治模式就统治了孟加拉三角洲的政治。这种模式可以被最确切地表述为街道动员：它依靠通过在大型群众集会上发表激烈的讲演，组织抗议游行和普遍的罢工以及发表政治宣言来赢得大众支持。联合阵线是一个不稳固的党派联盟，他们之间除了共同反对穆斯林联盟外没有太多共同点。这些党派中最大的是阿瓦米穆斯林联盟；其独得 46%的席位，取代了失信的穆斯林联盟成为享有广泛合法性的新政治组织。联合阵线的政治宣言包含二十一点。其中四点关于语言问题；其他的则涉及自治、公民权利和经济解放。经济上的要求受到了乡村选民的强烈反响。大多数三角洲东部的人们首先是将巴基斯坦想象为一个可以将他们从印度教地主、商人和借贷者手中解放出来，并终止土地停滞的农民乌托邦。繁荣对于他们而言远比国家权力的划分或语言、宗教事务重要得多。他们对于宣言中要求废除柴明达尔制度、农

业现代化以及控制洪水的条款表现得非常热情。另一方面，中间阶层也为合理化工资标准、教育改革和黄麻贸易国有化所吸引。从经济上看，头几年的巴基斯坦仍在挣扎中。穆斯林联盟的失败更是对其未能带来繁荣的裁决，而不仅因为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自大。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是东巴基斯坦的中间阶层重燃希望的短暂时期。许多人认为有可能使国家处于人民的控制之下。在殖民地时期，这个国家曾经是隔离的和专制的，而早期巴基斯坦国家也与之非常相似。只有极少数的东巴基斯坦精英被允许参加到巴基斯坦国家事务中，并且都是经过协商而非他们自己所争取的。结果是，在东巴基斯坦最有权势的人也从未对后 1947 年的国家有归属感。然而，1954 年的选举使他们对这种合作关系产生了新的希望。但是，这个希望很快减弱了，因为新政府立刻就被(不民主地)解散了，并造成了四年的政治冲突与动荡。

117

1955 年，阿瓦米穆斯林联盟更名为阿瓦米联盟以强调其非社群特色。这个政党通过其日报《伊特法齐》(*Ittefaq*，意为"和谐")将改革和世俗信息传递给了广泛的读者群。其在巴基斯坦国家最高层的活动加强了其吸引力。阿瓦米联盟的党员走出制宪会议以表示对巴基斯坦第一部宪法的抗议，因为其没有采纳该党长期坚持的要求。无论如何，宪法在 1956 年 3 月正式生效了。其宣布巴基斯坦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授予总统相当广泛的权力。在其后的政治混乱中，阿瓦米联盟的领导层事实上被要求加入东巴基斯坦新的省政府，在经过相当多的谈判之后，最终决定这样做。新内阁中的一位初级成员是 36 岁的政党组织者谢赫·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加入政府的决定导致了党派分裂：1957 年该党创始人巴沙尼毛拉退党并另建了全国阿瓦米党(NAP)，吸引了许多左翼追随者。[14]

然而，所有这些政治混乱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关联。1958 年 10 月，巴基斯坦军队发动了政变，并宣布废除宪法、施行军事统治，整个政治阶层被推到了一边。这结束了第一个选举政治和议会民主的巴基斯坦实验。现在是由一个独裁者领导着整个国家。他就是阿尤布·汗

(Ayub Khan),武装力量总司令。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巴基斯坦的官僚体制和军事制度逐渐上升到超越选举制度的统治地位,这一过程最终促成了政变。另一个酝酿政变的方式就是这个大众的、共同参与的国家逐渐为巴基斯坦从殖民统治继承来的国家机器所取代。这不仅在政变的时机上反映出来——就在已经确定的 1959 年初第一次全国普选几个月之前,如今这次普选被取消了——也在如今掌控巴基斯坦事务者的个性中反映出来。阿尤布与他视如不见的那些政治家们不同,他几乎为殖民政府(从 20 世纪 20 年代在英国的军事训练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为大英帝国在缅甸作战)并为巴基斯坦国家(20 世纪 50 年代成为总司令)服务了一生。在他统治时期,他主要关心的就是加强国家力量并使其统治不受民众力量的干涉。

118

1958 年的政变对于理解当代孟加拉国具有和语言运动同等重要的意义。它为一系列军事统治者提供了核心模式。这些军事统治者在独立后的孟加拉国使用过这种模式,他们在 20 世纪最后的 1/4 时间中的大多数时候统治着这个国家。语言运动是民众的清晰宣言,参与其中的国民试图影响这个国家,而 1958 年的政变则证明其与民众无关。高级的文职和军方官员并非依赖与国内经济权力和社会控制的结构的联系,而是愈加依赖他们与其国际担保人之间的联系。这一现象加深了对其合法性的忧虑。[15]孟加拉国将要继承的这种国家结构,目的在于使军队和官僚要员更加受益,并不断需要外部的财政和政治支持以反对国家内部人民的力量。

独裁

1958 年政变昭示了巴基斯坦精英——军界领袖、高级官员和最富裕的商人——的决心,他们停止了在其看来的政治家的无能和腐化。穆斯林联盟在东巴基斯坦的失败,使得国家中的任何党派都不能宣布拥有全国范围的合法性。建立一个统一的巴基斯坦国家看似比以前更为困难了。政变的领导者确信,军队是这个国家唯一能够坚决推动巴基斯坦进入正确轨道的机构。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废除了议会民主,羁

押了令人讨厌的政治家，剥夺了司法权，使媒体缄默，暂停公民权利并采取军事管制。现在军人控制着国家机关，国家的行政部门成为全能的了。最初军队也干涉经济政策的制定，但当此引起混乱时他们决定从幕后施加控制，而使行政部门处于前台。

对于东巴基斯坦而言，所有这些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军事统治意味着权力更明确地置于非本地人手中。东巴基斯坦的精英主要依赖政治动员而非军队或官僚体系来行使权力。巴基斯坦陆海空军的总部都在西巴基斯坦。大多数的军人也是从西巴基斯坦招募来的；只有3%左右的高层军官来自东巴基斯坦。西巴基斯坦人控制着巴基斯坦中央行政机构（占据着93%的高级职务）乃至东巴基斯坦的省行政机构。虽然新政权招募了更多的东巴基斯坦人，尤其是在省级行政机构中，但是这并未改变东巴基斯坦人中的一种普遍感受，亦即他们是被西巴基斯坦、确切地说是被占统治地位的旁遮普实行着内部殖民统治的。阿尤布·汗对孟加拉人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典型的殖民主义。在他的自传中，他将孟加拉人描述为具有“受压迫民族的一切限制，并且不认为有可能通过调试心理以适应新生自由的需要。其人民的复杂、排外、多疑以及一种自卫的攻击性倾向……应该被认识到并投其所好，帮助他们，使他们感到自己是平等的伙伴，并认为自己有用武之地”。[16]

阿尤布·汗忠实于许多军事独裁者的传统，他宣布政变的目的是为了保卫民主。其目的“并非反对民主制度，而仅仅反对其运作的方式”。在他看来，流行的民主形式太复杂而不能被“简单和未受教育的巴基斯坦人”成功地运作，“并且太遥远而不能吸引他们的主动参与”。[17] 1959年建立了一个新的制度，表面上是教导人民民主的方式并为他们真正全面地参与到代议制政府做准备。这一体系被称为“基本民主”（basic democracies）。这使人想起了英国殖民体系中被称为“地方自治政府”的政治监督体系，并且像其先辈一样，这一体系的目的在于将政治进程置于官僚体系控制之下并使政治问题本地化。通过否决议会制政府形式、禁止政治党派活动并抵制城市影响，基本民主将家长制作风与国家官员——虽然其中有些作为点缀的选举代表，但都是最

低级别的——的全面控制结合起来。1962年公布了一部专制宪法，模糊地表达了这一政权将永远存在的观点。其无声地表达了对大众权力和代议制政府的不信任，给予了总统非常大的权力（如阿尤布·汗为自己设计的那样），并建立了一个无力的国民大会。伊斯兰堡将成为中央政府所在地，而达卡（这时被指定为"第二首都"）将成为国民大会的主要所在地。不久，一系列未来主义的建筑群就出现在达卡市郊以容纳国民大会。今天，这些建筑是孟加拉国议会的所在地（插图11.4）。

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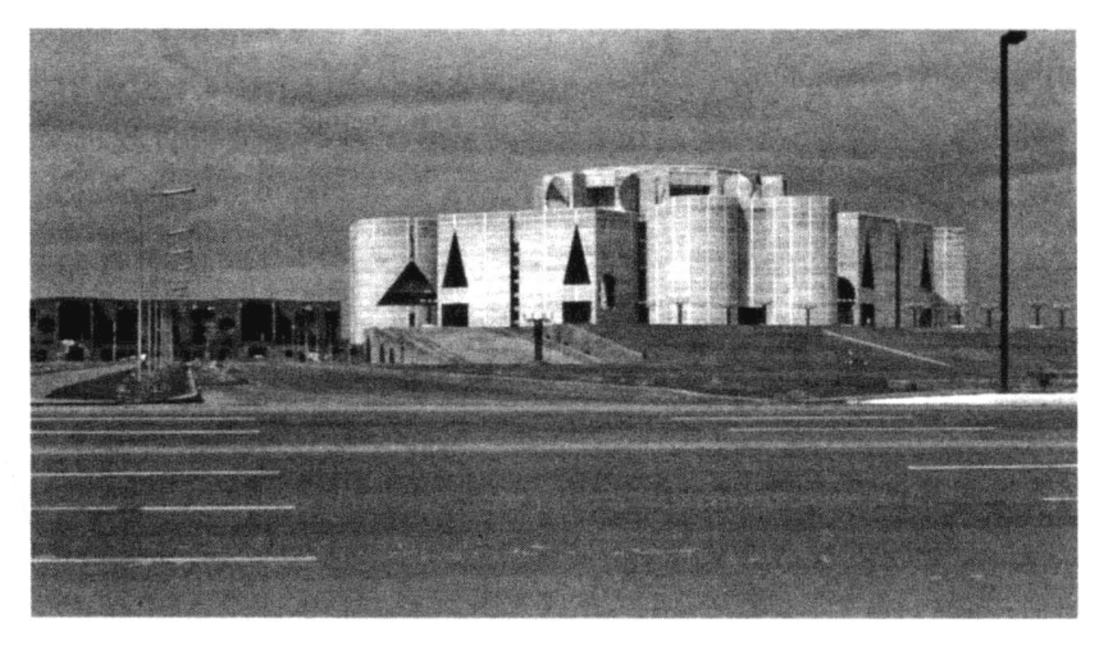


插图11.4 孟加拉国议会所在地，最初是巴基斯坦国民大会所在的建筑。由 Louis Kahn 于1962年设计，1983年最后竣工。

军事政权自视为坚定、公平、有建设性、高效和慈祥的。然而大多数东巴基斯坦人视其为专制的、帝国主义的、暴力的，且认为阿尤布·汗的权力像是帝王一般。阿尤布政权甚至还不如巴基斯坦政治家对东巴基斯坦做出的让步多——更不必奇怪官员阶层和军队实际上就是西巴基斯坦人的机构。这个政权相信，强有力的家长式制度是对巴基斯坦统治者永久恐慌的神奇解决方式：因为如果东巴基斯坦被给予民主的分享权力，就会导致统一国家的分裂。去除多余的政治竞争烟幕弹和"狭隘无知的地方主义"，当局承诺有能力进行经济管理，实现稳健增长，建设强大的国家和民族和谐。其核心口号便是经济发展。

第十二章　巴基斯坦的分裂

121

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巴基斯坦实验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东巴基斯坦的精英们长期奋斗以期能在国家中心获得更好的待遇——但是现在他们终于明白这是不会发生的了。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亦即只有广泛的区域自治才能够保护他们的利益。

在 1962 至 1968 年间,阿尤布政权的体制在三角洲一个怀有敌意的省长阿卜杜勒·莫内姆·汗(Abdul Monem Khan)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对政治上的反对者采取迫害和逮捕的手段,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并制造了一种恐怖气氛。他再次发动了对孟加拉语的攻击——他禁止巴基斯坦广播电台播放享有盛誉的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的歌曲——并因此再度推行原来的语言政策。于是,庆祝 2 月 21 日或泰戈尔的生日,或者用孟加拉语写标语或招牌都成为公然挑衅的方式。

1965 年,巴基斯坦开始了一场与印度之间争夺克什米尔的战争,政权的不得人心进一步加深了。在 6 周的战争期间,东巴基斯坦人的民族情绪十分高涨,但这最终只不过是即将幻灭的国家统一的激情之火的最后一丝闪动。东巴基斯坦人很快认识到,在省里几乎没有什么武装力量来保护他们,他们被完全暴露在印度的侵略之下。尽管印度并没有侵入这一地区,东巴基斯坦人也感到他们实际上被切断了与西巴基斯坦的联系。不安全感、被背叛感以及愤怒感加强了他们寻求自

治的愿望,这也促成了一位克里斯玛式的政治家的出现,他将在其后的十年里统治这片政治舞台。

1966年初,阿瓦米联盟的谢赫·穆吉布·拉赫曼发表的一张要求清单就抓住了这种情绪,这个清单后来被称为“六点计划”(Six-Point Programme)。它比先前的自治要求都更加激进,因为其不再倡议在巴基斯坦实行联邦制。相反,它要求两个分离集团之间的联盟。只将国防和外交事务仍旧交由全巴基斯坦政府处理。东巴基斯坦要全面控制自己的税收、财政计划、外贸收入、对外贸易谈判以及准军事力量。同时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货币。为了反击任何地方主义、分裂主义或者反巴基斯坦活动的指控,六点计划着重征引了1940年的《拉合尔决议》,正是这个文件呼吁建立巴基斯坦国。每个人都记得这个决议写着“像(英属)印度的西北部和东部这些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应当被划分在一起组成‘独立国家’,这一组成单位应是自治且享有主权的”。

六点计划激起了一场从再现的语言民族主义以及战后经济困境中汲取力量的激烈运动。[1]工人第一次在运动中扮演了非常突出的角色,这导致了更具有对抗性的策略。这场运动的特色仍然是大型集会以及以与警察冲突而结束的学生游行,但同时还伴随着民众对警察局、银行、政府大楼以及亲政府报纸办公场所的攻击。当这场运动发展出一种大众特色,其方式便更加粗野,精英阶层早先制定的反对政策也不得不让位于更为适应民情的方法。

不出所料,政府以重拳镇压和威胁作为回应。这一政策在短期内被证明是有效的,运动逐渐衰退下去了。然而从长期来看却是事与愿违,因为政府逮捕阿瓦米联盟的领导人并将之关押两年之久,使他们成为烈士一般的英雄。这塑造了谢赫·穆吉布·拉赫曼的公共形象,尤其是在其1968年因“阿加尔塔拉阴谋案”(Agartala conspiracy case)而遭审判时。在这一案件中,穆吉布和其他人被指控在印度政府的帮助下,试图将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分裂出去,并说这个计划是在印度边境城市阿加尔塔拉与印度官员举行的秘密会议上制订的。政府曾以为这个案件将会使穆吉布成为巴基斯坦的敌人和印度间谍而减损他的名誉,但是却适得其反;大众支持

被告的激烈运动迫使当局中途放弃了这个案子。[2]穆吉布被释放之后，紧接着在一场大型公众集会上被授予了荣耀的尊称：孟加拉之友（*baṅgabandhu*）。

阿瓦米联盟在1965年之后的兴起，融入到了东巴基斯坦政治更为广阔的发展之中：即左右之间的两极化。阿瓦米联盟由孟加拉民族主义者组成，他们基本上都是社会中间派或者保守主义者；他们的六点计划中并没有设想社会变革。与之相对抗的是众多号召社会革命的左翼党派。最盛行的是全国阿瓦米党（National Awami Party），其逐渐分裂为亲华和亲苏两派。

123

1968至1969年间，一场新的不安风潮席卷了整个巴基斯坦，此时这种分离变得十分重要。[3]从西巴基斯坦兴起的旨在推翻阿尤布政权的起义扩散到东巴基斯坦，在那里呈现出孟加拉民族主义的意味。一个东巴基斯坦学生组织的联盟积极地组成了一个联合阵线，并通过了一个十一点宣言。这个宣言不仅包括了阿瓦米联盟的六点计划，同时还包括了吸引左翼的一些社会诉求：降低对农民的税收、提高工人工资以及大工业和银行的国有化。这个运动因为产业工人和城市、乡村贫民表达他们的诉求而变得激进。已建立政治党派的领袖们无法控制这场运动，他们不得不艰难地跟随着民众高涨的情绪。数月的挟持（*gherāo*，一种以身体包围雇主并将之拘押直到他们认可工人要求的大众策略）与街头暴力随之而来。随着阿尤布的倒台，运动取得了胜利，统治者逃亡，自治主义者越发大胆地提出更多要求。穆吉布现在要求东部的统治地位，并且要求整个区域自治并建立议会政府，以及重新将国家的首都移到东巴基斯坦。

当阿尤布·汗在1969年3月被迫下台后，巴基斯坦军队总司令叶海亚·汗（Yahya Khan）取代了他的位置。叶海亚同其前任一样也代表着军队-官僚联盟的利益，他立即宣布实行军事管制以保护联盟地位。但是，他选择了一种不同于阿尤布的路径。他在寻求调解而非对抗，并试图将政治家们重新纳入巴基斯坦的力量均衡中。他宣布从1970年初开始即可进行政治活动，巴基斯坦的第一次国民大会普选也将在同年底举行。然而作为总统，他保留了相当大的权力。军队-官僚精英们认为，无论选

举结果如何，这些都足以保证他们在未来对这个国家的掌控。

很快，东巴基斯坦的政治家们就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进行参选活动：大会的多数席位已经被分配给东巴基斯坦，因此如果哪一个政党能在东巴基斯坦取得压倒性胜利，就可能控制整个国民大会。这就是阿瓦米联盟全力出击的目的所在(插图 12.1)。西巴基斯坦的政治家对于选举的结果不太乐观，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已经在考虑暴力抗争了。据叶海亚·汗所说，布托在 1970 年建议他忘记选举这回事："军人叶海亚和政治家布托将会成为非常好的组合，并能够一起使这个国家正常运转。"当叶海亚问他准备怎样处理东巴基斯坦时，据说他回答道："东巴基斯坦不是问题。我们将不得不在那里杀死两万人，一切就都安定了。"[4]

124



插图 12.1　1970 年，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乘火车进行竞选活动。出自 Ahmad, *Swadhinota*, 47。

这时，三角洲反复无常的自然条件又扰乱了巴基斯坦统治者制订好的计划。1970 年夏天，在东巴基斯坦爆发了大洪水，导致选举一直推迟

到 12 月。然而,11 月时一场台风又袭击了孟加拉三角洲。这并非一场普通的台风,而是该地区有史以来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台风袭击。根据官方数字,竟然有 50 万人在狂风巨浪中丧生(其他一些数据表明至少有 32.5 万人遇难)。对这一饱受摧残地区的恢复措施是十分缓慢且严重不足的,叶海亚政权在应对灾难时的极端无能暴露无遗。更为糟糕的是,政权对受难者命运冷酷的漠视激起了东巴基斯坦人民极度的愤怒。左翼政党现在呼吁迅速从巴基斯坦独立出来,并决定联合抵制 12 月的选举。这给阿瓦米联盟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并送给了他们比预想的更大的胜利。当选票计算出来之后,他们赢得了分配给东巴基斯坦的 162 个席位中除 2 席以外的所有席位[其中一个保留席位被查克玛拉加(Chakma Raja)赢得,见"崔迪威拉加"]以及分配给妇女的所有 7 个席位。这一巨大的胜利使得阿瓦米联盟在巴基斯坦 300 席的国民大会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这几乎没有人预见到。第二大党(占 81 席)是巴基斯坦人民党,由布托领导。这个党在东巴基斯坦没有派任何候选人,所有的选票都来自西巴基斯坦。[5]令所有人吃惊的是,巴基斯坦选民完全放弃了国家政党而创造了一个两极化的、由两个地区的党派所控制的国民大会。

叶海亚政权现在面临着出乎意料的局面。看起来东巴基斯坦人希望控制整个国家的梦想最终居然实现了。穆吉布自信地认为他不久将领导一个全阿瓦米联盟的巴基斯坦政府,他的党派将要为这个国家准备一部新的、更加民主的宪法。然而,无论是军队—官僚精英还是西巴基斯坦的政治家都认为这是相当令人不快的。布托要求分享权力,却被穆吉布拒绝了。布托随后宣称将抵制 1971 年 3 月 3 日的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并威胁那些来自西巴基斯坦的小党派成员,如果谁计划前往达卡(国民大会所在地)将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他同时要求叶海亚·汗推迟这次会议。叶海亚在 3 月 1 日做出了推迟会议的决定,随后激起了东巴基斯坦自发的示威活动以及抗议者和武装力量之间的冲突。很明显,巴基斯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而且,这一次有些事儿不得不妥协了。

在统一的巴基斯坦的最后几天纷扰里,穆吉布受到了来自东巴基斯坦左翼政治家和激进活动家要求迅速宣布独立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军队

统治者则调派了大量军队以迫使穆吉布放弃这样的声明。当东巴基斯坦在示威者与武装力量的暴力冲突中步履蹒跚时,穆吉布力图通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推行中间策略。这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使东巴基斯坦的行政机构陷入瘫痪,穆吉布实际上掌控了省里的权力。他宣布东巴基斯坦人已经进入了为独立而战的阶段,但与此同时,他仍在寻求一个在巴基斯坦框架内的解决方案,设想自己能成为统一的巴基斯坦的总理(插图 12.3)。

126

崔迪威拉加

1953 年的一个下午,节日的氛围弥漫着兰格马蒂(Rangamati)这座山镇。宫殿大厅里挤满了各色显贵,他们在这里参加一个融合了莫卧儿、英国和巴基斯坦风格的庆典。巴基斯坦共和国将要在吉大港山区(东巴基斯坦东南部)任命一位新的拉加(raja,意为"王公,首领")。以来复枪致敬、官方公告和赠送典礼剑给一个 19 岁的男孩标志着这一事件。这就是崔迪威·罗伊(Tridiv Roy)接替他最近故去的父亲继承查克玛拉加的过程。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一艘装饰着镀金孔雀弓的船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其上载着崔迪威的新娘及其侍从,她被带到宫殿来"坐着披挂锦缎的轿子,由传统的轿夫扛在肩上",并由侍卫和鼓手随从。那一夜,新娘阿尔提·迪万(Arati Dewan)"穿着金色的贝拿勒斯绸缎莎莉并带着冠冕和其他饰物",成为新查克玛拉尼(rani,意为"王妃")。

这一浪漫的场景对崔迪威备受政治发展打击的一生来说相当珍贵。崔迪威拉加曾扮演过许多不同的角色。他曾在殖民地孟加拉附近的精英寄宿学校接受教育,并同这一地区许多贵族家庭有联系。此时他是巴基斯坦国家的税务官,每年在他兰格马蒂的宫廷里收税。他也是查克玛人民有名无实的首领,一位地方长官、政治家,有时也会是官方外交使团的一员。1962 年,随着开普泰水力发电计划的完成,一个巨大的湖泊淹没了吉大港山区的中央谷,使他成了环境难民。崔迪威的宫殿成为数千所消失在水下的房屋之一。他在湖中的新岛上又建立了一座豪宅。

1971 年,崔迪威拉加的生活像许许多多生活在巴基斯坦的人一样,难以置信地改变了。在 1970 年的国民大会选举中,他成为东巴基斯坦获选

的两个独立候选人之一(其他的 167 个席位都属于阿瓦米联盟)。他没有加入到孟加拉国运动中,主要的是因为他觉得一个独立的孟加拉国比巴基斯坦会对吉大港山区自治造成更大的威胁。

当孟加拉解放战争爆发时,他试图保持中立,但最终倒向了巴基斯坦一边,作为其特使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进行了友好访问,并出任了军队控 127



插图 12.2 新加冕的崔迪威·罗伊拉加和他的新娘阿尔提在兰格马蒂,1953 年。承蒙 Raja Tridiv Roy 提供。出自 Van Schendel *et al.*, *Chittagong Hill Tracts*, 267。

制的省政府部长。战争结束后，他迁移到巴基斯坦，将他的家庭抛在了新建立的孟加拉国。孟加拉国政府视其为叛徒，将之废黜并认可他的儿子戴瓦斯希(Devasish)为拉加。崔迪威拉加成为战后巴基斯坦的内阁部长，其后出任了巴基斯坦驻阿根廷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大使。因为他的一些孩子跟他一起，所以这个家族分布在若干大洲上。[6]

সংবাদ

SANGBAD



সামরিক আইন প্রত্যাহার ও গণপ্রতিনিধিদের হাতে ক্ষমতা দিলেই পরিষদের অধিবেশনে যোগ দিব কিনা ঠিক করিব

এবার স্বাধীনতার সংগ্রাম : মুজিব

ঢাকা বেতার ও টেলিভিশন কেন্দ্র বন্ধ

মুজিবের নির্দেশ





插图 12.3 “穆吉布：这是为独立而斗争的时候了。”出自 *Shongbad* (8 March 1971)。承蒙 Rajshahi University Library 提供。

1971 年 3 月中旬，叶海亚飞抵达卡，表面上看是为寻求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做最后努力。他在那里和布托会合，但是没有一个移交权力的提议方案符合所有三方的要求。叶海亚准备按照六点计划的要求给予东巴基斯坦广泛的自治，并愿意接受穆吉布为总理。布托则将之视为对西巴基斯坦人的巨大背叛。[7]正当会议室中的谈判陷入僵局时，街头的政治骚乱逐渐升温，更多的西巴基斯坦军队悄声潜入。阿瓦米联盟在 3 月 23 日向叶海亚提交了一个区域自治的草案，并警告他要在 48 小时之内通过，否则东巴基斯坦将会失去控制。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独立，在进行军事训练时可以看见激进者打着“孟加拉国”的新旗帜（插图 12.4）。 129



插图 12.4　“欢乐的孟加拉巴哈尼阅兵（胜利归于孟加拉国军队）。”出自 *Shongbad* (24 March 1971)。承蒙 Rajshahi University Library 提供。

3 月 25 日，叶海亚政权一方面仍与阿瓦米联盟保持谈判，同时另一方面采取了预先部署好的危机军事解决方案。[8]那天夜里，叶海亚秘密地飞回了西巴基斯坦，在此之前，他已下令巴基斯坦军队攻击自治运 130

动的核心。士兵开始在达卡和整个东巴基斯坦凶残杀戮,激起了孟加拉国解放战争(Bangladesh Liberation War)。这个故事将在第16章讲述,此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东、西巴基斯坦在政治疏离之下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第十三章　东巴基斯坦人的生活

131

巴基斯坦政治上的衰落有着深刻的经济挫败的根源。20 世纪 40 年代，大部分巴基斯坦的支持者都对孟加拉三角洲的快速发展充满了希望。他们相信独立必然与区域繁荣联系在一起，因为独立会使其从剥削的殖民体系中脱离出来，并推翻那些作为殖民体系代表的地主、商人和官员。当然，分治在最初会造成混乱，但其长期前景被认为是光明的。

然而在分治之后，事情突然变得复杂多了。穆斯林联盟的领导没有准备好统治，其政策并不能吻合孟加拉三角洲经济发展的需要，且其建设一个国家经济体系的企图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除此之外，人口的互换比预想的还要广泛并具破坏性。在东巴基斯坦的早些年间，也就是现在所知的孟加拉三角洲，不仅充满着政治暴力，也充满着经济混乱。

人口互换

1947 年的分治是第一阶段的人口学分裂。大量的人口处于迁移中。在旁遮普，在西部，人口互换造成了大量而迅速的同族互杀惨状。在孟加拉，情况发展得缓慢些，没有那么暴力，但波及范围也很广泛。在加尔各答、诺阿卡利和比哈尔骚乱之后，因预想到分治而产生的移民

从1946年就开始了。1947年8月开始分治时,一些特别的群体开始移民。他们移民的首要原因并非(如在远方的旁遮普一般的)广泛的公共骚乱的结果。一些人迁移是为了促进他们的职业前景或缺乏对巴基斯坦实验的热情。其他人则是逃离一个他们发现难以忍受的局面。[1]比如,许多东巴基斯坦的富裕印度教徒面临着一个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局面。他们发现,先前那些彬彬有礼的穆斯林佃户、雇工和邻居现在从恐惧中脱离了出来,以毫不掩饰的恐吓、憎恨和敌意等形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由于无法适应这种突然转换的环境,并觉得不再受到巴基斯坦当局的保护,许多东巴基斯坦的印度人除了抛弃自己的财产和家园去印度面对未知的未来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类似的事情同样也发生在印度北部和东部的穆斯林身上。[2]当这些痛苦的移民在其新家定居时,他们常常会给已经白热化的社群关系火上浇油,并协助驱逐其他宗教社团的家庭。

132

没有人知道这一跨边境的人口迁移规模有多大。一位孟加拉诗人很久以后将之写在一篇名为《破碎的孟加拉》(Broken Bengal)的诗中:

> 他们粗暴地用力拉出大地的根,
> 人们向各处四散惊逃,
> 没有人去顾虑谁死了和谁活着。[3]

两个新国家都无法监控这些移民,并经常为了政治目的操纵数据。到1948年早期,当人潮逐渐衰退,官方估计约有80万人从印度移民到了东巴基斯坦,而约有100万人从东巴基斯坦迁往印度定居。然而,在经过这些最早的互换后,跨边境的移民并未结束,而是在其后若干年内兴衰交替地继续着,随着一些像1949年印度入侵海德拉巴(Hyderabad,次大陆南部一个准备加入巴基斯坦的地区)以及1950年在孟加拉东西两部分都影响甚广的社群冲突等政治事件而波动。第三次高潮发生在1952年护照与签证体系即将引入之前。此前,印度和东巴基斯坦之间的旅行相对容易,尤其是对于大量回归的移民来说。20

世纪 50 年代剩余的岁月里很少再见到移民，但在 1961 至 1965 年之间孟加拉两部分发生骚乱时又再次高涨。

进入东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主要来自邻近地区：西孟加拉、阿萨姆、特里普拉和比哈尔，但也同样来自北印度的北方邦。巴基斯坦当局认为他们对非孟加拉移民有特别的责任，他们将之称为“穆哈吉尔”(Muhajirs，离开一个地方去寻求避难所的人们)，这个词让人联想到公元 622 年先知及其追随者从麦加去往麦地那的迁徙(*hijrā*)。一些穆哈吉尔受到了国家在住房和配给上的支持，而其他许多人就不得不自力更生了。孟加拉移民(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受到任何国家补助)和许多当地人感到国家对那些非孟加拉人的新来者有所偏袒。

大多数来自东巴基斯坦的移民定居在印度讲孟加拉语的地区。加尔各答成为一座难民城市和东孟加拉流亡者乡愁的中心。[4]许多人在难民营中度过数年。[5]在那些将财产留在了东巴基斯坦的人中，一些人在分治后的数年里仍然从租客和佃农那里获得收益。而事实上，他们失去了对其房屋、土地和生意的控制，巴基斯坦将这些都宣布为“敌人的财产”。

许多非穆斯林从东巴基斯坦移民出来，但更多人留了下来，认识这一点很重要。东巴基斯坦不像西巴基斯坦那样，在分治之后非穆斯林人口迅速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其仍旧是 1 000 万印度教徒——占人口的 1/5——以及 50 万佛教徒、基督徒和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家园。[6]

乡村经济

在整个巴基斯坦时期，东巴基斯坦主要还是乡村社会：超过 9/10 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对于大多数东巴基斯坦人而言，生活与农业节奏紧密联系。一个乡村家庭生活通常在日出之前就开始了。他们按照性别和年龄来分配家中的工作。妻子在庭院的灶台点燃干草和牛粪块准备早餐。她的公公可能漫步到村中的清真寺参加晨祷。天亮后，她就用加了盐、辣椒和一些蔬菜的剩饭给她的丈夫、公婆和孩子们做早饭，然后打扫庭院、喂养家中的牲畜。之后，她的丈夫就带着小公牛沿着乡

村小路——在泛滥平原上垫高的堤道——往田地里去，将这些小公牛套到木制的犁上。一个儿子去放羊，一个女儿去附近的水井汲水。妻子和婆婆一天主要就在做饭、打扫、洗衣服、重新修葺家中的竹墙、照顾更小的孩子并照管小片菜地。丈夫在外面耕种并把自己的午饭带到地里去。下午的时候，他会回家休息一会儿，在家周围做一些零散的工作。孩子们帮助父母们工作、玩耍或者去村里上学。随着白昼将尽，丈夫便走到邻村去——那里每星期有两次集市(插图 13.1)，他卖掉一只小鸡，带回来煤油、鱼、烟草以及最新的小道消息。他们的晚餐用得较晚，其后，在几盏小油灯的陪伴下，全家大约在九点钟就都睡觉了。

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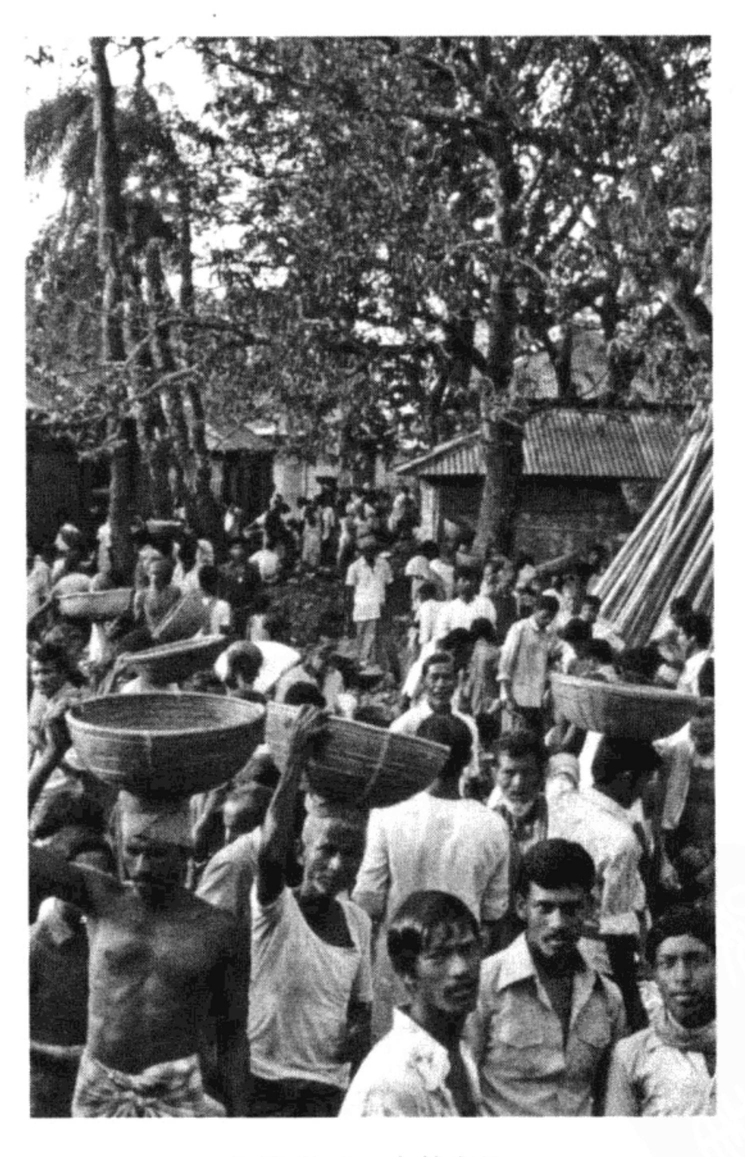


插图 13.1　乡村市场。

孟加拉三角洲的社会秩序依赖亲戚关系，他们生活在集体中，其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团体在田地里劳作且扮演着社会主要的安全网络。这些并不奇怪。亲属关系的意识形态相当强烈，这甚至包含那些没有血缘或婚姻关系的人们。这是(并将继续是)陌生人迅速建立虚拟的亲属纽带的一般准则。因此，一个男人称一个熟人的妻子为“大姐”(*āpā*，*didi*)，称一个年老的店主为“叔叔”(*cācā*)。这种亲属关系的意识形态伴随着非常复杂的尊重与服从规则，有互相承担责任、互相保护的准则以及强烈的归属感。这并非说，在大型的、经常是几世同堂的、构成社会基础的家庭中不会发生大的冲突，但亲属关系无疑是乡村社会秩序的典范。

135

农业曾一度统治着经济。在 1950 年前后，80%的劳动力在农业中劳作，贡献了东巴基斯坦总产值的 65%。只有不到 1%的劳动力从事大工业、运输业和公共事业。[7]这些数字逐渐发生着变化，但是今天的孟加拉国人仍旧主要依靠土地为生：约有 60%的劳动力部署在农业上。然而，很快农业生产的经济重要性在国民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就下降到 20%左右。这不仅反映出农业的停滞，也反映出 21 世纪经济的多样化。[8]

经济政策

分治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都集中精力提高生活水平，发展更为均衡的经济。他们的政策和计划建立在始于殖民地时期的基础之上。发展型国家的建设先于分治，但现在变得更为动态化了。巴基斯坦和印度都优先推进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但选择了不同的政策来达成这一目的。巴基斯坦与印度不同，其通过鼓励私人投资来建设工业。除了少数战略工业(军火、铁路、水力发电)，国家政策给私人企业留下了巨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并给予他们大量的补贴与设施资助。这些补贴主要流向哪里呢？巴基斯坦将大部分预算用于安全方面。事实上，其发展出了阿耶沙·贾拉尔(Ayesha Jalal)所称的“防卫政治经济”，其特点便是将国防预算维持在远超过资源生产量的水平。[9]在 1947 至 1970 年间，巴基斯坦超过一半的中央开支用于防务。约有 1/3 的剩余预算投入工业，而只有 1/10 投入农业和饥饿救助计划中。[10]结果是，军队的

将领和最大的企业家与上层官僚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按照巴基斯坦首席经济学家马赫布卜·乌尔·哈克(Mahbub ul Haq)的观点,仅 22 个家族占有了巴基斯坦 66%的工业财富并且控制了 87%的银行和保险业资产。这显示了一种极端的财富与权力集中,也表明了其他一些事情:这些家族中没有一个是孟加拉人的。

经济权力集中在国家西部,政治权力也掌握在西巴基斯坦人手中,这造成两翼之间极不平衡的经济关系。比如,2/3 的巴基斯坦外汇是由东巴基斯坦获得的——大部分通过黄麻出口——但大多数都转移到了西巴基斯坦。[11]通过这种方式,西巴基斯坦从东巴基斯坦那里获得了相当可观的资源,为其自身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对东巴基斯坦的预算连 1/4 都不到,而大多数的巴基斯坦人生活在那一地区。[12]在 20 世纪 50 年代,西巴基斯坦的人均收入增加了,而东巴基斯坦的人均收入却降低了,且西部的教育和交通的进步远比东部迅速。[13]

当巴基斯坦出现之时,东翼便处于一种经济劣势中。在巴基斯坦时期,两翼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虽然在东巴基斯坦许多人都直截了当地将责任归咎于政府那任意的歧视性发展政策,但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政府在西巴基斯坦分配更多是因为移民企业家定居在这里,还因为巴基斯坦的首都在西巴基斯坦。因为东巴基斯坦低水平的本土企业和相当多的政治动荡以及劳动力骚乱,使这里的外国投资比西巴基斯坦少得多。[14]最后,对城市和工业倾斜的巴基斯坦发展策略也不利于东巴基斯坦压倒性的农业和乡村经济。

地理方面的因素加重了巴基斯坦经济的不均衡发展。首先,分治使东巴基斯坦几乎全部为印度所包围,切断了古老的商路和运输联系。分治将东孟加拉从阿萨姆、东孟加拉、西孟加拉之间联结了数个世纪之久的区域经济中切除出来。经济的瓦解使东巴基斯坦相对西巴基斯坦处于劣势。其次,巴基斯坦两翼之间的直线距离是 1 500 公里,并且因为与印度之间不确定的、经常难以处理的关系而使其实际距离更为遥远。他们之间交通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环绕印度次大陆的海路,这又使得东、西巴基斯坦之间增加了数千公里的有效距离。穿越印度领空的

航线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通行的，尤其是对于民航而言（插图13.2），但是只有 1%的“两翼之间”的旅行是通过航空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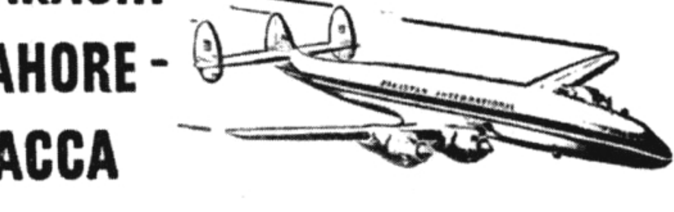






插图 13.2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在巴基斯坦成立八年后的 1955 年宣布首次实现东、西巴基斯坦之间直飞。在此之前，两翼之间的空中往来都要通过印度航空公司。出自 *Pakistan Times* (2 June 1955)。承蒙 Rajshahi University Library 提供。

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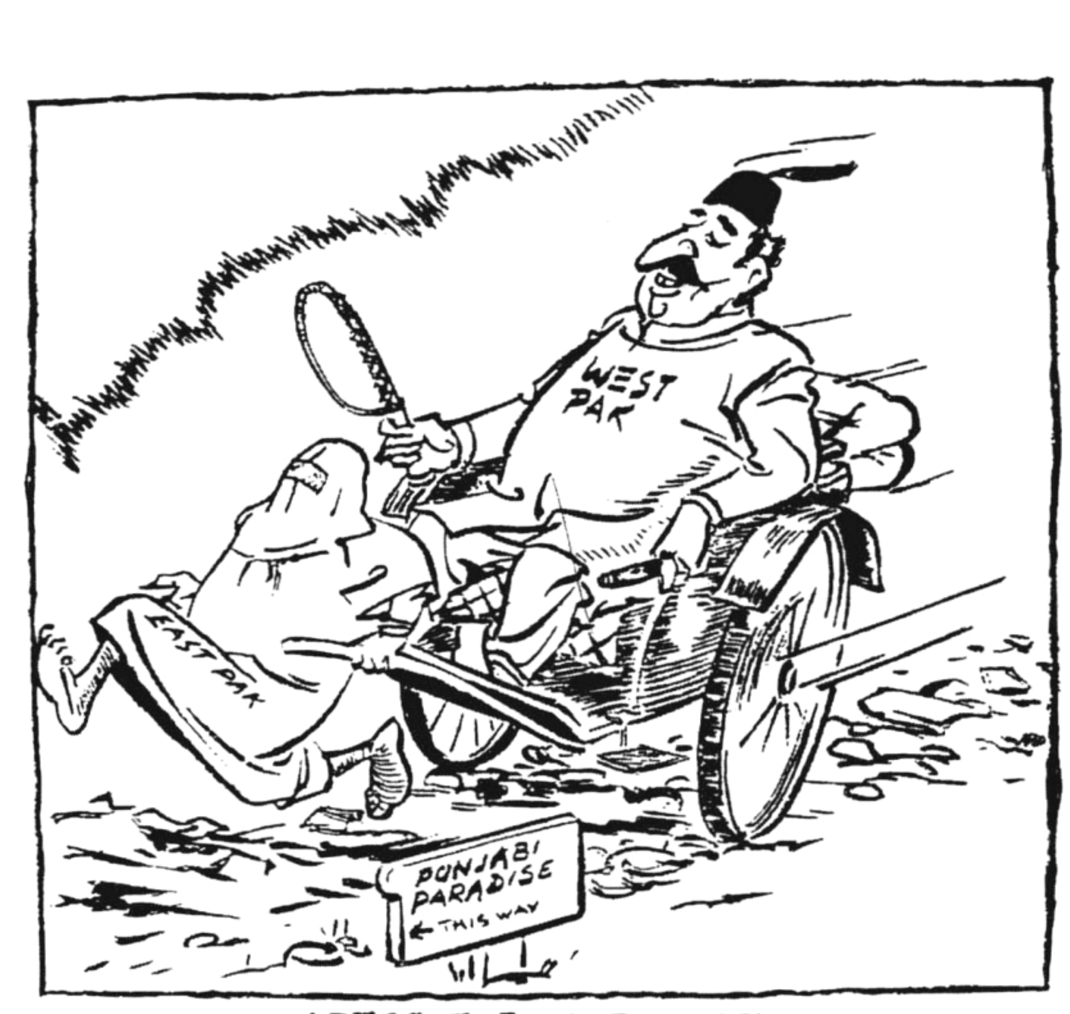


插图 13.3 《蜜月之后》，出自 Ahmed (comp. and ed.), *Gonomadhyome Bangladesher Muktijuddho*, 26。

随着时间推移，两翼之间的经济不均并未缓解。最早，巴基斯坦观察家将东翼描绘为一个被政府忽略和遗忘的地区。然而，大多数人渐渐认识到这一地区并非是被如此忽略的，其受到西巴基斯坦领主的系统性剥削。[15]随着分治后欢乐情绪的逐渐消退，东巴基斯坦人开始将自己视为二等公民，从插图 13.3 中可以看出这种被漫画家艾哈迈德(Ahmed)所捕捉到的感觉。[16]

巴基斯坦的统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 300 多年前莫卧儿王朝吞并孟加拉三角洲的情形。达卡再次成为要塞城市，北印度来的统治者想在那里统治整个乡村；农业是三角洲经济的中流砥柱；三角洲的财富流向权力中心。西巴基斯坦精英消费了大量来自孟加拉三角洲的商品；

139

140

被派往东巴基斯坦的官员感觉他们是去担任一份苦差事;西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

然而在一个重要方式上,巴基斯坦的统治与莫卧儿王朝的统治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莫卧儿王朝在孟加拉三角洲建立地税系统,英国人占领之后也接受了这个系统。他们的"固定赋额法"使柴明达尔(地主/收税人)成为土地的拥有者和向政府缴纳固定税额的纳税者。这一体系现在被废除了。1950 年的《东孟加拉税收与租地法案》(The East Bengal State Acquisition and Tenancy Act)废除了柴明达尔以及其下许多中间人的特权,使所有土地拥有者成为直接向国家交税的承租人,同时也规定了每家最多占地 13 公顷的上限。其结果便是土地税收的改革和国家赋税的增加。然而,这却不是一次土地改革。到英国统治末期,几乎 75%的土地属于印度教地主,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分治后成为在外地主或迁徙去了印度。新的立法导致乡村地区有权势的穆斯林家族迅速重新洗牌,并声明其对柴明达尔们留下来的财产享有所有权。他们扮演着直接纳税户的中间角色,通过将其土地注册在别人名下以绕过最高限地的规定。改革的确铲除了过去的收税上层,但事实上却加强了三角洲农业结构的不平等。其否定佃户对土地的任何权力,并将他们等同于薪资劳动者。这背离了小土地持有者和无地农民的期望,他们曾期冀能占有先前为地主所有的剩余土地。虽然在新法律之下,他们可以租用土地,却并没有真正地得到土地。从这一点来考虑,巴基斯坦实验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苦涩的失望:他们原来所期待的乌托邦从未有实现。

对于大多数东巴基斯坦人而言,土地是衡量财产多寡的主要方式。在 1960 年左右,除薪资劳动者以外,约有 20%的乡村人口没有土地。大多数土地所有者所持有的土地也非常之少:超过 50%的农田小于 1 公顷(总共只占耕地面积的 16%),而几乎 90%的农田都小于 3 公顷。[17] 使事情进一步复杂的是,个体土地常常被再分割成许多不同的小块土地——这是为了将之分割成遗产,并且可以获得低地和高地两种土地。国家尝试将这些小土地合在一起,但是受到了激烈的抵抗,最终不得不

放弃。

140 因为这些土地狭小,以及国家对农业投资甚少,使其产量非常低,贫穷在到处蔓延。无论如何,大米的净产量从20世纪50年代的每公顷900千克上升到20世纪60年代的每公顷1 100千克,这一增长被认为主要是由于投入了更多的劳动力。[18]

大米是东巴基斯坦的主要食物,但黄麻是最重要的出口作物。迅速生长的季节性黄麻,是这一地区的本地植物,其能生产出一种纤维,销往世界各地以制作包裹、绳索、粗麻袋、园艺麻线、地毯、帆布、防水布和许多其他的工业产品。它的叶子同时也可以入菜。因为它的颜色及其经济重要性,黄麻在孟加拉被称为“黄金纤维”。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孟加拉三角洲事实上垄断了黄麻的生产:它供应了全世界黄麻需求的80%。然而,1947年的分治对其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几乎所有的黄麻都生长在三角洲东部(划归巴基斯坦),而一百多个加工厂则在西孟加拉(划归印度)加尔各答附近。巴基斯坦当局急于建立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禁止向印度出口黄麻。这样东巴基斯坦的黄麻种植者向他们唯一的作物买主——印度黄麻厂售卖黄麻时就打上了走私贩的烙印。在东巴基斯坦,国家与黄麻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只有在东巴基斯坦建立黄麻加工厂时才能得到缓和。[19]其中最著名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是纳拉扬甘杰的阿达姆吉(Adamjee)黄麻厂,其在1955年投入生产。在巴基斯坦时代末期,东巴基斯坦地区拥有了超过70个黄麻厂。与此同时,印度也在自己的领土上推广黄麻种植以供应西孟加拉的工厂。因此,分治导致了原来统一的黄麻生产和加工体系的破裂,而以两个相互竞争的体系取而代之:一个在东巴基斯坦,另一个在西孟加拉。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对黄麻的需求下降,这两个体系都遭受到来自合成纤维,尤其是聚丙烯合成纤维的挑战。

国家试图在其他领域对经济进行分治的努力收效甚微。大部分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被禁止了,但却不可能阻止非法的跨境贸易。许多迹象表明走私非常活跃,即使最有力的政策也事与愿违。比如,1957至1958年间,巴基斯坦在东巴基斯坦边界走廊对走私活动进行

军事镇压。这一“关门行动”给边境人口带来了恐慌,但最终却被放弃了,因为其可悲地在查验非法越境贸易方面失败了。[20]

141

东巴基斯坦的工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受到国家支持的西巴基斯坦企业,主要是采取加工当地原材料这种相对简单的方式。除了黄麻工业外,其他重要的新措施包括主要在西部和北部地区建立糖厂,在东北部建立茶厂,以及在章德拉沟纳(Chandraghona,吉大港山区)建立一座大型纸厂。[21]这座纸厂的原材料是竹子,从保留的山区森林砍伐,编成巨大的竹筏沿着戈尔诺普利河(the Karnaphuli river)漂下来(插图 13.4)。另一个分治之后发展起来的是棉纺织工业。在此之前,孟加拉三角洲已经长期不生产棉花了。孟加拉的棉纺织品曾一度在亚洲和欧洲家喻户晓。此时,则不得不进口原料。



插图 13.4　开普泰湖上的竹排,1964 — 1965 年。Keith Sandercock 摄。出自 Van Schendel *et al.*, *Chittagong Hill Tracts*, 139。

虽然城市人口在整体人口中仍占少数,东巴基斯坦的主要城镇却发展迅速。从 1947 年以来,达卡的人口翻了 3 倍,将近有 100 万居民。大多数新来的人都是从乡村来的求职者,想要在城市工业或服务业中

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服务业稳定增长的一个领域是公共交通，尤其是人力车。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被引入达卡——在另外两个市镇，迈门辛和纳拉扬甘杰之后，到 20 世纪 50 年代，已多半取代了以前常常可见的四轮马车。最早的人力车外表单调乏味，而到 20 世纪 50 年代就加上了色彩丰富的装饰，这些很快发展成为彰显城市孟加拉鲜明特色的流行艺术："达卡的新人力车是一团色彩。每一平方英寸上都有装饰。到处都是流苏、金属丝和花体字。前面和侧面插着塑料花。图片和图形被画得、钉得到处都是。"[22] 几万名男子在这座城市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人力车夫，就像妇女找到家政工人的工作一样普通。大多数新来者都住在工人阶级聚居区，其已经超越了原来殖民地达卡的城市范围。随着城市的拓展，达卡还增建了其他一些社区：办公楼在摩提杰黑尔(Motijheel)附近(插图 13.5)，行政机构和新的市场在拉姆纳(Ramna)，工厂在代杰冈(Tejgaon)，高级住宅在达蒙蒂(Dhanmondi)。



插图 13.5　20 世纪 60 年代达卡新建的商贸大楼。出自 *Pakistan Quarterly* (1966)。承蒙 Rajshahi University Library 提供。

143

在巴基斯坦实验末期，孟加拉三角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变成了一个与周围环绕着的印度领土相当不同的领土单元。东巴基斯坦的政治斗争是为了争取区域自治或国家地位的独立，而并非为了重新加入印度。1947年以来，人口在24年里增长了60%。10个人中有9个人生活在乡村。他们大多数依赖农业，因此乡村拥挤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因为贫穷从未减少。到1971年，有比1947年更多的东巴基斯坦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新生儿预期寿命有所增长，但还是低于50岁。在提升生活质量方面，巴基斯坦实验令大多数公民都失望了。

144

第十四章　依赖支援的根源

巴基斯坦的政策制定者认为他们自己是现代化的典范。他们确信,自己知道如何推动萧条的经济进入高速运转并带来“发展”。他们所需要的是钱,以及跟从他们领导的人民。

显然这没有什么新意。孟加拉三角洲的农业停滞问题在20世纪早期就首次成为政策关注的对象。殖民当局注意到,趋于关闭的农业边界和人口增长导致了农业产量的停滞和乡村收入的减少。这推动了第一次乡村发展的尝试(或者像那时所称呼的,叫做“乡村复兴”):在乡村合作社、减免债务、农作物研究、农业扩展以及使用化肥等方面进行试验。虽然大多数措施来自政府,一些非政府组织[比如救世军(Salvation Army)]也非常活跃。发展政策的根源可回溯到一个多世纪之前,其今天也是孟加拉国的中心议题。

从巴基斯坦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就自视为专心于发展的。其扮演了一个干涉主义者的角色,但其所发派的资金却寥寥无几。其也高估了自己转变经济的能力:“除了少数例外,中央资助的项目是计划糟糕、腐败现象普遍和总体管理不善的最佳的教科书范例。”[1]

1958年政变之后,军事政权将自己展现为唯一有能力使巴基斯坦现代化的力量。其所理解的现代化,基本上就是通过集中和威权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其目标是最大限度的增长和税收,而非参与分享或社

会福利。为了这一目的,官僚集团从执行法律的机构变成了一个负责经济管理的机构。于是,年轻官员被派往达卡东部城镇库米拉新建立的巴基斯坦乡村发展学会(Pakistan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接受一部分训练。就增长方面来看,这一政权的政策相当成功:在阿尤布时期,巴基斯坦经济以每年5.5%的速度增长。

然而,通过政府的独裁实现的增长并非真正的经济增长。自始至终,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哲学是“民营企业在政府投资下增长”,而经济发展的收益却极少分配。[2]小部分强盗式资本家和大农场主精英阶层获得了国家补贴的好处,而大多数孟加拉人忍受着物价上涨、实际收入减少的痛苦,且贫困人口的实际数目也有所增加。两翼之间的财产分配也显示出巨大的鸿沟。尽管阿尤布政权增加了对东巴基斯坦公共资金的分配,私人投资仍然处于只占所有投资的22%这一低水平上。西巴基斯坦的年增长率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3.2%上升为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7.2%。而东巴基斯坦相对应的数字则是从1.7%上升到5.2%。[3]换句话说,军事政权对发展的强调加强了巴基斯坦两部分已经存在的不平等。毫无疑问,经济不平等成为两翼之间关系的主要议题。孟加拉三角洲的精英开始要求通过“两种经济政策”(two-economy policy)的方式实现区域经济自治。这意味着两部分的经济应该完全分离对待,并应该分别为两部分设计适宜的政策。

这一切都与一个重要变化相关:巴基斯坦的发展政策开始与国外资金联系起来。20世纪50年代早期,冷战使政府对政府间的援助成为地缘政治的有利工具,而在专家当中存在着援助将会加速经济发展的强烈信念。新建立的巴基斯坦很快就与美国建立了援助关系,并同时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安全体系中的一员。西巴基斯坦接受了超过东巴基斯坦五倍的美国援助。大部分的美国援助都用于军事、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4]一小部分投入东巴基斯坦的农业——这一地区最主要的经济领域——用于建立社区发展计划,比如始于1953年的乡村农业和工业发展计划(V-AID programme)。[5]其失败后,1955年又开展了一个新行动:在库米拉建立乡村发展学会。

146

库米拉模式

乡村发展学会得到了东部三角洲的一个乡村(*thānā*)作为"当地政府和经济发展的实验区域"。[6]此时的主要观念是使乡村形成社区,社区要成为能够进行改革的基本单位,并通过其引入"现代化"。这些社区和学会的中间人是"乡村组织者"和"模范农场主"。不顾"世界上这一地区合作制悲惨失败的历史",学会再次建立了合作社,并开展了一系列培训、研究和扩展活动。使这些措施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强调,发展不仅仅是农业专业知识的传播,同时也需要输入当地知识经验。该学会主任,热情的阿克特·哈米德·汗(Akhter Hameed Khan)指出,发展的关键就是传播知识和改变人们的态度:

> 参与实践的愿望,旧知识必须被检验和通过无止境的探索获取新知识的信念,以及通过扩展使科学知识变得有用的紧迫感——这些是美国发展的基本态度,我们也可以开始同样的进程。[7]

1958年政变之后,库米拉学会成为军事政权在乡村地区赢得合法性的关键。基本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公共工程计划。[8]这个计划的目标(主要接受美国的建议)是利用乡村尚未充分使用的人力资源参与到"国家建设"活动中——修建堤围、公路、学校和灌溉体系,而给工人的报酬主要是美国过剩的小麦。[9]阿克特·哈米德·汗积极地投入到了工程计划的制订中,认为这是使政权合法化的一项重要手段。他在写给政府的信中谈道:"挫折、苦涩和愤世嫉俗都将消失……数百万低收入的乡村民众在农闲季节去工作……这些防卫工程……将会成为一个好政府无所不在的标记。"[10]对工程计划的批评很快指出,其作为政府的国际宣传工具比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更为成功。在他们看来,工

147

程计划确实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但公共设施本身却主要是泥路和小桥,疏于计划、执行和维护,并且缺乏地方的参与或正确的财务

处理。[11]

20 世纪 60 年代,学会接待了许多国际访问者。其对乡村发展的处方(现在被称为库米拉模式),作为一种突破而引起了一片欢呼。库米拉模式包括家庭生育计划,灌溉和电气化计划,信贷措施,妇女培训以及农产品贮藏、加工和销售计划。从一开始,这个计划就有三个令人担忧的地方:高度依赖个人(精力充沛且社会关系良好的领导者)的努力;如果缺乏国际资金便难以保证其稳定性;以及难以在"实验区域"之外复制这些计划。此外,也有人对孟加拉三角洲的乡村能否被视为社区持怀疑态度。合作真的就意味着利益和忠诚的共享吗?抛开这些疑虑不顾,库米拉模式将孟加拉国未来的乡村发展计划提上了日程。

在 1959 至 1969 年间,从外部流入的援助资源翻了六番。[12]从 1960 年以来,大多数外国援助——半数来自美国——是通过世界银行援助巴基斯坦财团(World Bank's Aid-to-Pakistan consortium)进行的。这一财团由美国、西德、英国、加拿大、法国、日本、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组成。[13]通过大幅提高其援助金额,财团表明了对巴基斯坦军事政权的支持,并成为其发展策略的伙伴:

> 意识到巴基斯坦增长不平衡并非巴基斯坦发展策略无意识的副产品这一点非常重要。巴基斯坦的政策制定者积极地寻求能推动这种不平等的政策……外国援助的流向限制在这些特殊的社会-经济目标的框架之内,并有助于通过不平等实现增长。[14]

因此,巴基斯坦增长的不平等——无论是从贫困方面还是从区域剥削方面来看——受到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各国家的支持。巴基斯坦的发展政策毫无疑问是威权的和由上而下的。在这种意义上,作为东巴基斯坦乡村发展特色项目的库米拉实验就被引入了歧途。大多数发展政策都是在缺乏对当地的认识或知识的情况下被构想出来或实施的。我们已经看到,巴基斯坦的社会发展体制是如何扩大贫富差距和两翼之间的差距的,这激起了东巴基斯坦的广泛抗议。但是在东巴基斯坦

148

内部也出现了一种区域不均，并在东巴基斯坦变成孟加拉国之后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影响。最为极端的例子就是开普泰(Kaptai)大坝，一个在吉大港山区的大型工程(插图 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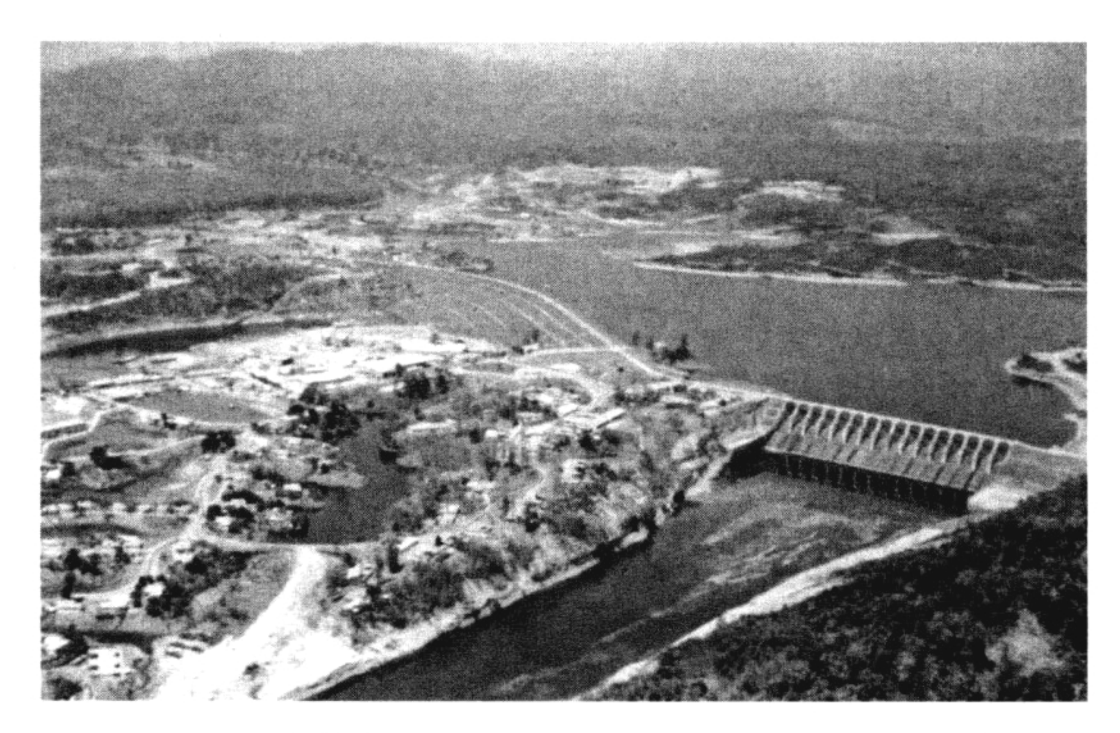


插图 14.1 开普泰大坝，1964 — 1965 年。Keith Sandercock 摄。出自 Van Schendel *et al.*, *Chittagong Hill Tracts*, 199。

山中的水坝

东巴基斯坦的首要问题之一就是能源动力的缺乏。其大部分能源都依赖进口。这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发生了变化，当时在锡尔赫特东部和库米拉发现了可开采的天然气，还有外国的援助可以帮助在这一地区建立一座水泥厂和化肥厂。然而还需要更多的能源。巴基斯坦规划者成功地说服了外国援助者在吉大港山区投资建设一个大型水力发电工程。这项在吉大港山区建立一个人工湖的计划，实际上可以追溯到 1906 年，但是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获得外国资金支持之后才被认真对待。这个计划使数千名平原地区的孟加拉工人和北美、欧洲的工程师来到了这片非孟加拉人地区。到 1961 年，在开普泰村横跨戈尔诺普利河的大坝已经建成了。它被作为现代化的胜利而受到了广泛赞誉。然

149

而，在其发电站能够为远方城市和工业输送电力之前，却必须填满巨大(650 平方公里)而形状怪异的开普泰湖。这片湖淹没了许多村庄和森林，还有吉大港山区 40%的可耕种土地，导致约 10 万人被迫迁移并毁灭了许多野生动物。这是由上而下发展负面影响的典型例证(参见“施拉布拉塔与大逃亡”)。

施拉布拉塔与大逃亡

当开普泰大坝迫使施拉布拉塔·塔昌戈雅(Shilabrata Tangchangya)离开他的小村庄时，他完全没有准备。

“我仍然能听到大坝闸门关闭时持续整夜的轰鸣声。到早上，水已经淹到了我们门口。我们放了自己的牛羊、鸡鸭，然后开始急匆匆地和受到影响的人们一起带着他们的大米、稻谷、家具和所有其他能拿的东西一起逃往附近的山上……虽然能带走的东西都带到山顶来了，仍有许多人回到他们的房子里过夜。当他们睡觉时，水位逐渐上升惊醒了他们，于是他们不得不在夜深人静之时从自己的房中奔逃出来。”



插图 14.2　开普泰湖中耸立的山头，1965 年。Dick Recter 摄。出自 Van Schendel *et al.*, *Chittagong Hill Tracts*, 142。

曾在克拉姆鲁(Kellamura)村生活的恩里帕提·郎加·特里普拉(Nripati Ranjan Tripura)回忆道：　150

“我们的村子也被吞没了。我们先到附近的山上躲避。这座山第一年里没有受到大水泛滥的影响。水漫到了山脚下就停住了。那时这座山就像是一个岛。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山体被水波击打，逐渐开始腐蚀。次年就完全被水淹没了。我们除了离开以外别无选择。”

那些被迫迁移者并不将开普泰大坝的竣工视为发展的胜利，而是视为大逃亡(Boro Porong, Great Exodus)。对他们而言，那是“奇怪的和极其罪恶的……因为我们没有枪，我们不得不在沉默、屈辱与愤怒中哭泣”。以此同时，开普泰发电站所产生的电能输往了平原地区的城市，而非吉大港山区的村庄。

几乎没有一个受影响的人得到任何赔偿，这个项目也没有催生什么就业的机会。一些人定居在湖边，但多数人被迫到吉大港山区的其他地方寻求避难所。数万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逃往印度和缅甸。20 世纪 60 年代，印度政府将这些发展的牺牲者安置到东北的偏远地区。今天，他们及其后代在那里处于一种几乎不被接受，也没有国籍的状态，竭力维持着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生活。[15]

依赖支援

巴基斯坦时期建立了一种模式，即孟加拉三角洲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外国援助，而非依靠动员其内部的资源。发展计划中的预期受益人的参与是微不足道的，且发展部门的官员是对外国赞助人而非当地选民负责。其自始就是不民主和由上而下的制度，在环境受到严格控制时运行是最好的。它在受到良好资助的后 1958 年军事独裁时代的繁荣并不使人惊讶。巴基斯坦的国家精英逐渐对外国的援助上瘾——援助强化了国家机构——并且国家的统治者们允许外国捐助者来确定发展重点。

这些捐助者们认为，支持巴基斯坦最强大的经济领域和企业会带来更为有效的快速经济增长，然后这样产生的财富便会逐渐流向穷人和薄弱的经济领域。这一在强势领域押赌注的政策尤其不适宜于东孟

加拉的发展,其完全丧失了与西巴基斯坦缩小差距的机会,阻碍了当地产业阶层的发展,并使数千万人生活在贫困中。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撼动整个孟加拉三角洲的政治危机就是对这一政策失败的反应。在孟加拉国解放战争前夕,两位经济学家在概括巴基斯坦的发展表现时指出,国内的政策制定者确实应当受到指责,而“外国捐助者应为其后几年巴基斯坦争斗冲突的结果承担相当大的责任”。[16]

152

第十五章　新精英分子与文化更新

巴基斯坦时代不仅是一个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时期;同时也是文化转变的关键时期。1947 年之后,孟加拉三角洲的居民有许多反思要做。现在,古老的孟加拉文化中心加尔各答已经成为难以接近的城市,许多印度教专家也去了印度,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孟加拉人意味着什么?这种反思在一个开始在三角洲较大城镇和城市崭露头角的新专业人士团体中尤为强烈。他们不像其前辈那样大多数是老地主阶级或伯德鲁洛克,这些新来者有着低层或中层背景,往往来自乡村和三角洲小镇。由于新的教育和工作机会以及完全接受孟加拉语教育,这些省(乡村)精英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形式。其明显不同于以加尔各答为基础的城市专业人士的方式,也不同于地主阶层的普遍文化,更不用说西巴基斯坦新领袖的了。使这些新精英不同的是他们并不使用双语(孟加拉语—英语或孟加拉语—乌尔都语),他们的参照系是孟加拉三角洲,而非整个次大陆或巴基斯坦整体。他们的新文化风格是由过去旧式精英团体所看轻的、非常行省化的穆斯林意识所塑造的。它是大众的而非贵族的,开放的而非保守的,集中于三角洲而非全国的。更为重要的是,其用孟加拉语来表达。

达卡和东巴基斯坦其他迅速发展的城市成为这一文化更新的中心。新精英最为有力的活动集中在学生组织上,语言运动为其提供了

一个广泛流行的契机。鲁纳克·贾汗(Rounaq Jahan)曾经注意到，“1952年的语言运动创造的神话、象征和口号巩固了这些地方精英”。[1]其中许多神话、象征和口号都与今天的孟加拉国密切相关。

153

语言运动不仅反对西巴基斯坦统治者的文化优势，也反对从加尔各答和西孟加拉其他地区来的上层穆斯林移民的文化优势。因为受的是英语教育，这些新来者与来自北印度的穆哈吉尔以及以前居住在老达卡纳瓦布宫廷附近的旧贵族(讲乌尔都语的)家庭有着许多相似的特点。这些团体组成了政治联盟，主要是在穆斯林联盟内部，并把自己想象为东巴基斯坦的领导者。然而，1954年的选举打破了他们的权力，东巴基斯坦的大众文化在其定位上显示出了明显的东孟加拉特色。

20世纪下半叶见证了这一逐渐忽略那些以加尔各答为中心和受西巴基斯坦控制的文化模式的新区域文化的出现，并且其变得越发自信。这种自信在很多方面得以表现，比如流行周刊《女士》(*Begom*)，其为妇女作家提供了一个论坛(插图15.1)，以及文化组织查哈亚诺特(Chhayanot，一种音乐风格)，他们从1963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露天音乐会庆祝孟加拉新年并将这一传统延续至今。孟加拉新年(4月15日，*pahelā baiśākh*)一直很重要——比如，这是应该还债的时候——但此时成为具有深刻政治意味的公共传统。

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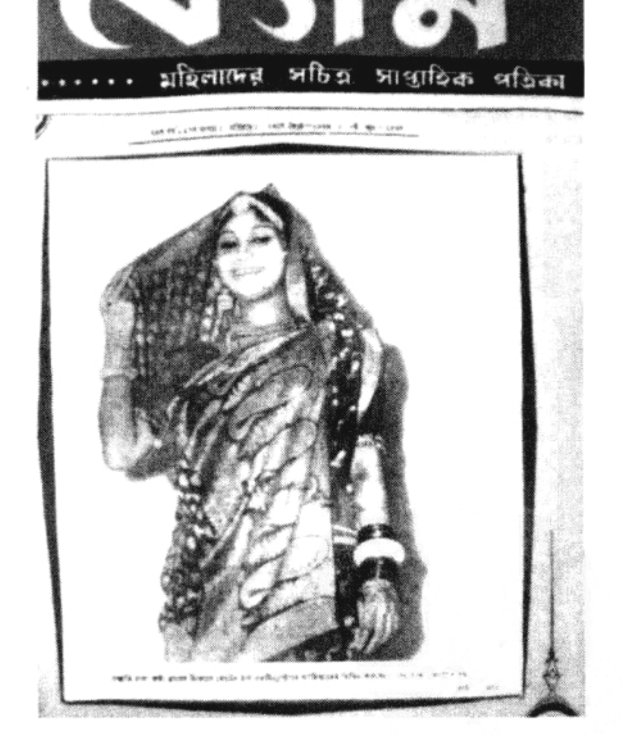


插图15.1　《女士》周刊封面，1969年。承蒙 Archives of Bangladesh History, Rajshahi 提供。

这种新的自信也在其他一些至今仍在活跃的机构里有所

表现,比如布尔布尔艺术学会(Bulbul Academy for Fine Arts,其培养舞蹈家、歌唱家和音乐家)和孟加拉学会(Bangla Academy,其推动孟加拉语言和文学),这两个学会都在 1955 年建立。另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是艺术与工艺学院[College of Arts and Crafts,现在叫美术学院(Fine Arts Institute)],其培养画家和雕塑家(插图 15.2),同时也因其建筑而知名——由穆扎鲁尔·伊斯拉姆(Muzharul Islam)设计,于 1953 至 1955 年建造,被视为第一次体现了一个新的建筑学派,即"孟加拉现代主义派"。



插图 15.2 哈米杜·拉赫曼(Hamidur Rahman),1948 至 1950 年为艺术与工艺学院学生,后来成为很有影响的画家和美术老师。这幅画题为《思想者》(1960 年)。[2]* 承蒙 Rajshahi University Library 提供。

* 原文此处及其后几处注释的序号标错,译文中均改为正确的序号。——译者注

155　现代主义与另一个主题相连：对孟加拉丰富民间传统的重新评估。比如，电影制片人认识到，商业成功依赖于抓住那些已经习惯乡村戏剧(*jātrā*)的乡村观众的想象。展现这一风格艺术习俗的第一部电影是《鲁浦般》(*Rupbān*，1965)，这部电影取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功，并使达卡的电影产业从那一年的仅有5部上升到1970年的39部。[3]乡村题材在剧院中也非常突出，比如《事情》(*The Thing*)便以孟加拉湾一处受风暴袭击的岛屿为背景(插图15.3)。



插图15.3　1962年达卡戏剧表演。艺术委员会戏剧组正在演出阿布·赛义德(Abu Sayeed)的《事情》。在孟加拉国1971年赢得独立之后，(东巴基斯坦)艺术委员会成为孟加拉国施尔波库拉学会(Bangladesh Shilpokola Academy)，即国家美术与表演艺术学会(National Academy of Fine and Performing Arts)。出自*Pakistan Quarterly*(1962)。承蒙Rajshahi University Library提供。

在巴基斯坦时期，广播开始推进到乡村地区。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只有不到1%的村庄通电，而且收音机是奢侈品。[4]政府很快意识到了这一新媒体——在娱乐、教育和宣传方面——在这个文盲占多数的社会中的力量。20世纪60年代中期，政府向整个三角洲的社区中心捐赠了晶体管收音机。[5]广播在塑造一种多元统一的意识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因为人们体验到了东巴基斯坦其他地区的方言和文化表达。156 民族音乐尤其受到听众们的欢迎。区域风格的音乐受到了跨区域的欣赏，比如北方热切的爱情歌曲——宝雅雅(bhaoaya)，特别因为阿巴斯乌丁·艾哈迈德(Abbasuddin Ahmed)而流行——以及来自西部和南部令人难忘的船歌——芭提阿里(bhatiali)(插图 15.4)。在更为现代的歌曲中，卡兹·纳兹鲁尔·伊斯拉姆(Kazi Nazrul Islam)和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作品在精英阶层中备受推崇，电影歌曲也在年轻人中十分流行。



插图 15.4　民族音乐在巴基斯坦广播电台现场直播，达卡，1961 年。这组正在表演一种哀歌(*jārigān*)。领唱者是博里萨尔的阿卜杜勒·甘尼·巴亚提(Abdul Gani Bayati)，他刚刚因为杰出的表演而获得了总督金质奖章。出自 *Contemporary Arts of Pakistan*，2：1 (1961)。承蒙 Rajshahi University Library 提供。

整个巴基斯坦时期，正规教育仍仅为少数人所享有。1961 年的人口普查表明，东巴基斯坦有 82%的人是文盲(这表明其在日常生活中连一个简短的声明都读不懂)。殖民地政策曾聚焦于高等教育，初级和

中级教育主要依靠私人办学。结果是,初级教育发展相当惨淡,尤其是在乡村地区,那里4/5的村庄没有小学,教师们的培训和待遇也很差。辍学率相当之高:有一半上学的孩子在五年级之前就退学了,只有1/5的孩子上到中学。伊斯兰学校(*mādrāsā*)的一个平行系统教授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学问。英国的离开并没有造成迅速的政策变化。尽管民众强烈要求,东巴基斯坦政府却漠视大众教育。虽然其引进了一套替代殖民地时期教学内容的课程体系,却在初级、中级或成人教育上着力甚少。到巴基斯坦时代末期,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157

然而,对于那些居住在城市以及能够负担(主要是私人学校)高昂学费的人们来说,有用英语、乌尔都语和孟加拉语授课的较好的初级和中级教育可供选择。高等教育体系比基础水平教育的发展更为迅速。[6] 学院的数量稳步增加,除了殖民地时代的达卡大学之外又新增了四所大学:拉杰沙希大学(1954)、迈门辛农业大学(1961)、吉大港大学(1961)以及达卡工程技术大学(1962)。

高等教育体系的扩张产生了比劳动力市场容纳量更多的毕业生。这导致了广泛的失业现象以及新出现的年轻一代精英们的沮丧情绪。大学成为文化创造和政治争论的中心并不令人吃惊。对于新一代的学生激进分子而言,孟加拉自治的梦想预示着经济和文化的双重解放。

新的精英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之间找到了他们共同的声音、观点和乡村支持基础,但也并非没有内部分歧。其大多数成员来自三角洲东部和中部——像库米拉、达卡、诺阿卡利和吉大港这些有文化的穆斯林家庭高度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比北部和西部拥有更多的教育设施和更好的基础设施,并有三角洲的首府(达卡)、最大的港口(吉大港)以及最重要的工业城市(纳拉扬甘杰)。简而言之,它比三角洲北部和西部更为发达。随着达卡的迅速发展及其成为东巴基斯坦的文化和经济中心,东部中心的统治使许多北部和西部的人们开始怨恨。他们产生了一种区域性的被剥夺感,这种感觉今天仍然清晰可见。

通过呼吁分享文化标志,新兴的当地精英能够在其经济上和物理距离上疏离时,仍能与乡村民众保持联系。精英阶层与巴基斯坦国家

158 复杂的政治关系——既想参与但又保持一定距离——反映在新东孟加拉文化和巴基斯坦国家建设尝试之间的晦涩关系上。有时是敌对和反抗的;另一些时候却是串通一气和支持的。然而,在整个巴基斯坦实验中,东孟加拉文化成为西巴基斯坦人既不能渗透又不能操控的领域——它是一种能够燃起孟加拉人跨越阶级、区域与宗教界限而紧密团结的集体资源。而最重要的是,其给予了自治和最终独立的要求以凝聚力。无论何时,为解放的政治斗争逐渐消退或受到镇压时,文化斗争却不会消退,对于统治者而言更难预见。当国家想要通过基本民主体系去治理东巴基斯坦乡村分散的政治权利时,发现根本不可能赢得乡村的人心和思想。另一方面,当地的精英利用其个人与文化的联系能够就文化更新、政治自治和社会发展的前景更为有效地动员乡村人口。

这就是 1970 年第一次普选出现极端结果的原因。阿瓦米联盟,当时主要代表着当地精英的雄心抱负,以其“金色的孟加拉”(*sōnār bāṃlā*)的座右铭吸引了渴望孟加拉三角洲更新、自治与发展的目光。这一座右铭选得非常聪明,因为这是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 1906 年所作的一首歌的名字,而巴基斯坦政府曾经禁播过这首歌。它不仅唤起了人们对赋予生命与深深爱恋的祖国的感情,同时也描绘了一个充满反抗精神的孟加拉:“我金色的孟加拉,我爱你——永远爱你的天空,你的空气进入我的心里发出曲调,仿佛它是一把长笛。”这首歌在民族主义者集会上演奏,其对孟加拉三角洲光辉的未来的预示,在统一的巴基斯坦艰难岁月的最后时期,燃起了数百万人的期待。

第四卷

战争与孟加拉国的诞生



第四卷　描绘1971年自由战士的街头壁画。这一街头壁画在达卡的拉姆纳(Ramna),名为《从1952年到1971年》(*From 1952 to 1971*),由S. R. Shamim于1998年创作。

第十六章　武装冲突

161

1971年的解放战争是三角洲在20世纪的第三次重大动荡。在1943至1944年大饥荒和1947年分治之后，武装冲突正席卷整个三角洲。讲述战争的故事并不容易，因为许多事情在同一时间发生——而且许多事情至今仍存在激烈的争议。关于1971年3月到12月发生的事情有大量的文献记载，从新闻报道和宣传到牺牲者的日记、军事和政治回忆录、学术著作、创造性的写作和电影以及调查委员会报告等。这些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多层次的故事。主线是巴基斯坦武装力量和东孟加拉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武装冲突。但与解放战争的编年史相交织的还有许多其他的主题：特殊的受害群体(妇女、印度教徒和少数民族)；当地仇杀与个人恩怨的解决；不同类型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暴力与破坏下的区域变动和人口迁移；以及数千个个人勇气和牺牲的故事。同样重要的事实是，战争是两个更大的地缘政治游戏的一部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竞争，以及冷战超级大国之间的争斗。正是这些使这一冲突在整个1971年登上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将“孟加拉国”变成了一个全球家喻户晓的名字。从那时起，孟加拉三角洲就吸引了前所未有的众多国际关注。

巴基斯坦的"最终解决方案"

162

1971年3月25日对三角洲而言是一个命中注定的日子。当巴基斯坦独裁者秘密乘坐最后一班飞机离开达卡时,他对整装待发的军队下令,向东巴基斯坦人民发动攻击。这是为根除孟加拉民族主义和重申西巴基斯坦对东巴基斯坦统治权的惩罚性措施。叶海亚·汗次日从西巴基斯坦的广播中说:"确保一个完整、牢固和安全的巴基斯坦是巴基斯坦武装力量的责任。我已经下令让他们去履行责任,并恢复政府的权威……我呼吁我的国民充分意识到这一局势的严重性,应将所有的指责都指向那些巴基斯坦反对者和分裂主义者。"[1]军事攻击[代号为探照灯行动(Operation Searchlight)]由提卡·汗(Tikka Khan)将军领导,其后他迅速以"孟加拉屠夫"而知名。

在那些军事统帅视为孟加拉反抗的中心地区,攻击相当残暴。坦克、装甲运兵车和部队以扇形分布摧毁了达卡两个能够真正进行武装反抗的孟加拉组织:警察和东巴基斯坦准军事步枪队。激烈的战斗之后形成了压倒性的局势。其次,军队针对贫民区发动进攻,他们用火焰喷射器纵火并击毙逃离的居民。[2]第三个目标是达卡大学,它在先前几周的非暴力反抗期间就关闭了,因此很幸运地,许多学生都回家了。部队蹂躏了整个校园,用迫击炮轰击学生宿舍并屠杀学生和教员。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军队拆除了匆忙垒砌的路障,前往攻击东孟加拉民族主义精神源泉的两大标志。第一个是绍黑德塔(语言运动烈士纪念碑),其被推倒在地。第二个是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与其他多数阿瓦米联盟的领导人不同,穆吉布并未选择躲藏。军队因为害怕把他变成一位烈士而没有杀害他。相反,将他软禁在家中,并想将他带到西巴基斯坦。他现在因为发动人民反抗运动被控犯有叛国罪。

在军事恐怖的最初几个小时里,全达卡的居民被从家里揪出来,并"被派遣到孟加拉国"(dispatched to Bangladesh)——这是军队对立即处决的委婉说法。还有口头,其后是书面的命令,要求射杀印度教公

民。[3]达卡的旧工匠聚居区山卡理伯蒂(Shankharipotti,海螺壳制造者聚居区)受到了攻击,印度教居民被杀害。许多著名的印度教徒被搜捕出来后遭处死。在经历了一夜极端的国家暴力之后,破晓之时,达卡如同一座鬼城一般。

在东巴基斯坦其他地区,军队的攻击也是同样过激且带有报复性。根据一份战后巴基斯坦政府委员会的报告,在 3 月 27 至 28 日的库米拉兵营屠杀中,“17 名孟加拉官员和 915 名士兵在一个指挥官手指轻弹之下就被杀死”。[4]但军队并非在所有地方都成功地建立了控制。在吉大港,东孟加拉军团(East Bengal Regiment)的孟加拉部队听到达卡的事件之后便杀死了他们的巴基斯坦长官,离开了城镇并坚持抵抗。3 月 26 至 27 日,前政府官员齐亚乌尔·拉赫曼(Ziaur Rahman)在一个小广播站中发表广播呼吁“孟加拉国的人民”一起反抗军队的进攻。这个广播站的收听范围十分有限,并在随后的空袭中彻底沉默了。结果,全世界最初对东巴基斯坦的事情毫无觉察,而这份广播稿后来成为独立宣言。军队占领了广播站和电话局,摧毁了《伊特法齐》和其他报纸的办公室,并将外国通讯记者限制在达卡唯一的豪华酒店中。虽然这些记者能看到在他们周围处处燃烧着的城市,却无法与外部世界联系。

163

尽管军队的进攻非常突然且猛烈,整个孟加拉三角洲到处都是民众的抵抗。这些抵抗在一些地区迅速被镇压下去了,而在另一些地区——如库什蒂亚、杰索尔、锡尔赫特和北部地区——则持续了数周。一直到 5 月底,巴基斯坦军队才自信控制了大多数的城镇。[5]

军事行动开始时,出现了大批惊慌失措的难民逃亡。数千人从军队最为活跃的城市和城镇逃离,到他们乡村的亲戚那里渡过难关。但军队同时也袭击乡村。一位目击者说:

> 在军队镇压之后的最初几天里,这一地区处于自由战士的控制之下。其后巴基斯坦空军开始了空袭。我[从婆罗门巴里亚

> (Brahmanbaria)东部城镇]和全家逃到乡村去。那是一段非常悲惨的经历。我们不能在任何一个村庄待上一段时间……巴基斯坦军队一个接着一个地烧毁村庄……我们在一个村子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听说军队已经朝这个村子进发。我们又再次和那所房子的主人一起逃走。几天后当我们回来时,发现整个村子都被烧成了灰烬。许多没能逃出来的人都被杀害了。家畜的尸体到处都是。那股恶臭让人无法忍受。那就是地狱啊![6]

164

其他一些人感到如此不安以至跨越边境去了印度。印度当局报道,到 1971 年 5 月有超过 150 万难民进入印度,并且每天都新增 6 万人。到战争结束之前,更多的人逃离到了印度——虽然难民的总数难以证实,但通常引用的数字是 1 000 万人。

孟加拉人的回应

战争的第一阶段到 5 月告一段落。军队在战栗的三角洲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表面上的控制,而反抗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同时,阿瓦米联盟的领导层在印度重新集结,他们在那里组成了一个流亡政府。在印度的支持下,他们在 1971 年 4 月 17 日正式宣布孟加拉国为一个独立国家。以下是其声明的节选:

> 有鉴于自由的选举曾在孟加拉国举行……以及……
>
> 有鉴于在这次选举中孟加拉人民将 169 个席位中的 167 个投给了阿瓦米联盟,以及……
>
> 有鉴于巴基斯坦当局不仅不兑现承诺,且在与孟加拉人民的代表协商的过程中,发动了一场不公正和背叛的战争,以及……
>
> 有鉴于在这场无情与野蛮的战争中,巴基斯坦当局对孟加拉平民和手无寸铁的百姓所实施的,且仍在继续实施的难以计数的种族灭绝行为和史无前例的折磨行为……
>
> 我们,这些孟加拉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为了保障孟加拉

国人民的平等、人类尊严和社会正义，宣布并建立孟加拉国为享有主权的人民共和国。

宣言发布的地方就在孟加拉国境内梅赫尔布尔(Meherpur)附近的一个芒果园里，其被更名为穆吉布纳加[Mujibnagar，即穆吉布镇(Mujib Town)]。[7]这则消息经由一个新建立的地下广播站——独立孟加拉语广播电台(Independent Bangla Radio)传遍了整个三角洲。

最初对军队暴行的反抗都是缺乏合作和自发的，但逐渐发展出了一个更为有组织的计划。整个孟加拉三角洲的青年男女都秘密地加入了这个名为自由战士(Freedom Fighters)或莫克提-巴希尼(Mukti Bahini)的组织。从一开始的时候，自由战士们就接受印度的支持和培训，他们的大部分营地就在印度的边境上。孟加拉许多人苦苦求生存的环境突然变成了沸腾着暴力的大锅。即使如此，他们还是经常通过给战士们提供庇护、提供食物和引路来帮助游击队。三角洲最为著名的文人为他们创造了许多爱国诗歌和歌曲(参见“无暇盘起你的秀发”)。

无暇盘起你的秀发

苏菲亚·卡玛尔(Sufia Kamal，1911 — 1999)东巴基斯坦重要文学人物之一。她是一位诗人、杂志编辑和文化活动家，在妇女组织和反对压制孟加拉语言和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杰出。在 1971 年战争期间，她一直待在乡间坚持写日记并支持自由战士。在这首战争诗歌中，她鼓舞妇女积极投身于斗争。

无暇盘起你的秀发[8]

现在已无暇将你的秀发盘起，
或关注你莎丽(*sari*)迷人的花边，
或你额心的那一提普(*tip*)、你的眼膏或唇红。

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因为生命的战斗已经开始！

再也没有青春少女或年轻寡妇的笑声了。
她们的口唇坚定地撅起。
现在不得安宁的，就像一把剑的锋刃的
曾经温柔的眼睛，现在锐利而凸起。
她们的眼神再也不像受惊的母鹿。
她们在搜寻，如同猎鹰。
她们苦涩的心变得冰冷、凶猛和坚硬，
去向那些残忍的劫掠者复仇。

女人丢掉了她们的腼腆而优雅的风度，
为她们所失去的最亲爱的人报仇。
在她们纤细的身体和心中聚集着
狮子般的勇气。
她们有无尽的力量——这些英勇的女人。

不再仅仅有爱的歌——相反，
她们唱着："胜利属于我的祖国，
我的人民，英勇的战士们！"
将安朝（*onchol*）浸入
洒满街道的烈士鲜血中，她们以鲜血
向大地母亲偿付了亏欠。

莎丽（*sari*）：妇女服装。
提普（*tip*）：点在前额上的色点。
安朝（onchol）：莎丽的松散底部。

随着孟加拉人的反击初具规模，季风又来到了，三角洲被泥巴和水所覆盖。这使常规战争变得困难，而有利于游击队的策略。在 1971 年

中间的几个月里,巴基斯坦军队和自由战士团体在整个三角洲进行着致命的猫鼠游戏(插图16.1)。更多的人变得无家可归——根据一些估算,战争期间国内约有2 000万无家可归者——且对大饥荒的恐慌情绪也在蔓延。



插图16.1　自由战士,1971年。[9]

自由战士团体分别在11个按区域划分的"防区"运作,由莫克提-巴希尼领导,总部设在加尔各答。新的孟加拉武装力量总司令是奥斯马尼(Osmany)将军。军队中一些人曾在巴基斯坦军队中服役,但是大多数都是武装战斗的新手,需要地方性的训练。还有许多地方性的自由战士团体加入了同巴基斯坦军队的战斗。这些团体处于莫克提-巴希尼的组织之外,但经常与其进行合作,其中包括塔盖尔的卡德尔-巴希尼(Kader Bahini)、迈门辛的阿发撒-巴希尼(Afsar Bahini)以及博里萨尔的西拉杰·锡克达尔(Siraj Sikdar)的团体。

自由战士们在正面对抗中无法击败巴基斯坦军队,这一点很快就变得明显起来。然而,因为他们分布在整个三角洲,"代表着无处不在

167

的威胁,不断地以伏击、偷袭、破坏和宣传牵制他们的对手;他们的活动使巴基斯坦军队疲惫不堪并造成了一种持续的不稳定和危险的使人神经衰弱的感觉”。[10]到 1971 年 11 月,众多自由战士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 10 万人,其中一半在孟加拉/东巴基斯坦,并在边境上建立了十多个自由区域。其中最大的在吉大港山区、迪纳杰布尔-朗布尔地区和锡尔赫特。

巴基斯坦军队通过创立民间团体(和平委员会)和后来巴基斯坦人控制下的准军事团体——拉扎卡(Razakar)、阿尔-沙姆斯(Al-Shams)、阿尔-巴德尔(Al-Badr)——来对抗自由战士。这些团体提供了象征意义的支持(插图 16.2)并且扮演了敢死队和镇压叛乱的智囊的角色。



插图 16.2 战争中期,巴基斯坦的支持者在锡尔赫特举行游行纪念第 24 个巴基斯坦独立日——1971 年 8 月 14 日。他们举着以花环装饰的 M. A. 真纳的肖像和一面巴基斯坦国旗。Mohammad Shafee 摄。承蒙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提供。

国际干涉

168

巴基斯坦的统治者曾经计划迅速摧毁东巴基斯坦孟加拉人的政治雄心，其后同样迅速地恢复常态。整个 1971 年，被钳制的媒体一直坚持着这一小小的国内故障很快就会得到修护的神话（插图 16.3）。



SUNDAY PAKISTAN OBSERVER

ARMY CLOSING IN ON MISCHIEF-MAKERS

Organised resistance liquidated : Governor

President in Lahore

3 MPAs of defunct AL condemn India

Curfew further relaxed by two hours

10 killed in Dum Dum jail break rioting

Girls' schools, madrassas in city reopen

Development schemes of Rs 500 cr. during 70-71 likely

$ 307m Chinese assistance

Statement by ICFTU Secy General

插图 16.3 战争宣传。一份军队控制的报纸（*Sunday Pakistan Observer*）在 1971 年 5 月 16 日报道三角洲的生活已经恢复正常。承蒙 Rajshahi University Library 提供。

然而，事实上，巴基斯坦统治者很快就失算了。他们在游击战争中陷入了困境，引起了国际关注，并且完全不能使世界相信，这仅仅是其内政。数百万难民冲过边境涌入印度，带来了残忍暴行的故事；国际媒体开始谈及种族灭绝；[11] 全世界支持孟加拉的组织迅速增长；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孟加拉职员潜逃或被解雇。[12] 国际关注随着"孟加拉国音乐会"（Concert for Bangladesh）而达到高潮。这是一个为孟加拉国儿童进行大众募捐的演出，1971 年 8 月在纽约举行，有众多像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nson）、鲍勃·迪伦（Bob Dylan）和拉维·桑卡

尔(Ravi Shankar)等名人出席。那时候,国际舆论强烈指责巴基斯坦统治阶层。

169 然而,政治上的反应更为复杂。在区域层面上,事情是相当直接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分享着"误解的遗产",对彼此的动机和行为通常进行负面的理解。[13]结果是,这两个国家发现他们在任何南亚事务上都相互反对,在1971年的事情上也不例外。一边是印度,他们将自己表现为孟加拉国自决权力的拥护者,通过外交、军事训练、热情招待、照顾难民、宣传以及给自由战士跨边境突袭提供炮火掩护来对其进行支持。另一边则是巴基斯坦,坚持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一个统一的穆斯林祖国,并严厉谴责印度对其内政的难以容忍的干涉。两个国家间战争的威胁再一次逼近(在1948年和1965年的战争之后),双方都在准备一决胜负并坚信自己会获胜。

南亚的区域事态也卷入了全球政治博弈中。孟加拉国解放战争在冷战中期爆发,这就意味着世界超级大国也被卷了进来。其阵营如下:苏联站在印度背后并支持孟加拉国解放运动,而美国则与巴基斯坦结盟。巴基斯坦同时也得到了许多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支持。这一划分意味着此次冲突无法通过外交方式来解决——在联合国的讨论停滞了,双边磋商也没有产生立场变化。而另一方面,当战争在整个1971年被拖延时,印度和苏联联系越发紧密并加强了他们对孟加拉国一方的支持。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在几十年的外交冰冻期之后再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巴基斯坦作为他们数次会晤的中间人极具价值。在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战争不能破坏这些更为重要的工作。[14]正像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1971年5月2日给其下属的著名便笺中所说的:"致全体人员。这时不要对叶海亚施加压力。RN。"[15]

10月,雨季结束之后,巴基斯坦军队显然无法再度对三角洲地区进行控制了,但是自由战士们也无法赢得军事上的胜利。印度——其现在不再将三角洲称为"东巴基斯坦"而称为"东孟加拉"——开始缓慢推进全面的军事入侵。其在国际宣传活动上加快

了脚步,并在 11 月任命了一位印度将军作为自由战士和印度军队的联军司令。也是在 11 月,其军事行动扩展到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境内,但出于对地缘政治后果的担忧没有宣战。机会在 1971 年 12 月 3 日出现了,当巴基斯坦空军从西巴基斯坦起飞执行空袭任务时,轰炸了印度西北部的一些机场。印度迅速投入行动,(第三次)印巴战争开始了(插图 16.4)。 170



插图 16.4 1971 年 12 月,印度装甲车在前往库尔纳的路上。出自 *Bangla Name Desh*, 104。

印度武装力量有自由战士陪伴作战,占尽了优势。他们从各个方向向三角洲进军,拥有比巴基斯坦军队更好的武器装备,并享有制空权和制海权,还被视为解放者受到大多数当地民众的欢迎。然而,入侵也无法轻易取胜:巴基斯坦人进行了猛烈的抵抗并造成了相当大的伤亡。战争的最后几天里发生了对重要的孟加拉知识分子的屠杀。亲巴基斯坦的阿尔-巴德尔自卫队围捕在达卡的作家、教授、艺术家、医生和其他专家,将他们蒙上眼睛后进行屠杀。几天后的 12 月 16 日,巴基斯坦行政体系崩溃了,军队也被迫投降。[16]战争结束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诞生了(插图 16.5)。

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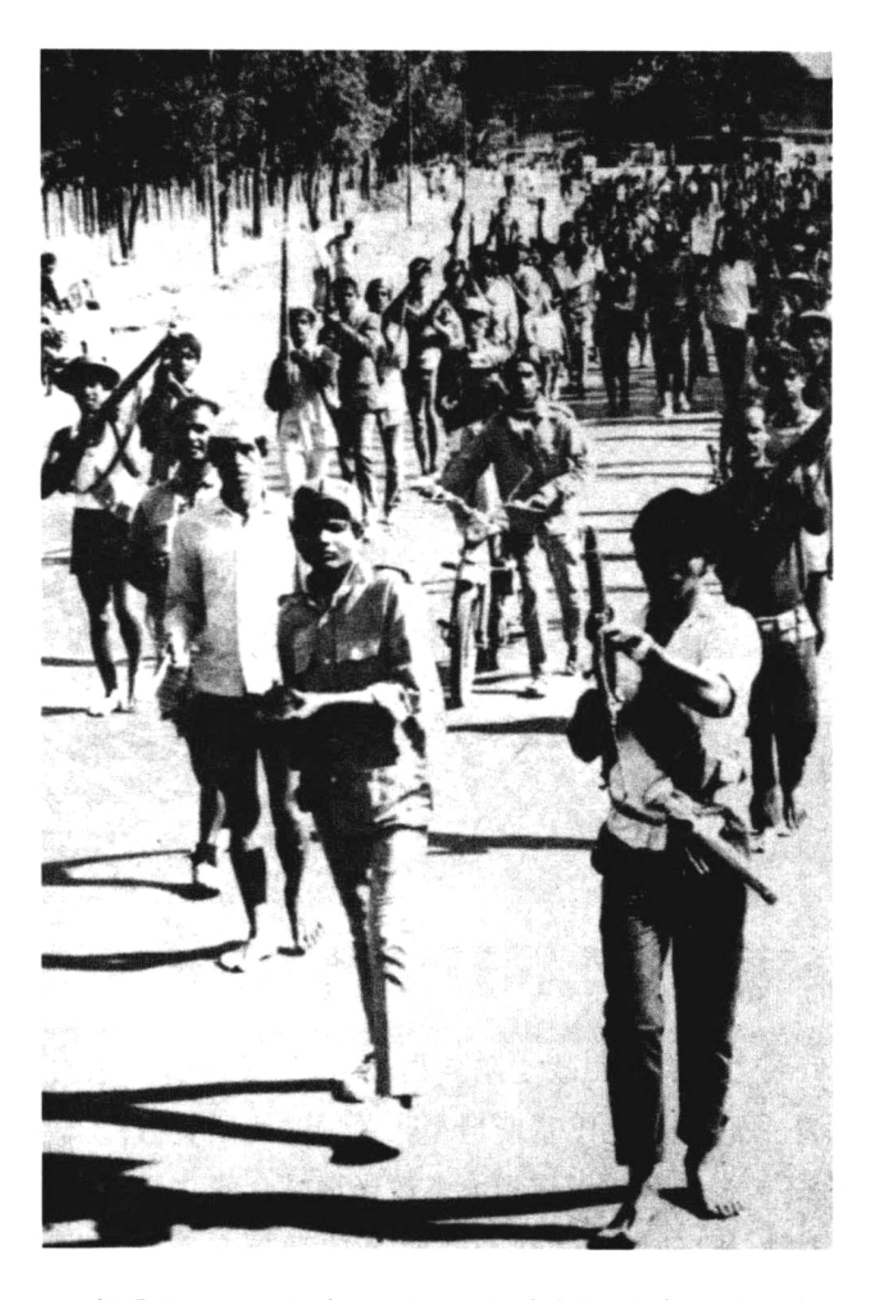


插图 16.5　1971 年 12 月 17 日，莫克提-巴希尼（自由战士）向达卡行进。出自 Bari, *Muktijuddher Roktim Smriti*, 186。

第十七章　一个国家的诞生

172

1971 年 12 月 16 日是情感迸发的重要一刻。巴基斯坦投降的那一天成为孟加拉国的胜利日(*bijay dibas*)。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成为现实,三角洲被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所笼罩。现在,“金色的孟加拉”——那期许的欢乐之地——终于触手可及了。印度方面迅速设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俘虏巴基斯坦士兵并试图恢复秩序。这也是一段骚乱与困难的时期。整个三角洲的人们都在疯狂地复仇;数百万民众回到了他们多数被夷为平地和洗劫一空的家园。这个年轻的国家面临着三个最急切的问题:如何处理通敌者,如何恢复战争受害者的正常生活,以及如何修复战争所带来的破坏。

处理内部敌人

如何处理那些曾站在巴基斯坦一边并仍旧留在三角洲的人们呢?一个约由 9 万名巴基斯坦战犯和平民战俘组成的群体被带到了印度。他们在回到巴基斯坦之前将在印度营房里待上数年。[1]

第二个由通敌者所组成的群体仍旧留在孟加拉国:他们是准军事群体的成员、敢死队员、市民委员会、抢掠者和告密者。1972 年 1 月,政府决定将他们送上通敌者法庭并以战争罪对其起诉。然而这最终并没有发生,因为孟加拉国政府在 1973 年宣布了大赦——作为对巴基斯

坦外交承认孟加拉国及遣返几十万被关押在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的回应。然而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要求正义的呼声再次响起。[2]

第三个更庞大的群体是那些在 1947 年之后移民到三角洲的非孟加拉穆斯林，他们曾被视为穆哈吉尔而受到欢迎。这群人有强烈的巴基斯坦理念，当巴基斯坦当局与孟加拉民族主义者发生冲突时，他们中大多数——并非全部——都站在巴基斯坦一边也并不奇怪。孟加拉人叫他们"比哈尔人"，即使他们并非都来自比哈尔。在解放战争之前，民族主义暴徒就杀戮比哈尔人，在战争期间许多比哈尔人帮助巴基斯坦军队，而现在战争结束了，比哈尔人又集体被刻上了巴基斯坦通敌者的标记。其后发生了许多复仇行动，导致了数千名非孟加拉人死亡的种族屠杀，并迫使超过 100 万人背井离乡，在全国各地那些拥挤不堪的类似贫民窟的地方寻找避难所。[3]他们将自己描述为滞留的巴基斯坦人，并要求把他们"遣返"回巴基斯坦。虽然一些人想办法进入了巴基斯坦，但"比哈尔问题"从未彻底解决。今天，大多数在孟加拉滞留的巴基斯坦人仍旧受到排斥且没有公民权，生活在贫穷、孤立与动荡之中。[4]

173

战争受害者

在孟加拉解放战争中的遇难者人数至今仍是未知数。国内无家可归者和流亡印度的难民累计有几百万。对于战争死难人数的统计相差巨大，孟加拉国官方数字为 300 万人，而巴基斯坦官方数字则为 2.6 万。一份综合多种推测得到的数据认为约有 170 万人丧生。[5]然而，由于战后缺乏任何可信的评估，其真实的数字，即使只是粗略的，恐怕也永远无法确定(插图 17.1)。

除了这些死去的人之外，还有许多人在战争中致残或心理受创。[6]其中一个重要的群体是遭巴基斯坦人、比哈尔人和孟加拉人所强暴的妇女。这些妇女——国家尊称他们为"勇敢的女英雄"(*bīrāngana*)——在战后的孟加拉国遭到了极大的歧视，她们的孩子也是如此。[7]起初，政府曾努力使战争受害者重获其社会立足点，但不久就

留由他们自己解决了。



插图 17.1　战后的孟加拉国布满了众多的纪念物，从国家纪念碑到私人墓碑——就如同这个在名为波拉哈特(Bholahat)的西部村庄的墓碑一样。其标明了自由战士莫哈迈德·卡玛鲁丁(Mohammad Kamaluddin)之死，他在 1971 年 10 月 6 日死于巴基斯坦人的枪下。

战争破坏

战争所造成的物质破坏是非常巨大的。数百条公路和铁路桥被摧毁，六座机场无法运行，吉大港——最大的港口——到处是地雷和车船残骸，电讯网络也停止了运转。无数的学校、卫生所和房屋被摧毁。农业生产也遭受重创，数百万人不能去耕种他们热爱着并想获得好收成的土地。公牛已经被屠宰，没有了储备种子，并且灌溉水泵和工具也遭到了破坏。渔民不得不去寻找新的船和渔网。一种估计认为，总共的损失占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 40%以上。[8]这些悲惨的战争遗留问题被独立的极度兴奋所抵消了。数千万无名孟加拉人努力挣扎求生，恢复他们的工作生活，使三角洲的经济得以恢复，并避免了曾在战争期间深深担忧的饥荒。他们得到了许多国际援助与重建的帮助，其中部分是由联合国来协调的。

174

一个稳健的政府

谁来执掌新建立的孟加拉国呢？担忧之一是关于自由战士中的激175 进化，这曾促使印度入侵三角洲，并建立了一个新政府。印度领土包围着孟加拉国也是政治上的不稳定所在：西孟加拉的毛主义革命者，亦即纳萨尔派(Naxalites)，非常积极地进行活动，印度东北部众多寻求自治的团体也同样活跃。在战争期间，许多自由战士就开始想象，一个自由的孟加拉国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且应该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一预期在两个方面造成了印度政策制定者的担忧。第一，其可能为纳萨尔派和其他左翼反叛者提供战略上的跨边境联系；第二，孟加拉国实行土地国有化会导致大量被剥夺了财产的地主流亡到印度。在印度的计划表中，确保孟加拉国具有不甚激进的政府政策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它直截了当地支持战时在印度成立了孟加拉国流亡政府的阿瓦米联盟。然而，许多自由战士不接受这个政府。这些战士真实地投入了战斗，他们认为这些流亡的领导人“在加尔各答过着奢侈的生活却什么也没做”，脱离了孟加拉的现实。[9]

1972 年 1 月，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他在 1971 年 12 月曾在巴基斯坦被判处死刑)被从巴基斯坦的拘禁中释放了。[10] 他回到了孟加拉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执掌领导大权并公布议会政体。然而，1968 至 1969 年起义期间，左翼就开始在阿瓦米联盟内部和外部积蓄力量。1970 年阿瓦米联盟的政府选举宣言涉及国有化、土地改革和废除地税。现在，在战争结束之后，阿瓦米联盟的领导阶层承受着激进、武装的自由战士的巨大压力，他们要求一个革命性的变革。穆吉布——现在被称为“国家之父”(*jātir janak*)——不理会以各党派(除亲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右翼之外，他们被禁止活动)代表组成“国家政府”的呼吁。相反，他依靠“他的传奇……他克里斯玛式的呼吁和他对孟加拉人催眠式的控制”，组成了一个阿瓦米联盟政府。[11] 到 3 月份，印度感到新政府已经能够充分掌控社会行政而使其具备了撤出的可能性。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插图 17.2)。紧接

着,政府就对银行、保险公司、船运公司和纺织、黄麻、蔗糖厂进行了国有化。然而其并未触动土地所有权,只是规定土地占有量以 13.5 公顷(100 *bighā*)为上限,且占有土地量在 3.4 公顷(25 *bighā*)以下可以免税。那年晚些时候,孟加拉国宣布自己为一个议会制度的“人民共和国”。其宪法声称这个共和国基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和世俗主义”的原则。[12]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歌曲《我金色的孟加拉》(My Golden Bangla)成为国歌。 176



পূর্বদেশ

উঠেছে নবীন সূর্য গগনে

বাংলাদেশে ইন্দিরার অভূতপূর্ব অভ্যর্থনা : সোহরাওয়ার্দী উদ্যানে ঐতিহাসিক সমাবেশ

চক্রান্তকারীরা হুঁশিয়ার প্রয়োজনে আরো রক্ত দেব : মুজিব

মৈত্রী সম্পর্ক আরও জোরদার হবে : ইন্দিরা

插图 17.2 “一个新太阳升上了天空”:英迪拉·甘地访问独立的孟加拉国。出自 *Purbodesh*(18 March 1972)。承蒙 Rajshahi University Library 提供。

政党和国家

战后的国家机构很不稳固且非常混乱。许多官僚和军队的高级位

置出现了空缺,因为他们过去都是从西巴基斯坦被派遣来的。这些机构以及政治党派成为那些流亡印度积极支持独立的一方和1971年战争期间在孟加拉国内历经磨难的另一方之间进行内部争斗的政治舞台。疲弱的新国家面临着大量的挑战:它要解除自由战士们的武装,建立法律和秩序,发展新型国有工业,重建基础设施以及成为国际国家体系的参与者。最为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必须实现经济发展。从巴基斯坦政治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允诺已经实现;现在就要看政府在其他方面的允诺表现得如何:将三角洲从经济剥削、贫穷和停滞中解放出来。

177

一个弱小的国家面对着这样高的大众期待时,一个克里斯玛式的领袖角色是至关重要的。穆吉布凭借他的个人威望和政治直觉接下了这一新挑战。这几乎不可能做到平衡,他作为一个反对派领袖比一个政治家有效得多——激昂的修辞比有力的管理更符合他的风格,这一点很快就显现出来。他无法将自己与追随者的关系转化为一个不依赖于他个人素质的政权结构。[13]在对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状况的可怕重演中——当时穆斯林联盟无法从一个巴基斯坦运动的发动机转化为一个进行有效统治的政党——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出现了阿瓦米联盟威望的迅速下滑。其中的原因包括盛大的个人崇拜(这使人们想起了阿尤布时期),将国家意识形态定位为"穆吉布主义"(Mujibism,*mujibbād*)的尝试,印度对孟加拉国的过大影响以及党内广泛的贪污和任人唯亲的报道等。但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政府流失民心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认为其对糟糕的经济状况负有责任。

战后许多孟加拉人都希望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但却震惊地看到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状况并未得到改善,相反却在持续下降。经济产量远远落后于战前的水平,到1973年,农业和工业产值分别下降到只有战争爆发前夕的84%和66%。工农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急剧下降。比如,一个农业劳动者的生活费用增长到了原先的150%,而其实际的收入则下滑到1970年的87%。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部分是由于缺乏经验的原因。这时许多居于国家高位的政治家和官员们,都是突然从省级政府的中层被提拔到国

家政府的最高职务上；他们需要时间去学习他们的工作。另一个原因在于，多数掌权的上层认为，只要去掉了巴基斯坦人的剥削，经济自然就会复苏，因此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政治、法律和外交事务而非经济事务上。第三，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巴基斯坦的“二十二大家族”和他们的同盟、地主以及武装力量都走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权力现在掌控在三角洲剩余农民、小企业家和工业贸易联盟手中。他们都期望通过支持阿瓦米联盟以获得更为广大的经济机遇。[14] 178

这些状况加剧了经济状况的恶化，并阻碍了新政权发展社会日常工作。更深远的问题在于，政府没有能够创建一个专业的、政治中立的、能让政策有效推行的国家官僚体系。相反，其却忙于大量的委任式政治，至今都妨碍着孟加拉国的国家机器。在独立的孟加拉国，对执政党的忠诚取代了国家利益。统治者们利用国家来促进他们党派的发展而非与此相反。

阿瓦米联盟被国内的竞争者所困扰，试图通过建立控制这个国家的官吏任免网络来确保其成员的尽忠职守。它经常不考虑他们的行政管理能力，便指定对党忠诚的人担任国家官僚体系的关键职位。这种党派政治的考量完全优先于任何一贯的经济政策，更不必说其实行了。阿瓦米联盟的理论家们无法达成正确的国家与社会主义发展政策上的一致，更为糟糕的是，尽管有着高尚的措辞并在巴基斯坦时期和解放战争期间经受了许多痛苦，阿瓦米联盟“没有向其领导和成员灌输一种为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重建而无私工作的理想主义”。[15]

阿瓦米联盟的统治很快就变成了党在国上的状况。国有化企业的管理交到了毫无经验的政治活动家手中，导致了产值的急剧下滑和管理层财产的大幅上升。相似的是，掌握在阿瓦米联盟亲信手中的进出口许可也成为非法获利的丰富资源，部分是通过向印度走私进口货物、黄麻和大米的方式。与阿瓦米联盟有关的暴徒也因其敲诈勒索行为而变得臭名昭著。阿瓦米联盟的领导人还采用了新的准军事力量——洛克依-巴希尼[Rokkhi Bahini，国民卫队（National Security Force）]，以恐吓和拷问散布恐慌。穆吉布意识到“这是其党员公开的滥用权力和 179

贪污舞弊的行为”，但其终归是对党忠诚的，便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他们。[16]

三角洲不仅承受着不当的经济政策、管理不善和劫掠所带来的痛苦，他们在经济上的不幸又因为孟加拉的新货币塔卡(taka)而加重，其印钞数量过大导致了通货膨胀和贫困。另一方面，国际援助和救援的流入掩盖了这些经济上的缺陷，直到1973年末联合国孟加拉国救济组织(UNROB)关闭。

孟加拉国第一次选举

1973年3月，孟加拉国举行了第一次普选。穆吉布仍然保持着他巨大的个人威望，但“在反对阿瓦米联盟的选民中，一种怨恨已经在积聚，并注定将反映在选举上”。[17]伊斯兰右翼政党被禁止了，因此所有的反对党派都是阿瓦米联盟的左派。其中有国家社会主义党(JSD, *Jātiya Samājtāntrik Dal*)，它是刚刚从阿瓦米联盟中分离出来的；巴沙尼毛拉的“伊斯兰社会主义者”全国阿瓦米党(NAP)；以及一系列亲苏或亲华的共产主义团体。选举被阿瓦米联盟为保证完全的胜利所采取的绑架、强迫、操纵选票和窃取选票箱等手段所玷污。当阿瓦米联盟宣布他们获得了议会97%的席位时，选举存在不法行为的三角洲传统延续到了孟加拉国时代。[18]

挫折感充满了街道和乡村小径。反对党感到他们被剥夺了议会的角色，重新回到了巴基斯坦时期相当有效的街头政治上。普遍的罢工(*hartāl*)和群众围堵挟持(*gherāo*)再度出现，而政府的回应也使人想起了往昔的巴基斯坦政府。比如，一个阿瓦米联盟的暴徒在国家社会主义党总部纵火，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报纸被政府接管，数百名党员被逮捕。

现在，一种在劫难逃的动荡又出现了。国家使用的暴力策略使公开反对的空间很小，从而迫使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潜入地下。大量的左派团体都试图完成在他们看来未完成或夭折的孟加拉革命，开始在乡村发起武装抵抗。左翼游击战士在三角洲不同地区都变得非常活跃，

在全国范围内袭击警察局并刺杀阿瓦米联盟成员，最频繁的地区是博里萨尔、库什蒂亚、拉杰沙希和达卡。[19]政府试图重新获得控制，开始着手对付这些反对者——他们被称为“恶棍”和“反社会分子”，还通过了特别权利法案（Special Power Act，1974 年 2 月）给予自己广泛的限制个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正式权力。 180

1974 年饥荒

到 1974 年，金色孟加拉的梦想已经变成了一种妄想。独立两年之后，这个国家陷入到了深深的经济、政治危机之中。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这种形势简直是无法忍受的。由于对阿瓦米联盟及其资助人印度的深深幻灭感，以及比战前严重得多的贫穷，他们不得不以反抗来求生存。1973 年 12 月的水稻产量不错，但其后的粮食价格却一直上涨，这种状况应主要归咎于有着良好政治关系的贸易商。到 1974 年 3 月，饥饿、乞讨和贫困的移民呈上升趋势。就在这种令人绝望的环境中，自然又给了他们重重的一击：夏季带来了极深、长期且具有破坏性的洪水，将更多的人逼到了绝境。到 1974 年 8 月底，整个孟加拉国呈现出一个充满混乱和民生疾苦的令人痛苦的景象……这是 1943 年的重现。大量饥饿的人群（男人、妇女和孩子）一个个骨瘦如柴，艰苦跋涉到城镇去寻找食物。他们大多数都是半裸的……我们都在绝望中亲眼见证了这些事。除了一些私人的施舍之外，匮乏的城市中心也只有极少的一点资源……在城市街道中“游荡”了几天之后，他们就倒下并死去……8 月，我在去办公室的路上平均每天都会看到 3 到 5 具无人认领的尸体，而这段路步行仅有 5 分钟而已。[20]

这一时期粮食价格仍在上涨，但是国库已经如此空虚以至于政府无法进口大米。美国曾经对孟加拉国发布过食物援助的禁令，因为其向古巴这一在美国黑名单上的国家出口黄麻。来自其他方面的救助也遭到了偷窃。在最初否认任何严重的事情正在发生之后，政府命令孟加拉国军队逮捕大米囤积者并防止大米走私到印度去。但是在军队逮捕大米囤积者时却不得不停下来，因为“他们要不就是阿瓦米联盟的成

员要不就是受其保护的……在其党内同志的压力下,穆吉布不得不给予他遭逮捕的党员以保护,即使他们非常明显地有罪”。[21]

181 这引起了民间团体的强烈反应:孟加拉人以多种方式援助饥荒受害者。全国的私人志愿组织开始提供免费的膳食和救济,而政府赞助的粥厂也紧随其后。这些努力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即使如此,1974 年饥荒导致的死亡人数被认为可能接近 150 万。[22]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同 1971 年战争一样令人惊愕不已的灾难。

到这一年底,孟加拉政府暴露出了他们的不称职、冷漠和无情。他们所有的政治信誉都土崩瓦解了。70 位杰出的孟加拉经济学家、律师和作家发表了一份声明,认为饥荒是人祸导致的,并且应归罪于“毫无羞耻的劫掠、剥削、恐吓、奉承、欺诈和暴政”。他们还认为,政府“很明显是被一群走私贩和奸商所统治和代表的”。[23]

独裁统治

由于对这些事件的转机感到幻灭,穆吉布感到应该号召一个新的开始。他明白迅速出现的新暴发户团体是由那些已经完全变得名誉扫地的阿瓦米联盟骨干所组成的。对其统治的暴力抗议正在扩展。经济也在摇摇欲坠之中。然而,穆吉布没有认识到,他已经丧失了在民众中的克里斯玛式形象。相反,他的政治直觉告诉他只有一种方式可以避免陷入政治混乱中:一个独裁政府是达成“无剥削”社会的突破口。[24]

1974 年 12 月,孟加拉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暂停只有两年之久的宪法所赋予的全部基本权利。在 1975 年初,其以一部采取一党总统制的修正案代替了宪法。穆吉布宣誓就任孟加拉国总统并建立了一个新党,孟加拉农民、工人和人民联盟(BAKSAL, *Bāṃlādeś Kṛṣak Śramik Āoyāmi Līg*)。他现在是权力至高的国家元首,丢弃了对公众的责任、民主以及权力分化。他的目的是从上层发动一场社会革命,就像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那时正在做的一样。他的新平民专制计划被认为是“二次革命”。

新政权暂时风平浪静。冬季的收成不错,大米的价格也在下降。

所有面值为100塔卡的纸币停止发行，这减少了货币供应并减轻了通货膨胀。警察已经抓捕并杀害了穆吉布最具影响力的地下组织的对手，萨卜哈那党[Shorbohara Party，即无产者党(Proletarian Party)]的领袖西拉杰·锡克达尔。但并非只有左翼仇视穆吉布，将其视为独裁的新化身。另一个更为危险的团体也深感受到了冒犯：军队。 182

军队采取行动

孟加拉军队共有5.5万人左右，由参加过自由战士的巴基斯坦时期的专业士兵、曾于战争期间在西巴基斯坦被困的孟加拉军事人员以及来自各种战时游击队组织的新兵组成。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并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们去做，他们就变得越发不开心。他们的愤懑始于1971年战争的最后阶段。对他们而言，印度军队夺走了孟加拉战士解放孟加拉国的光荣，他们是在自由战士已经完成这项任务时才进来的，而且还把所有从巴基斯坦缴获的优良武器和装甲车带到了印度。战后出现的那个实力雄厚的对手——洛克依-巴希尼使他们深感自己被忽视。他们对穆吉布与印度的亲密关系也十分不满，认为印度会暗中破坏孟加拉国的主权。到1973年，军队中许多人都是反印度且反穆吉布的；在那一年的选举中，卫戍部队团结一致地将票投给了反对党候选人。

军队的第一次真正行动是在1974年大饥荒当中。穆吉布下令让他们去抓捕囤积者和走私贩，其后又要求他们回去保护阿瓦米联盟的支持者。就在这时，军队的不安转化为极度的愤怒，并产生了军队是全国唯一能将穆吉布从权位上赶下来的组织的信念。一个密谋逐渐成型。到1975年春天时，印度获悉这一消息并警告了穆吉布，他却大笑着对这个提醒不以为然，认为任何一个孟加拉人都不会反对他："不会，不会，他们都是我的孩子。"[25]但是他错了。就在1975年8月15日午夜之后，由下级官员领导的3支突击部队离开了达卡的总兵站，在几个小时内就刺杀了穆吉布和四十多名他的家庭成员。[26]孟加拉长期珍视的大众民主之梦先是变成了独裁统治的噩梦，现在又转变成了军事统治。

183

第十八章　梦想新社会

在战后最初的时候，是一段全国欢庆的时期。在 1972 年和 1973 年里，任何事看起来都是可能的。这个民族最终赢得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现在可以设计他们自己的未来。这种情绪奇怪地让人想起 25 年前另一个举国欢庆的时刻，当时孟加拉三角洲的人民正式加入了巴基斯坦。那时，未来也看起来很光明，并且对令人憎恶的霸主消失后引入一场社会革命满怀期待。

但是这两个时刻却有一种关键的不同。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是一种伊斯兰观点点燃了国家意识。三角洲的人民与南亚其他的穆斯林一起去建立巴基斯坦祖国。首先是穆斯林，其次才是孟加拉人，他们想象的未来社会是与伊斯兰意义上的秩序和正义一致的，并且适应当地的状况。相比之下，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激励他们的是一种区域性的国家认同。他们首先是孟加拉人，其次才是穆斯林。新社会应与那些在西方已经发展出来的原则相一致，并且能适应当地环境：民主、社会主义和世俗主义。伊斯兰教作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以及个人信仰十分重要，但却并非国家认同的一部分。在这 25 年里，他们已经将对自己的想象从孟加拉穆斯林转化为穆斯林孟加拉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壮举之所以成为可能只因为双重的孟加拉–伊斯兰认同已经在数个世纪里深深扎根在孟加拉三角洲了。

此外,新的民族主义无疑是“三角洲的”(deltaic):其只局限在东孟加拉/孟加拉国,这一孟加拉–穆斯林认同最为突出的地区。当然,情感共鸣的深层涌动还是联系着在孟加拉国的孟加拉人和那些在印度的同胞,但是孟加拉民族主义却从未设想过重新统一。一些印度观察家低估了这种“分离的孟加拉意识”(separate Bengaliness)的情感力量。由于缺乏对东孟加拉人怎么追忆殖民社会秩序、巴基斯坦实验如何塑造了他们的认同以及他们认为孟加拉文化重心已经东移的感受的了解,这些观察家在试探性地建议他们与印度建立更为亲密的联系而遭到坚决反驳时大吃一惊。

184

由此便开始了一个持续至今的误解。两种叙事开始发展起来。印度的叙事强调孟加拉的忘恩负义。它如此描述:印度创造了孟加拉国。它的武装力量将孟加拉从巴基斯坦手中解放出来,并在这个过程中遭受了许多的人员伤亡。印度对新成立的国家给予了大量帮助和建议很显然应该得到孟加拉国的感激、信任和合作。然而孟加拉人的态度在战后令人难以接受地迅速改变了,如果不是完全敌意的话,他们至少变得过分敏感、多疑和难以合作。

与此相反,孟加拉人的叙述则强调印度人的飞扬跋扈。它如此描述:在印度的大量帮助下,孟加拉国解放了自己。孟加拉人曾经(至今依然)对此非常感激。但是印度的军队在孟加拉国并没有表现得如天使一般纯洁,印度官员也并不总是以对一个主权国家代表的尊重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孟加拉伙伴。孟加拉国抗争的目的是为使自己从巴基斯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不是为了成为印度的卫星国。它想与其庞大且更富有的邻居和睦相处,但是不能容忍专横的行为。

这些叙述形成了一种误解,并在印度与孟加拉国的关系中根深蒂固。从那时起这些事情就变得棘手和困难,尽管边境两端的孟加拉人的关系通常都相当亲切。孟加拉人的抱怨有很多:印度将河水引入了它自己的领土,“非法占有”了孟加拉国的小块领土,宣称对在孟加拉湾新形成的一座孟加拉国认为属于他们的岛屿享有主权,并且还围绕孟加拉国边境修筑了防御工事。印度则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指责孟加拉国没有禁止非法移民进入印度,为印度东北部的叛乱者提供庇护所,拒

绝向印度出口天然气以及不允许中转运输。[1]

新的孟加拉精英想象着这个在三角洲初具规模的社会应有鲜明的孟加拉特色。他们认为孟加拉国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是所有在巴基斯坦非正义统治下的孟加拉人群体的共同家园(参见“我们都是孟加拉人”)。这对于三角洲的孟加拉人——几千万穆斯林，几百万印度教徒，几十万基督徒以及几万佛教徒——而言是个相当好的消息，但是对那些非孟加拉人而言就不是那么好了。狂欢的孟加拉民族主义者无暇关注那些非孟加拉穆斯林或许多从不将自己认同为孟加拉人或穆斯林的土著群体。

185

这在谢赫·穆吉布·拉赫曼访问吉大港山区时令人难堪地清晰起来，那里的人口压倒性地是非孟加拉人和非穆斯林。他对他们发表演讲，“像兄弟一样，并告诉他们成为孟加拉人，忘记殖民地的过去，加入到孟加拉主流文化中来”。[2]当地人离席以示抗议，这一事件在吉大港山区就像是一代人以前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在东巴基斯坦发表那场宣称“乌尔都语将成为巴基斯坦的国家语言”的运气不佳的演讲一样意味深长。巴基斯坦政府的不妥协态度激起了语言运动，并以暴力冲突而结束。现在，新的孟加拉国政府明显地表现出对三角洲少数民族文化同样的麻木——它也将很快引起武装反抗。

国家文化

独立给三角洲带来了文化自治和新的国家建设计划。现在，居民们被邀请将自己想象为孟加拉国人。因为对于那些六十几岁的人和终生生活在三角洲的人们而言，这是他们第三次被邀请加入一个国家。他们作为英属印度的国民出生，成长在印度民主主义运动时期，在三十岁上下的时候成为巴基斯坦人。现在他们又成为孟加拉国人，见证着一个新的国家文化正在形成，其主要的支柱是语言、一种区域形式以及对现代化的探索。

我们都是孟加拉人

在 1971 年战争之后，孟加拉三角洲占主导地位的氛围是慷慨和宽容的。这很好地体现在一份当时流行的海报上，它写道：

孟加拉的印度教徒，

孟加拉的基督教徒，

孟加拉的佛教徒，

孟加拉的穆斯林，

我们全都是孟加拉人！

它描绘了一座印度教寺庙、一座清真寺、一座佛塔和一座教堂——连接在一起作为整体——这幅海报强调那种以宗教来划分孟加拉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的孟加拉国将赋予所有孟加拉三角洲的居民以公民权(插图 18.1)。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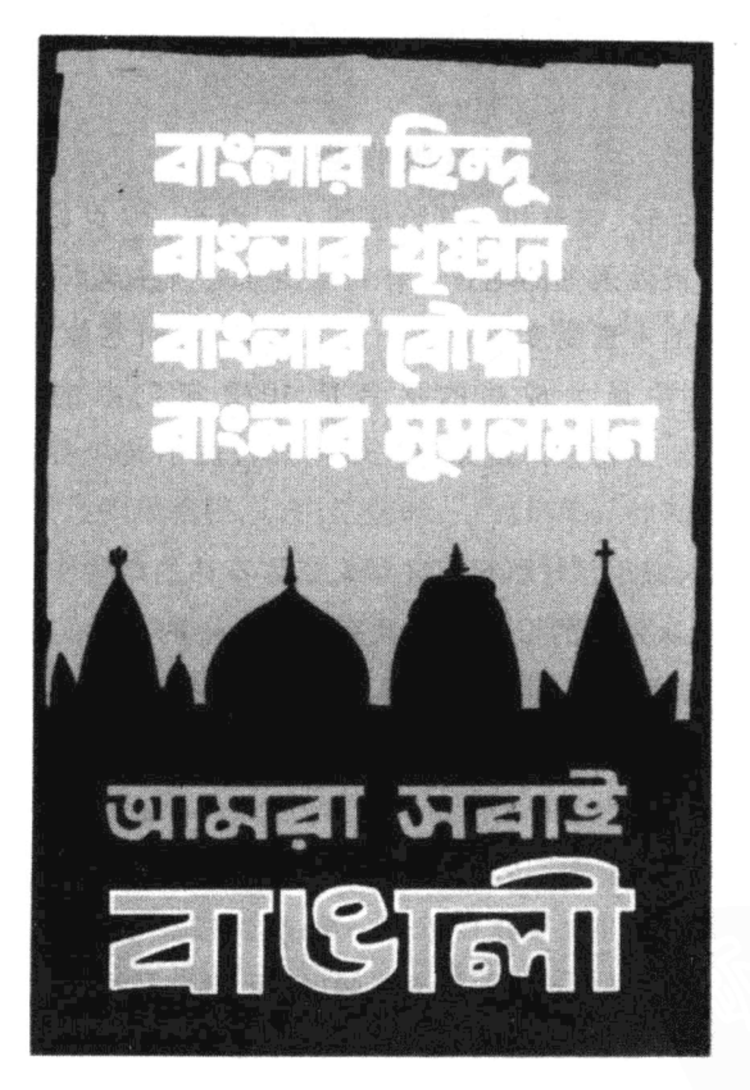


插图 18.1　“我们都是孟加拉人。”承蒙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提供。

187 对孟加拉语言的自豪点燃了国家运动，因此几乎不必惊奇语言在国家建设中居于首席。在公共领域中，乌尔都语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英语也变得更为稀少。在教育体系中出现了向孟加拉语的迅速转移，而孟加拉语的出版物也繁荣起来(参见“出版物创新”)。[3]

孟加拉学会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语言运动时期，现在成为全国艺术与文学学会，并且是教材、辞典、民间文学、翻译作品、文化研究和创意写作等方面的主要出版者。它同时也作为三项每年一度的盛典的焦点而显得十分重要，亦即持续一个月的依库舍节(纪念语言运动的文化活动)、书籍展销会和四月中旬的孟加拉新年庆典。

出版物创新

对于那些年轻、聪慧和中等阶层的人们而言，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达卡是一个接近天堂的地方。你将置身于乐观主义和创造力爆发之中。从几十年的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之后，中等阶层能够前所未有地表达自己。其中最为成功的平台是1972年创办的《比奇特拉》(*Bichitra*)周刊。这份杂志震动了整个孟加拉国的传媒界，其发行量使许多日报都汗颜。

《比奇特拉》吸引了一群极有才华又直言不讳的年轻作家。他们都是现代和世俗的，认为好的报刊杂志具有改变社会的力量。他们为独立报道设置了一个新的标准，并引入了反对正统写作的风格，这在主流媒体中都是全新的。这份杂志主要由附有重要文化和政治人物肖像的调查性报道、独立社论、社会不公正事件的口述、移居海外的孟加拉人的国外生活故事、读者论坛、创意写作以及体育和时尚新闻组成。这一综合内容吸引了大量的读者群，其中主要是青年人。通过这种方式，《比奇特拉》在塑造自信和启蒙国家中等阶层方面深有影响(插图18.2和插图18.3)。

然而，它很快就陷入到与对独立声音日益难以容忍的国家之间的麻188 烦中。这毫不令人吃惊。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就陷入了重重困难之中，但是一直存在到1997年政府将其关闭。到那个时候，其风格已经为孟加拉国许多其他杂志所效仿。



插图 18.2 《比奇特拉》的封面，1975 年。承蒙 Archives of Bangladesh History，Rajshahi 提供。



插图 18.3 《比奇特拉》的封面，1975 年。承蒙 Archives of Bangladesh History，Rajshahi 提供。

孟加拉学会坐落于达卡的一座大厦。这座建筑体现了三角洲 20 世纪历史不同阶段的风格特点，由柏德旺王公（Maharaja of Burdwan，因此其名为柏德旺大厦）在 1905 年分割孟加拉时期建造，使人联想到殖民地孟加拉的贵族地主所有制。分治之后它成为东巴基斯坦首席部长的府邸，就是这个人在 1952 年下令屠杀孟加拉语言活动者，因此其特别适合作为孟加拉国后巴基斯坦时期文化自治的主要象征的所在地。

国家文化也鼓励三角洲民族音乐、舞蹈和绘画传统，与此同时还寻求其发展与更新。许多培养手工艺生产的计划得到落实；20 世纪 70 年代成为装饰性黄麻绳罐钩（jute-rope pot-hangers）、竹藤板凳、刺绣锦被和印花布无所不在的时期。

189

孟加拉国的文化精英寻求发展出一种国家文化，以将当地的实际情况与现代需求结合起来。宗教的标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官方的国家标志刻画了三角洲的山川壮丽、物产丰富（插图 18.4）。新的国旗（深绿色背景之上有一个红色圆轮）和国家纪念碑都是既简洁又现代

的(插图 18.5)。



插图 18.4　1 塔卡纸币(1974 年),描绘了一只握着成熟稻穗的手以及水百合式样的国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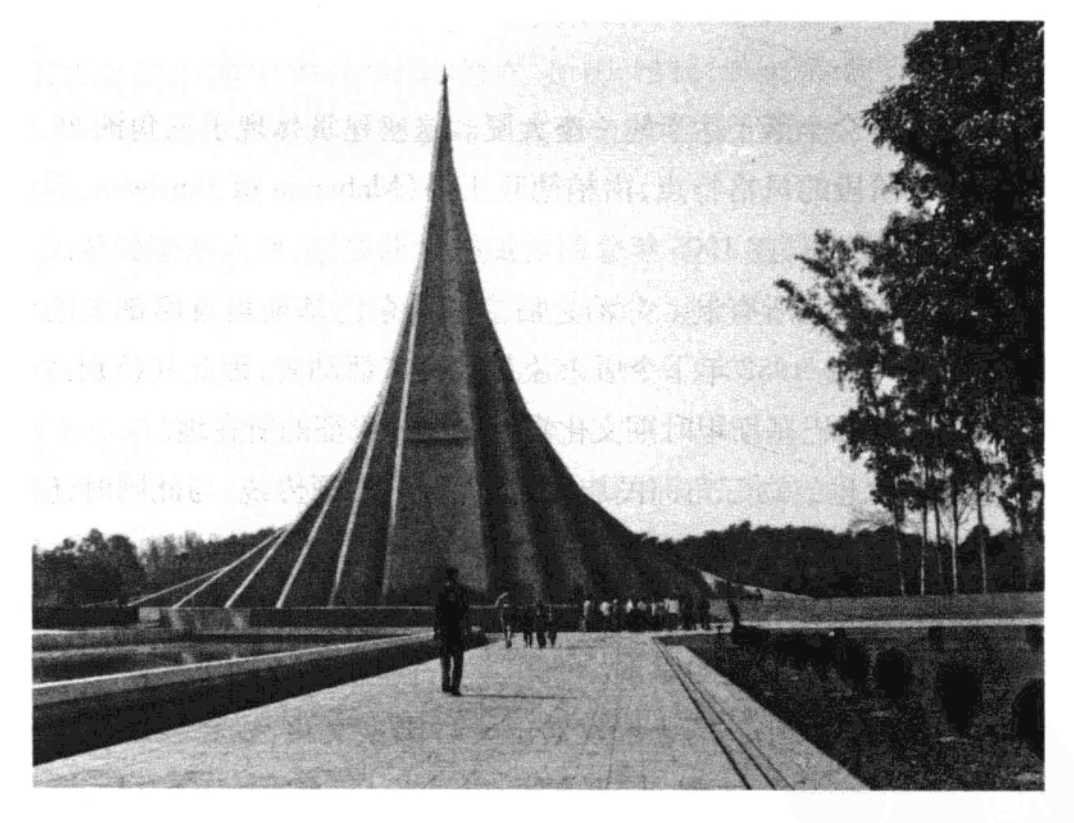


插图 18.5　沙瓦国家烈士纪念碑(National Monument for the Martyrs in Savar),1972 年动工,1982 年竣工。

国家历史

历史意识现在被激烈的民族主义者所控制。其聚焦于三角洲的人民如何在英帝国主义者、印度教地主和西巴基斯坦篡夺者之下成为牺牲品，以及他们的抗争如何最终实现了自身的解放，成立了一个被认可和独立的国家。这是政治激进主义和民主动机的叙事。一个三角洲的国家叙事被构建了起来，并赋予这个新的国家以意义和合法性。毫无疑问，其英雄是那些在巴基斯坦时期为孟加拉语言献身以及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人们。突然地，巴基斯坦民族主义叙事的支柱——1947 年分治——不再是焦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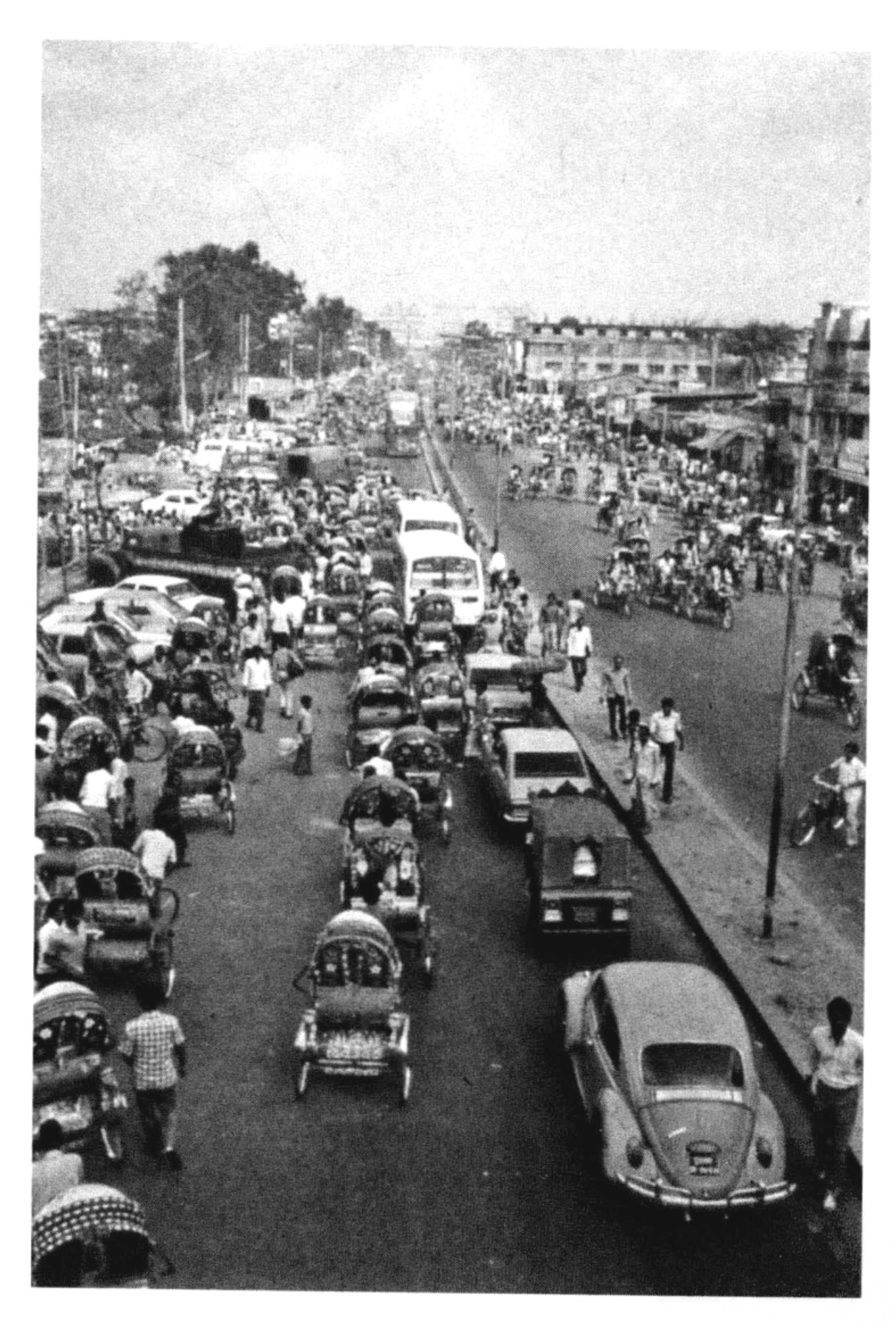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重要的新开始，因为从此孟加拉国对国家历史的观点将从根本上不同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印度和巴基斯坦，1947 年的分治仍是国家意识的枢纽和民族主义历史理解的根基。在孟加拉国，这一地位坚决地被 1971 年的事件所代替。因此，无论印度还是巴基斯坦的历史学家通常都将 1947 年作为殖民主义的结束与国家独立的开始，而孟加拉国的历史学家则强调，在三角洲地区殖民统治一直持续到 1971 年，之后才是国家独立。通过这种方式，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历史起到了双重作用。一方面使孟加拉国具有了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挑战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现代南亚历史解读上的支配地位。

190



第五卷

独立的孟加拉国



第五卷　20 世纪 80 年代达卡新市场街景。

第十九章　创建政治制度

193

1975 年，孟加拉国陷入危机之中。经济正在苦苦挣扎，国内存在着可能滑进无政府状态的真实忧虑。孟加拉国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通往前方的路哪一条是最好的呢？这个问题有三个答案。穆吉布（和其日益缩小的追随者团体）开出了比他曾在此前几年里开出的剂量更强的药方。然而，左派的批评使人深信这无助于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他们坚持孟加拉国需要一场社会革命、一场彻底的土地改革和国家社会主义。这与那些认为解决方法在于经济解放和国家支持私营经济的人们直接相反。

正是这些关于未来不可调和的观点之间的争斗，在 1975 年动摇了孟加拉国的国家大厦。首先，穆吉布 1 月份的宪法政变建立了专制独裁统治。反对力量也迅速崛起。穆吉布在 8 月 15 日被暗杀，一个军方背景的政府建立起来。这个政府被 11 月 3 日的第二场军事政变所推翻，其后在 11 月 7 日又再次发生政变。[1]现在成为孟加拉国统治者的人是齐亚乌尔·拉赫曼（Ziaur Rahman）少将——以齐亚（Zia）之名为人所熟知。他的第一个行动是禁止政党活动并取缔了国家社会主义党。这是曾鼓舞激进的士兵发动上一次政变的最左翼的政党，认为士兵的革命是为受压迫阶级服务的。齐亚对其领袖阿布·塔赫尔（Abu Taher）上校处以绞刑。

军事统治(1975－1990)

到1975年底,孟加拉国已经从穆吉布的计划或革命路径折回了。新的齐亚乌尔·拉赫曼政权(1975－1981)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实现了决定性的突破。其将国有化的企业重新归还给先前的所有者,支持私营经济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并尝试通过增加津贴以及许多一系列发展计划来繁荣农业。这些政策所需要的国外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使孟加拉国的经济恢复成为可能。齐亚政权将国家放置在自由化的轨道上,其后就再也没有偏离过。

194

齐亚乌尔·拉赫曼政权同时也在另一种意义上实现了决定性的突破:独立后孟加拉国军事统治的出现。将军们将在其后的15年里统治孟加拉国,甚至在1990年民众起义推翻了军事统治之后,军队也从未真正回到兵营里去。其仍然作为一种决定生死的力量,在一系列平民政府的宝座之后若隐若现,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孟加拉国独裁的根源

孟加拉国在独立后从民主统治转而迅速军事化需要一个解释。军事统治并不植根于孟加拉三角洲的历史中,但却是旁遮普殖民历史中的重要特色,那里是巴基斯坦统治的一片遥远的区域。19世纪后期,英国人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观点,将某些南亚种族归类为"尚武民族"(martial races),认为他们比其他民族的战斗力更强。旁遮普人就被视为尚武的(孟加拉人则是非尚武的)。旁遮普的一些地区就成为印度军队首选的征兵地区。出于军民一体的统治之下,旁遮普成为"英属印度的卫戍之省"。[2]1947年之后,这种经验给了旁遮普穆斯林上层挤进巴基斯坦权力斗争的资本。最初有三个主要团体,认为自己将成为巴基斯坦新国家的领导者:孟加拉人、穆哈吉尔人(从印度移民来的穆斯林)和旁遮普人(见第十一章)。孟加拉人几乎很快就出局了,穆哈吉尔人在20世纪50年代持观望态度。随着旁遮普人权力在巴基斯坦的上升,民事制度让位给了军事制度。武装力量从一开始就是旁遮普人控

制的：1947 年，旁遮普人占巴基斯坦军队人数的 77%。[3] 当军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发动第一次政变时，旁遮普人的支配地位达到了顶点。现在统治着巴基斯坦的军事—官僚精英长久的家长式专制主义就带有英国对旁遮普殖民控制的特点。

这对于更名为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三角洲意味着什么呢？其中的一些情况是众所周知的。由于巴基斯坦采用英国曾在旁遮普熟练运用的军事—专制特色，它就将东巴基斯坦变成了一个内部殖民地。孟加拉精英被排除在国家事务的有效建言之外——更不必说在军队中——最终造成了巴基斯坦的终结。但是国家建设是一个更为连续的过程。作为殖民卫戍堡垒的旁遮普，逐渐将巴基斯坦变为军事国家，又将其军事传统传承给了孟加拉国。

195

在孟加拉国，20 世纪 70 年代在很多方面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重现：对民主统治的高度期望迅速被击碎，军队接管之后在尚未找到落脚点之前，国家在日益专制的统治下挣扎。孟加拉国将要在 1975 至 1990 年间处于军事独裁的统治之下，其模式与巴基斯坦的阿尤布—叶海亚政权十分类似。[4] 可以说，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孟加拉三角洲的军事统治并非平民规范的例外，恰恰相反，军人从 1958 年以来控制这个国家长达 28 年——其中 13 年是巴基斯坦时期，15 年是孟加拉国时期。

旁遮普的殖民传统何以嫁接到了孟加拉三角洲呢？以及为什么会一直持续到没有任何类似于旁遮普精英支持的 1971 年之后？从巴基斯坦独立出来产生了控制三角洲的新的、当地的主人，但并未带来一场社会革命或对国家进行一次系统的彻底检修。在很多方面，孟加拉国不过是另一个名字的巴基斯坦，甚至就是武装力量，这一在 1971 年战争中受创最剧的国家体系，也很快通过恢复到巴基斯坦模式而重新获得了平衡。他们赋予自己国家事务的仲裁者的身份，僭取了行政权力。[参见“巴基斯坦训练的孟加拉国强人(1975－1990)”]。

巴基斯坦训练的孟加拉国强人(1975 — 1990)

1975 年后掌控孟加拉三角洲权力的官员们是在巴基斯坦军事独裁期间(1958 — 1971)开始他们的生涯的。他们对平民政治持一种鄙视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比那些政治家更有能力且更应该掌管这个国家。

齐亚乌尔·拉赫曼的统治从 1975 年直到 1981 年他被暗杀。当齐亚 1936 年诞生时,他的父亲是一名加尔各答的药剂师。这个家庭后来移居到了卡拉奇,在那里齐亚于 1955 年从巴基斯坦军事学院毕业,并加入了巴基斯坦军队,那时他还是一个少年。阿尤布时期他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1971 年战争爆发时,他正巧派驻在吉大港。他决定站在孟加拉一方同生死共命运,叛变后在广播上宣布独立,加入了自由战士,潜入印度并因勇猛而广受赞誉。独立后,他被任命为孟加拉国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他 1975 年掌权时,就像阿尤布·汗将军在 1958 年所作所为的回声,这几乎都体现在他对全国讲话的文稿中:"政府承诺将不会继续实行超越时代需要的军事管制……我不是一个政治家。我是一个士兵……我要讲清楚,我与任何政治没有关系,我们完全是一个无党派和非政治的政府。"[5] 他将武装力量和警察的规模翻了一番,并且直到其五年多之后被暗杀一直统治着这个国家。

196





插图 19.1 和 19.2　齐亚将军和艾尔沙德将军。

在齐亚被刺杀的几个月间隔之后，中将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在 1982 年夺取了权力。艾尔沙德控制孟加拉国直到 1990 年被民众起义所推翻。他大约在 1930 年（他的出生日期存有争议）生于朗布尔附近，1952 年加入巴基斯坦军队并逐级上升。孟加拉解放战争期间他在西巴基斯坦，但与其他许多孟加拉官员不同，艾尔沙德在战争期间继续在巴基斯坦军队中服役。1973 年他被遣返回国，加入了孟加拉国军队，并在齐亚时期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当他于 1982 年 3 月 24 日夺取国家权力之后，立即向孟加拉国民众发表讲话，他辩称国家的民族安全、独立和主权都受到了“社会和政治无纪律、史无前例的贪污腐化、饱受摧残的经济、行政管理僵局、法律和秩序的极度恶化以及令人惊恐的经济和食品危机”的威胁，以此来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6] 在他看来，他的国民需要一种军事纪律，他就是将这种军事纪律赋予他们的人。

197

齐亚乌尔·拉赫曼政权被另一位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Hussain Muhammad Ershad）将军的政权所取代。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军人掌握权力，通过取消基本权利并禁止政党活动以作为快速发展和无可指责的行政管理的代价。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通过建立一个政党以试图建立合法性，使其自己被选举为拥有极大权力的孟加拉国总统。其后，他突然就被从政治舞台上抹去了。这在齐亚乌尔·拉赫曼身上发生得最为激烈。他在 1981 年访问吉大港时，在一场失败的政变中被暗杀了。军方支持的平民政府掌控了几个月之后，便被参谋长艾尔沙德所推翻了，他因此成为孟加拉国的第二个独裁者。艾尔沙德在 1990 年的一次民众起义中被迫交出权力。此后军队就将国家的最高位置留给了平民。

在 1975 至 1990 年间孟加拉国所逐步形成的政治体系中，司法权和立法权被军队控制的行政权力所摆布。这一时期的公民权利与最初独立的那几年相比大大地缩减了。这是许多孟加拉国公民都难以接受的。他们对未来的渴望展现在他们为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增加自己对国家的影响力而进行的持续斗争当中。整个

15年的军事统治中，许多孟加拉国人都极力争取议会民主的回归，与军队力图使国家免于大众影响的力量相对抗（插图19.3）。[7]他们的努力在1990年的一次旷日持久和范围广泛的抗议活动中达到顶点，最终驱逐了军事统治，推翻了艾尔沙德政权并使议会民主得以回归。

议会民主(1990－2006)

平民统治的回归在孟加拉国受到了广泛欢迎。许多人将之视为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和一个真正民主的孟加拉国的全新开始。事实上，在短短几个月里，这个国家就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了议会和渴望引导一个更好未来的民众政府。即使如此，其也不得不处理军事统治时代的许多遗留问题。有三个后遗症尤难解决：难以调和的国家观点之间的斗争、伊斯兰主义政治的兴起和适应区域自治上的无能。

198

军事统治时代主要的政治遗产是对国家的另一种观点的出现及其在主要政党中的化身。齐亚曾寻求通过建立一个政党，并使该党参加自己所掌控的选举来为其军事政权取得合法性。齐亚在1978年所创立的政党就是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BNP)。它的意识形态是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在齐亚1981年去世后，他的遗孀卡莉达·齐亚(Khaleda Zia，她于1960年在15岁时嫁给了齐亚)被指定为领袖，尽管她缺乏政治经验，却保证了党内多数成员的团结。在她的领导下，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成为一股令人敬畏的政治力量。这个政党与军队的紧密关系可以从一个事实体现出来，即卡莉达·齐亚一直居住在达卡的主要卫戍部队或军营中。

199

齐亚的后继者艾尔沙德也以同样的方式创立了自己的政党，比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的政治立场更为倾向右翼。这个在1986年建立的政党称为民族党(Jatiyo Party)。与齐亚不同的是，艾尔沙德在其独裁统治之后幸存了下来。他在1990年下台之后，因贪污被拘禁，多年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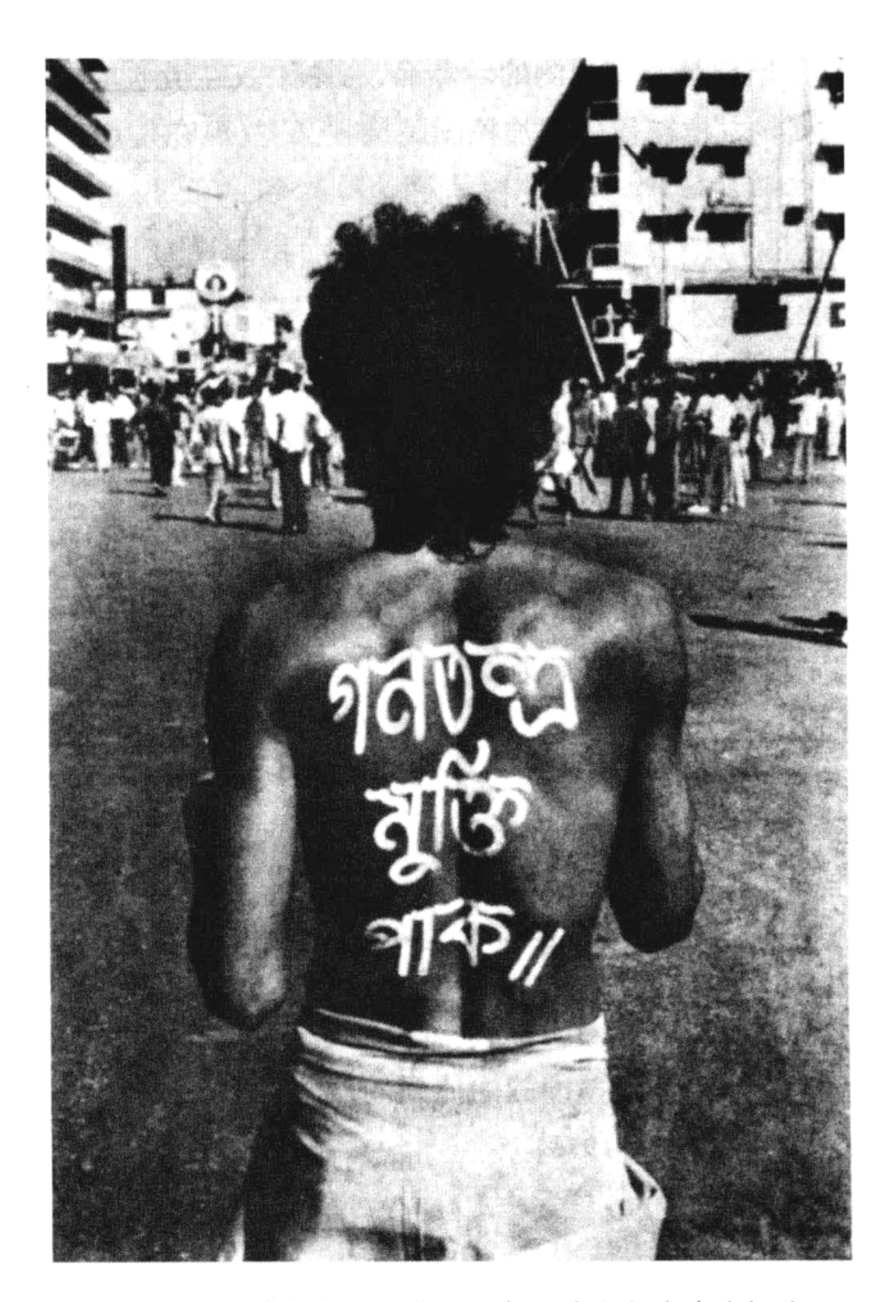


插图 19.3　“释放民主!”1987 年反对艾尔沙德政权的一次民众抗议中,诺尔·侯赛因(Nur Hossain)将这些文字写在自己的后背上,“打倒独裁政府”写在前胸上。警察将其击毙,使其成为孟加拉国追求民主斗争的永恒标志。Pavel Rahman 摄。

屡次进出监狱,与此同时继续领导其党内的一个派别,且在议会中赢得了几个席位。但是民族党不像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那么强大,其在议会民主制度恢复之后一直只是个小角色。

艾尔沙德倒台后,1991 年举行了全国议会选举。许多政党参与了

选举,结果是开放且不可预测的。然而,有两个政党清晰地控制了这个局面:齐亚乌尔·拉赫曼的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现在是由他的遗孀卡莉达·齐亚领导)和由谢赫·穆吉布·拉赫曼的女儿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领导的阿瓦米联盟。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赢得了31%的选票,阿瓦米联盟赢得了28%。结果是,卡莉达·齐亚组建了新政府并成为孟加拉国的总理。

其后,1996年和2001年又分别举行了议会选举(每次都伴有大量暴力事件并且都有75%以上的高投票率),加固了两个领头党派的统治地位。1996年的选举中,阿瓦米联盟赢得了38%的选票(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赢得34%),2001年*的选举中,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赢得了41%的选票(阿瓦米联盟赢得40%)。然而,这一非正式的两党议会体系在2006年遭遇了障碍,因为大量的选举前暴力事件导致2007年的大选计划不得不推迟。军方背景的临时政府在2007年早期执政,且又将选举推迟到2008年,引起了人们对议会民主再一次陷入危险境地的担忧(参见“孟加拉国政治体系的八个阶段”)。

200

孟加拉国政治体系的八个阶段

I. 议会民主(1971－1975)

主要政治人物:谢赫·穆吉布·拉赫曼

主要政党:阿瓦米联盟(创立于1949年)

结束于:谢赫·穆吉布·拉赫曼的平民政变

II. 平民独裁(1975)

主要政治人物:谢赫·穆吉布·拉赫曼

主要政党:孟加拉农民、工人和人民联盟(由谢赫·穆吉布·拉赫曼创立)

结束于:谢赫·穆吉布·拉赫曼被暗杀,军事政变

* 原文误作“1996年”。——译者注

III. 军事独裁(1975－1981)

主要政治人物：齐亚·拉赫曼

主要政党：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由齐亚乌尔·拉赫曼创立)

结束于：齐亚乌尔·拉赫曼被暗杀

IV. 军事独裁(1982－1990)

主要政治人物：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

主要政党：民族党(由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创立)

结束于：民众起义;艾尔沙德被迫下台

V. 议会民主(1991－1996)

主要政治人物：卡莉达·齐亚

主要政党：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

结束于：选举

VI. 议会民主(1996－2001)

主要政治人物：谢赫·哈西娜

主要政党：阿瓦米联盟

结束于：选举

VII. 议会民主(2001－2006)

201

主要政治人物：卡莉达·齐亚

主要政党：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

结束于：被军队支持的临时政府取代

VIII. 军队支持的临时政府(2007－　)

孟加拉人或孟加拉国人

1990年后的事态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局势是由两位号召力基于“继承的克里斯玛”的杰出政治家所掌控。她们有时被称为两位女士(Two Begoms),在推翻艾尔沙德的过程中进行了成功的合作。在这期间她们经常受到拘押和骚扰,她们从那时起就扮演决不妥协的对手。第一位是卡莉达·齐亚,她是齐亚乌尔·拉赫曼的遗孀和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的领袖。像我们所看到的,她在1991年第

一次后艾尔沙德时期的选举中成为总理，并一直统治到 1996 年。在那一年下台之后，她又在 2001 年的选举中重掌权力，这次一直持续到 2006 年。

1996 至 2001 年间的总理是她的主要竞争对手哈西娜·瓦吉德(Hasina Wazed)，也被称为谢赫·哈西娜。她是谢赫·穆吉布·拉赫曼的长女，因为恰好去了海外而在 1975 年的家族暗杀中幸免于难。阿瓦米联盟再次集结时，她成为该党的领袖，并在 1981 年齐亚乌尔·拉赫曼死后很快从自我流亡中回国。

正是通过这两个女人，孟加拉国政治体系中未解矛盾的关键一幕才开始成型。这是一场关于国家认同和正确的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这给孟加拉三角洲长期历史上的双重孟加拉–伊斯兰身份带来了新的转向。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讨论的，孟加拉 1905 年的划分使许多三角洲居民意识到了自己孟加拉人和穆斯林身份之间的新的裂缝。他们第一次感觉到，他们不得不选择哪一个才是占支配地位的。这一左右为难的困境成为整个 20 世纪一直持续讨论的主题。那些支持巴基斯坦运动的人选择突出他们的穆斯林身份。但在巴基斯坦时期，当国家建设奠基在穆斯林意识之上时，对西巴基斯坦支配三角洲的反对却充分利用了语言和区域的象征。

202

“孟加拉意识”(*Bengaliness*)

从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孟加拉本土精英曾将孟加拉国想象为一个孟加拉人(巴基斯坦当局不承认这一概念)的家园。对他们而言，孟加拉国家不仅仅代表一个语言共同体。国家的精神以特殊的文化意识、虔诚的传统和人道主义的渴望来表达，充溢在三角洲民歌和包尔神秘主义当中，也同样深刻地反映在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和卡兹·纳兹鲁尔·伊斯拉姆的诗歌中。最理想的国家图景是一副由点缀着简朴、宁静的河边村庄的片片沃野所构成的画面。

这种像一首乡村田园诗——一床“绣花被”[8]——般的国家观念的全盛期正是三角洲知识界统治政治舞台的时期——从印度–巴基斯坦

战争(1965 年)后的阿瓦米联盟六点计划到齐亚乌尔·拉赫曼的军队掌权(1975 年)。在这重要的十年里,许多三角洲的知识分子相信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构建一个自治的孟加拉国。1975 年后的事件表明这种信念是非常错误的。政治上的新来者在国家意识上带来了与知识界极为不同的观念,后者对逝去的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到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那种精神有着强烈的怀念。谢赫·哈西娜和她的支持者希望能挽回这种国家意识。

“孟加拉国意识”(*Bangladeshiness*)

随着 1975 年阿瓦米联盟对国家控制的崩溃,一种新的国家叙事就被发展出来以支撑齐亚乌尔·拉赫曼的军事政权。其区分了“孟加拉意识”和“孟加拉国意识”,并再次强调了宗教维度。其认为这个 1971 年后出现的独立国家是压倒性的和本质上的穆斯林国家。[9] 这在战争仅仅过去几年时是个鲁莽的行为,因为直到那时,任何暗示穆斯林身份胜过孟加拉身份的,都被认为是亲巴基斯坦和反孟加拉国的。然而,这种新的“孟加拉国意识叙事”通过将齐亚乌尔·拉赫曼偶像化为 1971 年战争期间的英雄角色而逃开了叛国罪的指责。通过这种方式,其申明了在国家诞生时就具有的合法性,如同其竞争者、旧式的“孟加拉意识”叙事一样。但是后者将国家视为从语言运动和 1971 年战争兴起的,而孟加拉国意识的叙事则认为国家是从巴基斯坦运动和 1971 年战争起源的。其并未将巴基斯坦的创立视为一个随着孟加拉国出现才得以纠正的错误。相反,其认为孟加拉国人的国家的建立是三角洲穆斯林—孟加拉认同的终极表现,这一认同是在英国和巴基斯坦时期逐渐成熟的(插图 19.4)。换句话说,1947 年是为 1971 年所做的准备:巴基斯坦的建立使孟加拉国的出现成为可能。齐亚在政治生活中再次引入了伊斯兰教象征,清除了孟加拉国宪法中的世俗主义,并在其序言中以伊斯兰教取而代之。1981 年他死后,这种国家观念又为卡莉达·齐亚及其支持者所宣传。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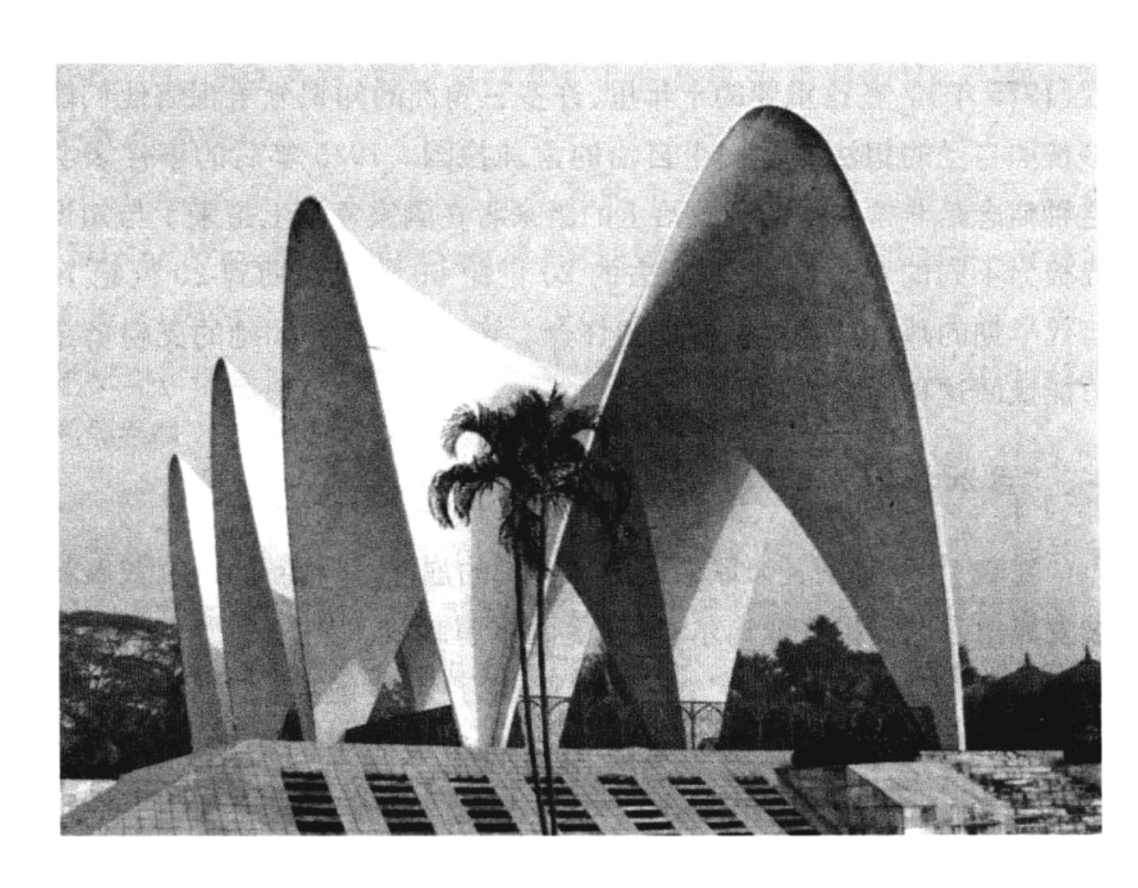


插图 19.4　位于达卡的三位领袖陵墓(Tin Netar Mazar)建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其为纪念活跃于巴基斯坦时代早期的三位卓越的政治家：A. K. 法兹卢勒·胡克(A. K. Fazlul Huq, 1873 – 1962)、H. S. 苏拉瓦底(H. S. Suhrawardy, 1892 – 1963)以及和卡沃杰·纳齐姆丁(Khwaja Nazimuddin, 1894 –1964)。这座陵墓的设计师是 S. A. K. 马苏德·艾哈迈德(S. A. K. Masud Ahmed)。在背景中可以看到一座莫卧儿时期的清真寺。

204　孟加拉国意识叙事对政坛中许多更为保守和笃信宗教的人群极具吸引力。他们的口号“孟加拉国万岁”(*Bangladesh Zindabad*)构成了对“胜利归于孟加拉”(*Joy Bangla*)这一战斗口号的挑战(插图 19.5 和 19.6)。

205　1991 年军事统治后第一次民主选举的结果清晰地表明了孟加拉国意识叙事对选民的号召力，而孟加拉意识叙事则处于守势。它同时也表明，其他一些国家叙事，比如众多左派的叙事，则几乎完全出局了(参见“征途中的耄耋老人”)。



插图 19.5　“胜利归于孟加拉!”海报描绘了谢赫·哈西娜作为一个女政治家在其政党和国家的象征围绕之中：她的父亲、旗帜、具有乡土风格的船。她被描述为“土地上的宝石，人民的领导者，孟加拉之友以及孟加拉国家永远的至高国父谢赫·穆吉布·拉赫曼的女儿”（约 2005 年）。承蒙 Archives of Bangladesh History，Rajshahi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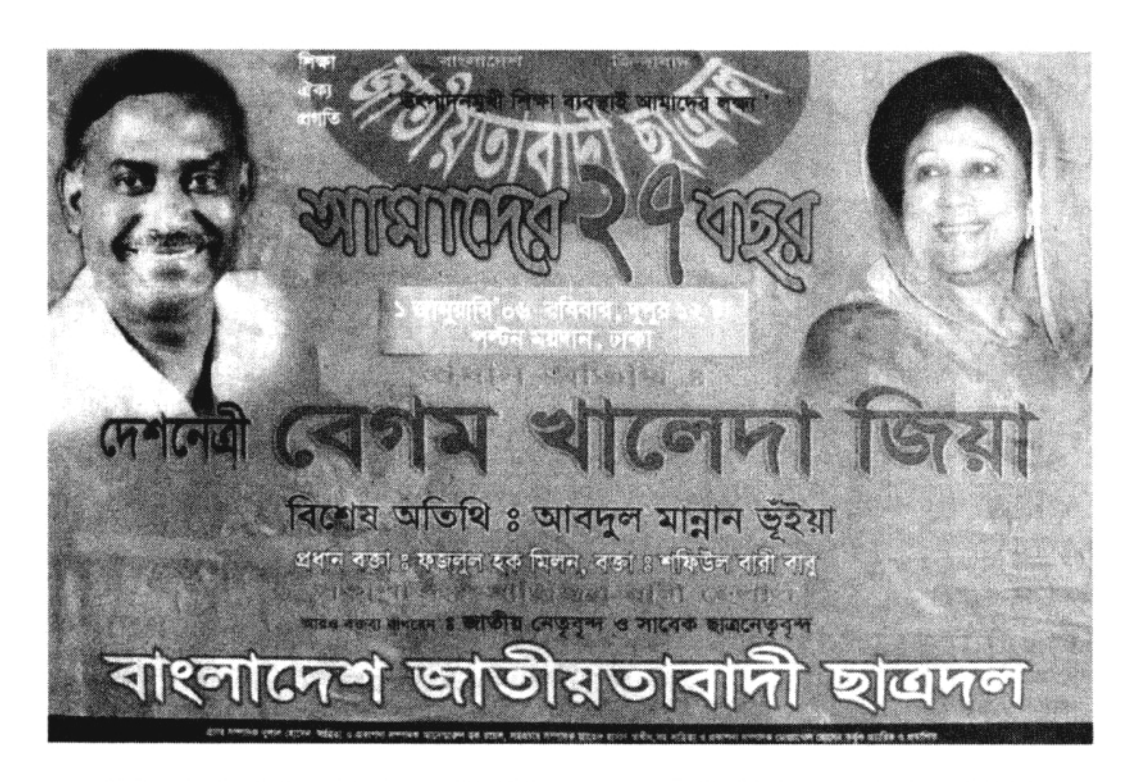


插图 19.6 “孟加拉国万岁!”2006 年,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的学生团体庆祝建党 27 周年。这幅海报的主角是卡莉达·齐亚,她被描绘为“国家的领导者”。海报上还描绘了她被刺杀的丈夫齐亚乌尔·拉赫曼将军。

征途中的耄耋老人

1947 年以来,孟加拉三角洲就陷入了一片政治混乱当中,众多政治家来来去去。但是其中有一位常青树:巴沙尼毛拉(约 1880 — 1976)。巴沙尼是唯一一个扎根于乡村的卓越领导人。因为在他非常长的生命历程中,他主要居住在塔盖尔地区的桑托什(Santosh)村,这里离他的出生地很近。他原名阿卜杜勒·哈米德·汗(Abdul Hamid Khan),由于其培训和教学工作获得了毛拉的称号(*maolānā*;伊斯兰学者),并因为在 20 世纪 30 年代保护巴沙楚尔(Bhashan Chor,阿萨姆地区布拉马普特拉河上一个小岛)上的孟加拉定居者免受洪水之灾而获得了巴沙尼的尊称。

作为一个对民众情绪有着神秘感知且不墨守成规而灵活的领导者,他成为东巴基斯坦的重要人物。[10] 虽然他从未担任过国家公职,但其独特的介入经常影响到政治进程。作为巴基斯坦长期的支持者,他在 1949 年离开了穆斯林联盟并组建了阿瓦米(穆斯林)联盟,还成为语言运动的领

206

导者之一。1957 年,他又离开了阿瓦米联盟组建了左翼的全国阿瓦米党(NAP)。在这一点上,他成为伊斯兰左翼在巴基斯坦发展趋势中最主要的拥护者。他因其信念而数次遭到监禁,在农民中享有广泛声誉,他们将之视为农民的捍卫者。当世界范围内的左翼分为亲苏和亲华的派别后,全国阿瓦米党也分裂了,巴沙尼领导着亲华的一支。1970 年,当他决定全国阿瓦米党不参加巴基斯坦第一次普选时再次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并给那时由谢赫·穆吉布·拉赫曼领导的阿瓦米联盟取得重大胜利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他的最后一次重大行动发生在 1976 年,当时他组织了一次从拉杰沙希到印度边境的"长征",以抗议印度的法拉卡(Farakka)堰坝剥夺孟加拉国所享有的恒河水(插图 19.7)。他去世后,孟加拉国再也没有出现像他一样具有全国广泛号召力的左翼领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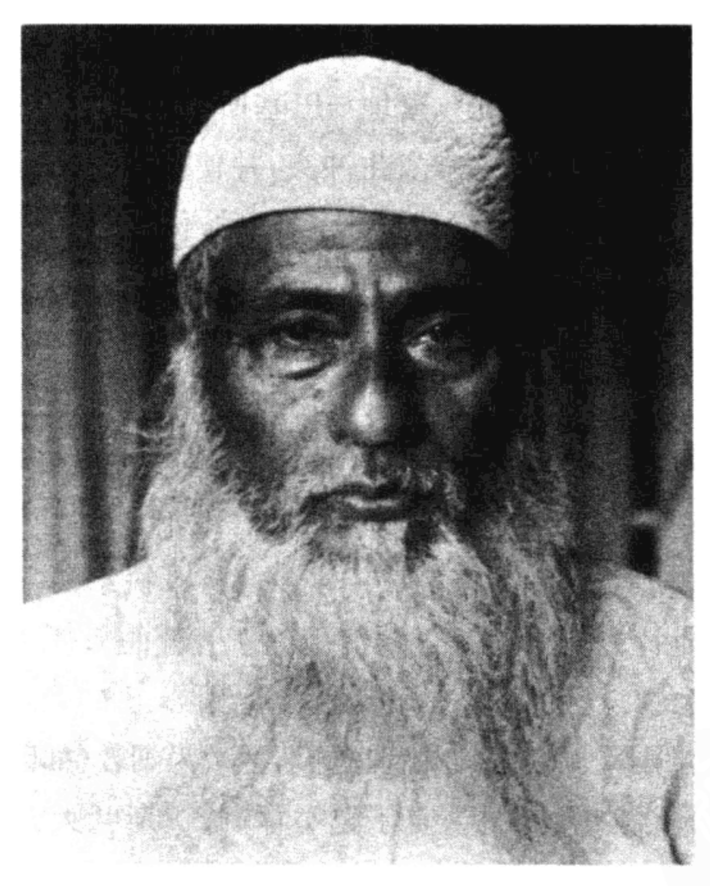


插图 19.7　巴沙尼毛拉。出自 *Banglapedia — The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207

孟加拉国人或穆斯林

“孟加拉国意识”的观念是孟加拉国军事统治时代的首要遗产。第二个便是伊斯兰主义政治家的再现。他们主要的政治载体是孟加拉国伊斯兰大会党(Jamaat-e-Islami)。

伊斯兰大会党(“伊斯兰集会”)这个政党可以追溯到英国统治时期。由来自奥兰加巴德(Aurangabad,南印度)的毛杜迪(Maududi)毛拉在1941年建立。分治之后,伊斯兰大会党分裂成不同的国家分支。毛杜迪移居巴基斯坦并一直领导该党到1972年。伊斯兰大会党认为,神的权威和人民的权威是互不相容的,而“伊斯兰民主”要求一个伊斯兰政府必须接受(由伊斯兰大会所解释的)伊斯兰教法在政治和宗教生活中所有方面的最高权威。

这些雄心壮志使毛杜迪频繁地与巴基斯坦统治者——他们并不主张建立一个神权政治国家——发生冲突,并使他成为东巴基斯坦自治运动不可调解的对手。结果,1971年战争后,伊斯兰大会党的领导人在孟加拉国遭到了唾弃并逃亡到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政府因为其与巴基斯坦军队勾结而禁止其活动。然而,在1978年,齐亚乌尔·拉赫曼却允许他们重新回来并恢复政治活动。孟加拉国的军事统治与伊斯兰主义有着鲜明的联系。就像他之前的阿尤布一样,齐亚乌尔·拉赫曼利用伊斯兰主义者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因此在政治上确定了一种严格的和不宽容的伊斯兰理念。1982年艾尔沙德将军执掌国家权力之后又更进了一步,他比齐亚更为大量地使用伊斯兰教的象征和联系。对于来自世俗论者的广泛的抵抗——以及伊斯兰主义者的喝彩——他修改了宪法,禁止了国家世俗主义并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插图19.8)。[11]

1990年后,孟加拉国又恢复了选举体制,伊斯兰大会党的候选人参加了议会竞选,但却从未获得9%以上的选票。无论如何,伊斯兰大会党一直充当着许多人看做是孟加拉国政治中缓慢伊斯兰化的中心力量。其影响力在2001年获得很大的提升,那年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与之一起组成了一届联合政府。[12]



插图 19.8 “在政治中使用宗教是不可接受的！”1988 年，妇女组织抗议艾尔沙德政权宣布伊斯兰教为孟加拉国的国教。Rahnuma Ahmed/DRIK 摄。

伊斯兰激进主义

伊斯兰大会党被广泛认为与旨在孟加拉国发动塔利班式伊斯兰革命的地下激进主义者有联系。激进伊斯兰主义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他们首先在坚持性别差异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立场。神职人员开始用法特瓦(fatwa，伊斯兰教法裁决)来赦免对妇女的虐待行为。[13] 孟加拉国执掌法特瓦的神职人员的权力因其中一部分人要求处死女权主义作家塔斯里玛·纳斯林(Taslima Nasrin)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1993 年她出版了一部题为《耻辱》(*Lajjā*)的小说，内容是关于上一年孟加拉国的反印度教暴力活动——作为对阿约提亚城(Ayodhya，印度)的巴布瑞(Babri)清真寺遭到破坏的回应。孟加拉国政府禁止了这本小说；作者也不得不流亡海外。[14]

208

受到鼓励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现在又采取了孟加拉三角洲的古老传统——恐怖行动。在那之前，恐怖策略——利用引人注意的公开暴力事件渗透恐惧和动摇社会秩序——已经是激进改革政治家的保留项

目了。恐怖行动最早用于从殖民统治下争取自由(参见第八章)。[15] 20世纪早期的"孟加拉恐怖分子"像民族英雄一样生活在孟加拉国,并曾在1971年战争期间鼓舞了众多自由战士。独立之后,激进左翼组织也曾运用恐怖主义策略作为其试图在孟加拉国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工具。现在,这一政治工具被那些梦想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和那些反对世俗主义和非穆斯林的激进主义者所利用(参见"奥萨马的崇拜者俱乐部")。[16]

209

奥萨马的崇拜者俱乐部

以伊斯兰教名义发动的恐怖袭击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企图杀死著名的老年诗人沙姆苏尔·拉赫曼(Shamsur Rahman)的事件便是典型例子。1999年,孟加拉国哈尔卡特-乌尔-杰哈德-奥尔-伊斯拉米[Harkat-ul-Jihad-al-Islami,据说是受到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支持建立的一个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团体[17]]的成员在其公寓中用斧子对其进行袭击。他的妻子挡住了他们救了他。另一个例子是"拉姆纳爆炸案"。文化组织查哈亚诺特从1963年以来,每年都在达卡的拉姆纳地区举办露天音乐会庆祝孟加拉新年。2001年4月(孟加拉历法1408年新年),一个炸弹在节庆人群中引爆,45分钟后又发生了一次爆炸。这造成了9人死亡十几人受伤。几个月之后,纳拉扬甘杰阿瓦米联盟办公室的一次爆炸导致21人死亡和多人受伤。

这年晚些时候,纽约世贸大厦遭到袭击。本·拉登被认为策划了这次袭击,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臭名昭著。他却在孟加拉国伊斯兰主义极端分子当中成为英雄,他们将其视为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者(插图19.9)。与海外伊斯兰主义团体的联系进一步增加,据说伊斯兰圣战者(*jihādī*)在孟加拉国的营地接受训练,如东南部乌克希亚(Ukhia)附近。[18]

枪击、持刀伤人、炸弹爆炸和手榴弹袭击等变得更为频繁。有些袭击是完全不加选择的。2002年,在迈门辛四个人群聚集的影剧院里发生的一系列爆炸案至少造成了17人遇难和一百多人受伤。2005年,在遍及孟加拉国的50多个城市和乡镇中同时发生了三百多起爆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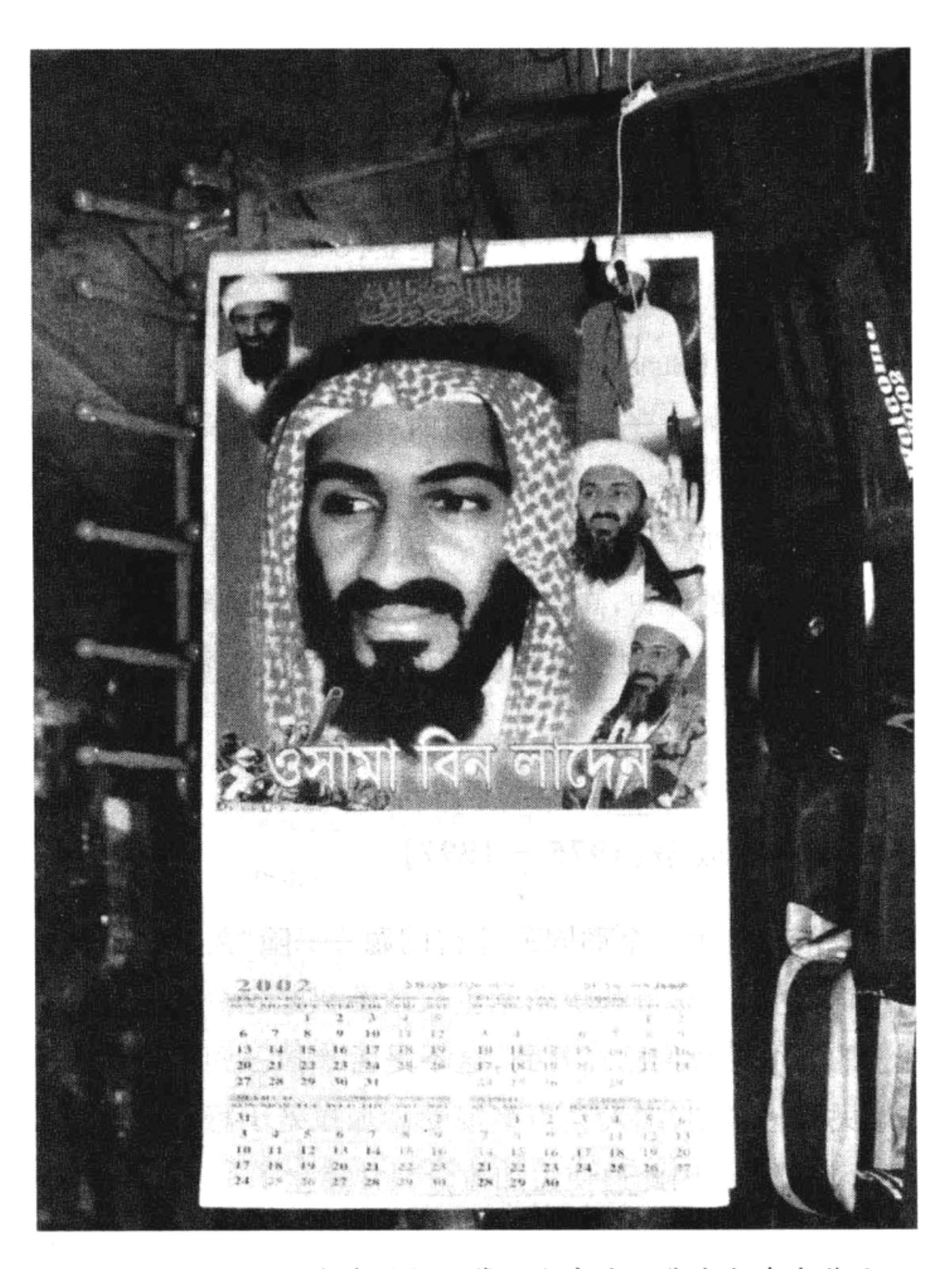


插图 19.9　2001 年在兰格马蒂一个商店里售卖印有奥萨马·本·拉登形象的日历。

另一些袭击则有着清晰的攻击目标。比如在 2003 年兴起的反艾哈迈迪派骚乱。艾哈迈迪派[Ahmadi(yyas)]是一个穆斯林派别，约有十万成员。伊斯兰主义激进分子恐吓艾哈迈迪派并要求政府宣布这一派别是非穆斯林。他们杀害了沙·阿拉姆(Shah Alam，杰索尔的一位布道者)，轰炸并点燃了艾哈迈迪派在诺多尔(Nator)和婆罗门巴里亚(Brahmanbaria)的清真寺。[19] 其他伊斯兰主义者的攻击目标则是印度教徒、基督徒和佛教徒。

这些人成立了一个组织,即孟加拉国印度教、佛教、基督教联合委员会(Bangladesh Hindu Buddhist Christian Unity Council),其保存着关于袭击和歧视的明细。[20] 圣战杀手也将各界名人如文学领域的胡马雍·阿扎德(Humayun Azad)、政治领域的沙·吉布里亚(Shah Kibria)和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人权领域的沙里阿尔·卡比尔(Shahriar Kabir)、学术领域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等作为暗杀对象。

210 伊斯兰主义恐怖分子能够使他们的行动几乎不受惩罚。尽管有大众、媒体和反对党政治家们普遍的激烈抗议,政府却反应缓慢,只逮捕了很少的嫌疑人,而予以起诉的则更少。在很多观察家看来,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伊斯兰大会党的保护,其直到 2006 年还是联合政府的参与者。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伊斯兰激进主义能够产生远远大过其相对较少的追随者的影响力与威慑力。

211

吉大港山区战争(1975 — 1997)

军事统治时代第三个顽固的遗留问题——除“孟加拉意识”和“孟加拉国意识”之间的斗争和伊斯兰主义政治兴起之外——是在协调区域自治上的无能。我们已经看到,这不是孟加拉三角洲历史上的新问题。在殖民时代末期,国大党拒绝接受孟加拉处于穆斯林联盟控制下的后殖民区域自治,因此迫使孟加拉分裂并建立了东巴基斯坦(参见第九章)。1947 年之后,巴基斯坦政权上层拒绝了东巴基斯坦自治运动的要求,因此在采取军事措施未能成功摧毁其之前,导致形式不断激化(参见第十二章)。真纳想维持某种联盟的状态,但却在领导独立的巴基斯坦时去世了。谢赫·穆吉布·拉赫曼在 1971 年 3 月军队镇压之前一直以为自己将是未来的巴基斯坦总理,但也在领导一个独立的孟加拉国时去世了。

在国家成立之后,孟加拉国内部的区域自治要求很快就浮出水面,却被置若罔闻。无论是狂欢的孟加拉民族主义,还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出现的更伊斯兰化的国家解释,都没有对那些不认同为孟加拉人

以及/或穆斯林的孟加拉国公民作出什么承诺。国家辩论首先忽略了这个国家许多土著团体的权利，其后又积极地试图使他们沉默。

一个从吉大港山区来的代表团在1972年约见了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他们的经历为之定下了基调。这个由一位议员率领的代表团希望向穆吉布提交一份备忘录以寻求保留1900年的《吉大港山区条例》所保护的自治，并请求限制非山区居民的流入。[21]穆吉布拒绝接受这份备忘录并立即予以驳回。那一年晚些时候，公布了第一部孟加拉国宪法，其中不再包含吉大港山区的特别条款：新的孟加拉国统治者拒绝接受从英国统治时期就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自治模式，而其今天仍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宪法中存在着。鉴于他们自身长期以来为自决所作的斗争，其对国家中少数民族文化的麻木简直令人震惊。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山区人民开始集体地自称为“朱玛”(Jumma，*jummā*)——表明他们与山区农业(*jhum*)关系的绰号[22]——并在1972年组成了一个政党：联合人民党(United People’s Party)或称JSS(Jono Shonghoti Shomiti)。　212

1975年的政变使联合人民党无法实现政党运作，并导致了吉大港山区受到印度(其反对齐亚政权)支持的叛乱活动。齐亚乌尔·拉赫曼认为他能利用军事力量来根除这一运动，但是这一政策却尤其适得其反。联合人民党的武装派别山提-巴希尼(*śānti bāhinī*，意为“和平力量”)打败了孟加拉国军队，其后全面的区域战争开始了(插图19.10)。吉大港山区变得极度军事化，当地居民也聚集到环绕着军队营地的“村落丛”中。政权仍然支持孟加拉移民进入山区，并为之提供运输、政府批地、配给、现金和武装保护。随着山提-巴希尼袭击军营和孟加拉人定居点，孟加拉国武装力量和武装定居者团体对朱玛村庄进行了报复性杀戮，导致了一系列的屠杀，并迫使数以万计的朱玛难民逃往印度。1986年，印度建立了六个难民营以收留那些拒绝回到孟加拉国的山区居民。　213
吉大港山区战争在艾尔沙德(1982－1990)和卡莉达·齐亚(1991－1996)时期一直持续着，但是当阿瓦米联盟政府于1996年再次执掌孟加拉国政权时，印度取消了对自治运动的支持，这为联合人民党和达卡政府之间的和谈打开了大门，双方在1997年签订了和平协议。协议确定吉大

港山区的行政管理仍旧不同于国家的其他地方，尽管这远没有满足自治主义者的要求。通过间接统治（三个首领或拉加的机构）的残留形式、当地赋税体系和土地权利以及地方议会等特殊代表制度，吉大港山区重获了一些区域特权——或者叫一条国内的政权边界（参见第三章）。[23]



插图 19.10 与孟加拉国武装力量作战。吉大港山区的山提-巴希尼游击队队员在丛林隐匿处摆姿势拍照，1986 年。承蒙 Organising Committe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Compaign 提供。

然而，尽管签订了协议，和平却并没有回到这个地区。前些年的那些屠杀和绑架仍然没有受到调查，且未受惩罚（参见“克尔普纳·查克玛”），那些反对和平协议的前联合人民党成员继续战斗，现在称为联合人民民主阵线（UPDF，United People's Democratic Front）。此外，后续的孟加拉国政府未能成功地施行最重要的协议条款。其中包括所有返回难民和国内无家可归者的再安置，恢复战争期间从山区人民手中充公的土地，从吉大港山区撤出编外军营以及将权力转交到当地行政机构手中。结果，吉大港山区（现在分为三个区）成为孟加拉国唯一处于严密军事控制的地区，虽然孟加拉国其他地区早已恢复了平民统治。朱玛民族主义继续面临着在全国范围内争论民族自我（national selfhood）的艰巨的区域性挑战。

克尔普纳·查克玛(Kolpona Chakma)

克尔普纳·查克玛是一位年轻且充满活力的妇女权利活动者。作为山区妇女联盟(Hill Women's Federation)的组织秘书,她公开批评孟加拉国武装力量成员对朱玛妇女的骚扰(插图 19.11)。1996 年 6 月,孟加拉国举行了议会选举,克尔普纳被游说成为受到联合人民党支持的独立参选人。

214



插图 19.11　克尔普纳·查克玛在科格拉焦里(Khagrachhari)进行公开讲演,1995 年。承蒙 Organising Committe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Compaign 提供。

在票箱打开的前一天晚上,她被惊醒了。一群陌生人闯入了她在吉大港山区北部拉亚格胡纳(Lallyaghona)村的家中。他们进入房中,用手电强光照着这个正在睡觉的家庭,带走了克尔普纳和她的两个兄弟。这些绑架者后来被证实为附近军营的指挥官费尔多斯(Ferdous)中尉和几个便衣探员。此前,克尔普纳曾就一些来自他军营的士兵打伤朱玛平民并烧毁了其房子一事与费尔多斯进行过争论。

这些人将三个俘虏蒙上了眼睛并紧紧地绑住他们。她的兄弟在绑架者准备向他们开火时跳入水中得以逃生。克尔普纳尖叫道:“兄弟,兄弟,救我!”

次日清晨,她的兄弟和其他人来到当地的军营和警察局,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军队开始拙劣地制造虚假信息。很快这次绑架便成为全国性的话题。孟加拉国的妇女组织和人权战士开始了行动,举行示威,并向内政部长请愿,指明对朱玛妇女的绑架和强奸以前就曾发生过。这一案件也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联合国妇女暴力专员与孟加拉国政府进行了接触,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呼吁进行公正的调查且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24]但是克尔普纳从此再没有出现,该案件仍悬而未决。

---

215 这样的争斗在一个小范围上发生在整个孟加拉国的土著团体中,尤其是 2001 年他们组建了孟加拉国土著人民论坛(Bangladesh Indigenous People's Forum),并开始了在国内、国际上反对歧视和政权敌意以及寻求宪法认可的斗争。他们抵抗政府的一个焦点问题是政府决定宣布毛德胡普尔(Modhupur,位于孟加拉国中部)和毛尔维巴扎尔(Moulvibazar,位于孟加拉国东部)为"国家生态公园",却没有为当地土著人民的权利做任何考虑。

孟加拉国政治体系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来,三种国家理念——孟加拉的、孟加拉国的和穆斯林的——以及两种政府模式——专制和民主——便统领着孟加拉国的政治生活。它们之间的紧张导致了无论在军人还是平民统治时期,国内政党之间多变、有时甚至反复无常的联盟。它们同样也影响着孟加拉国政治体系中兴盛的领导风格。无论是政党还是军事统治者掌权,领导阶层的基本特征是一致的。其通常是高度个人化的,"基于世袭的权威和忠诚,并通过一种复杂的、非正式的庇护关系网络所维持"。[25]结果形成了一幅充满了高度自我之间的激烈竞争的政治图景,通常以秘密协商或如大众示威、普遍罢工和警方指控等公开的方式来展现。[26]这些使许多孟加拉国人民产生了国家缺乏保卫和指导的痛苦感。许多人感到,政治家们不顾一切地赌光了 1971 年战争后提供给他们的大量机会。

纪念解放战争

1971 年战争始终处于孟加拉国政治体系的中心地位,因为国内的

主要政治团体试图通过提及此次战争使自己获得合法性。这些团体如何记忆(或遗忘)这次战争与他们今天的权力争夺直接相关。1975 至 1996 年间,历任政府都阻止将此次战争作为鲜活和可讨论质疑的经历来看待,而是选择以国家典礼的盛况和氛围来纪念。自由战士的牺牲者在阿瓦米联盟统治时期一直到 1975 年都受到赞颂,其后便逐渐不受重视,政府对自由战士们所需的资助也停止了(插图 19.12)。 216



插图 19.12 “先生,您不认识我了吗?您是我的司令啊,我是个自由战士。”漫画(1981 年)批评那些政治精英对那些曾在十年前为国家独立而冒生命危险的人们的做法。出自 *Doinik Ittefaq* (3 April 1981)。承蒙 Rajshahi University Library 提供。

然而,被遗忘的自由战士的困境,偶尔在反对党一方试图以其来争取民众的支持时也会显现出来。插图 19.13 就是一个例子。这幅海报基于战时英雄战士的形象,其邀请民众加入一个 1994 年在达卡的中心草地上举办的“与游击队和自由战士的特别的重聚和集会”,是由一个左翼党派的学生团体组织的。

217



插图 19.13 “尊重解放战争的理念。”海报,1994 年。承蒙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提供。

有时并非政治党派而是其他团体能够影响公众对战争的看法。比如,1992 年一个由贾哈纳拉·伊玛姆(Jahanara Imam)领导的“支持解放”的激进分子团体组建了尼姆尔委员会[Nirmul Committee,或称彻底铲除 1971 年卖国贼和通敌者委员会(Committee for Uprooting of Traitors and Collaborators of 1971)]。他们成立了“人民法庭”(Gono Adalot),对伊斯兰大会党的领袖做出人民的裁决,指控他们犯有战争罪和通敌罪(插图 19.14)。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试图使已经停滞下来的对战争罪犯的控告回到政治议程上来。政府则以指控人民法庭的组织者犯有叛国罪为回

应。无论如何，尼姆尔委员会存在了下来，并成为孟加拉国世俗力量和反原教旨主义力量的一个重要集结点。[27]这一时期另一塑造 1971 年战争公共看法的重要力量是一部名为《自由之歌》(*muktir gān*)的纪录片，其在 1995 年上映。其续集《自由的话语》(*muktir kathā*)引起了关于告知战后一代许多战争未知方面的必要性的公开讨论。1996 年，经历了 21 年的中断之后，阿瓦米联盟再次成为孟加拉国政治体系中的支配性力量。公众对解放战争和该党在其中角色的关注度急剧上升——这种关注在阿瓦米联盟 2001 年交权给反对党之后又明显减退了。

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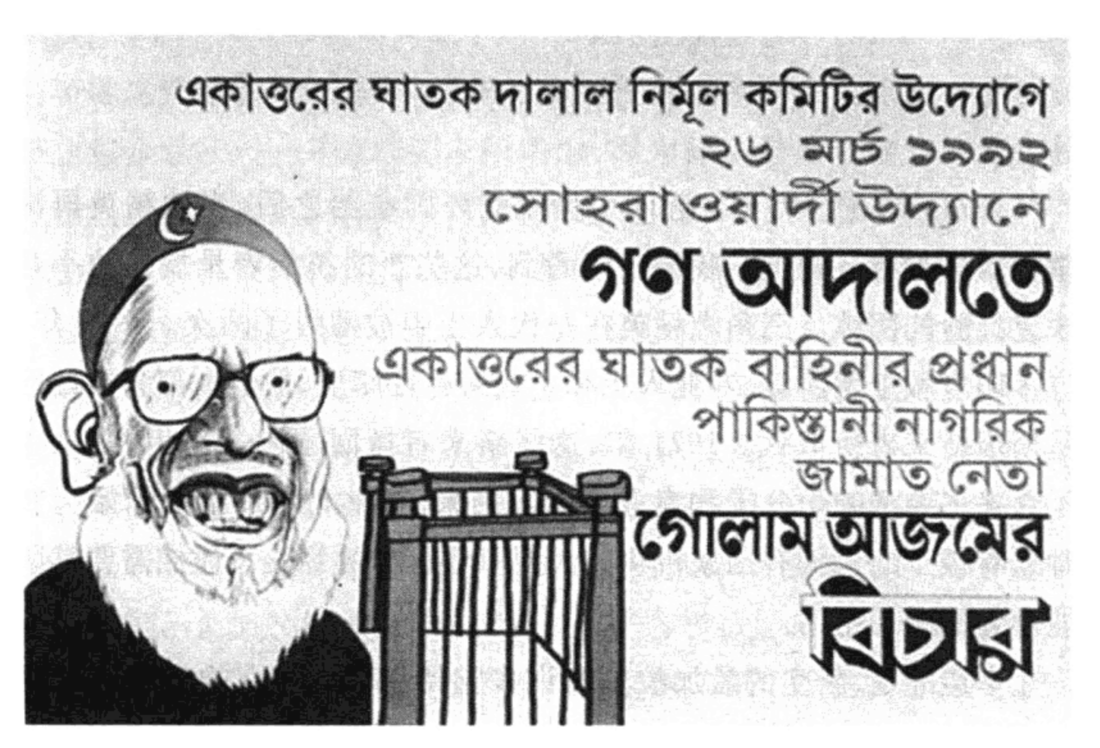


插图 19.14　尼姆尔委员会的海报宣布将于 1992 年 3 月 26 日对格拉姆·阿扎姆(Golam Azam，1971 年敢死队的首领，巴基斯坦公民和伊斯兰大会堂领导)进行审判。

当孟加拉国在 1971 年建立时，许多观察家都怀疑其是否能够存在下去。但是，独立的孟加拉国并未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相反，从不稳定的开端经过许多挫折变幻，这个国家成长起来，且对孟加拉三角洲的控制正在加强。其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可以显著抵抗危机的政治体系，政府为公民服务的能力也在增强。然而，其稳定性并非完全只靠国内。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所看到的，国际支援对这个年轻的国家而言是相当关键的。

219

第二十章 跨国联系

1971年,在经历了将近四个世纪的外国统治之后,当地精英再次掌控了孟加拉三角洲。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新的统治者是规模较小且缺乏经验的团体。三角洲精英在一代人当中被摧毁了两次。1947年,许多印度教上层阶级、专业人士和企业家逃往印度,他们大部分被西巴基斯坦新来者所取代。1971年,这些新来者撤回了巴基斯坦,并杀害了众多三角洲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结果,独立的孟加拉国开始运转时只有极少的人拥有国家机构或大型事业运作的经验。他们需要其所能得到的一切帮助。

幸运的是,新生的孟加拉国有许多支持者。其独立的促成者印度和苏联都急于向其输送援助,并且,恢复整个战争创伤的紧急支援从世界各地涌向孟加拉国。达卡现在作为国家首都点缀着一些大使馆。三角洲的精英们突然要在全球舞台上演出了。结果,孟加拉国社会迅速发展出了一种新的跨国联系,这将塑造其未来的道路。其中,外国的援助和投资、大量移民以及在连通性上的巨大进步尤其具有影响。

外国援助

正如我们在第十四章所看到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孟加拉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是由外国援助所支持的,而非动员内部资源。巴基

斯坦的政权精英越发对外国援助产生了依赖,并允许外国捐赠者制订发展的重点。其后便是将赌注压在强势一方的政策,自以为好处将会流向更贫穷的人们和经济的薄弱环节。这些政策后来证明是对孟加拉三角洲极为不利的,并促成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震动整个地区的政治危机。三角洲的自治运动被一种希望所激励,亦即认为通过自治可以使当地经济分享到更多的对巴基斯坦的海外援助。

220

真正独立之后,孟加拉国接手了一个穷困、饱受战争摧残和大部分为乡村的经济体。9/10的孟加拉国人在乡村生活。8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以每天消耗低于2 150卡路里为标准),因此国内几乎没有资源生产的能力。此外,那些能真正提供剩余产品的人们——大农场主和企业家——并未被国家所考虑,因为他们是主要的支持者和投票中坚。这个政治实体排斥对乡村社会进行一次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为印度所害怕(因为这将会产生跨境难民)而为左翼团体所鼓吹。

孟加拉国领导们急于在全球同情该国的氛围中兑现各种援助就不足为奇了。援助比以往都来得容易。全世界许多人们都认为国际社会有责任帮助遭受战争破坏的孟加拉国重新恢复起来。此外,"统治的力量也将援助视为恢复他们由于此前支持巴基斯坦统治精英而在孟加拉国民众中减弱了的信誉"。[1]最后,冷战思维也使来自西方的援助成为确保孟加拉国不会加入共产主义阵营的工具。各种援助项目以跳跃性增长,孟加拉国成为一个著名的以援助推动发展的实例。[2]就在战前,对东巴基斯坦的外国援助相当于每个居民4美元。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翻了三番,并在军事统治时期继续上升,直到1990年达到所有时期最高峰的人均20美元。从那之后,这一数字逐渐下降到10美元。[3]

外国援助对三角洲的经济恢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捐助者也以此为工具诱导1975年后的政府实现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化。[4]社会和政治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而深远的。数千名外派人员——顾问、志愿者、援助管理人、外交官和技术支持人员——蜂拥至孟加拉国。他们的任务是指导、建议和引导新政权精英,以使援助的资金和帮助用于恢复孟加拉三角洲社会。他们是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商业集团和志愿者组织

221 的当地代表。从幻想的热情到强硬的推销,从地缘政治的调遣部署到无私的善行,许多不同的利益联合在一起,由于为其所控制的大量的金钱所支持,这些外来者就成为一种令人敬畏的存在。[5]

如果说 20 世纪 60 年代的巴基斯坦精英已经是惯于依赖援助,那更穷的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孟加拉国精英们则更是对援助上瘾。事实上,正是这个被支援起来的政权,使他们得以出现、稳定和维持自身(插图 20.1)。许多人在援助建立的官方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发展项目中找到了工作。援助捐助的学校、诊所和基础设施工程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许多人通过挪用援助款而致富。这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动员内部资源的必要性,孟加拉国精英越发依赖于跨国的合作者而非孟加拉国公民。他们在达卡附近创建了一个时髦的社区与外国人群共享。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援助政权大力发展军事和不民主的机构——援助额在军事统治之下持续增长。



插图 20.1 孟加拉国官员正在接受一袋袋的金钱(标注着“英镑”、“美元”、“日元”、“里亚尔”和“借款”),同时又举着一块牌子写着“我们必须自力更生!”纳兹鲁尔(Nazrul)所绘漫画,出自 *Robber* (July 1979)。承蒙 Rajshahi University Library 提供。

非政府组织的增长

外国援助同时也在三角洲地区创造了新的组织形式:“非政府组织”或者称为 NGO。孟加拉国政府处理援助资金的能力有限,国际资

助者经常认为他们的资金通过私人组织来运作能够被使用得更为节俭、更为迅速、更为有效和更具创造性。于是，非政府组织就作为实施各种“发展政策”的首要渠道出现了。[6]整个社会很快就充斥着数千个援助支持的非政府组织，从管理社区发展计划的家庭式企业到具有国内(国际)雄心的大型企业。有些是作为政权的延伸，而另一些则是对抗政权的——这使得有些组织看起来更像是国家内部的小集团。BRAC便是其中之一。它是从一个小型捐助基金救济组织，1972年在苏拉(Sulla，锡尔赫特区)建立的孟加拉国乡村促进委员会(Bangladesh Rural Advancement Committee)发展而来的。现在，其描述自己为一个独立、实质上自筹资金致力于人类发展的范例。其雇员人数为97 192人，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以救济贫困和赋予穷人权利为双重目标。通过在实践经验中学习，BRAC今天已经提供和保护了大约一亿孟加拉国人民的生活……BRAC的服务范围遍及全国所有的64个行政区并且……还呼吁帮助包括阿富汗和斯里兰卡在内的一系列国家。[7] 222

多年来，BRAC已经成为一个超大型公司，其活动促成了多个国家卫生计划、许多高级工艺品商店、一家茶叶公司、一家银行、一所大学、互联网服务以及一个投诉办公室等各种不同领域的项目。

另一起源于一个当地项目并发展成为国际运动的非政府组织则是格莱明银行(Grameen Bank；*grāmīn*，意为“乡村”)。其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是作为一个在吉大港附近的一些村庄中进行信贷投放的创新研究项目成立的，后来在1983年成为一家独立银行。其专门为挑战传统银行实践而设计，格莱明银行在没有担保或正式协议的情况下向一些贫穷妇女团体借贷少量资金。这一被称为“微型贷款”(microcredit)的方式被证明相当富有成效。从1995年开始，银行便不再利用捐赠基金。2007年，格莱明银行已经借贷出60亿资金，在孟加拉国有超过700万借贷者——几乎全是妇女——并且几乎覆盖了全国90%的乡村。和BRAC一样，它也成为具有从国内主要的手机厂到纺织厂若干分支的强大公司。[8]在孟加拉国已经取得的成就之上，微型贷款(或小额信贷)计划在全世界的许多国家中建立起来。2006年，格莱明银行及其创始人穆罕 223

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还有许多其他方式使当地民众投入到发展进程中。孟加拉国人民参与到了关于国外援助流入正反两方面影响、这些资金应如何利用,以及各种发展计划如何才能真正促进国家福利的激烈讨论中。在一些情况下,他们阻止那些被认为是有害的或欠考虑的发展项目实施。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全国范围内的反对洪水行动计划(Flood Action Plan)。在1988年灾难性大洪水之后(参见第一章),捐赠者提议修建庞大的工程建筑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洪水问题。作为回应,孟加拉国和海外都召开了若干会议来挑战那些支撑这一计划的假设:控制洪水是否是有价值的,在三角洲主要河流上建造可持续使用的堤防是否是可行的,以及如此大型的干预是否可以在与涉及的人民相脱离且没有意识到环境代价的情况下进行计划。在这些活动中发展出来的理念聚焦在防洪措施而非洪水控制上,更重视人民在计划过程中的参与、改进排水系统的疏浚、区域性的解决方案而非一个国家性的统筹计划和环境评估上。其中的一些观点融入了孟加拉国的官方政策中。最初计划的大规模工程也从未实施过。[9]

与外国援助相比,外国公司的投资在孟加拉国经济中的作用仍旧是平庸的。孟加拉国因其廉价且丰富的劳动力而极具吸引力,从齐亚乌尔·拉赫曼政权(1975－1981)开始就大力吸引投资。但因其反复多变的政局、透明度的缺乏和不稳固的基础设施使其对投资者而言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外国直接投资(在能源、纺织、制药以及移动电话领域)不足外国援助的一半。

外国援助在塑造1971年后的孟加拉国社会方面具有相当重大的贡献。它使新的举措得以成功,给初生的国家带来了稳定性并为新的一代人带来了未曾预料的机会。其通过提供更好的使人们免于自然危害的保护、更多的卫生保健条件、更安全的饮用水、新的就业机会、更高的生产率、更好的学校教育、广泛改进的基础设施(参见“三角洲上架桥”)和许多其他益处,明显提高了数百万孟加拉国人的生活质量。

224

到20世纪90年代,原先作为变化的发电中枢的国外援助的重要性开始减退了,因为其他的财富资源现在也可以获得了。其中有些是

在国内形成的——通过公司形式的非政府组织或政府形式;但是一种主要的新资源是跨国界的——移民的汇款。

三角洲上架桥

孟加拉国最著名的工程功绩之一是巨大的贾木纳大桥。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深思熟虑和计算,这座4.8公里长的大桥在大量的国际支援之下最终建成了。大多数资金由日本政府、亚洲发展银行和国际开发署提供——孟加拉国政府负担了1/3的费用。施工人员中有韩国工程师和许多分包商,还包括成千上万名孟加拉国工人。这座大桥以铁路和公路相连为特色,同时还附有通讯电缆和天然气管道(插图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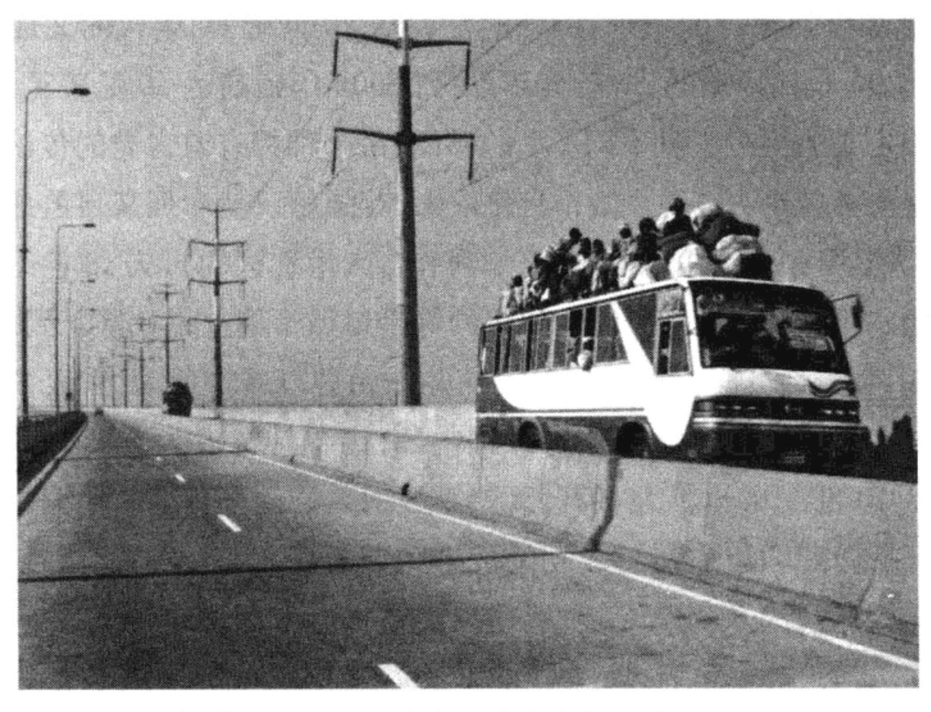


插图20.2 公交车穿过贾木纳大桥,2003年。

这座大桥横跨危险而广阔的贾木纳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其在1988年开通,并从此成为孟加拉国人的骄傲。现在,孟加拉国北部地区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与该国其他地区相通的陆路通道。在大桥开通之前,孟加拉国中部和北部之间的旅行者不得不通过渡船渡过贾木纳河。这座大桥减少了旅行2/3的时间,并为三角洲北部居民打开了新的生产和劳动力市场。 225

移民

对于孟加拉三角洲而言，国际移民并非什么新鲜事物，这一地区在数千年里一直像是人口高度流动的十字路口。孟加拉的城市常常是世界性中心，海外的孟加拉人社区也早已建立，比如在苏门答腊岛北部(参见第四章)。在第三章中我们已经看到，19世纪时耕地边界已经随着去往阿萨姆和缅甸的稳定的移民潮，果断地超越了三角洲地区。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从三角洲向外移民的重要性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移民向国内的汇款迅速增长，很快就形成了对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持。官方数字——其只表明了真实数字的一小部分——表明了这种趋势：根据孟加拉国银行的记录，国外的汇款从20世纪80年代的2亿美元飙升到90年代早期的10亿美元，而到2006年则高达50亿美元。[10]

有必要去区分三种不同类型的移民，每一种都有着古老的传统。第一种是海外劳动力移民。数个世纪以来，英国船只就雇佣来自孟加拉的船员(尤其是来自锡尔赫特、诺阿卡利和吉大港地区的)，从18世纪开始滞留的水手(*laśkar*)就在伦敦和纽约等港口城市建立了社区。到20世纪中期，英国经济面临着劳动力短缺并开始进口廉价劳动力，大多数来自南亚和加勒比地区。在孟加拉国内部，锡尔赫特成为首要的输出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就有数千人前往全英国各处工业城镇的工厂里做工。他们带着成功的故事荣归故里，因此推动了更多的移民。然而，随着英国收紧移民法，使来去变得更为困难，锡尔赫特的劳动力就在英国永久定居下来。今天英国的大部分孟加拉人中，锡尔赫特出身的占绝大多数。[11]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富含石油的西亚国家的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并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一些相似类型的劳动力移民也发展起来。这种移民部分是由国家组织的，涉及全孟加拉国数百万低技术劳工。他们多是短期合同工，主要输往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阿曼、利比亚和(直到1990年)伊拉克。其后，孟加拉国劳工团体也将工人输往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韩国(插图20.3)。[12]这些劳动力移民中的许多人在其和约期满之后想要留下或去往另一个目的地，

226



插图 20.3 孟加拉国合同工抵达吉隆坡机场,2007 年。

便加入一个全球非正式劳工互助会。[13]

227 第二种类型的移民是基于三角洲中等阶层的家庭让他们的孩子在重要学术中心接受教育的传统。在英国时期,这些中心意味着达卡、加尔各答或英国;在巴基斯坦时期,意味着达卡、西巴基斯坦、英国或美国。在孟加拉国最初的几年里,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将其子女送到海外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国家精英阶层经历了一种转变。其现在是更庞大、更富裕和更具有自信和世界性的。海外高等教育不仅成为一种可能,并且成为一种令人垂涎的身份象征。现在达卡大学——他们父母那一代人曾颂扬其为“东方的牛津”——对于他们的孩子而言已经不够好了。受富裕国家中产阶级富裕而幸福的传媒形象影响的年轻人,渴望一种摆脱孟加拉国限制的生活。随着定居海外机会的放开,境况较好的家庭将其成员送到各个大陆上,足迹遍布北美、澳大利亚、欧洲和海湾等各地。这些移民成员往往在世界上最富裕的经济体中谋得了体面的工作,并且继续珍惜着他们的孟加拉之根(插图 20.4)。[14] 他们能给家乡提供大量的资金。这可以使其在孟加拉国的亲属从对外国援助的过度依赖中摆脱出来。

第三种类型的移民则完全在另一个对立面上。它涉及孟加拉国最

大且最穷的团体。离开孟加拉国最简便的方式便是穿过边境到印度去，甚至常常是步行，然后在那里成为非法移民。跨境移民网络在边境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在 1947 年分治之前，就有无数的孟加拉定居者和工人移民到了阿萨姆、特里普拉和阿拉干——并且 1947 年之后也有许多三角洲的难民定居在印度。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孟加拉人从 1971 年 3 月 25 日（两个国家决定孟加拉国将不再对这个日期之前的非法移民定居者负责）之后未经许可就迁往了印度，但数字一定相当巨大。在他们当中有逃离歧视和压迫的家族、环境难民、政治流亡者、被拐卖的妇女和儿童以及寻求得体生活的赤贫者。[15] 在印度他们受到了不同的待遇。许多雇主和政治家欢迎这些廉价劳动力和选票，但是激烈的反移民运动也在发展，尤其是在印度的东北部和印度教原教旨主

228

插图 20.4 “搭建起传统与海外新一代之间的桥梁。”宣传北美孟加拉国人社团联盟年会的海报，2007 年。出自 www.fobana2007ks.com。

义党派的支持者当中。2003年印度政府宣布有令人惊愕的2 000万孟加拉国人非法居住在印度(参见“努里回来”)。虽然这些移民中的多数都极端贫困,他们的整体人数也使得其汇回家乡的款项相当可观。 229

努里回来

努里(Noori)仅仅是移居到印度的数百万穷困的孟加拉国人之一,与她的丈夫和五个孩子一起生活在德里的贫民窟。作为一个非法移民,她的生活非常艰难。警察会定期组织驱逐行动,有嫌疑的孟加拉国人将会被带到边境“推回”孟加拉国领土。有时候,你可以通过向警察行贿使其放了你。努里曾七次被驱逐到印度-孟加拉国边境。每一次她都成功地回来了。

正如她于1998年在德里对一位研究者所说的:“他们驱逐了我很多次。但是每一次他们在边境离开我时,我会在一会儿后再回来。即使警察 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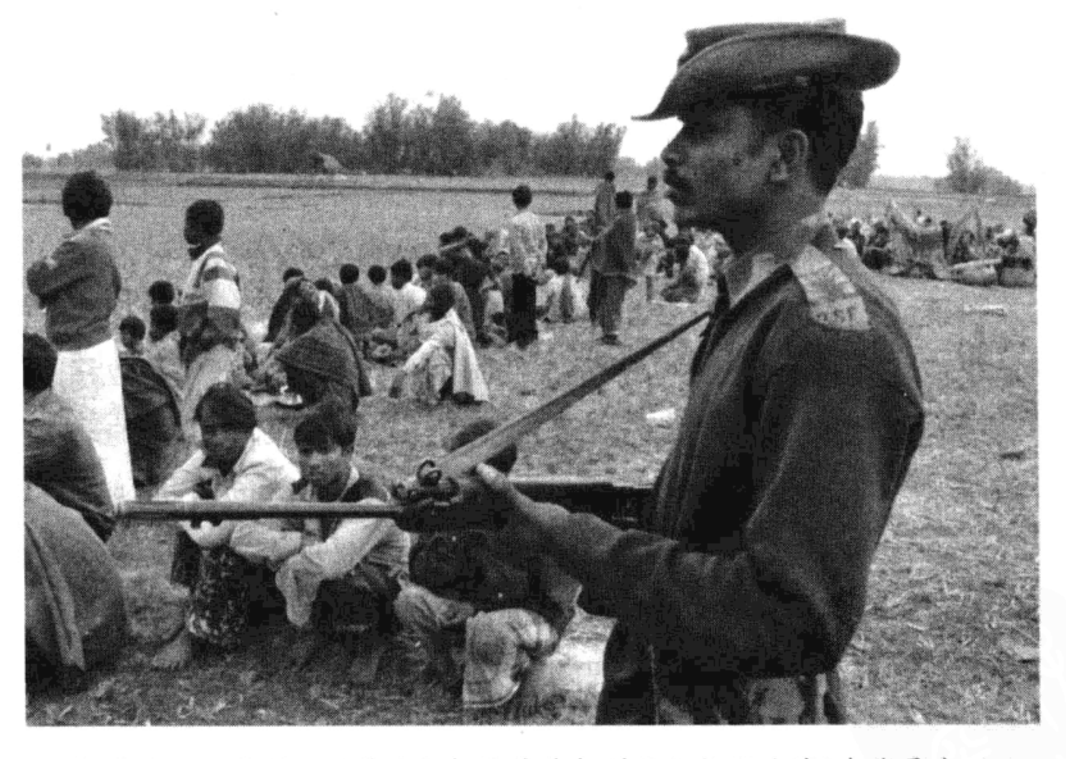


插图20.5 被驱逐的移民与想要将其赶到孟加拉国边境(在背景中可以看到)一边的印度边境守卫。孟加拉国边境守卫拒绝这些被驱逐者进入,迫使数百人在两个国家之间的无人区宿营。拉莫尼尔哈特/库奇-比哈尔(Lalmonirhat/Cooch Behar)边境,2003年。Shib Shankar Chatterjee 摄。

非常震惊。他们说:'那是阿提亚的妈妈。她又回来了。我们上个礼拜不是已经驱逐她了吗?'在他们两次驱逐我之后,我明白地告诉他们:'我不会贿赂你们的,但我会再回来。你就等着看吧。我就这样做了!'"[16]

孟加拉国拒绝接受被印度驱逐回来的人,认为印度无法证明他们确实是孟加拉国公民,因此这些不幸的移民被两个国家所追捕,一个不允许他们在自己的领土上谋生,另一个则否认他们的公民身份(插图20.5)。[17]

三种类型的移民——海外劳动力移民、中等阶层的教育和工作移民以及去往印度的非法劳动力移民——成为三角洲经济重要的财富资源,这是因为在孟加拉人中存在着强烈的亲属观念。[18]去国外经常不是一个人的决定,而是家庭作出的决定,或者是其中最有权威的成员作出的决定,其主要根据就是谁能够挣最多的钱并寄钱回来。因此,汇款就成为亲属纽带强度的物质体现,也意味着他们的跨国责任。可以预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孟加拉人去海外谋生,汇款也会增多。然而,我们也同样能预期,随着移民者变老,汇款也会随之停滞或逐渐减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国外出生的孩子对其在孟加拉国的亲属不再有父辈那种忠诚了。

21世纪初期,官方记录表明向孟加拉国的汇款总额是对孟加拉国的外国援助的4倍还多,接近每人40美元。这些数字并未包括那些移民经非官方渠道或绕过银行系统汇回国内的大量钱款。大多数移民倾向于更为可靠、便宜和快捷的货币转账系统,即通过那些信任的非正式货币兑换商。这一系统——被称为浑迪(hundi)或哈瓦拉(hawala)——出现在现代银行业之前,但其在数百万孟加拉人成为跨国移民之后经历了一次强有力的复苏。如果我们加上这些国家未见到的非正式汇款,很明显移民就成为孟加拉国主要的捐助者。孟加拉国经济现在成了汇款依赖而非援助依赖。

231

连通性

外国援助和移民锻造了强有力的跨国联系,但是没有什么比通讯

方式上的进步更能展现变化的高速。三角洲在这方面受到了长期的忽视。比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经常会有一个高级官员拿起他办公桌上若干涂着鲜亮颜色的电话中的一个,用最大的声音叫喊以试图在静电干扰声和串线谈话中,使与他同在一个城市的下属听清楚他的话。30 年后,见到一位不识字的乡村妇女从她没有电的小屋里走到邻居家,拨通移动电话与在迪拜的儿子安静地通话,也是再平常不过了。一代人的时间里,孟加拉三角洲的信息传递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大多数孟加拉人依靠口传、报纸、信件、电报和广播。一个非本地的电话需要几个小时才能接通,电视则连中层阶级家庭都未曾见过。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他们开始接触到电视并逐渐扩展到乡村地区,其后便是移动电话和各种便携式电子设备。即使现在电力仍未能通到许多乡村地区——到 2000 年只有不到 1/3 的乡村地区通了电——但是城镇与城镇联结了起来,且有关外部世界的信息传递与以前相比更为快速。今天,孟加拉国的中等阶层也成为全球网络空间的积极参与者:现在网络上可获取许多孟加拉语资源,孟加拉国的网站和讨论小组也在迅速地增长。

独立的孟加拉国锻造跨国联系的速度是惊人的。很显然,认为当代的孟加拉国社会局限于其空间国界之内是错误的。所有的孟加拉国公民——无论来自城市还是乡村、工人阶级还是中等阶层——现在过着一种超越他们领土范围的生活。全世界各地都有孟加拉国人群体,他们与其返乡的同胞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作为新观念和财富的中转者,他们对充满孟加拉三角洲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新鲜活力起到了促进作用。

232

第二十一章　拥挤不堪

独立之后的孟加拉三角洲经历了新的经济活力、兴旺的人口增长和空前的城市化。人类对环境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现在一场惊人的竞赛正在上演：三角洲将驶往繁荣还是走向破产？

城镇在孟加拉三角洲并不新鲜，城市中心可以追溯到2 000年前。即使如此，大多数人口还是一直居住在乡村。之于最近的历史来说也是如此。1970 年，超过 90%的孟加拉国人居住在乡村地区，今天也有75%的孟加拉国人仍旧如此。与此同时，孟加拉国的人口却翻番了，因此当今乡村的拥挤程度比从前更为严重。

许多孟加拉国人决定到城里试试运气，并且这群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并不令人意外。孟加拉国刚刚建立时，新首都达卡约有100 万居民，到 1990 年则拥有 600 万居民，2007 年则是 1 400 万。如此快的增长速度使其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每年至少有 30 万孟加拉国最穷的人移居到达卡——并且预计到 2025 年这座城市的人口将达到 2 400 万。到那时，它将成为世界上真正的特大城市之一。而且，并非只有达卡如此。其他的城市也在迅速增长：吉大港在 1971 年时拥有 80 万人口，而在 2007 年时则成了 400 万。

人口的增长成为塑造 20 世纪孟加拉国社会的一个主要因素，并且，如果可以相信一些预见的话，它将会继续影响到 21 世纪。最近估

计的数据是,到 2050 年孟加拉国人口将达到 2.5 亿,是 1970 年人口数量的 3 倍还多,比今天生活在孟加拉国的人口还多 1 亿。考虑到如此持续的增长对任何国家都是一种压力,孟加拉国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1]其取得的许多进步出人意料。1971 年,孟加拉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 44 岁;今天的预期寿命是 63 岁。婴儿和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有所下降,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总生育率减半了。[2]同样值得注意的事实是,食物生产的增长速率高于人口增长。成人的识字率从 1974 年的 26%上升到今天的 40%。到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孟加拉国的经济增长每年都在 2%以下,其后便开始加速,到 2006 年增长率已经达到了 6%。要做到这些绝非易事。大量的进步都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发生的。

233

即使如此,孟加拉国社会仍旧陷入穷困之中。虽然贫困远非毫无发展的停滞,也有许多方式使穷人提高自身地位,但仍有 4/5 的人口生活在每天 2 美元的标准之下,且 1/3 的人口每天的消耗少于 1 美元。[3]半数人口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之下。从绝对数字上看,贫穷正在可怕地蔓延。结果是,现在孟加拉三角洲的穷人比以前多得多。事实上,今天三角洲贫困人口的数量比 1974 年的全国总人口还多。

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几乎 2/3 的孟加拉国人从事农业工作。毫无疑问,农业发展很有活力,从孟加拉国独立以来其投入和产量都有显著提升。[4]然而,这个领域的产量仍相对较低,大约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5。

水稻丰产

水稻仍然是三角洲农业的中流砥柱,提供了 80%的农业出口额和孟加拉国人均摄入卡路里的 70%——比任何其他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都要高。

在数代人里,水稻生产者都没有能力对水稻生产技术的提高进行投资,他们仍主要依赖木犁、营养不良的公牛、当地的种子和肥料以及更多的耕作(插图 21.1)来进行生产。他们希望通过开垦更多的新土

地来增加生产量，但是随着殖民时代耕地边界的关闭，这一策略走到了尽头。耕作者通过复种农业、加强耕作和减少收割后的损失等方式，来推动每个土地单元的产出量。他们也减少自身的消费，并通过做雇佣劳工和小本生意使他们的收入来源多样化。[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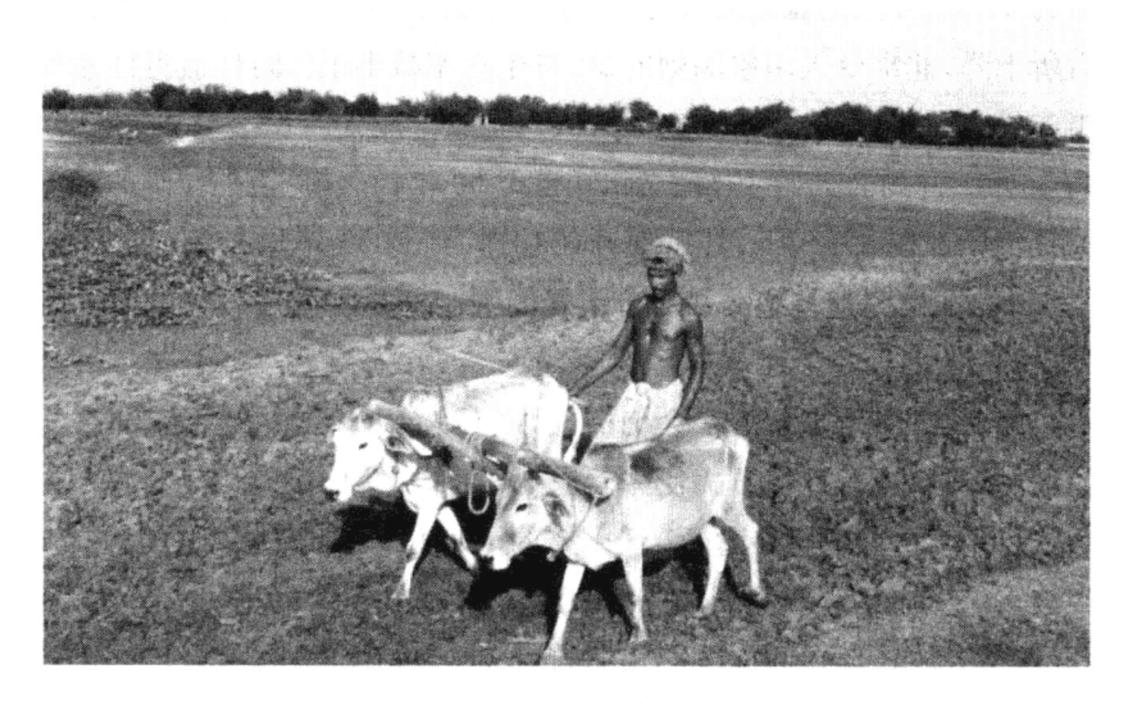


插图 21.1 耕地，达卡，1981 年。

在巴基斯坦时期，尽管土地持有量很少且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也非常有限，三角洲的耕种者还是将稻米每公顷的净产量从 900 公斤提升到了 1 100 公斤。孟加拉国时期更出现了非常显著的进步。稻米产量迅速增长，主要是国家和国际机构在农业上齐心协力投资的结果。这些投资产生了两个主要影响。

234

首先是冬播作物的扩展。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冬稻只能在一些低洼地区或有灌溉系统的地区种植，因为冬季降雨很少。这里有用木桶和转轮从河流、池塘中取水的古老传统，随着发动机驱动水泵的使用，这种方式变得更为高效。此外，在整个三角洲安置管井也能够从深层地下水中获取灌溉用水。现在，灌溉冬稻(*boro*)开始迅速扩展并很快占了孟加拉国水稻总产量的一半。

其次，引入高产量水稻品种以代替当地品种，提高了所有三个季节

的产量——秋稻(*āman*)、冬稻(*boro*)和夏稻(*āuś*)。这些品种要求增加化肥和农药的使用。这两个因素的介入——连同进一步的耕地轮作(无数小土地所有者甚至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到水稻生产上)——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推动水稻产量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每公顷2 000公斤,到2005年达则到每公顷2 400公斤。虽然从世界标准来看这仍然很低,但是三角洲地区每一单位土地上的产量几乎是20世纪中期的3倍。由于更高的产量和冬季水稻种植的扩展,孟加拉国的年水稻产量从20世纪70年代的约1 200万吨上升到2000年的2 300万吨(这是该国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粮食剩余)。

235

这实际上是一项非常伟大的成就。然而,许多观察家们仍视其仅为一种"绿色革命"技术的暂时利益,对其后几年里的自给自足并没有真正保障。要实现水稻产量的后续增长,必然要应对资源(土地、水源、化学药物和劳动力)的减少甚至更小的农业规模,也不得不面临采用现代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水稻生物多样性的严重流失、土地肥力的下降和水污染。简而言之,水稻的丰产防止了大规模饥荒的发生,但在20世纪后期并没有能提高孟加拉国水稻种植者的生活水平。人们对于水稻丰产难以长久维持感到非常担忧。粮食安全仍旧是对这片高度肥沃的土地的基本挑战。[6]

黄麻衰退

黄麻的故事则是一个相反的研究。从19世纪中期以来,这种自然纤维植物成为三角洲主要的出口作物,但在20世纪70年代却陷入了困境,主要是因为受到了合成纤维的竞争。黄麻生产陷入停滞,出口也不景气。随着国家其他出口的增长,黄麻所占份额陡然下降,从20世纪70年代占80%到30年后只占5%。然而,它仍旧是为数百万人提供工作的作物,包括种植者和黄麻厂工人。到2007年,政府鉴于大量劳动力不安的局面,决定关闭亏损和老化的黄麻厂,解雇了数千名工人。[7]这一工业的未来相当不明朗。虽然怀有使这种廉价、强韧的天然纤维在这个环保意识日益增强的世界上找到新市场的希望,全球黄麻



插图 21.2　库尔纳人民黄麻厂的工人，2007 年这所国有企业被关闭的几个月前。

消费却并未有所增长(插图 21.2)。

另一个丰收：虾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商人们发现了青蛙和虾的出口市场。数以千万计的牛蛙在三角洲的土地、池塘和沼泽里被抓住，制成青蛙腿出口。这是一项非常有利可图的贸易，但有着极为不利的生态和经济影响。随着青蛙从稻田里消失，虫害滋生起来并造成了相关疾病。到最后，进口杀灭虫害的农药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出口青蛙腿的收入。1989 年，孟加拉国禁止了青蛙贸易。

236

然而，与青蛙不同，虾是可以饲养的。企业家们开始购买潮汐三角洲低洼的耕地，并以淡盐水将之淹没(插图 21.3)。养虾被证明比作物农业获利更多，其后(冻)虾就成为该国第三大出口获利商品。今天这个行业为数十万劳动者提供了就业机会。其同时也造成了对树木和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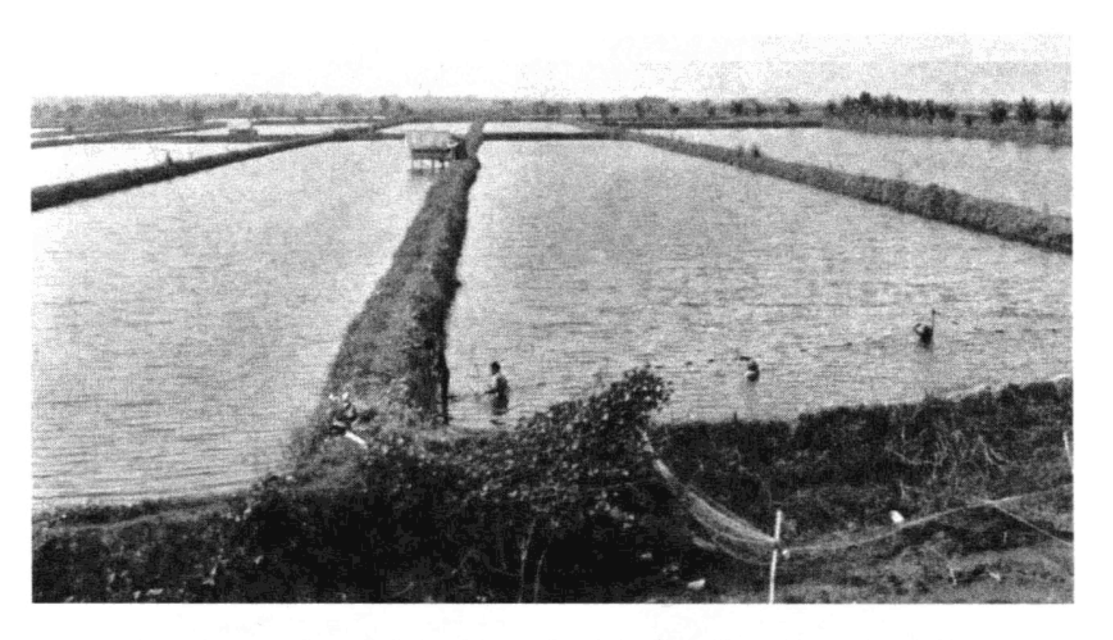


插图 21.3 劳工在养虾围场工作，巴格哈特(Bagerhat)，2006 年。

稼的破坏，增加了土地盐渍度，并引发了人口迁移以及关于土地和生存权利的暴力冲突。[8]因此，可持续性也是个关键问题。

城市的运行

1971 年后，农业和渔业变得更有活力，但其无法为数百万需要工作的人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结果便是极低的乡村工资(半数乡村人口依赖临时雇佣劳动)和广泛的匮乏、穷困。然而无论如何，1974 年之后孟加拉国再未遭受全国范围大饥荒的袭击，尽管经常有区域性饥荒的报道——被当局称为孟卡(monga，类似饥荒)——尤其是在孟加拉国北部。许多人选择移民到城市或海外作为他们的逃难路线。流动性一直以来是孟加拉三角洲人民的特色，而现在比以前更加城市化了。 237

城市应该为这些贫穷的移民提供些什么呢？很明显，应该为庞大的新来者群体提供广泛且日益增加的就业机会。城市的新来者进入一个以高度的性别标准来划分的劳动力市场。没有技术的男人能在运输(比如人力车或者手推车)、建筑、公共事业和服务，以及非正式的贸易方面找到许多卑微的工作(插图 21.4)。

对于没有技术的妇女而言，选择就更受限制。有两种形式的雇佣



插图 21.4　散工带着手推车等待雇主，达卡的谷山(Gulshan)，1981 年。

因其不断扩展而十分重要：工厂劳动和家政工作。[9] 20 世纪 80 年代，成衣业开始在孟加拉国发展起来。外国商人转包给孟加拉国企业生产衬衫、裤子、T 恤和毛衣，主要销往北美和欧盟地区。时隔两个世纪之后——且各种境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孟加拉人再一次开始为世界市场生产纺织品。这一工业迅速扩张，很快成为该国最主要的出口获利商品。到 1990 年，成衣占孟加拉国全部注册出口产品的一半——取代了黄麻和黄麻制品，成为首要出口品——并且到 2006 年更是占到了 3/4。成衣工厂在整个三角洲的城市中心激增，成为重要的雇主。在世纪交替之际，这一产业的 3 000 多家工厂雇佣了 150 万工人，其中妇女占绝大多数(插图 21.5)。[10]

238

这些工厂在工作时间、健康危害、安全和童工方面的状况相当令人震惊——为寻求改善这一状况甚至引发了国际范围的争论。然而，妇女们仍然成群地涌向成衣厂，因为没有其他的工作机会能使她们同样每月赚到 20 美元。另一个大量雇佣妇女的是家政业。孟加拉国中等阶层的生活方式极为依赖家仆，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等阶层在规模和财富上都有所增加，为家政工作者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这一行



插图 21.5　沙瓦织布厂里的工人,2005 年。Jenneke Arens 摄。

业的工资更低,工作条件也相差很大。

城市杂乱地增长着。它们活跃且基本未经规划的扩张使其陷入到了严重的问题之中:交通阻塞、空气污染、供电中断以及严重的服务供应不足。如此大量的移民涌入使许多人很难马上就找到工作和住处。[11]结果便出现了大量依靠施舍救济、临时工和犯罪为生的无家可归的流动人口(插图 21.6)。[12]

239

因为首都达卡有着最多的财富积累,迅速地发生着变化,就吸引了大量人口来这里寻找机会,无论这种机会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今天,达卡尽力维持着其电力供应和水供应,并且仍旧缺乏一个相应的公共交通体系。虽然在与严重的空气污染斗争上做出了相当多的努力,达卡仍旧时常出现在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名单上。随着 1/3 的人口居住在拥挤的贫民窟中,富人们开始撤到设有公寓建筑、百货超市和私人保安的新开发的卫星城去了(插图 21.7)。[13]

水资源

1901 年时,有 3 000 万人居住在三角洲地区;一个世纪后,人数有当时的 5 倍之多。在一个世纪里,每平方公里的人口从 200 人上升到

240



插图 21.6　年幼的收废品者在人行道上醒来，达卡，1983 年。



插图 21.7　城市正在建设。达卡最新城郊住宅区，巴舒达拉城(Boshundhara City)的高楼大厦包围着老式民居，2006 年。

了超过 1 000 人，且 2/3 的人必须以农业为生。随着所有这些孟加拉国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对于环境造成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但是人口增长并非造成三角洲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工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浪费和具有破坏性。三角洲现在不得不处理数量巨大的塑料和其他不可降解的垃圾、人造化肥、农药和工业废料。许多都被冲进了从印度流到孟加拉国的河流里。这些有毒物质易于漂浮在地表水上，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病原体源，这是因为，由于缺乏污水处理系统，孟加拉国约有 90％的人类排泄物最终都直接排到了三角洲的河流和湖泊里。

孟加拉国独立后，马上开展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以手动泵提供更好的公共卫生状况的运动。不久之后，河流、池塘和井中的地表水消耗逐渐减少。今天，大多数孟加拉国人民饮用用泵汲取的地下水，这对于他们的健康极为有利(插图 21.8)。但是这一干预也产生了始料未及的结果：1993 年地下水也被发现存在着危险。在三角洲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南部地带和东北部，地下水中含有天然形成的砷。目前对砷中毒并没有什么治疗方法，也没有快速安全的替代疗法可以提供给这一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被描述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毒人群”，其至少影响到了 3 500 万人。[14]

另一个与水资源相关的问题是另一种类型的。在孟加拉国被称为法拉卡(Farakka)问题。法拉卡是一座位于印度和孟加拉国边境的村庄。恒河从这里流入孟加拉国，其分支形成了三角洲。就在进入孟加拉国之前，主河干流的第一个河道分支流往加尔各答。这一分支，巴吉拉蒂·胡格利河(Bhagirathi-Hooghly)，在莫卧儿时期河流东移之前曾是主河道(参见第二章的地图 2.1)。现在其不再是活跃三角洲的一部分了。关于加尔各答港口日益淤塞的担忧也由来已久。

分治给予了印度补救三角洲长期东移的机会，并不用很担心对东三角洲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那里现在属于另一个国家了。从 1947 年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一直在双方对恒河水源的使用权利上争吵不休。1961 年，巴基斯坦强烈反对印度在法拉卡修建水坝，好在

旱季时将恒河水引到加尔各答的决定。印度争辩道,他们需要水冲刷加尔各答港口的淤泥。巴基斯坦反驳说,这样的改道将使东巴基斯坦农业和经济的主河道水量不足。即使如此,印度仍在1975年建成了这座大坝。这个时候,东巴基斯坦已经变成了孟加拉国。经过复杂的协

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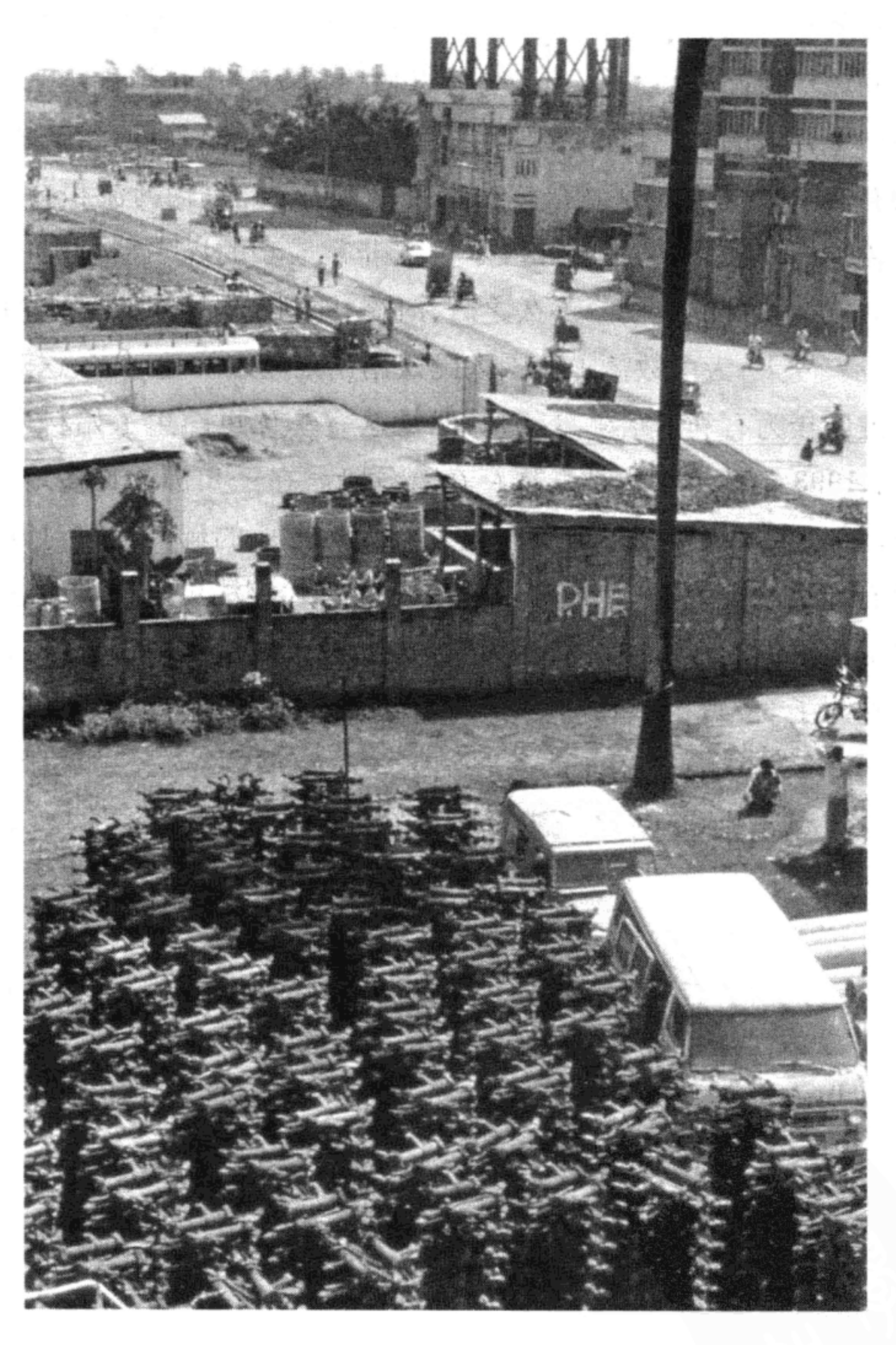


插图21.8　数百个手动泵堆积在达卡一个供应厂商的院子里,准备分派往乡村地区,1983年。

商谈判，两国最终在1996年达成了一个30年的水源共享协议。[15]法拉卡大坝对孟加拉国西南部生态和经济方面的负面影响从那时起就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尤其是考虑到低水位——阻碍航行、渔业和灌溉——减少了土壤水分，并使人类消费用水质量下降。还有一个论点认为法拉卡也对印度造成自食其果的影响，就是大量的环境难民开始从孟加拉国逃到印度。[16]印度其他通过大坝和连接河道以引水的计划——尤其是一个连接布拉马普特拉河和恒河的计划——激起了孟加拉国更多的愤怒和担忧。

孟加拉三角洲一直以其为世界上最湿润的地方之一而自豪。河流从远古的喜马拉雅山流出，带来了大量纯净、给予生命的水。季风降雨经常过于充裕而导致洪水。然而今天，三角洲面临着一个不可预知的水源危机——其地表水遭到了污染，许多地下水被怀疑有毒，而对水资源的需求又飞速增长。农业变得十分依赖灌溉系统，迅速增长的乡村人口消费了更多的水资源，而拥挤的城市中也缺乏相应的供水。问题并非单纯水资源的缺乏，而是安全的水资源的缺乏。

拯救环境

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三角洲当地居民或在孟加拉国的国际援助机构的注意。20世纪90年代，一场环境运动开始形成。[17]随着获取更多的力量和变得更有发言权，其聚焦于广泛的各类事务，从空气和水污染对健康的威胁到土地退化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孟加拉国可能在四个方面最易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海平面上升，更深的洪水，更频繁的风暴和由于高温导致的粮食损失。[18]此外，部分三角洲土地被认为将会下沉，这将使问题进一步恶化。最近的预期十分不明朗，但是有人建议孟加拉国应为21世纪中期将可能出现的沿海地区环境危机做好逃亡的准备。

孟加拉国环境运动在2002年取得初期胜利，政府决定禁止生产和使用聚乙烯袋子。最初这是一个轰动性的胜利，但那些由非法聚乙烯工厂生产的袋子又逐渐流回了市场。环境运动的影响在两个领

域中是特别明显的，亦即国家的能源政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问题上。

244

能源

孟加拉国人长期依赖生物能量来满足其能源需要：炉子通常烧干树叶、木头、稻壳、黄麻杆和牛粪，大部分是靠家庭成员收集来的。当河上排满帆船的时候，风和水也是能源的重要来源。今天，2/3 的能源仍是由非商业的生物能量所提供的。商业能源稍晚才有所发展：油灯所用的煤油、灌溉泵所用的柴油、汽车燃料、电力和天然气。虽然它们发展很快，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到 2003 年，只有 1/10 的人能用上碳氢化合物(液体燃料和气体)，1/3 的人能用上电。[19]

随着对能源需求的增加，几届政府都努力增加供应。[20]在 20 世纪 60 年代，政府正式开启了开普泰水力发电工程，并且浮现出在卢普尔(Rooppur，帕布纳)建设核动力发电的计划。其后大量天然气储量的发现将所有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这种能源资源上。国际公司在孟加拉国勘探天然气和石油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之前，尤其是在斯塔昆达地区(Sitakunda，吉大港)和东锡尔赫特。第一个商用气田于 1955 年在哈里普尔(Haripur，锡尔赫特)发现。到 2001 年为止，又在东部发现了 21 处气田，其中一些在孟加拉湾的近海处。工业用气始于 1959 年的一座水泥厂，其后是一座化肥厂和一座发电厂。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达卡的一些家庭用户也通上了天然气管道，其后越来越多的人用上了天然气。油气储备的进一步发现，激起了对油气输出的辩论，尤其是对印度。[21]近年来，另一种关于在贾马勒布尔(Jamalpur)和迪纳杰布尔开采煤炭的讨论也发展起来。这些讨论以环保主义者为首，他们指出了开普泰计划导致的环境灾难并强调制定对生态有利的国家能源政策的必要性。他们特别批评、警告了那些受短期商业和政治利益驱使所做出的未经周详考虑的解决方案。

处于险境的生物多样性

环境运动同样在传播三角洲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意识方面取得了成功。比如,人类活动影响到了三角洲丰富的河流栖息地,导致了许多水生物的灭绝。黑鳖(black soft-shell turtle)的故事就很有启发意义。18世纪初,一位伊斯兰教精神导师拜亚吉德·包斯塔米(Bayazid Bostami)在吉大港附近挖了一个大池塘并放入了一些淡水龟。在他去世后,毗邻的圣祠就成为一个朝圣的中心。在池塘中生活的龟和鱼受到尊敬、喂养和保护。随着这种龟类在其自然栖息地变得越发稀少(其曾经遍布三角洲东部和阿拉干地区),这些饲养在人工池塘中的群体呈现出了新的重要性。今天,这种黑鳖(*Aspideretes nigricans*)在自然界野生状态下已经灭绝了;在包斯塔米池塘中的几百只是仅存的。但是它们在那里也不安全。2004年,它们成为伊斯兰恐怖袭击的牺牲品。在一次预先计划好的,针对孟加拉穆斯林所崇拜的古老动物的袭击中,伊斯兰主义者向池塘里投放了杀虫剂。大部分的鱼都被毒死了,但一群志愿者最终救出了黑鳖。

245

另一个例子是一种鲥(hilsa,*ilis*)的消亡。这种鱼长期以来是孟加拉烹饪中的一种文化标志和美味的精髓。它是孟加拉国的官方“国鱼”,它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海中,只在每年的洪水期洄游到河口水域产卵。由于被认为具有极高的价值且在三角洲河流中季节性地丰富起来,鲥鱼也是对西孟加拉和全球移居国外的孟加拉人群体的重要的出口产品。然而其过去常常过剩的存货却突然下降了。究其原因,在于用以灌溉以及控制洪水的大坝的修建(阻碍了洄游),在鲥鱼洄游受阻的地方对将要产卵的鲥鱼进行的过度捕捞,河流的淤塞以及地表水的污染等。数年来,孟加拉国消费者都在哀叹鲥鱼的匮乏和日益升高的价格。[22]

并不只是两栖动物和鱼类容易受到攻击。三种秃鹫也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难以置信的急速减少,现在被认为已经灭绝了。它们过去在整个三角洲都司空见惯,直到一种人类的止痛药(双氯芬酸)开始

在孟加拉国使用,扩散到了环境中并最终杀死了它们。

环境运动同时也关注海洋栖息地(参见“珊瑚和海龟”),但是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需要保护的陆地栖息地上。曾经覆盖三角洲的孟加拉雨林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向各个方向伸展的稻田。三角洲的湖泊(*hāor*,*bil*)仍旧扮演着候鸟中间站的重要角色,这些候鸟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喜马拉雅山地区和欧洲。一些地方还存有小片林区,但拯救古老动植物群的残存者仍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在孟加拉国中部毛德胡普尔有一片古老的森林,现在被形容为“奄奄一息”。[23]只有两个边远地区仍旧森林茂盛:东南部的吉大港山区和西南部的松达班湿地。

246

珊瑚和海龟

在孟加拉国陆地最南端再往南大约10公里的地方,一座小岛坐落于孟加拉湾中。面对着缅甸的海岸。这就是纳里克尔-金吉拉(Narikel Jinjira),在外面的世界其更以圣马丁岛(St Martin's Island)的名字而为人所知。

其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与许多沿海的冲积岛屿不同。纳里克尔-金吉拉并非淤泥堆积的岛屿。它是孟加拉国唯一拥有珊瑚暗礁的岛屿。其以非常独特的生态系统为豪,所有这些——海洋、陆地、潮汐泻湖——受到了捕鱼过度、珊瑚和贝类采集、开垦、农业和旅游业等人类活动的严重威胁。岛上共有600余户定居者,主要依靠季节性捕捞和晒干鱼生产为生。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地老人们联合签署了一份保护宣言;20世纪90年代,建立了一个环境保护方面的非政府组织。孟加拉国政府受到国内外保护主义者的压力,宣布这座岛屿为“生态关键区域”,并采取多项计划以保护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但是执行效果不佳,环境仍在不断退化。

247

其中一项计划是为到海边产卵的海龟提供产卵地。每年都有数百只橄榄海龟和绿龟在这里产下数千枚卵。它们切实地受到了人类和狗的威胁,并需要受到其保护。它们在产卵之前会受到悉心的呵护,安全地孵化



插图 21.9 纳里克尔-金吉拉的海龟产卵地，2001 年。背景中的建筑是风暴庇护所，对于这座处在孟加拉湾季节性热带风暴的必经之路上的暴露、低洼岛屿上的居民而言十分必要。

后再放回海中。

吉大港山区的森林砍伐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就变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人口增长导致了土地匮乏，并且因为刀耕火种的循环使土地肥力耗尽而难以维持——山区土地需要休耕许多年才能恢复其土地肥力。产量开始下降。其后，开普泰大坝的修建又导致了大量可耕地的丧失，并迫使许多人另寻土地以进行山区农业（参见第十四章）。这一状况在孟加拉国诞生之后更加恶化。1975 年之后，森林砍伐和生态灭绝的加速尤为显著，当时吉大港山区战争爆发，对平原居民进行移居山区的政治动员也已经开始（参见第十九章）。这一地区到处都有军事岗哨，坐落于裸露光秃的山顶上。军队人员和承包商建立了有利可图的合作关系，很快对竹子和其他森林资源的砍伐和挖掘就失去了控制（插图 21.10）。这最终造成了土地侵蚀和土地肥力的下降。其后，政府制定的弥补生产能力下降的政策——尤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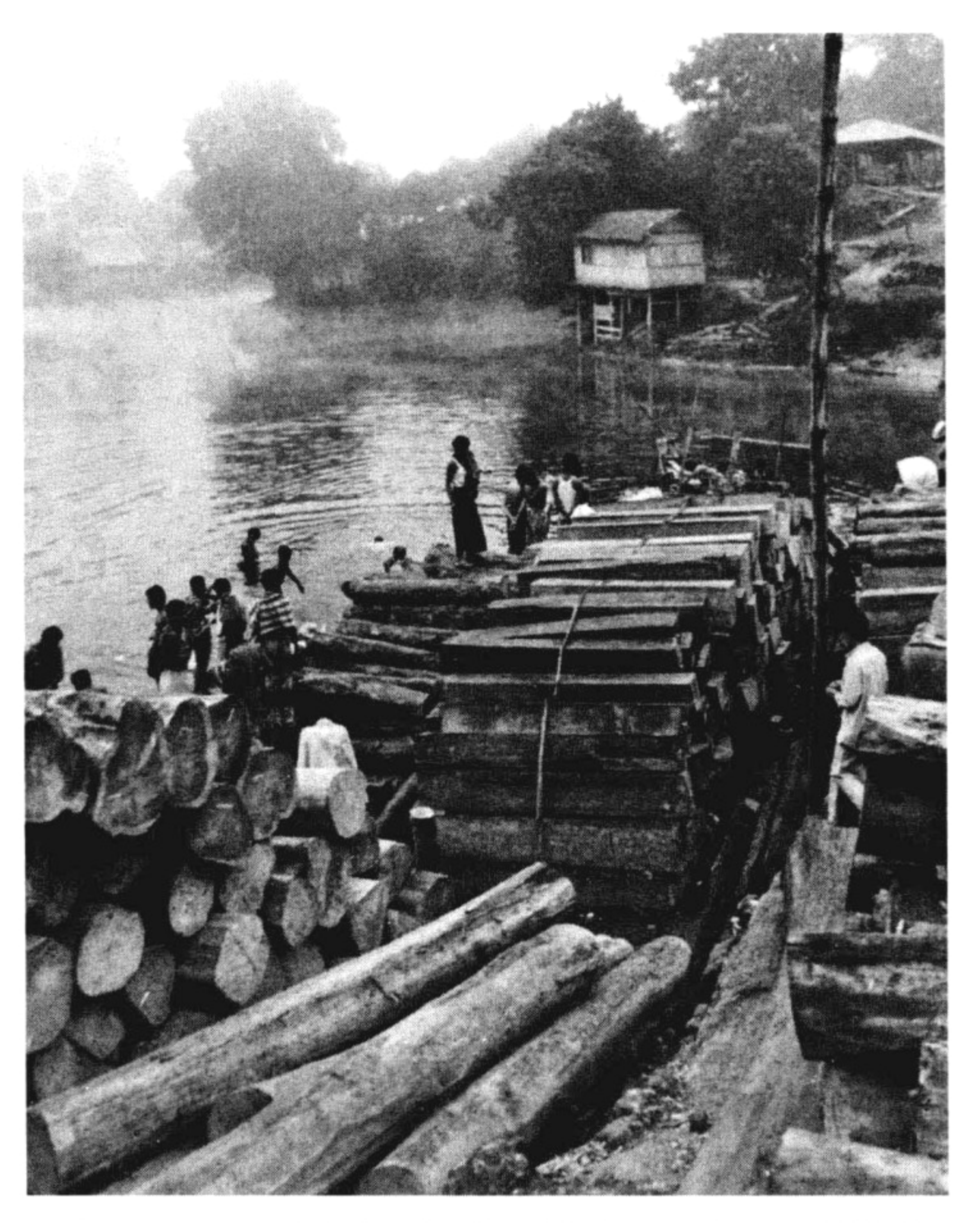


插图 21.10　正在砍伐森林：来自吉大港山区保留地的木材被拉上兰格马蒂的岸边，2001 年。

是建立柚木和橡胶树种植园——在不经意间又进一步恶化了环境危害。[24]

相比之下，耐盐的红树林的生长地——松达班（“美丽的森林”或“松达树森林”）的境遇稍好。这片森林曾经有现在的 3 倍大，横跨三角洲整个沿海边缘地区。经过几代人之后，吃苦耐劳的耕种者为求生存将耕地边界推进到这一危险环境中。这一进程在殖民时代早期加速，当时一个国库空虚的国家鼓励了缺乏土地的定居者。[25]要不是殖民管

理者中有种这里将为附近的城市提供日益增长的木材和燃料需要的意识，整片森林很可能已经消失了。就当地而言，来自木材的收入对于殖民国家与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同样至关重要。19 世纪 70 年代，松达班的一大片土地被划归林业部，它们“成为下孟加拉仅存的以国家垄断工业运作的生产单位”（插图 21.11）。[26]



插图 21.11 溪流为上涨的潮水所填满，松达班，2006 年。

248

1947 年这一地区分属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其最大的一部分划入了巴基斯坦的库尔纳区。对森林资源的管理继续掌控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手中。获得或未获得政府许可的伐木工、采蜜工、渔民和猎人纷纷进入松达班。长期的退化被很好地记录下来：[27]

> 植被的茂密与繁盛程度，以及动物和鱼类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远远不及两个世纪之前的样子。在松达班，最后一次关于爪哇犀牛的记录是在 1870 年，最后的野生水牛在 1890 年被打死。麂和渔猫也在当地灭绝了。独立以来，鳄鱼、猴子和其他动物的数量即使在保护区里也大大减少了。受到威胁而仅存的孟加拉虎生活在两个国家的保护区里。但它们的一些食物（泽鹿、豚鹿和印度野牛）却消失了。[28]

249

250

1971 年之后，松达班湿地成为孟加拉国处于萌芽阶段的生态旅游产业的焦点。为有助于向游客呈现一幅原始自然的图景，松达班被包装为最后一片未受损坏、充满野生动物的森林。这一地区神秘的顶级捕食者孟加拉虎成为旅游产业的宠儿。其被宣布为孟加拉国的“国宝动物”，成为一个被钉在墙上标志和招徕游人的工具。它也成为一种环境意识、国家自豪、旅游潜力和冒险的象征(插图21.12)。







插图 21.12 “我们国家的英勇象征——拯救老虎——停止猎杀老虎。”孟加拉国邮票，1974 年。

环境运动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掀起了一个全球深切关注的高潮，已经能够将生态退化的议题放入孟加拉国的政治日程当中。其要与一个强大的企业家团体相竞争，这些人以具有快速经济回报的砍伐和对环境有害的发展项目来诱惑政治家、官员和军方人士们。

显著的经济变化和人口增长是后 1971 年孟加拉国的重要特点。它成为一个三角洲社会人口翻番，且经济也齐头并进的时期。一部分孟加拉国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实际上获得了提高，然而贫穷仍在四处蔓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经济增长和食品安全方面都战胜了与实际情况相反的预测。然而，经济学家和农学家都表达了对食品安全在不久的将来是否能够维持的严重关切。环保主义者则谈论人类对生态施加压力的后果以及三角洲自然资源的落后管理。三角洲将会走向繁荣还是走向萧条呢?

第二十二章　一种国家文化？

251

炫目的文化创新成为独立的孟加拉国的一大特色。年轻的国家要求一种国家文化的创建，新的跨国联系在一些找到了新生活表达方式的群体中带来了新的理念和日益增长的财富。三角洲的文化被拽往不同的方向，相互冲突的趋势之间不得不彼此适应。这是一段理想主义重燃和热切寻找灵魂的时期。

乡村的高涨

孟加拉国运动的领导人曾经设想建立一个基于民主、社会主义、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社会。一旦从巴基斯坦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三角洲的经济将会奔腾向前，一切都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些理念表现在这个新国家的名字——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以及一个金色孟加拉的理想中。从官方的角度说，孟加拉国仍然是一个“人民共和国”。但是对于大部分公民来讲，旧的理念听起来极为神圣。只有民族主义抵挡住了时间的破坏。社会主义和世俗主义都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结束了，民主也历经了多变与中断。

孟加拉国第一代领导人在传播他们梦想上的失败，削弱了他们地方文化模式的号召力，这是一种体现在殖民上层社会（伯德鲁洛克）和孟加拉人流行方式中的精致混合物。这种理想最终幻灭了。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军

事统治的兴起，为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创造了空间，其变得鲁莽且越发自信。老式精英——他们在一代人之前将自己从乡村背景中解放了出来——现在面临着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新一波的“乡村运动”(mofussilisation)。他们认为那些新的掌权者都是只受过有限教育的暴发户，孟加拉文学的浪漫、泰戈尔诗歌的精妙和生命中极好的事情在那些人身上都完全失去了。这种新的文化模式是一种不自然的暴发户(*nouveau riche*)形态：服装俗丽，珠宝奢华，房子及其内部都装饰得铺张炫耀。新的文化英雄不再是优雅的诗人、端庄的主妇或者理想主义的学生运动者。现在招摇在大街小巷的是默斯坦(mostan)或称马斯坦(mastan)。

252

“默斯坦统治”(Mostanocracy)

默斯坦在社会上并不是新事物，但是其非常完美地契合了新的氛围。默斯坦的原型是年轻的、城市的、武装的、荷尔蒙过剩的。他指手画脚地扮演着当地的非正式领导者，把受尊敬的长者和指定的权威推到一边。作为一个新贵，他通过恐怖实行统治，有时会对错误复仇但更多时候是他们自己做错了。他出现后成为孟加拉国流行文化的一个主要标志(插图22.1)。





插图22.1　乡村茶店的电影海报。一部电影名为《默斯坦穆纳》(*Munna the Mastan*)，另一部是《女人也能成为默斯坦》(*Women Can Also Be Mastans*)。

一个微不足道的流氓何以成为一个文化标志呢？他代表了一种新的城市化的社会，一个在旧式精英统治下更为暴力、更少预见性、更不稳固的社会。默斯坦的形象对于年轻人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对独立的孟加拉国所能提供的感到失望；默斯坦代表着愤怒、对非正义复仇的允诺并发出了底层民众雄心的呼声。

他变得越发重要也并非一种想象力的虚构。独立后的政党曾经为青年人配备武装以为其搜罗选票，招募和管理大型集会的民众，迫使大罢工和生成政党资金。默斯坦同时也在通常描述的贪污中扮演齿轮的作用——这一做法给所有公务人员提供了除薪酬之外的收入。孟加拉国人首先将贪污与国家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警察、法官、海关和税务官员被视为特别成功的操作者。[1]作为一种行为模式，贿赂在三角洲有着很长的历史——对于大多数孟加拉人而言，这是让一位官员倾听他们，让一个政客释放你被没收的牛，让一个法官撤销一个案子或让一个护士做她的工作的唯一的途径。[2]发展援助和经济自由化使得这一做法日益兴盛。现在，如果你需要化肥、管井、装电话或者一次成功的投标，你就不得不给官员、企业家或者非政府组织的责任人一些“油水”（贿赂）。[3]默斯坦会卷入到所有这些交易中，但是他们在另一种方式上有过人之处：为地区提供免于遭受这种强迫付费的安全——换句话说，他们经营着勒索保护费的组织。作为勒索(chandabaji)方面的专家，他们支撑着整个政治、官僚、市场和犯罪的世界。[4]默斯坦是国家政治家和官僚们的地方工具——他们中的一些人自己逐渐变成了国家政客。随着默斯坦对社会控制的增长，人们开始谈论“默斯坦统治”——流氓的统治。

253

伊斯兰礼节

对地方文化模式的另一个挑战来自日益增长的伊斯兰情感。这一增长是各种力量结合的结果。一方面，是军事统治时期伊斯兰教标志回归公共生活（参见第九章），来自海湾地区移民所带回的伊斯兰正统礼仪的全球观念的输入，以及富裕的西亚国家对伊斯兰组织

和机构所提供的财政援助。另一方面,这是底层民众对无法获得体面地位所作出的反应。最后,这表明了一种对更为积极价值观的寻求,这些人对公共生活中的贪污深恶痛绝并且渴望在城市丛林中寻求更安全的地位。

对那些信奉新的伊斯兰礼节的人而言,这是一种在道德和精神两方面都确认现代性的方式——在一个不纯洁的世界里变得纯洁。在某些方面,这种新的情感认同使人想起了19世纪时决心"纯洁"孟加拉穆斯林的宗教和社会实践的运动。那时,其曾经是新的——现在是传统的——来自阿拉伯半岛的观念,引发了在孟加拉如何才算一个"适宜的"穆斯林的反思。

254

还有另一条历史平行线。城市中的新清真寺为乡村来的移民提供了与在莫卧儿时期为东三角洲清除并定居森林的农民服务的边境清真寺同样意义的服务(参见第三章)。这些清真寺为他们提供了社区保护和社会秩序。新的清真寺在孟加拉国迅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机构,为会众提供联络,使他们有一种归属感并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和住所。在莫卧儿时期,耕地、宗教和国家边界融汇在了一起,伊斯兰教演化为一种征服森林并推进定居农业的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明显的孟加拉伊斯兰教发展起来。在20世纪后期,伊斯兰教成为一种帮助移民穿越边界来到城市生活的意识形态。在这一进程的推动下,其成为新城市化的孟加拉国的意识形态,三角洲的伊斯兰教自然地就发生了适应这一新状况的变化。

这种新伊斯兰教仍旧是孟加拉的,但与其乡村先驱有明显不同。其从一种适应多路线、面对面互动的乡村生活的宗教,转变为城市中更为单线的、匿名的互动。其更具有外向性和文本性,却更少接受当地文化因素。[5]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推动这一进程的组织。其中最成功的一项是传教宣讲(Tabligh)运动,以达卡的卡克拉里(Kakrail)清真寺为中心。其每年在达卡北部同吉(Tongi)的集会被称为比索-伊基塔玛(Bissho Ijtema,意为"世界集会")。今天其经常被描述为继麦加朝圣(Hajj)之后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集会,每年都吸引了超过

200 万人。

如同插图 22.2 所示，伊斯兰教礼仪最明显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时尚。男人们戴着刺绣的帽子(*ṭupi*)，他们的衬衫很长以至于几乎完全遮住了方格围裙(*luṅg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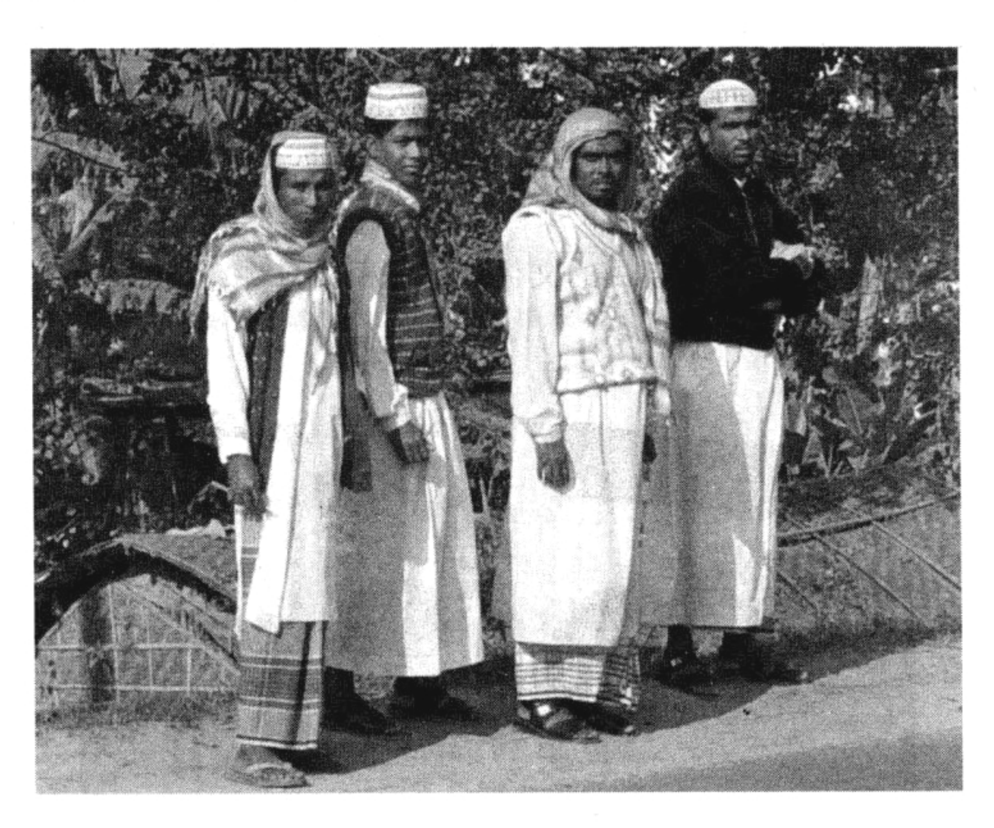


插图 22.2　参加比索-伊基塔玛集会的人，同吉，2003 年。

妇女的户外装束更体现了这种新伊斯兰礼仪观念。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是莎丽主导的年代。莎丽是一种长而艳丽的未缝合外衣，围裹着身体，在整个南亚都非常风行。在孟加拉国，这是一种成年妇女所选择的服装，而许多年轻女孩则穿着配宽松裤子的长束腰衣。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在诺阿卡利这些孟加拉东部的地区)，一些穆斯林妇女会在离开她们的村庄时，在莎丽外面罩上一件帐篷一样的罩袍(burka)。这一习俗，即使在达卡最古老的街区也被认为是即将过时的(插图 22.3)。　255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很少有人会预见到罩袍将会重新流行起来。然而，随着新伊斯兰礼仪新观念的流行，这的的确确发生了。虽然孟

加拉国许多穆斯林(和所有非穆斯林妇女)都拒绝新的文化设定,但她们在公开场合出现时穿戴头巾、面纱和罩袍的数字却在上升。这些服装与旧式服装在颜色、面料和样式上都有很大不同。它们的意味也不同:其体现了对孟加拉国伊斯兰教新的、自信一面的公众依从性。罩袍代表着"从私人走向公开场合的父权制"以及"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的需要和保持她们隐蔽的要求之间的调和"(插图22.4)。[6]

这一在孟加拉国通往新伊斯兰文化的趋势并非一帆风顺。它无法处处替代孟加拉国更为自由的文化观点。相反,自由观点否认伊斯兰教的观点能代表整个国家。

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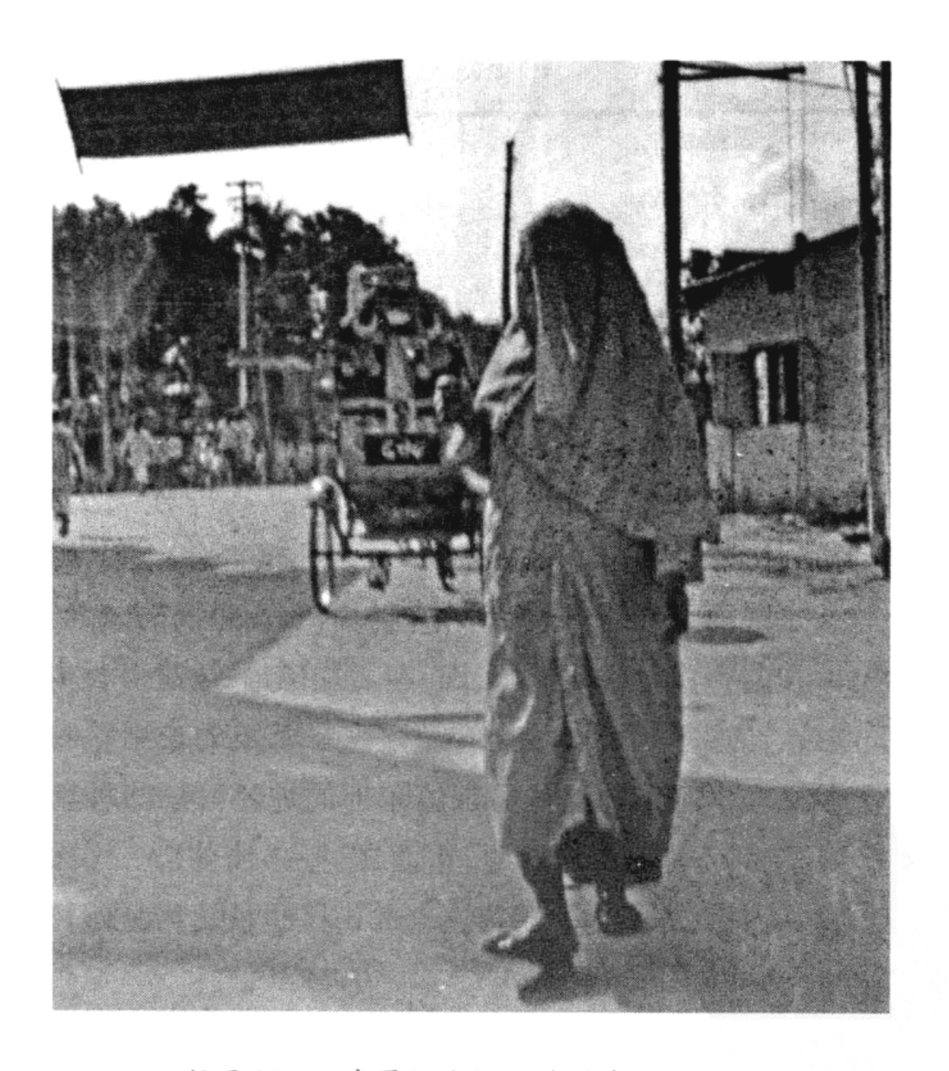


插图 22.3 穿罩袍的女人,老达卡,198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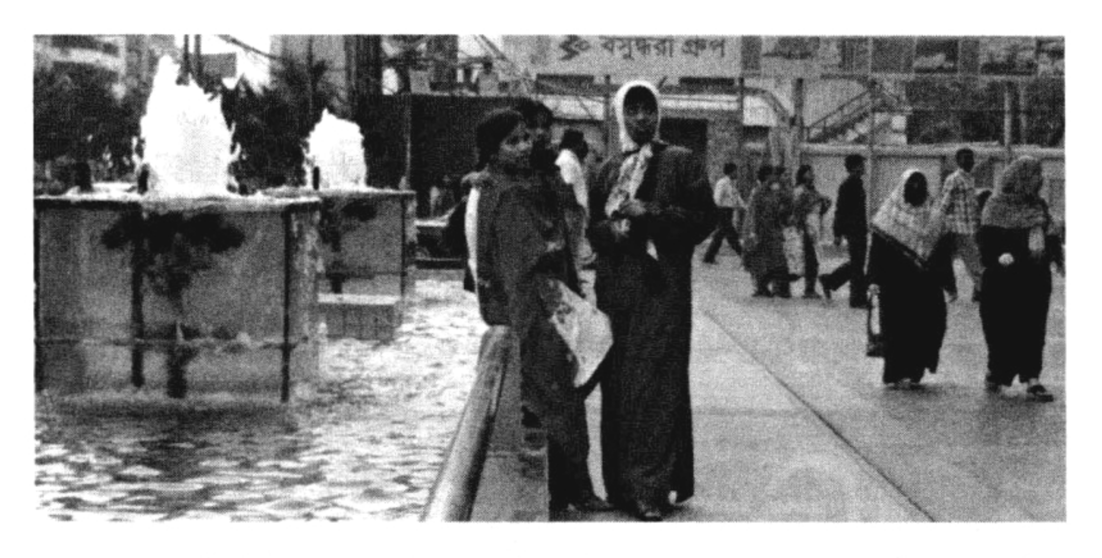


插图 22.4　穿着各种风格服装的妇女在达卡参观一座新开张的大型商场，2006 年。

孟加拉国的自由派观点

257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关于未来的自由观点就遭遇了严峻、鲜明的伊斯兰观点的挑战。双方都宣称为脱离大多数孟加拉国人想要逃脱的不公正、腐败和不安全的困境提供了最好的指导。孟加拉国自由派的基本问题与伊斯兰主义者不同，他们曾有机会去实现承诺，但是却没有能够兑现一个金色孟加拉的梦想。即使他们已经失去了国家权力，仍然通过许多制度化的方式极力捍卫自己的观点。诸如孟加拉学会和施尔波库拉学会（Shilpokola Academy，即国家美术与表演艺术学会）这些历史悠久的组织仍旧是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化中心，一些新的机构也逐渐出现。其中一些是由国家出资的，比如国家博物馆（1975 年开放）、儿童学会（1976 年开放）、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1973 年开建，1985 年开放）。其他一些则是私人运作的，比如解放战争纪念馆（Muktijuddho Jadughor，1996 年开放）和众多大众传播媒体。

大量的自由力量汇入了非政府组织的创建上。[7] 像 BRAC 和格莱明银行这样的大型非政府组织都属于自由派阵营。此外还有一些极具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比如法律援助中心（Ain-O-Shalish Kendro）和促进人权组织（Odhikar）。这些组织旨在提升法律和人权意识。他们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并反对诸如家庭暴力、针对妇女的硫酸袭击以及

宗教和种族歧视等问题。

权利事宜也是由这些组织自己处理。孟加拉国印度教、佛教、基督教联合委员会在 1988 年成立,以反对宣称伊斯兰教为孟加拉国国教。孟加拉国土著人民论坛联合了 40 多个民族团体,一起要求取消一个将会迫使原住民离开其祖辈土地的"生态公园"。[8]孟加拉国同时也发展出了一场坚决的妇女运动,几个协会相联合,并得到了强大的国际支持(插图 22.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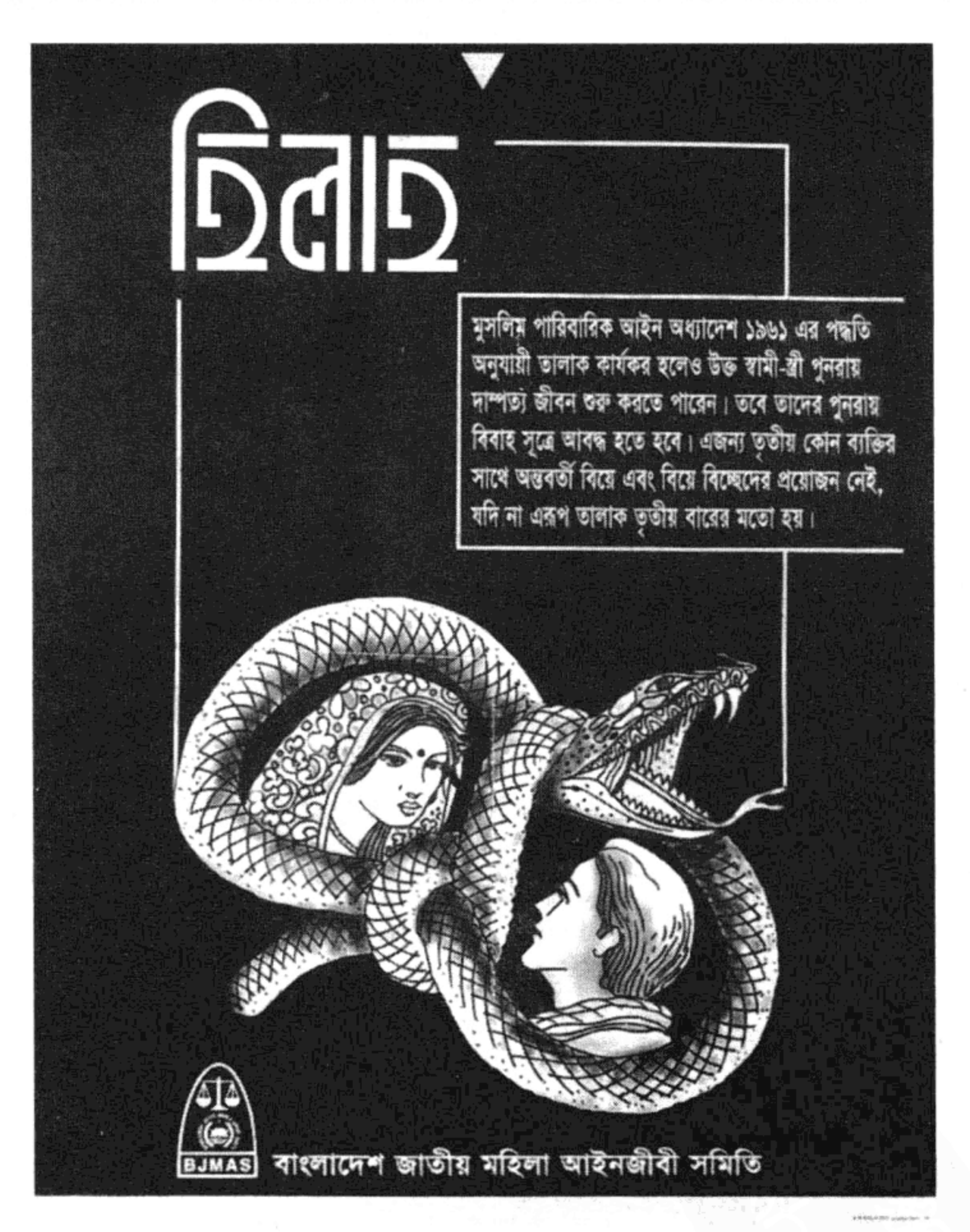


插图 22.5　一份全国妇女律师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men Lawyers)的海报,宣传孟加拉国妇女在离婚时的合法权益,1998 年。承蒙 Archives of Bangladesh History, Rajshahi 提供。

自由派对三角洲未来的理解同时也表现在公共事务当中。其中一些与全国性运动相联系，诸如在胜利日(12 月 16 日)和语言日(2 月 21 日)在全国的纪念碑向烈士们敬献花圈。[10] 其他的则是些区域认同的庆典。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庆祝孟加拉历新年(4 月 14 日)，届时会有大量的节庆群众涌向达卡的街头观看装饰有大孔雀和其他奇异动物的鲜亮的彩车，观赏复杂的地面装饰 (*ālphanā*)，购买彩绘陶罐和玩具，并欣赏庆祝孟加拉人 6 个季节的歌曲(插图 22.6)。[11] 还有一些节庆是国际性的，比如国际妇女节和五一劳动节。 258

259



插图 22.6 迎接新年，达卡，2007 年 4 月。承蒙 Shakib Ahmed (ruman962@gmail.com)提供照片。

到 20 世纪末期，孟加拉三角洲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青年文化。其与众不同的特点之一就是一种新的音乐形式：乐队音乐。第一支流行乐队珍加-高思提(Zinga Gosthi)由吉大港的大学生创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的乐队唱片是由英文灌制的，但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大部分乐队就开始用孟加拉语写歌，且经常借用像包尔歌曲这样的民乐曲调。这创造了一种生机勃勃的流行音乐环境，其表现内容超出

了熟悉的爱国歌曲和浪漫歌曲。与传统歌曲不同,这些新音乐还表达了对社会的批判以及诸如沮丧、愤怒等较灰暗的情绪。摇滚巡回演出和电视表演开始塑造大量青少年听众的新口味,其影响不仅是在孟加拉国国内,也远及西孟加拉和全世界的孟加拉人。随着三角洲丰富传统的复兴,孟加拉摇滚走向了全球。这些融合最终就很好地表现在一个最为著名的乐队名称上:诺戈尔-包尔(Nogor Baul,意为"城市游吟诗人")。通过将三角洲音乐传统和美国风格相结合,"孟加拉国摇滚乐"以这种方式表达出了城市青少年对新伊斯兰意识直截了当的反对(插图 22.7)。

260



插图 22.7 《包尔灵魂》(*Baul Soul*)的封面,流行歌手林库(Rinku)的专辑,2006 年。承蒙 Gaanchil Media 提供。

孟加拉国文化战争

自由派和伊斯兰教对孟加拉国文化观点的冲突在多条战线上存在

着：语言的使用、服装、性别关系、节日和音乐。媒体是最主要的战场，尤其是许多报纸、电视台、电影院和在线交流。[12]然而，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能是危险的，一些自由派记者和观点制造者(opinion-maker)经常遭到袭击甚至暗杀。[13]教育是另一个关键的竞技场。你将选择送你的孩子去世俗的学校还是伊斯兰教的学校呢？他们那里教授什么样的伊斯兰教呢？孟加拉国的教育体系有两个平行的分支，一个是明显世俗化的，另一个则是伊斯兰教学校(*mādrāsā*)。在学院和大学的层面上，两部分合并在了一起，正是在这里，文化对手之间频繁交锋。校园政治作为国民心态的先兆而常常十分重要，其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所控制。而且，这些并非仅仅是象征性的冲突；而是造成许多人丧生的流血冲突。学生团体常常与国家政党有联系，由后者提供枪支和炸药。他们便利用这些武器肆无忌惮地恐吓、伤害和杀死他们的同学和教员。宿舍与宿舍之间的枪战远非个例。一些校园为伊斯兰主义者占据。比如，史比尔(Shibir，伊斯兰学生团)——伊斯兰大会党的青年组织从 1982 年以来就在吉大港大学称霸，因此非伊斯兰主义的教员和学生不得不处处小心。其他的校园则是持续的战场或由世俗主义者所控制(插图 22.8)。

261



插图 22.8　沙瓦(伊斯兰主义和非伊斯兰主义学生组织之间争斗的前沿地区之一)的贾汉吉尔纳加尔大学校园内展现世俗标志的浅浮雕，2006 年。

朝向伊斯兰礼仪的新趋势和偏激的恐怖策略使孟加拉国的自由派穆斯林感到忧虑。而这个国家中数百万非穆斯林则感到巨大的恐慌。其中印度教徒是最大的一个群体。1971 年,印度教徒的数量约为1 000万,到 2007 年则为1 400万,他们是继印度和尼泊尔之后世界上最多的印度教人口。[14] 然而,孟加拉国印度教徒的增长速度远远慢于孟加拉国穆斯林,因此他们的人口比例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 13%下降到了 30 年后的 9%。这一相对的减少是由于国家支持的歧视和日常的偏见造成了人口迁出并且出生率不断下降。大多数印度教徒是生活在国家各地的耕种者,但也有些相对集中的地区,比如在西南部。印度教徒也在某些特定领域,如教育和创造性职业中占有一定地位。其中一位是深受喜爱的卡通画家施什亚·巴塔查尔吉(Shishir Bhattacharjee,插图 22.9),因为对孟加拉印度教徒和其他非穆斯林来说,自由派场景是唯一可以接受的。

262



插图 22.9　施什亚·巴塔查尔吉以嘲弄政治人物而闻名。在这幅漫画中,我们看到总理谢赫·哈西娜正在滥用国家的欢欣为政党的政治目的服务。2000 年,孟加拉国板球队达到了“测试状态”,成为全国巨大自豪的来源。总理高呼着“我们都非常开心”,并正在一只板球板上涂抹她已故的父亲,谢赫·穆吉布曾经所穿的马甲的式样——这也成为阿瓦米联盟坚定分子的制服。出自 *Prothom Alo*(21 June 2000)。

今天,自由派孟加拉国人越发感到严阵以待。许多人确信伊斯兰主义正在危险地增长,受到一个温和的政府以及恐怖主义威胁的支持。另一方面,自由派孟加拉人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活跃的、畅所欲言的团体,并有着前所未有的全球联系。孟加拉国社会进一步的伊斯兰化或世俗化,都并非注定的结果。三角洲最年轻的一代人将会给古老的双重身份——孟加拉–穆斯林带来什么,依然悬而未决。 263

鱼和稻米

穿着罩袍的乡下人、街头流氓和女权主义名流可能在身份认同和道德问题上有很多的分歧,但是却在一个文化主题上有着心有灵犀的看法:食物。孟加拉国的文化一定是世界上最以食物为中心的文化之一。三角洲一直生产着各种食物,并且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新的作物和新的饮食习惯不断地被引入进来。通过这种方式,番茄、土豆和辣椒——所有这些都是早期从美洲进口的——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主要的食物仍然是大米,其食用量很大,拌上辛辣的配菜(*tarkāri*)在芥子油中烹饪。[15] 如同在这个地区的人们所说的,"鱼和稻米塑造了孟加拉人"(*māche bhāte bāṅgālī*),确实如此,至少是对那些有条件吃得好的人而言。孟加拉国的许多穷人只能偶尔吃到鱼,并且只有很少一点,肉类则更加稀少,取而代之的是将扁豆和其他蔬菜或仅仅是咖喱拌到米饭当中。最好的食物通常都留给男人们,而妇女们比男人们更少吃到鱼和肉。[16] 孟加拉国的烹饪术有着相当复杂的菜品分类,不同地区、团体、阶层和家庭之间都有差别。比如,孟加拉国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烹饪就非常不同,住在沿海的人们对干晒海鱼(*śũṭki mach*)情有独钟,扁豆拌饭(*khicuri*)是穷人的传统食物,并且每一个非孟加拉人团体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烹饪风格。

随着烹饪资源的增加,三角洲的居民因其挑剔的口味而闻名。食物是件严肃的事情:它受到重视,并且被精确地评价。但是这个民族对于食物的关注远远超过营养、口味和烹饪技术的传承。食物曾经并且一直在宴请招待、社会交往、商业往来、声誉和幸福等观念中占据中心位置(插图

22.10)。宴会邀请(*dāoyāt*),无论接受或拒绝它们,都是最重要的社会财富。主人们想通过他们的慷慨大方给客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之后,客人们将对食物的质量、菜肴的数量与种类以及主人坚持提供更多食物等方面做出谨慎的评价。对主人而言,如果客人们吃得很少会使其失望和不悦。

264



插图 22.10　一个孟加拉国组织在野餐时共同进餐,诺多尔,2006 年。

在饮食习惯的变化当中,孟加拉国时期出现了对小麦的消耗,主要用以制作早餐面饼(*ruṭi*, *paraṭā*)。其取代了过去以稻米为主的早餐,诸如用水泡隔夜或有点发酵的米饭(*pāntā bhāt*),以盐、洋葱和酸橙佐餐。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人们开始购买更多包装好和加工过的食物,从而减轻了家庭主妇和佣人们碾米和添加香料的沉重工作。一代人之前还在三角洲的乡村随处可闻的木制脚踏碾米机的扑通声,已经逐渐被机械碾米厂的叮当声所取代。

茶叶也是大宗消耗的物品,其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还是中等阶层才能获得的稀缺奢侈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发大众化。三角洲当地的许多水果——从质量上乘的芒果(*ām*)和榴莲(*kā̃ṭhāl*)到酸李子

(*kul*)和黑莓(*jām*)——与葡萄、橙子、苹果等进口水果都出现在市面上。然而，也有一些食物变得稀少或消失了。当发现一种香草豌豆(*khesari*)长期食用能引起麻痹时，其消耗量就急剧下降了。[17]

265

整个这一时期，只有一样东西可与稻米作为孟加拉三角洲饮食习惯的主要食物相匹敌：米西提(mishiti)或甜品。其命运相比稻米，与国家形成的历史联系更为紧密(参见“甜品成瘾”)。

甜品成瘾

孟加拉国的居民因其嗜好甜食而闻名。他们传统的甜食是以牛奶为主的甜品(米西提，*miṣṭi*)。其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通常在家里做准备而后由专业人士加工。从19世纪中期以来，在城市里出现了迎合精英高雅品位的甜品店。第一流的甜品师傅几乎全是印度教徒。孟加拉1947年分治使其中许多人去往印度，造成了东巴基斯坦向中等阶层提供甜品的危机。然而，一些印度教甜品师傅留了下来，穆斯林甜品师傅也很快出现。孟加拉解放战争导致了甜品工艺的进一步转化和适应。孟加拉国中等阶层在20世纪后期日益增长的财富也为甜品的显著发展奠定了基础：营业额迅速上升，时髦的甜品连锁店在整洁的街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米西提不仅仅是一种嗜好。当你去拜望一个家庭或朋友时，一大盒甜品是必不可少的礼物。在宗教节日或重大人生事件时，没有甜品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当你从另一个城镇回来时，人们就会期望你带回来一盒当地特殊的甜品。有十几种地方性的特色产品。比如，库米拉就以当地的荣诗玛莱(*rasmālāi*；一种裹着稠浓牛奶的凝乳球)为豪，拉杰沙希的荣耀在于荣诗卡达姆(*raskadam*；覆盖着大颗糖珠的凝乳球)，博格拉的主要成就则是像奶油酸乳酪的道依(*dai*，*dahi*)。同时也有整个国家都在吃(邻国印度也吃)的普通的甜品——荣诗格拉(*rasagollā*；在糖浆中煮过的海绵状凝乳球)或者商黛西(*sandeś*；干凝乳膏块)。

凝乳甜品只不过是多得令人惊讶的甜食糖果品种中最知名的一类。许多都是主要用稻米并且在家中制作的。米粉蛋糕(*piṭhā*)——中间填满椰子肉、糖浆或者枣汁——是冬季丰收时节的最爱。穆斯林表达感恩

(*milād*)则必然要有一盘基拉皮(*jilāpi*)。此外还有帕雅喜(*pāyes*;在加糖牛奶里煮的大米并配有小豆蔻和开心果)以及舍买(*semāi*;在加糖牛奶里煮的小麦面条并配有桂皮和肉桂叶),等等。甜品是全国都热衷的,但是大吃甜品已经不再是无害的事了。许多孟加拉国人已经对中等阶层中日益增多的肥胖、糖尿病和心脏疾病的现象感到警惕。

2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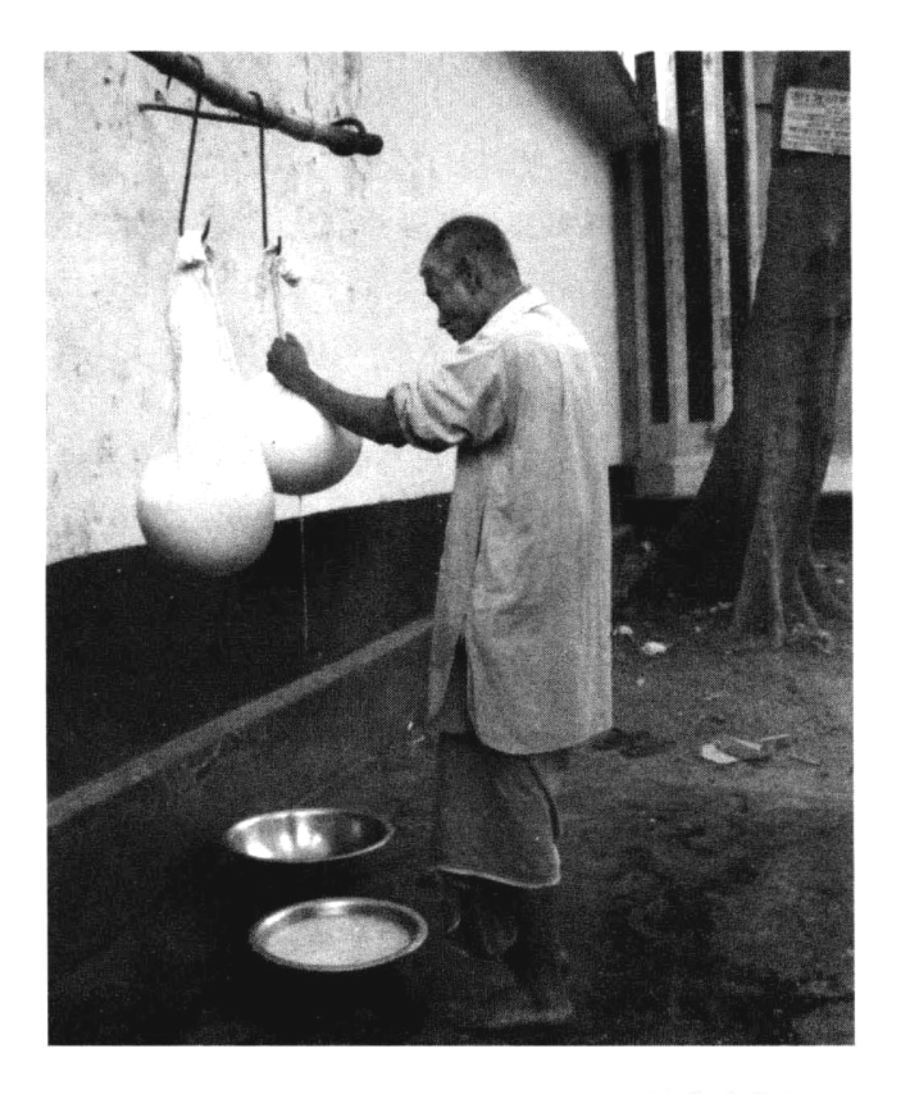


插图 22.11 诺多尔的专业米西提制造者正在过滤新鲜凝乳,2006 年。

国家文化再定义

孟加拉国时期见证了孟加拉三角洲文化变化的加速。独立的国家状态和新的生活方式使其居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接触到了全球文化变

革。他们进行了创造性的回应，但其回应并非都指向同一方向。因此，三角洲各地的共鸣伴随着关于国家文化是什么的激烈辩论。21 世纪生活在这片巨大的泛滥平原上意味着什么？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以面对未来？ 267

虽然，大多数孟加拉国人都有着一种很强的国家意识并对三角洲的环境怀有深深的依恋，但其国家背景却越来越多元化。无论他们生活在孟加拉国还是散居在世界各地，他们都与超越国界的文化观点保持着联系，从世俗到正统、从激进到稳健以及从保守到前卫。结果是出现了一种相当复杂、碎片化且生机勃勃的文化景象，其中个人在公共或私人领域的自我表现相当不同。作为一个当代的孟加拉国人意味着要一直自觉地做出文化选择。而且文化多元长期以来就是孟加拉三角洲的显著特点。三角洲多元、移动边界的历史已经完全地进入到了一个崭新和振奋人心的时期。

268

结　　论

当一个男孩在摩诃斯坦弯腰种下稻种时，他能够确信，男孩们在同一片土地上进行相同的工作至少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当一位采蜜人进入松达班湿地之前向邦比比女神鞠躬致敬时，他代表了千年之久的传统。当孟加拉国人目睹着洪水淹没他们的家园时，他们知道数万年以来他们的先祖也有着相同的经历。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很多事情都有久远的历史。孟加拉国也许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是其整个社会结构来自漫长和动荡的过去。在本书中，我们进行了一番鸟瞰，对其历史进行了粗略的勾勒，却省去了绝大多数的细节。这一理念便是通过展示其历史根脉来解释当代的孟加拉国。其中一些能够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自从人类在这一地区定居，在这一易发洪水的热带三角洲谋生便成为持续不断的挑战。直到今天，人类的技术力量在能赐予富饶或造成巨大破坏的令人敬畏的自然力面前还是相形见绌。另一个长期存在的因素便是孟加拉三角洲的开放性。观念、民族和货物在无法追忆的远古时代就在这个十字路口相遇交织，留下了不可胜数的文化、经济和基因的痕迹，并创造了独具风格的区域文化。正是从这种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中逐渐衍生出了现代孟加拉认同——其从未是大一统的，而是经常冲突、永久变化的。

这些长期过程塑造了当代孟加拉国的深层架构——其定居模式、

农业生产方式、亲属意识形态、音乐传统、烹饪风格以及宗教多样性。正是这些使该地区与众不同。但是孟加拉三角洲也与周边地区共享着许多东西，比如数个世纪的帝国控制，先是北印度的莫卧儿王朝(1610 —1713)，其后是英国(1757 — 1947)。这些时期发生了经济重组和行政变化，许多都影响深远。其同时也创造了新的精英集团，并给予了今天的孟加拉国仍在进行的古老文化实践几层新的意义。 269

最后，20 世纪出现的政治动乱、人口动荡和地缘政治转化，最终塑造了一个新的国家——孟加拉国。三次重大事件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特别的地位：1943 年大饥荒、1947 年分治以及 1971 年战争——每一个都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前者在大众中的记忆。这一段当代历史就是孟加拉国日常现状的根源。一场激烈的叙事辩论远未尘埃落定，因为反对团体仍旧利用其寻求认可与权力。这是一段非常生动的历史。其混杂着记忆、编造的神话、宣传、遗忘以及学术的历史写作，对于所有孟加拉国人而言，这一段近期历史的轨迹，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其创造了生机勃勃的政治体系，主导着他们的生活，并成为现在经济与生态斗争的基础，且刺激了国家的文化战争。今天，孟加拉三角洲的居民——经常出色地——以一种灵活、乐观向上的适应力来处理问题，这正是该地区最有价值的历史遗产之一。

孟加拉国行政地图



地图 A　孟加拉国行政区，1971 至 1984 年。



地图 B　1984 年以来的孟加拉国行政区。

1947 年以来的重要政治人物

（以出生日期为序）

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ad Ali Jinnah,1876 — 1948)以其为巴基斯坦的设计者最为人所知。他出生于卡拉奇,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在伦敦学习律师课程,并在 1896 年进入政坛之前在孟买(Bombay,Mumbai)从事法律工作。他加入了印度国大党,但其后又领导了全印度穆斯林联盟,该党派致力于建立作为印度穆斯林家园的巴基斯坦国家。当巴基斯坦在 1947 年建立后,真纳成为第一任总督。在他第一次访问东巴基斯坦时所做的乌尔都语将成为巴基斯坦国家语言的讲演,激怒了讲孟加拉语的大多数人。其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阿卜杜勒·哈米德·汗·巴沙尼毛拉(Maulana Abdul Hamid Khan Bhashani,约 1880 — 1976)是一位从未担任过公职却极有影响的政治家。他出生于达帕拉(Dhanpara,锡拉杰甘杰区),是一位宗教名人(毛拉,亦即穆斯林学者),他积极地从事基于乡村活动的政治斗争,为农民和劳动者的利益而战。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他搬到了阿萨姆,在那里活跃于穆斯林联盟并在孟加拉定居者中工作。1948 年,他来到了巴基斯坦,并在 1949 年退出穆斯林联盟组建了东巴基斯坦阿瓦米穆斯林联盟。其后又成为语言运动的倡导者。在其长期生涯中,他一直作为一个左翼的伊斯兰政治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并因为敢于直言而数次遭

到羁押。他最后的活动之一是 1976 年为反对在拉杰沙希附近修建法拉卡水坝而组织的一次“长征”。

阿卜杜勒·莫内姆·汗(Abdul Monem Khan,1899 – 1971)是东巴基斯坦相当不受欢迎的一位长官(1962 – 1969)。他生于胡马雍布尔(Humayunpur,吉绍尔甘杰区),1924 年在达卡大学获得法律学位。他于 1935 年加入穆斯林联盟,在迈门辛是一个活跃的政治组织者。巴基斯坦建国后,他担任了诸多行政职务。他与阿尤布·汗将军格外亲近,成为其内阁成员,后于 1962 年被任命为东巴基斯坦总督。他迫害并逮捕政治上的反对者,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并造成恐怖气氛。他再度发起了对孟加拉语的攻击——无耻地禁止巴基斯坦广播电台播放最受推崇的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歌曲——并重新推行语言政治。随着其保护者阿尤布在 1969 年的倒台,莫内姆·汗也失去了他的位置。1971 年战争期间,自由战士在袭击他家的时候将其杀死。

阿尤布·汗(将军)(1908 – 1974)是 1958 至 1969 年间掌权的巴基斯坦第一位军事独裁者。他出生于西北边境省(现属巴基斯坦),并在英国桑德赫斯特皇家陆军军官学校(Royal Military College at Sandhurst)接受训练。他在 1928 年加入了英属印度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缅甸服役,分治后加入了巴基斯坦军队。1948 年,他被派往东巴基斯坦担任总参谋长,负责国家的整个东翼部分。1958 年他发动了一场流血政变,成为统治巴基斯坦十余年的军事独裁者。他修改了宪法并建立了被称为“基本民主”的“代表专制”。在他统治期间经济增长有所加速,但财富的分配却极度失衡。他使巴基斯坦与美国结成了紧密的同盟,其后也同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 1965 年与印度的战争之后(在那期间他将自己擢升为元帅),他的专制统治开始分裂。寻求东巴基斯坦自治的运动积蓄力量,最终在东、西巴基斯坦大规模民众抗议之后,军队于 1969 年 3 月将其废黜。他的位置被叶海亚·汗将军所取代。

提卡·汗(将军)(1915 – 2002),生于旁遮普省,并在印度军事学院接受训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缅甸和北非战斗,并在 1947 年成

为巴基斯坦军事学院的教员。他曾参加1965年的印巴战争,并因其在战争中的无情而赢得声誉,这一点在其1971年3月被叶海亚·汗指定为东巴基斯坦军事指挥官之后又得到了充分反映。提卡·汗是探照灯行动——1971年3月25日摧毁孟加拉国运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总策划,造成了众多平民的死亡,他因此得到了"孟加拉屠夫"的绰号。其在4月被取代,9月被召回西巴基斯坦。提卡·汗在孟加拉国被视为主要战犯,而在巴基斯坦依旧受到政治精英的重用。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1972年任命其为参谋长,并派遣其镇压俾路支的分裂主义运动,他的冷酷又为他赢得了第二个绰号——"俾路支屠夫"。从军队退伍后,他加入了巴基斯坦人民党,出任布托的国家安全特别顾问并在1988年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担任总理时被任命为旁遮普省总督。

叶海亚·汗(将军)(1917－1980)是巴基斯坦第二位军事独裁者,于1969至1971年掌权。他出生在白沙瓦,在1938年加入英属印度军队之前曾就读于旁遮普大学和印度军事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伊拉克和北非服役,并于1942年为轴心国所俘虏。他于1947年加入巴基斯坦军队,其后不断晋升,1966年成为总司令。1969年,他继承阿尤布·汗成为军事统治者。他的风格不同于前任。他在1970年12月组织了巴基斯坦第一次全民议会选举。出人意料的结果出现之后,他主持了东巴基斯坦阿瓦米联盟(由谢赫·穆吉布·拉赫曼领导)与西巴基斯坦的巴基斯坦人民党(由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领导)之间复杂的协商。当这些对话最终未能达成妥协,东巴基斯坦的局势在1971年3月达到沸点时,他命令军队摧毁东巴基斯坦争取自治/独立的运动。这引发了孟加拉国解放战争,并导致巴基斯坦失去了其整个东翼。1971年12月20日,叶海亚·汗不得不将剩余的西翼的权力移交给布托。

穆罕默德·阿图尔·贾尼·奥斯马尼(将军)(Mohammad Ataul Ghani Osmany,1918－1984)是1971年孟加拉国解放战争军队总司令。他出生于苏纳姆甘杰(Sunamganj),曾在锡尔赫特、阿里格尔

(Aligarh)和设在德哈拉顿(Dehra Dun)的印度军事学院接受教育,1940 年加入英属印度军队,1947 年加入巴基斯坦军队。他在 1970 年加入阿瓦米联盟,并于同年成为议会议员。战争爆发时,他被任命为孟加拉国军队总司令,战后成为孟加拉国军队的将军。他于 1972 年退伍,担任阿瓦米联盟内阁的部长。他在穆吉布引入平民独裁时辞职。后来,他创立了自己的政党,但在两次总统选举中都不成功。

谢赫·穆吉布·拉赫曼(穆吉布)(1920 — 1975)是孟加拉国运动中克里斯玛式的领导人以及这个国家的首任总统。他出生于同吉帕拉(Tungipara,戈巴尔甘杰区),是一个法庭小官员的儿子。他被送到加尔各答接受高等教育,并成为政治活跃分子,起先为穆斯林联盟服务,1949 年转投阿瓦米(穆斯林)联盟。他的演讲和组织能力是他最大的优势。他在语言运动中十分活跃,并在 1953 至 1966 年间担任阿瓦米联盟的秘书长。50 年代中期,他被选入东孟加拉省议会,并曾短期担任省政府部长。60 年代后半期,他发布了政治宣言(六点计划)并因为阿加尔塔拉阴谋而遭到监禁,这使他成为东巴基斯坦国家抱负无可争辩的标志性人物。他领导的阿瓦米联盟在 1970 年的全国议会选举中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穆吉布被广泛认为将成为巴基斯坦的下一任总理。这遭到了西巴基斯坦政治家(尤其是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和军队领导人的极力反对。政治僵局在军队试图摧毁阿瓦米联盟时终结,并导致了孟加拉国解放战争(1971)。穆吉布在战争刚开始时即遭逮捕,带往西巴基斯坦并被秘密法庭判处死刑。战后穆吉布被允许回到孟加拉国,并在 1972 年早期执掌国家领导大权。他倾向于世俗的民族主义并且将基础工业国有化。他的政党在 1973 年孟加拉国第一次议会选举中又获得了重大胜利,但在其后不久便失去了民众的支持。1975 年早期他宣布“二次革命”并使自己成为孟加拉国第一个独裁统治者。1975 年 8 月 15 日,穆吉布在一次军队政变中遇袭身亡。

275

格拉姆·阿扎姆(Golam Azam,生于 1922 年)是一位伊斯兰主义政治家,因在孟加拉国解放战争期间与巴基斯坦军队勾结而臭名昭著。他出生于一个达卡的教士家庭,曾在达卡大学学习政治并于 50 年代早

期任教于朗布尔。他在1957年成为东巴基斯坦伊斯兰大会党的秘书长，并于1969年成为其领袖（或称“埃米尔”）。他坚决反对孟加拉国运动，1971年战争期间是巴基斯坦军队的重要支持者。战争结束时他逃往巴基斯坦，并在中东地区寻求颠覆孟加拉国政府的支持。齐亚乌尔·拉赫曼在1978年时允许其回到孟加拉国，其后他便成为孟加拉国伊斯兰大会党的领袖（这在技术层面上是非法的，因为他直到1994年才成为孟加拉国公民）。由贾哈纳拉·伊玛姆及其他人于1992年组织的人民法庭指控他犯有叛国罪并在1971年战争期间领导了一个暗杀小组。2000年，他退出了政治活动。

276

伊拉·密特拉（1925－2002）是一位共产主义活动者，台布哈加/那考尔起义（1946－1950）的领导者之一。她出身于加尔各答的一个伯德鲁洛克家庭，与出身于查普泰-纳瓦布甘杰（Chapai Nawabganj）地主家庭的共产党员莱曼德拉·密特拉（Ramendra Mitra）结为夫妇。在迁居那一地区后，她便开始组织当地的农民（大多数是桑德尔人）为权力而斗争。巴基斯坦建立之后她决定留下来。那考尔运动在巴基斯坦政府于1948年禁止共产党之后变得激进。1950年一次严重冲突之后，巴基斯坦军队摧毁了这一运动，伊拉·密特拉也遭到了逮捕。她在拉杰沙希法庭上的陈述揭露了警察和军队的暴行，因此加深了东巴基斯坦人民对穆斯林联盟政府的普遍不满。判处终身监禁之后，她从1954年的政府更迭中受益。鉴于她极端虚弱的身体状况，新政府允许她前往加尔各答接受医疗护理。在孟加拉国独立之前她都没有回去过。每一次回到祖国，她都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1928－1979）是一位巴基斯坦政治家，他在1971年国家分裂时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他出生在拉卡纳（Larkana，现属巴基斯坦）一个富裕且有权势的地主家庭，曾在加利福尼亚学习政治科学，在牛津学习法律。1958年，阿尤布·汗将军任命他为内阁部长，布托成为独裁者极为信任的顾问。他在1963年成为外交部长，但在1967年辞职，并转而反对阿尤布·汗，组织了自己的巴基斯坦人民党。在反阿尤布的动荡浪潮中，他逐渐显露头角。他在1968年

遭到短期羁押,后又要求阿尤布辞职。1969 年叶海亚·汗掌权之后,布托以维护西巴基斯坦利益强硬路线的代言人自居。1970 年的议会选举中,他的政党赢得了西巴基斯坦大多数的选票,但阿瓦米联盟赢得了总票数中的大多数。布托拒绝支持阿瓦米联盟政府,并拒绝给予东巴基斯坦更多自治权。他破坏了所有政治协调的尝试,并全力支持军队于 1971 年 3 月在东巴基斯坦摧毁其竞争对手。战后,他于 1971 年 12 月 20 日从叶海亚·汗手中接过权力,成为(西)巴基斯坦总统、军队总司令和第一位平民出身的军事管制首席执行官。1972 年 1 月,他释放了一直被监禁在巴基斯坦监狱中并已被判处死刑的谢赫·穆吉布·拉赫曼。直到 1973 年 6 月布托才承认孟加拉国为一个独立国家。在经历了其后多变的政治生涯后,他被巴基斯坦第三位军事独裁者齐亚·乌尔·哈克(Zia ul Haq)逮捕并审判,于 1979 年被绞死。

贾哈纳拉·伊玛姆(1929 — 1994)是一个作家,其作为人民法庭的组织者在政治舞台上受到瞩目。她出生于穆尔希达巴德(现在属于印度的西孟加拉),是一个副县长的女儿。她在家中接受教育,婚后在迈门辛和达卡当学校教师,并在达卡大学和美国接受了进一步的教育。1971 年,她的儿子加入了自由战士,她在日记中表达着她的经历与担忧,这本日记在战后以《1971 年的那些天》(*Ekattorer Dinguli*)为名出版。由于对战犯没有受到应有惩罚以及对那些曾激励自由战士理念的忽视的失望,她参与组织了一个人民法庭,于 1992 年对战犯和通敌者进行了象征性的审判。

277

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将军)(约出生于 1930 年)是孟加拉国的第二位军事独裁者,其在 1982 至 1990 年间掌权。他出生于朗布尔,1952 年加入巴基斯坦军队。孟加拉国解放战争期间,艾尔沙德在西巴基斯坦,但与其他许多辞职的孟加拉官员不同,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待在军队中。1973 年,他被遣返回孟加拉国,加入了孟加拉国军队,并在齐亚执政时期被任命为参谋长。1982 年齐亚遭暗杀几个月后,他发动了一场不流血政变。次年,他宣布自己为孟加拉国总统,并在 1986 年建立民族党。他比齐亚更右倾,十分听信伊斯兰主义言论。

1988年,他宣布伊斯兰教为孟加拉国国教。对其政权的反对逐渐形成了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在暴力冲突后他被迫于1990年辞职。他曾因贪污被捕并于数年间在监狱中进进出出,但仍旧领导着其政党中的一派。

崔迪威·罗伊(拉加)(生于1933年)是1971年之前吉大港山区的主要政治人物。他出生于兰格马蒂,是查克玛首领纳里纳卡沙·罗伊(Nalinaksha Roy)拉加的儿子。1953年他19岁时继承了他父亲的位置。他同时也是一位地方长官、税收官、政治家,有时也作为官方外交使团的一员。1962年,随着开普泰水力发电计划的完成,一个巨大的湖泊淹没了吉大港山区的中央谷。崔迪威拉加的宫殿成为数千所消失在水下的房屋之一。在1970年的国民大会选举中,他成为东巴基斯坦仅有的两位获选的独立候选人之一。他并未加入孟加拉国运动,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一个独立的孟加拉国比巴基斯坦对吉大港山区的自治造成的威胁更大。当孟加拉国解放战争爆发时,他寻求保持中立但最终倒向了巴基斯坦一边,作为其特使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进行了友好访问,并出任军队掌控的省政府战时部长。战争结束后,他迁移到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政府将其视为叛徒并废黜了他。崔迪威拉加在战后由布托领导的巴基斯坦内阁中担任部长,其后曾出任巴基斯坦驻阿根廷及其他国家的大使。

278

齐亚乌尔·拉赫曼(将军)(齐亚)(1936－1981)出生于巴格巴里(Bagbari,博格拉区),是孟加拉国第一位军事独裁者,其在1975至1981年间掌权。他的父亲是加尔各答的一名药剂师。巴基斯坦建立后全家迁往了卡拉奇。齐亚于1955年从巴基斯坦军事学院毕业,并加入了巴基斯坦军队,那时他还是个少年。阿尤布时期他在军队情报部门工作。他于1955年结婚(他的妻子卡莉达·齐亚后来成为总理)。1971年战争爆发时,他正好被派驻在吉大港。他叛变了巴基斯坦,全身心投入孟加拉国一边,并在广播中宣布独立,加入了自由战士,后逃往印度,因其勇猛赢得了广泛声誉。独立后,他被任命为孟加拉国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在1975年的三次政变之后,齐亚掌控了国家并实行

专制统治。他对工业实行解除国有化,并扶持私人企业。1977 年,他任命自己为孟加拉国总统,次年创立了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并允许其他党派恢复活动。他在政治中再次引入伊斯兰因素,并推动了"孟加拉国意识"的概念。1981 年,齐亚在一次失败的军事政变中被暗杀。

阿布·塔赫尔(上校)(1938 — 1976)是一位军官和激进的政治活动者。他出生于阿萨姆,在吉大港附近的高中接受教育,1960 年加入巴基斯坦军队。他接受了突击队员的训练,参加了 1965 年的印度—巴基斯坦战争,1971 年战争爆发时在西巴基斯坦服役。为了向对东巴基斯坦/孟加拉的镇压表示抗议,他投身自由战士并成为迈门辛—朗布尔地区极有影响力的司令官。他在 1971 年 11 月对巴基斯坦军队的一次袭击中失去了一条腿。在印度经过治疗后,他于 1972 年返回孟加拉国,加入孟加拉国军队并被授予勋章。他同时也加入了新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党,这是孟加拉国主要的左翼政党。1975 年的政变和反政变相继发生,并使得军队越发难以驾驭。阿布·塔赫尔借此机会组织左翼士兵在 1975 年 11 月 7 日发起暴动。这次政变使齐亚乌尔·拉赫曼而非阿布·塔赫尔掌握了权力。齐亚逮捕了阿布·塔赫尔,并将其送往达卡中心监狱的军事法庭受审。他被判处死刑,后于 1976 年被施以绞刑。 279

马纳班德拉·纳拉扬·拉玛(Manabendra Narayan Larma,1941 — 1983)是朱玛民族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他出生于科格拉焦里区(吉大港山区),在吉大港接受律师的培训,早年间就投身区域学生运动。他组织了一场运动,要求对数千名因 1960 年开普泰水力发电计划而无家可归的人进行适当的补偿,为此被监禁两年。他在 1970 年的东巴基斯坦省议会选举中作为独立参选人当选议员。孟加拉国赢得独立后不久,拉玛向新宪法草拟委员会提出吉大港山区区域自治的要求。这些要求未受理会,他便建立了吉大港山区联合人民党。1975 年穆吉布倒台后,拉玛逃往了印度,并在那里指挥联合人民党的武装力量山提-巴哈尼进行游击战争。联合人民党内部出现了左翼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这最终导致 1983 年马纳班德拉·纳拉扬·拉玛遭到暗杀。他的弟弟,**约提琳德拉·波德希普里亚(山图)·拉玛**——Jyotirindra

Bodhipriya(Shantu)Larma,生于 1944 年——接任联合人民党领袖。山图·拉玛在 1997 年 12 月的吉大港山区和平协议的谈判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协议结束了 25 年的区域战争,但却导致了联合人民党内部的分裂。那些不同意协议并坚持继续武装反抗达卡当局的人们组织了一个新政党——联合人民民主阵线。和平并未降临吉大港山区,因为联合人民党、联合人民民主阵线和孟加拉国武装力量仍在该地区制造暴力事件。

西拉杰·锡克达尔(1944 — 1975)是一位革命政治家。他出生于贝达尔甘杰(Bhedarganj,沙里亚德布尔区),曾接受工程师教育,后成为左翼政治家。1968 年,他在达卡组建了"毛泽东研究中心",不久即被当局关闭。1971 年战争期间,他在博里萨尔地区组建了自己的游击队,并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即萨卜哈那党或称东孟加拉无产者党。1973 年,他成为东孟加拉全国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of East Bengal)的主席,这是 11 个激进组织的联盟,旨在通过武装斗争在全国的一些地区反抗孟加拉国政府。他们的目标是完成未竟的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些袭击破坏了阿瓦米联盟政权的稳定,并促使穆吉布于 1974 年末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西拉杰·锡克达尔潜入地下,但仍在吉大港被捕,并于 1975 年 1 月在押往达卡监禁途中为警察所杀。

280

卡莉达·齐亚(夫人)(生于 1945 年)曾两度出任孟加拉国总理(1991 — 1996 以及 2001 — 2006)。她是一位迪纳杰布尔商人的女儿,在 15 岁时与齐亚乌尔·拉赫曼成婚(当时齐亚乌尔是一名上尉,后来成为孟加拉国的军事统治者),并于 1965 年与其在西巴基斯坦相聚。1971 年战争爆发后,齐亚乌尔·拉赫曼选择站在孟加拉国一方战斗,巴基斯坦军队便将卡莉达拘捕。1981 年齐亚乌尔·拉赫曼被刺杀后,其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陷入分裂的危险中。卡莉达被选为副主席并在 1984 年成为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主席,她至今仍占据这一位置。通过与谢赫·哈西娜和其他人的联盟,卡莉达成为反对艾尔沙德政权抵抗运动的领军人物,并最终迫使其在 1990 年下台。次年的选举使她成为

孟加拉国第一位女总理,谢赫·哈西娜则是反对党的领袖。在 1996 年的选举后她们互换了位置,并于 2001 年再次更迭。卡莉达领导的联合政府包括伊斯兰主义政党,尤其是伊斯兰大会党。在她第一任总理任期内,孟加拉国推行了免费的十年基础义务教育和女子教育。在她第二任任期内,伊斯兰恐怖主义逐渐抬头,而政府的反应却很怯懦。从 2004 年对艾哈迈迪派出版物的禁令就能看出伊斯兰主义势力在内阁的增长。2007 年,选举被推迟后由临时政府掌权,卡莉达和她的两个儿子被控贪污罪而遭逮捕。

谢赫·哈西娜·瓦吉德(生于 1947 年)是孟加拉国 1996 至 2001 年间的总理。她是谢赫·穆吉布·拉赫曼的女儿,因其身在海外而得以在 1975 年的家族暗杀中幸免于难。1981 年她在德里流亡期间成为阿瓦米联盟的主席,并一直占据着这个位置。其后不久,她返回孟加拉国,并成为反对艾尔沙德政权抵抗运动的核心人物。1986 年的大选使其成为议会反对党的领袖。她与其他政治家,尤其是卡莉达·齐亚结成联盟,组织了迫使艾尔沙德下台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从那时开始,她和卡莉达·齐亚便统治了整个孟加拉国的政治舞台。1991 年的选举使哈西娜再度成为反对党领袖,而卡莉达则当选总理。1996 年的新一轮选举中哈西娜的政党获胜,于是她成为联合政府的总理。她与印度签署了共享恒河水资源的 30 年协议,并签订了吉大港山区的和平协议。2001 年的议会选举使其再度成为反对党领导人,卡莉达·齐亚也再度出任总理。2004 年她在公共集会演讲时被投掷手榴弹——共有 14 人遇难、300 余人受伤,但是哈西娜却毫发未伤。本应在 2007 年举行的选举被推迟,临时政府掌控了政权。2007 年中旬哈西娜被控勒索罪而遭逮捕。

281

孟加拉语术语表

Ajlaf	(*ājlāph*)	出身低贱的
alpona	(*ālpanā*)	地面装饰
am	(*ām*)	芒果
amon	(*āman*)	秋稻
apa	(*āpā*)	姐姐
ashraf	(*āśrāph*)	贵族的
atrap	(*ātrāp*)	出身低贱的
aush	(*āuś*)	春稻
Bangla	(*bāṃlā*)	孟加拉语、孟加拉人
Bangladesh	(*bāṃlādeś*)	孟加拉国
Baul	(*bāul*)	虔诚团体
begom	(*begam*)	女士
bhaoaya	(*bhāoyāyā*)	民歌
bhasha andolon	(*bhāsā āndalan*)	语言运动
bhatiali	(*bhāṭiāli*)	船歌
bhodrolok	(*bhadralok*)	名门世家
bhodromohila	(*bhadramahilā*)	有地位的妇女
bhat	(*bhāt*)	米饭

bhita	(*bhiṭā*)	宅地
bigha	(*bighā*)	0.14 公顷
Bijoy Dibosh	(*bijay dibas*)	胜利日
bil	(*bil*)	低地、湖泊
birangona	(*bīrāṅganā*)	(战争)女英雄
Bisho Ijetema	(*biśva ijtemā*)	世界盛会
Bongobondhu	(*baṅgabandhu*)	孟加拉之友
boro	(*boro*)	冬稻
Boro Porong	(*baṛa paraṃ*)	大逃亡
burka, borka	(*borkā*)	罩袍
chacha	(*cācā*)	叔叔
chandabaji	(*cā̃dābāji*)	敲诈
chaul	(*cāul* 或者 *cāl*)	去壳稻米
chhayanot	(*chāyānaṭ*)	一种音乐形式
chor	(*car*)	淤积河岸、小岛
danga	(*ḍāṅgā*)	高地
daoat	(*dāoyāt*)	邀请
dhan	(*dhān*)	未去壳稻米
dhenki	(*ḍhēki*)	碾米者
didi	(*didi*)	姐姐
doba	(*ḍobā*)	水坑
doi	(*dai, dahi*)	甜酸奶
ekushe	(*ekushe*)	(2 月)21 日依库舍
Firingi	(*phiriṅgi*)	欧洲人
ghat	(*ghāṭ*)	卸货港
gherao	(*gherāo*)	周围的
gono adalot	(*gaṇa ādālat*)	人民法庭
gramin, grameen	(*grāmīn*)	乡村
hal	(*hāl*)	犁

haor (*hāor*) 低地、湖泊
hawala (*hāoyālā*) 银行系统
hijra (*hijrā*) 移民
hortal (*hartāl*) 普遍罢工
hundi (*huṇḍi*) 银行系统
ilish (*iliś*) 鲥(一种鱼)
jal (*jāl*) 渔网
jam (*jām*) 黑莓
jarigan (*jārigān*) 哀歌
Jatiyo Shongshod (*jātiya saṃsad*) 议会
Jatir Jonok (*jātir janak*) 国父
jatra (*jātrā*) 乡村戏剧
jhum (*jhum*) 山区农业
jihadi (*jihādī*) 伊斯兰战士
jilapi (*jilāpi*) 一种甜食
jolidhan (*jalidhān*) 浮稻
jongol (*jaṅgal*) 森林
Joy Bangla! (*jay bāṃlā*) 胜利归于孟加拉!
kacha (*kā̃cā*) 泥造的
kanthal (*kā̃ṭhāl*) 榴莲
kheshari (*khesari*) 香草豌豆
khichuri (*khicuri*) 扁豆拌饭
khola (*kholā*) 开阔地
kul (*kul*) 酸李子
krishok (*kṛṣak*) 农民
Lalon-giti (*lālan-gīti*) 包尔歌曲
langol (*lāṅgal*) 犁;耕地
lojja (*lajjā*) 耻辱
loshkor (*laśkar*) 水手

lungi (*luṅgi*) 男装围裙
madrasha (*mādrāsā*) 伊斯兰学校
mastan (*māstān*) 暴徒,恶棍
maulana (*maolānā*) 毛拉(伊斯兰学者)
milad (*milād*) 感恩
mishti (*miṣṭi*) 甜品
mofussil (*maphasval*) 乡村
monga (*maṅgā*) 类似饥荒
mostan (*mastān*) 暴徒,恶棍
mouza (*maujā*) 征税村
Muhajir (*muhājir*) 移民
Mujibbad (*mujibbād*) 穆吉布主义
mukti bahini (*mukti bāhinī*) 自由战士们
mukti joddha (*mukti joddhā*) 自由战士
Nobab (*nabāb*) 纳瓦布,统治者
olondaz (*olandāj*) 荷兰人;海盗
panta bhat (*pāntā bhāt*) 泡饭
para (*pāṛā*) 小型村落
payesh (*pāyes*) 一种甜食
pir (*pīr*) 精神导师
Pohela Boishakh (*pahelā baiśākh*) 孟加拉新年
porgona (*parganā*) 居住区
porota (*paraṭā*) 面饼
potti (*paṭṭi*) 村庄
pottonidari (*pattanidāri*) 封土分赐
pukur (*pukur*) 池塘
raiyot (*rāiyat*) 佃户
rastrobhasha (*rāśtrabhāsā*) 国家语言
razbari (*rājbāṛi*) 宫殿

Rokkhi Bahini	(*rakṣī bāhinī*)	保安部队
roshkodom	(*raskadam*)	一种甜品
roshmalai	(*rasmālāi*)	一种甜品
roshogolla	(*rasagollā*)	一种甜品
ruti	(*ruṭi*)	面饼
Shanti Bahini	(*śā̃nti bāhinī*)	和平部队
shankari	(*śākhāri*)	贝壳饰品制作者
shari	(*śāṛī*)	莎丽
shemai	(*semāi*)	一种甜食
shishu 1	(*śiśu*；*śuśuk*)	希舒(恒河江豚)
shishu 2	(*śiśu*)	孩子
shobha	(*sabhā*)	联盟
shodeshi	(*svadeśi*)	祖国
shohid minar	(*śahīd minār*)	烈士纪念碑
shomaz	(*samāj*)	会众
Shonar Bangla	(*sōnār bāṃlā*)	金色孟加拉
shondesh	(*sandeś*)	一种甜品
shorkar	(*sarkār*)	政府
shuba	(*subā*)	省
shuntki machh	(*śũṭki mach*)	干鱼
taka	(*ṭākā*)	塔卡(孟加拉国货币)
tebhaga	(*tebhāgā*)	一分为三
tezpata	(*tejpātā*)	肉桂叶
thana	(*thānā*)	卫戍部队；乡村
torkari	(*tarkāri*)	配菜
tupi	(*ṭupi*)	帽子
zamindar	(*jamindār* 或者 *jamidār*)	柴明达尔(地主/收税人)
zindabad!	(*jindābād*)	万岁！

285

注　　释

第一章　水脉与淤泥之地

1 Steven G. Darian, *The Ganges in Myth and History*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8).

2 Jayanta Bandyopadhyay, 'Water Management in the Ganges-Brahmaputra Basin: Emerging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11: 4 (1995), 411 - 442; Hugh Brammer, *Can Bangladesh Be Protected from Floods?*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2004.

3 F. H. Khan, *Geology of Bangladesh*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1); M. A. Allison *et al.*, 'Stratigraphic Evolution of the Late Holocene Ganges-Brahmaputra Lower Delta Plain', *Sedimentary Geology*, 155: 3 (2003), 317 - 342.

4 Alfred Sommer and W. Henry Mosley, 'The Cyclone: Medical Assessment and Determination of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Needs', in: Lincoln C. Chen (ed.), *Disaster in Bangladesh* (New York, et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19 - 132.

5 M. Monirul Qader Mirza, 'Three Recent Extreme Floods in

Bangladesh: A Hydro-Metereological Analysis', *Natural Hazards*, 28 (2003), 35 - 64.

6 Peter J. Bertocci, 'Elusive Villages: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 in Rural East Pakistan',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70; cf. Peter J. Bertocci, *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and Culture in Bangladesh: Selected Essays* (Dhaka: Centre for Social Studies, 1996).

7 与之相反的意见,参见 Bruno Messerli and Thomas Hofer, *Floods in Bangladesh: History, Dynamics and 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e Himalayas*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第二章　丛林、旷野、城市与国家

1 Vikrant Kumar and B. Mohan Reddy, 'Status of Austro-Asiatic Groups in the Peopling of India: An Exploratory Study Based on the Available Prehistoric, Linguistic and Biological Evidences', *Journal of Biosciences*, 28 (2003), 507 - 522; Asok Datta, 'Agricultural Communities (Early Period)', in: Sirajul Islam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Ⅰ, 63 - 66.

2 Dilip K. Chakrabarti, *Ancient Bangladesh: A Study of the Archaeological Sources* (Delhi, et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Syed Mohammad Kamrul Ahsan, 'Prehistory', in: Islam and Miah (eds.), *Banglapedia*, Ⅷ, 176 - 183; Abu Imam, 'Archaeology (Bangladesh)', in: Islam and Miah (eds.), *Banglapedia*, Ⅰ, 244 - 250; Swadhin Sen, 'Community Boundary, Secularized Religion and Imagined Past in Bangladesh: Archaeology and Historiography of Unequal

Encounter', *World Archaeology*, 34: 2 (2002), 346 – 362.

3 W. W. Hunter *et al.*, *A Statistical Account of Bengal* (London: Trübner and Co., 1876), 20 vols.

4 Enamul Haque (ed.), *Excavation at Wari-Bateshwar: A Preliminary Study* (Dhaka: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tudy of Bengal Art, 2001).

5 Henry Glassie, *Art and Life in Bangladesh*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6 Cf. Gautam Sengupta, Sima Roy Chowdhury and Sharmi Chakraborty, *Eloquent Earth: Early Terracottas in the State Archaeological Museum, West Bengal* (Kolkata: Directorate of Archaeology and Museums, West Bengal, 2007).

7 Joachim Karl Bautze, *Early Indian Terracottas* (Leiden, etc.: E. J. Brill, 1995).

8 Krishnapada Goswami, *Place Names of Bengal* (Calcutta: Jnan Prakasan, n. d. [1984]).

9 Samaren Roy, *The Roots of Bengali Culture* (Calcutta: Firma K. L. Mukhopadhyay, 1981).

10 Richard M. Eaton,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 – 1760* (Berkeley, et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3.

11 T. W. Clark, 'Evolution of Hinduism in Medieval Bengali Literature: Siva, Candi, Manas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7: 3 (1955), 511.

12 Eaton, *Rise of Islam*, 4.

13 Himangshu Prabha Ray, 'The Archaeology of Bengal: Trading Networks, Cultural Indentitie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49: 1 (2006), 68 – 95.

14 Darian, *Ganges*, 138.

15 Darian, *Ganges*; Aniruddha Ray, 'Gaur', in: Islam and Miah (eds.), *Banglapedia*, Ⅳ, 345 - 349.

16 A. M. Chowdhury, 'History: Early Period', in: Islam and Miah (eds.), *Banglapedia*, Ⅴ, 104 - 111; A. M. Chowdhury, 'Matsyanyayam', in: Islam and Miah (eds.), *Banglapedia*, Ⅵ, 446.

17 Sheena Panja, 'Monuments in a Flood Zone: "Builders" and "Recipients" in Ancient Varendri (Eastern India and Bangladesh)', *Antiquity*, 77: 297 (2003), 497 - 504.

第三章　多重边界的地区

1 Ralph W. Nicholas, 'Islam and Vaishnavism in the Environment of Rural Bengal', in: Rafiuddin Ahmed (ed.), *Understanding the Bengal Muslims: Interpretative Essays*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52 - 7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David Kopf (ed.), *Bengal: Regional Identity*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69); Richard M. Eaton, 'Human Settlement and Colonization in the Sundarbans, 1200 - 1750',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7: 2 (1990), 6 - 16; Eaton, *Rise of Islam*.

2 David E. Sopher, 'The Swidden/Wet-Rice Transition Zone in the Chittagong Hill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4: 1 (1964), 107 - 126.

3 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et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4 E. R. Leach, 'The Frontiers of "Burm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 1(1960), 49 - 68.

5 Willem van Schendel, Wolfgang Mey and Aditya Kumar Dewan,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Living in a Borderland* (Bangkok: White Lotus, 2000).

6 Abu Imam, 'Chinese Accounts — Ancient', in: Islam and Miah (eds.), *Banglapedia*, II, 482.

7 Ralph W. Nicholas, 'The Goddess Sitala and Epidemic Smallpox in Benga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1: 1 (1981), 21-44; Ralph W. Nicholas, *Fruits of Worship: Practical Religion in Bengal* (New Delhi: Chronicle Books, 2003), 78-104; Edward C. Dimock, Jr, *The Sound of Silent Guns and Other Essays*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David L. Curley, 'Marriage, Honor, Agency, and Trials by Ordeal: Women's Gender Roles in Caṇḍīmaṅgal', *Modern Asian Studies*, 35: 2 (2001), 315-348; Ashis Nandy, 'A Report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Health of the Gods and Goddesses in South Asia', *Postcolonial Studies*, 4: 2 (2001), 125-141.

8 Clark, 'Evolution of Hinduism', 506.

9 Edward C. Dimock, Jr (ed. and trans.), *The Thief of Love: Bengali Tales from Court and Villa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W. L. Smith, *The One-Eyed Goddess: A Study of the Manasā Mangal* (Stockholm: Almqvist and Wiksell, 1980).

10 Clark, 'Evolution of Hinduism'.

11 Muin-ud-Din Ahmad Khan, 'The Arabs', in: Islam and Miah (eds.), *Banglapedia*, I, 240-241.

12 Eaton, *Rise of Islam*, xxi.

13 Sirajul Islam, 'State', in: Islam and Miah (eds.), *Banglapedia*, IX, 420-424.

14 Tim Mackintosh-Smith (ed.), *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h*

(London: Picador, 2002), 253 - 254.

15 Richard M. Eaton, 'Who Are the Bengal Muslims? Conversion and Islamization in Bengal', in: Ahmed (ed.), *Understanding the Bengal Muslims*, 36. Cf. Tony K. Stewart, 'In Search of Equivalence: Conceiving Muslim-Hindu Encounter through Translation Theory', *History of Religions*, 40: 3 (2001), 260 - 287.

16 Eaton, *Rise of Islam*, 267; Stewart, 'In Search of Equivalence'; Ralph W. Nicholas, 'Islam and Vaishnavism'; Sufia M. Uddin, *Constructing Bangladesh: Religion, Ethnicity, and Language in an Islamic Na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17 Eaton, *Rise of Islam*, 303; cf. Shaman Hatley, 'Mapping the Esoteric Body in the Islamic Yoga of Bengal', *History of Religions*, 46 (2007), 351 - 368.

18 David Ludden, 'Investing in Nature around Sylhet: An Excursion into Geographical Histo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38: 48 (2003), 5080 - 5088.

19 T. H. Lewin, *The Hill Tracts of Chittagong and the Dwellers Therein, with Comparative Vocabularies of the Hill Dialects* (Calcutta: Bengal Printing Company Ltd, 1869); Edward T. Dalton, *Descriptive Ethnology of Bengal* (Calcutta: 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 1872); Lucien Bernot, *Les paysans arakanais du Pakistan Oriental: le monde végétal et l'organisation sociale des réfugiés Marma (Mog)* (Paris and The Hague: Mouton, 1967), 2 vols.; Claus-Dieter Brauns and Lorenz G. Löffler, *Mru: Hill People on the Border of Bangladesh* (Basle, etc.: Birkhäuser, 1990).

20 Ellen Bal, *They Ask If We Eat Frogs: Garo Ethnicity in*

Bangladesh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7); Mahmud Shah Qureshi (ed.), *Tribal Cultures in Bangladesh* (Rajshahi: Institute of Bangladesh Studies, 1984); Philip Gain (ed.), *Bangladesh: Land, Forest and Forest People* (Dhaka: Society for Environ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SEHD), 1995).

21 Sukumar Sen, *History of Bengali Literature* (New Delhi: Sahitya Akademi, 1960).

22 Dimock, *Thief of Love*, 5.

23 Willem van Schendel (ed.), *Francis Buchanan in Southeast Bengal (1798): His Journey to Chittagong,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Noakhali and Comilla*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2) (Bengali translation: *Dokkhinpurbo Banglay Francis Buchanan (1798): Kumilla, Noakhali, Chottogram, Parbotyo Chottograme Tanr Bhromon* (Dhaka: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Bengal Studies, 1994)).

24 Tony K. Stewart, *Fabulous Females and Peerless Pīrs: Tales of Mad Adventure in Old Bengal* (New York, et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6; cf. Dimock, *Thief of Love*.

25 Taslima Nasrin, *Behula Eka Bhasiyechila Bhela* (Behula Floated the Raft Alone) (Dhaka: Shikha Prakashani, 1993).

26 Asim Roy, 'Being and Becoming a Muslim: A Historiographic Perspective on the Search for Muslim Identity in Bengal', in: Sekhar Bandyopadhyay (ed.), *Bengal: Rethinking History-Essays on Historiography* (Delhi: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Bengal Studies/Manohar Publications, 2001), 167 – 229.

27 Wakil Ahmed, 'Pir', in: Islam and Miah (eds.), *Banglapedia*, Ⅷ, 89 – 90.

28 Stewart, *Fabulous Females*; Sujit Choudhury, 'Badsah: A

Hindu Godling with a Muslim Background', in: Mustafa Zaman Abbasi and Bashir Al Helal (eds.), *Folkloric Bangladesh* (Dacca: Bangladesh Folklore Parishad, 1979), 61 – 69.

29 Nirad C. Chaudhuri,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Unknown Indian* (Bombay: Jaico Publishing House, 1951), 31 – 34.

30 Jeanne Openshaw, *Seeking Bauls of Beng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Dimock, *Sound of Silent Guns*.

31 *Tomār path dhāikyāchhe mandire masjide,*
tomār dāk śuni, sā̃i, chalte nā pāi,
ruikṣya dā̃ṛā̃y gurute morshede. . . ,
tor duyāre nānān tālā, purāṇ korān tasbi mālā.
hāy guru, ei biṣam jwālā, kā̃indya madan mare khede.
改编自 Shamsuzzaman Khan (ed.), *Folklore of Bangladesh* (Dhaka: Bangla Academy, 1987), Ⅰ, 297.

第四章 作为十字路口的三角洲

1 Mackintosh-Smith, *Travels of Ibn Battutah*, 254; Harinath De (trans.), *Ibn Batuta's Account of Bengal* (Dacca: Baikunta Nath Press, 1904), 13.

2 Prithwis Chandra Chakravarti, 'Naval Warfare in Ancient India', *The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6: 4 (1930), 645 – 664.

3 Himangshu Prabha Ray, *The Archaeology of Seafaring in Ancient South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80.

4 Smith, *One-Eyed Goddess*, 90.

5 Ranabir Chakravarti, 'Trade and Commerce — Ancient Period', in: Islam and Miah (eds.), *Banglapedia*, Ⅹ, 183; Ray, 'Archaeology of Bengal'.

6 Hasna Jasimuddin Moudud, *A Thousand Year Old Bengali Mystic Poetry*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2), 61; Razia Sultana, 'Women's Occupation in Medieval Bengal', in: Firdous Azim and Niaz Zaman (eds.), *Infinite Variety: Women in Society and Literature*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4), 77.

7 Ray, 'Archaeology of Bengal', 83.

8 Wilfred H. Schoff (ed. and trans.), *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Travel and Trade in the Indian Ocean by a Merchant of the First Century*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12).

9 Chakravarti, 'Trade and Commerce', 184.

10 Chakravarti, 'Trade and Commerce'; Sushil Chaudhury, 'Trade and Commerce — Medieval Period', in: Islam and Miah (eds.), *Banglapedia*, X, 188 - 191.

11 Om Prakash,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Economy of Bengal*, 1630 - 172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27 - 34; Om Prakash, 'The Indian Maritime Merchant, 1500-1800',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47: 3 (2004), 451.

12 Ray, *Archaeology of Seafaring*, 30 - 36.

13 Gavin Hambly, 'A Note on the Trade in Eunuchs in Mughal Beng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4: 1 (1974), 125 - 130.

14 Chaudhury, 'Trade and Commerce', 188; cf. Prakash,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28.

15 K. N. Chaudhuri, *Asia Before Europe: Economy and Civilis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311 - 312.

16 Chaudhury, 'Trade and Commerce', 188.

17 Aniruddha Ray, 'The Portuguese', in: Islam and Miah (eds.), *Banglapedia*, Ⅷ, 142 - 146; J. J. A. Campos, *History of the Portuguese in Bengal* (Calcutta: Butterworth & Co., 1919), 26 -43, 66 - 80.

18 Prakash,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258.

19 Prakash,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53, 75, 118 - 141.

20 Glynis Ridley, *Clara's Grand Tour: Travels with an Eighteenth-Century Rhinoceros*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4). Cf. Sirajul Islam, 'American Maritime Activities in Calcutta: Cases of Elephant and Ice',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Humanities)*, 49: 1 (2004), 41 - 59.

21 Prakash, 'The Indian Maritime Merchant', 453.

22 Willem van Schendel, *The Bengal Borderland: Beyond State and Nation in South Asia* (London: Anthem Press, 2005), 274 - 275.

23 Prakash, 'The Indian Maritime Merchant', 453.

24 Sushil Chaudhury,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Eighteenth Century Bengal* (Delhi: Manohar, 1995).

25 Tapan Raychaudhuri, *Bengal under Akbar and Jahangir: An Introductory Study in Social History*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69 [1953]), 32 - 33, 192 - 211.

26 Sushil Chaudhury, 'International Trade in Bengal Silk and the Comparative Role of Asians and Europeans, circa 1700 - 1750', *Modern Asian Studies*, 29: 2 (1995b); Prakash,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1985, 221 - 234, 256, 259.

27 Frans Jansz van der Heijden, *Relation du Naufrage d'un Vaisseau Hollandois nommé Ter Schelling vers la Côte de Bengala...* (Amsterdam: La veuve de Jacob van Meurs, 1681).

28 Raychaudhuri, *Bengal under Akbar and Jahangir*, 237.

29 Campos, *History of the Portuguese in Bengal*, 90, 100 - 111.

第五章　从莫卧儿帝国到大英帝国

1 Jadunath Sarkar (ed.), *The History of Bengal. Volume* Ⅱ *: Muslim Period, 1200 -1757* (Dacca: University of Dacca, 1976 [1948]); Momtazur Rahman Tarafdar, *Husain Shahi Bengal, 1494 - 1538 A.D. : A Socio-Political Study* (Dacca: Asiatic Society of Pakistan, 1965).

2 Abdul Karim, *Dacca: The Mughal Capital* (Dacca: Asiatic Society of Pakistan, 1964).

3 Raychaudhuri, *Bengal under Akbar and Jahangir*, 38 - 39.

4 Mīrzā Nathan, *Bahāristān-i-Ghaybī: A History of the Mughal Wars in Assam, Cooch Behar, Bengal, Bihar and Orissa during the Reign of Jahāngir and Shāhjahān*;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Persian by M. I. Borah (Gauhati: Narayani Handiqui Historical Institute, Department of Historical and Antiquarian Studies, Government of Assam, 1936), Ⅰ, 130 - 131; Raychaudhuri, *Bengal under Akbar and Jahangir*, 82 - 84, 112 -114.

5 Raychaudhuri, *Bengal under Akbar and Jahangir*, 113.

6 Raychaudhuri, *Bengal under Akbar and Jahangir*, 86.

7 Wouter Schouten, *Reistogt naar en door Oostindiën*, 4th edn (Utrecht and Amsterdam, 1775 [1676]).

8 Wakil Ahmed, 'Ālāol', in: Islam and Miah (eds.), *Banglapedia*, Ⅰ, 169.

9 Raychaudhuri, *Bengal under Akbar and Jahangir*, 223 - 224.

10 François Balthazar Solvyns, *The Costume of Hindostan, Elucidated by Sixty Coloured Engravings: with Descriptions in*

English and French (London: Edward Orme, 1804).

11 Solvyns, *The Costume of Hindostan*.

12 Irfan Habib, *An Atlas of the Mughal Empir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aps with Detailed Notes, Bibliography and Index* (Delhi, et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Raychaudhuri, *Bengal under Akbar and Jahangir*, 204 – 211.

13 Chaudhury,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306 – 335; Sushil Chaudhury, *The Prelude to Empire: Plassey Revolution of 1757* (Delhi: Manohar, 2000).

第六章　英国的影响

1 W. W. Hunter, *The Annals of Rural Bengal: Vol. Ⅰ. The Ethnical Frontier of Lower Bengal, with the Ancient Principalities of Beerbhoom and Bishenpore* (New York: Leypoldt and Holt, 1868), 26 – 27, 29 – 30.

2 For an overview see for example Sugata Bose, *Peasant Labour and Colonial Capital: Rural Bengal Since 17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3 Ranajit Guha, *A Rule of Property for Bengal* (Paris: Mouton, 1963); Sirajul Islam, *The Permanent Settlement in Bengal: A Study of Its Operation* (Dacca: Bangla Academy, 1979).

4 Akinobu Kawai, '*Landlords' and Imperial Rule: Change in Bengal Agrarian Society c. 1885 – 1940* (Tokyo: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1987); Sirajul Islam, 'Permanent Settlement', in: Islam and Miah (eds.), *Banglapedia*, Ⅷ, 34 – 42; Sinkichi Taniguchi, Masahiko Togawa and Tetsuya Nakatani (eds.), *Grambangla: Itihash, Shomaj O Orthoniti* (Kolkata: K. P. Bagchi and Company, for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Bengal Studies, Delhi

Branch, 2007).

5 Sirajul Islam, *Bengal Land Tenure: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Intermediate Interests in the 19th Century* (Calcutta: K. P. Bagchi, 1988).

6 Cf. Sharif Uddin Ahmed, *Dacca: A Study in Urban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Curzon Press and Riverdale, MD, The Riverdale Company, 1986), 75 - 77.

7 *Annual Report of the Varendra Research Society for 1932 - 1933 and 1933 - 1934* (Rajshahi: Varendra Research Society, 1934); Gerd J. R. Mevissen, 'Stone Image of Jina Ṛṣabhanatha with Aṣṭadikpālas in Dinajpur Museum', Golden Jubilee Volume (1956 -2005),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Humanities*), 50: 1 - 2 (2005), 83 - 96.

8 Binay Bhushan Chaudhuri, 'Commercialisation of Agriculture', in: Islam and Miah (eds.), *Banglapedia*, Ⅰ, 371 - 427. Cf. Willem van Schendel, *Reviving a Rural Industry: Silk Producers and Officials in India and Bangladesh, 1880s to 1980s*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5).

9 Bose, *Peasant Labour and Colonial Capital*.

10 J. H. Broomfield, *Elite Conflict in a Plural Society: Twentieth-Century Benga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Joya Chatterji, *Bengal Divided: Hindu Communalism and Partition, 1932 - 1947* (New Delhi: Foundation Book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1 相关描述可参看例如 Rabindranath Tagore, *The Home and the World* (London: Macmillan, 1919); Chaudhuri,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Unknown Indian*, 1951; Shudha Mazumdar, *A Pattern of Life: The Memoirs of an Indian*

Woman, ed. Geraldine Forbes (New Delhi: Manohar Book Publications, 1977); Partha Chatterjee, *A Princely Impostor? The Strange and Universal History of the Kumar of Bhawal*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 Iftikhar-ul-Awwal, 'State of Indigenous Industries', in: Sirajul Islam (ed.), *History of Bangladesh 1704 – 1971. Volume* II: Economic History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1992), 272 – 370.

13 Ahmed, *Dacca*; Muntassir Mamoon, *Dhaka: Smriti Bismritir Nogori* (Dhaka: Recalling the Forgotten City) (Dhaka: Bangla Academy, 1993).

第七章 关闭的耕地边界

1 Bose, *Peasant Labour and Colonial Capital*, 1993; Chaudhuri, 'Commercialisation of Agriculture'; M. Mufakharul Islam, 'Agriculture — History', in: Islam and Miah (eds.), *Banglapedia*, Ⅰ, 71 – 82.

2 Van Schendel, *The Bengal Borderland*, 191 – 255.

3 Willem van Schendel, *Peasant Mobility: The Odds of Life in Rural Bangladesh* (Assen: van Gorcum, 1981 and Delhi: Manohar, 1982), 64 – 67.

4 Willem van Schendel, 'Self-Rescue and Survival: The Rural Poor in Bangladesh', *South As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9: 1 (1986), 41 – 60.

5 Willem van Schendel, *Three Deltas: Accumulation and Poverty in Rural Burma, Bengal and South India* (Delhi, etc.: Sage Publications, 1991), 302 – 304.

6 参见如联合国的数据：http://unstats. un. org/unsd/demographic/products/dyb/DYB2002/Tableo1. pdf; www. unfpa. org/swp/2004/

presskit/docs/indicator2. pdf; and USA Census Bureau data at www. census. gov/cgi-bin/ipc/idbsum. pl? cty = BG (accessed 23 October 2007).

7 Iftekhar Iqbal, 'Ecolog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Bengal Delta, *c*. 1840 – 1943',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5, 169 – 193; Iftekhar Iqbal, 'Toward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olonial East Bengal: Paradigms and Praxis',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50 (2005), 501 – 518; Iftekhar Iqbal, 'Fighting With a Weed: Water Hyacinth and the State in Colonial Bengal, *c*. 1910 – 1947',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15: 1 (2009).

8 Willem van Schendel and Aminul Haque Faraizi, *Rural Labourers in Bengal, 1880 – 1980* (Rotterdam: Comparative Asian Studies Programme,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1984).

9 Philip Gain, Lucille Sircar and Shamimul Islam, *The Case of Forests, Ethnic Communities and Tea Workers of Bangladesh* (Dhaka: Society for Environ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SEHD), 2005), 47 – 69.

10 Paul R. Greenough, *Prosperity and Misery in Modern Bengal: The Famine of 1943 – 1944*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309; Amartya Sen,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52 – 85.

11 Greenough, *Prosperity and Misery*, 89.

12 Greenough, *Prosperity and Misery*, 85, 97, 307; cf. Sen, *Poverty and Famines*; M. Mufarakhul Islam, 'The Great Bengal Famine and the Question of FAD Yet Again', *Modern Asian Studies*, 41: 2 (2007), 421 – 440.

13 Burhanuddin Khan Jahangir, *The Quest of Zainul Abedin*, trans. Meghna Guhathakurta (Dhaka: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Bengal Studies, 1993); Nikhil Sarkar, *A Matter of Conscience: Artists Bear Witness to the Great Bengal Famine of 1943*, trans. Satyabrata Dutta (Calcutta: Punascha, 1998).

第八章　殖民地的冲突

1 Muazzam Hussain Khan, 'Fakir-Sannyasi Resistance', in: Islam and Miah (eds.), *Banglapedia*, Ⅳ, 39 – 41; Suprakash Roy, *Bharoter Krishok-Bidroho o Gonotontrik Songgram* (Calcutta: DBNA Brothers, 1980); see also translation (by Rita Banerjee): Suprakash Roy, *Peasant Revolts and Democratic Struggles in India* (Calcutta: Naya Udyog, for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Bengal Studies, 1999).

2 Ratan Lal Chakraborty, 'Chakma Resistance to Early British Rule', *Bangladesh Historical Studies, Journal of the Bangladesh Itihas Samiti*, 2 (1977), 133 – 156; Willem van Schendel, 'Madmen of Mymensingh: Peasant Resistance and the Colonial Process in Eastern India, 1824 – 1833',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22: 2 (1985), 139 – 173.

3 Cf. Muntassir Mamoon, *Unish Shotoker Bangladesher Songbad-Shamoyikpotro, 1847 – 1905* (Nineteenth-Century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f Bangladesh, 1847 – 1905) (Dhaka: Bangla Academy, 1985 – 2000), 9 vols.

4 J. M. Tagore, cited in Bose, *Peasant Labour and Colonial Capital*, 158.

5 Muntassir Mamoon, 'Bengal Partition (1905): Reaction in Eastern Bengal',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114 (2007), 1 –32.

6 Sumit Sarkar, *The Swadeshi Movement in Bengal, 1903 – 1908*

(New Delh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3).

7 David M. Laushey, *Bengal Terrorism and the Marxist Left: Aspects of Regional Nationalism in India, 1905 - 1942* (Calcutta: Firma K. L. Mukhopadhyay, 1975); Peter Heehs, *The Bomb in Bengal: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Terrorism in India 1900 -1910*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8 *Chottogram Jubobidroho 1930 - 1934 Alekhyomala* (Pictures of the 1930 - 1934 Youth Revolt in Chittagong) (Kolkata: Biplobtirtho Chottogram Smritishongstha Prokashon, 2001); *Shurjo Sen Smriti* (Surya Sen Memento) (Kolkata: Biplobtirtho Chottogram Smritishongstha Prokashon, 2003 [1971]).

9 Dipesh Chakrabarty, 'Romantic Archives: Litera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Bengal', *Critical Inquiry*, 30 (2004), 654 - 682.

10 Sekhar Bandyopadhyay, *Caste, Politics and the Raj: Bengal 1872 -1937* (Calcutta: K. P. Bagchi, 1990).

11 Tazeen M. Murshid,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Bengal Muslim Discourses, 1871 -197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 Rafiuddin Ahmed, 'Introduc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 Bengal Muslims', in: Ahmed (ed.), *Understanding the Bengal Muslims*, 7.

13 Rafiuddin Ahmed, *The Bengal Muslims 1871 - 1906: A Quest for Identity*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4 Chatterji, *Bengal Divided*.

15 [Mrs] R. S. Hossein, *Sultana's Dream* (Calcutta: S. K. Lahiri & Co., 1908; facsimile edition, Dhaka: Liberation War Museum, 2005); Rokeya Sakhawat Hossain, *Sultana's Dream and Padmarag: Two Feminist Utopia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Barnita Bagchi) (New Delhi, etc.: Penguin Books, 2005).

16 Suranjan Das, *Communal Riots in Bengal, 1905 - 1947*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Sekhar Bandyopadhyay, 'A Namasudra-Muslim Riot in Jessore-Khulna, May 1911: A Case Study in Community Formation and Communal Conflict', in: Bidyut Chakrabarty (ed.), *Communal Identity in India: Its Construction and Articul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14 - 228.

17 Syed Serajul Islam, 'Bengal Legislative Assembly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Sirajul Islam (ed.), *History of Bangladesh 1704 - 1971. Volume Ⅰ: Political History*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1992), 276 - 306.

第九章 走向分治

1 'Presidential Address of M. A. Jinnah — Lahore, March 1940', in: Mushirul Hasan (ed.), *India's Partition: Process, Strategy and Mobilization*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44 - 58.

2 Ayesha Jalal, *The Sole Spokesman: Jinnah, the Muslim League and the Demand for Pakis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 Adrienne Cooper, *Sharecropping and Sharecroppers' Struggles in Bengal, 1930 - 1950* (Calcutta: K. P. Bagchi & Company, 1988).

4 Somenath Hore, *Tebhaga: An Artist's Diary and Sketchbook*; translated from Bengali by Somnath Zutshi (Calcutta: Seagull Books, 1990).

5 Marcus F. Franda, 'Communism and Regional Politics in East

Pakistan', *Asian Survey*, 10: 7 (1970), 588; Badruddin Umar, *The Emergence of Bangladesh: Class Struggles in East Pakistan (1947 – 1958)*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6 Umar, *Emergence of Bangladesh*, 138 – 144.

7 Chatterji, *Bengal Divided*.

8 Taj ul-Islam Hashmi, *Pakistan as a Peasant Utopia: The Communalization of Class Politics in East Bengal, 1920 – 1947* (Boulder, etc.: Westview Press, 1992).

9 Sugata Bose and Ayesha Jalal, *Modern South Asia: History, Culture,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188.

第十章　分　　治

1 Willem van Schendel, 'Stateless in South Asia: The Making of the India-Bangladesh Enclav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 1 (2002), 115 – 147; Van Schendel, *The Bengal Borderland*.

2 Van Schendel, *The Bengal Borderland*, 296 – 331.

3 David Ludden, 'The First Boundary of Bangladesh on Sylhet's Northern Frontiers',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48, 1 (2003), 1 – 54.

4 Md Mahbubar Rahman and Willem van Schendel, '"I Am *Not* a Refugee": Rethinking Partition Migrat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37: 3 (2003), 551 – 584; Joya Chatterji, '"Dispersal" and the Failure of Rehabilitation: Refugee Campdwellers and Squatters in West Bengal', *Modern Asian Studies*, 41: 5 (2007), 995 – 1032.

5 Joya Chatterji, 'The Fashioning of a Frontier: The Radcliffe

Line and Bengal's Border Landscape, 1947 – 1952', *Modern Asian Studies*, 33: 1 (1999), 185 – 242.

第十一章 巴基斯坦实验*

1 A. M. K. Maswani, *Subversion* in *East Pakistan* (Lahore: Amir Publications, 1979), 84 – 85.

2 *Five Years of Pakistan* (*August 1947-August 1952*) (Karachi: Pakistan Publications, 1952), 243.

3 Muhammad Ayub Khan, *Friends Not Master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22.

4 Hasan Zaheer, *The Separation of East Pakistan: The Rise and Realization of Bengali Muslim Nationalism*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4), 21.

5 Rounaq Jahan, *Pakistan: Failure in National Integ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12.

6 Anisuzzaman, *Creativity, Reality and Identity* (Dhaka: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Bengal Studies, 1993), 91 – 116.

7 Z. H. Zaidi (ed.-in-chief), *Jinnah Papers: Pakistan — Struggling for Survival, 1 January –30 September* 1948, vol. Ⅶ, Quaid-i-Azam Papers Project, Government of Pakistan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cf. Philip Oldenburg, '"A Place Insufficiently Imagined": Language, Belief and the Pakistan Crisis of 1971',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 4 (1985), 711 – 733.

8 M. Rashiduzzaman, 'The Awami League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Pakistan', *Asian Survey*, 10: 7 (1970), 574 –

* 原文误作第一章篇名。——译者注

587; Umar, *Emergence of Bangladesh*.

9 Uddin, *Constructing Bangladesh*.

10 Ahmad Saleem (comp. and ed.), *It Is My Mother's Face: Selected Readings on Bengali Language Movement* (Lahore: Sanjh Publications, n.d. [2006]); Talukdar Maniruzzaman,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Pakistan', *Asian Survey*, 7: 12 (1967), 876 - 885; Ian Talbot, *Pakistan: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Hurst & Company, 1998).

11 Zaheer, *Separation of East Pakistan*, 26.

12 Richard L. Park and Richard S. Wheeler, 'East Bengal under Governor's Rule', *Far Eastern Survey*, 23: 9 (1954), 129 - 134; Md Mahbubar Rahman, *Bangladesher Itihash, 1947 - 1971* (History of Bangladesh, 1947 - 1971) (Dhaka: Shomoy Prokashon, 1999).

13 Keith Callard, *Pakistan: A Political Stud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and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14 Rashiduzzaman, 'The Awami League'.

15 Ayesha Jalal,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South Asia: A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95 - 296; cf. Ayesha Jalal, 'Conjuring Pakistan: History as Official Imagi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7: 1 (1995), 73 - 89.

16 Khan, *Friends Not Masters*, 187.

17 D.P. Singhal, 'The New Constitution of Pakistan', *Asian Survey*, 2: 6 (1962), 15 - 23.

第十二章 巴基斯坦的分裂

1 Maniruzzaman, 'National Integration'.

2 Rashiduzzaman, 'The Awami League'; Roedad Khan (ed.), *The British Papers: Secret and Confidential India-Pakistan-Bangladesh Documents 1958 – 196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cf. Roedad Khan (ed.), *The American Papers: Secret and Confidential India-Pakistan-Bangladesh Documents 1965 – 1973*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9).

3 Tariq Ali, *Pakistan: Military Rule or People's Power*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0).

4 Mohammad Asghar Khan, *Generals in Politics: Pakistan 1958 – 1982*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83), 28.

5 Craig Baxter, 'Pakistan Votes — 1970', *Asian Survey*, 11: 3 (1971), 197 – 218; Jahan, *Pakistan*; Sharif al Mujahid, 'Pakistan: First General Elections', *Asian Survey*, 11: 2 (1971), 159 – 171.

6 Raja Tridiv Roy, *The Departed Melody* (*Memoirs*) (Islamabad: PPA Publications, 2003); Van Schendel *et al.*, *Chittagong Hill Tracts*.

7 Ahmad Salim (comp. and ed.), *Ten Days That Dismembered Pakistan: March 15-March 25, 1971: The Real Story of the Yahya-Mujib-Bhutto Talks* (Islamabad: Dost Publications, 2001).

8 Abdul Rahman Siddiqi, *East Pakistan: The End Game. An Onlooker's Journal 1969 – 1971* (Karachi, et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58; S. A. Karim, *Sheikh Mujib: Triumph and Tragedy*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2005), 172 – 203.

第十三章　东巴基斯坦人的生活

1 Imtiaz Ahmed, Abhijit Dasgupta and Kathinka Sinha-Kerkhoff (eds.), *State, Society and Displaced People in South Asia*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2004).

2 Rahman and Van Schendel, '"I Am *Not* a Refugee"'; Joya Chatterji, *The Spoils of Partition: Bengal and India, 1947 – 19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5 – 208.

3 Taslima Nasrin, 'Bhongo Bongodesh', in: *Ay Kosto Jhepe Jibon Debo Mepe* (Pain Came Roaring Down, I'll Measure Out My Life for You) (Kolkata: Anondo Publishers, 1995), 12.

4 Dipesh Chakrabarty, 'Remembered Villages: Representation of Hindu-Bengali Memories in the Aftermath of Partiti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0 August 1996), 2143 – 2151.

5 Manas Ray, 'Growing Up Refugee: On Memory and Localit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53 (2002), 149 – 179; Prafulla K. Chakrabarti, *The Marginal Men: The Refugees and the Left Political Syndrome in West Bengal*, 2nd edn (Calcutta: Naya Udyog, 1999).

6 Cf. Ellen Bal, 'An Untold Story of the Partition: The Garos of Northern Mymensingh', in: Ahmed *et al.* (eds.), *State, Society and Displaced People*, 245 – 279.

7 Taufiq M. Khan and A. Bergan, 'Measurement of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Pakistan Economy: A Review of the National Income Estimates, 1949/50 to 1963/64',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6: 2 (1966), 168 – 175; J. R. Andrus, Azizali F. Mohammed and Mohammed Afzal, 'State and Private Enterprise in Pakistan', *Far Eastern Survey*, 20: 7 (1951), 61; Ahmad Kamruddin, *Labour Movement in East Pakistan* (Dhaka: Progoti Publishers, 1969).

8 James K. Boyce, *Agrarian Impasse in Bengal: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to Technological Chan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9 Ayesha Jalal, *The State of Martial Rule: The Origins of*

Pakistan's Political Economy of Def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3.

10 Clive Dewey, 'The Rural Roots of Pakistani Militarism', in: D. A. Low (ed.), *The Political Inheritance of Pakis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55 - 283; A. M. Huq, 'Reflections on Economic Planning in Pakistan', *Far Eastern Survey*, 27: 1 (1958), 1 - 6; K. P. Misra, 'Intra-State Imperialism: The Case of Pakista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9: 1 (1972), 27 - 39; Farooq Naseem Bajwa, *Pakistan and the West: The First Decade 1947 - 1957* (Karachi, et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40.

11 Irving Brecher and S. A. Abbas, *Foreign Aid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akis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12 Misra, 'Intra-State Imperialism'; Jahan, *Pakistan*, 36; Nurul Islam, '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Pakistan', *The Economic Journal*, 82: 325 (1972), 502 - 530; Rehman Sobhan, 'Who Pays for Development?', *Pakistan Forum*, 1: 4 (1971), 6 - 7.

13 J. Russell Andrus and Azizali F. Mohammed, *Trade,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in Pakistan* (Karachi, et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270; Swadesh R. Bose, 'Trend of Real Income of the Rural Poor in East Pakistan, 1949 - 1966',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8: 3 (1968), 452 - 488.

14 Jahan, *Pakistan*, 30 - 36.

15 Islam, 'Foreign Assistance'.

16 Richard D. Lambert, 'Factors in Bengali Regionalism in Pakistan', *Far Eastern Survey*, 28: 4 (1959), 49 - 58.

17 Pk Md Motiur Rahman, *Poverty Issues in Rural Bangladesh*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4), 73.

18 Van Schendel, *Three Deltas*, 306 – 307.

19 Van Schendel, *Bengal Borderland*, 157 – 160.

20 Van Schendel, *Bengal Borderland*, 147 – 190.

21 Brecher and Abbas, *Foreign Aid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101 – 102; Willem van Schendel, *Reviving a Rural Industry: Silk Producers and Officials in India and Bangladesh, 1880s to 1980s*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5).

22 Rob Gallagher, *The Rickshaws of Bangladesh*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2), 637; cf. Joanna Kirkpatrick, *Transports of Delight: The Ricksha Art of Bangladesh*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2003).

第十四章　依赖支援的根源

1 Jalal, *State of Martial Rule*, 158.

2 Wayne Wilcox, 'Pakistan: A Decade of Ayub', *Asian Survey*, 9: 2 (1969), 87 – 93.

3 Talbot, *Pakistan*, 170 – 171; Jahan, *Pakistan*, 68 – 85.

4 Brecher and Abbas, *Foreign Aid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62.

5 Abul Hossain Ahmed Bhuiyan, Aminul Haque Faraizi and Jim McAllister, 'Developmentalism as a Disciplinary Strategy in Bangladesh', *Modern Asian Studies*, 39: 2 (2005), 349 – 368.

6 Arthur F. Raper, *Rural Development in Action: Th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at Comilla, East Pakista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14 – 15.

7 Raper, *Rural Development in Action*, 18.

8 M. Rashiduzzama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Local Councils: A Study of Union and District Councils in East Pakistan* (Karachi, et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9 Islam, 'Foreign Assistance'.

10 Akhter Hameed Khan, 'The Public Works Programme and a Developmental Proposal for East Pakistan', in: *An Evaluation of the Rural Public Works Programme*, *East Pakistan*, 1962 - 1963 (Comilla: Pakistan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 1963), 133 - 134, 转引自 Jahan, *Pakistan*, 114.

11 Rehman Sobhan, *Basic Democracies*, *Works Programm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East Pakistan* (Dac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Raper, *Rural Development in Action*, 98 - 125.

12 Rehman Sobhan, *The Crisis of External Dependen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Aid to Bangladesh*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82), 2.

13 George J. Lerski, 'The American -Pakistan Alliance: A Reevaluation of the Past Decade', *Asian Survey*, 8: 5 (1968), 404; Brecher and Abbas, *Foreign Aid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14 Islam, 'Foreign Assistance', 519.

15 Harikishore Chakma, Tapash Chakma, Preyasi Dewan and Mahfuz Ullah, *Bara Parang: The Tale of the Developmental Refugees of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Dhaka: Centr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995); Van Schendel *et al.*, *Chittagong Hill Tracts*.

16 Brecher and Abbas, *Foreign Aid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171.

第十五章　新精英分子与文化更新

1 Jahan, *Pakistan*, 44.

2 *Contemporary Arts in Pakistan*, 1: 7 (1960).

3 Alamgir Kabir, *Film in Bangladesh* (Dacca: Bangla Academy,

1979).

4 K. William Kapp *et al.*, *Neue Wege für Bangladesh: Sozio-ökonomische Analyse der Entwicklungs-aufgaben und-möglichkeiten des neuen Staates* (Hambur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1975), 101.

5 Rashiduzzama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93; Raper, *Rural Development in Action*, 5.

6 Zillur Rahman Siddiqui, *Visions and Revisions: Higher Education in Bangladesh, 1947 – 1992*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7).

第十六章 武装冲突

1 'Political Activities Banned: Awami League is Outlawed – Defiance of Law Act of Treason – A. L. Insulted National Flag and Quaid – Transfer of Power Pledge Reiterated – President's Address to Nation', *Pakistan Times* (27 March 1971).

2 Abdul Kasem, 'Nights and Days of Pakistani Butchers – Reminiscing this Bloody Day after Three Decades!' (http://humanists.net/avijit/z6th_march/nights_and_days.htm).

3 *Hamoodur Rahman Commission Report* (n.p.: Government of Pakistan, 1974; 参见 www.bangla2000.com/bangladesh/Independence-War/Report-Hamoo-dur-Rahman/default.shtm).

4 *Hamoodur Rahman Commission Report*.

5 John H. Gill, *An Atlas of the 1971 India-Pakistan War: The Creation of Bangladesh* (Washington, DC: Near East South Asi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3), 11; Md Mahbubar Rahman, *Ekattore Gaibandha* (Gaibandha District in 1971) (Dhaka: Bangladesh Chorcha, 2005).

6 Jahanara Imam, *Ekattorer Dinguli* (Dhaka: Shondhani

Prokashoni, 1986). English translation: *Of Blood and Fire: The Untold Story of Bangladesh's War of Independence*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0). Entry for 9 May 1971.

7 Sukumar Biswas (ed.), *The Bangladesh Liberation War: Mujibnagar Government Documents 1971* (Dhaka: Mowla Brothers, 2005).

8 'Benibinnash shomoy to ar nei' (*benibinyās samay tō ār nei*). Abrar Ahmad 译自: Niaz Zaman (ed.), *Under the Krishnachura: Fifty Years of Bangladeshi Writing*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2003), 9 – 10. Cf. Niaz Zaman (ed.), *1971 and After: Selected Stories*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2001); Tahmima Anam, *A Golden Age* (London: John Murray, 2007); Shaifullah Mahmud Dulal (ed.), *Muktijuddho: Nirbachito Kobita* (Liberation War: Selected Poems) (Dhaka: Nawroze Kitabistan, 1987).

9 M. A. Bari, *Muktijuddher Roktim Smriti/Memoirs of a Blood Birth* (Dhaka: Banimahal Prokashoni, *c.* 1996), 236.

10 Gill, *An Atlas of the 1971 India-Pakistan War*, 21.

11 *The Events in East Pakistan, 1971: A Legal Study*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72); Wardatul Akmam, 'Atrocities against Humanity during the Liberation War of Bangladesh: A Case of Genocid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4: 4 (2002), 543 – 559.

12 Fazlul Quader Quaderi (comp. and ed.), *Bangladesh Genocide and World Press* (Dhaka: Begum Dilafroz Quaderi, 1972); Muhammad Nurul Quadir, *Dusho Chheshotti Dine Swadhinota* (Independence in 266 Days) (Dhaka: Mukto Publishers, 1997).

13 Richard Sisson and Leo E. Rose, *War and Secession: Pakistan*,

India and the Creation of Bangladesh (Berkeley, et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14 Seymour M.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Kissinger in the Nixon White House*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3), 444 - 464.

15 Hersh, *Price of Power*, 449.

16 Siddiq Salik, *Witness to Surrender*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77]); Siddiqi, *East Pakistan — The End Game*; Zaheer, *The Separation of East Pakistan*; A. A. K. Niazi, *The Betrayal of East Pakistan*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9).

第十七章　一个国家的诞生

1 Siddiq Salik, *The Wounded Pride: Reminiscences of a Pakistani Prisoner of War in India (1971 - 1973)* (Lahore: Wajidalis, 1984); Muhammad Umar Memon, 'Urdu Creative Writing on National Disintegration: The Case of Bangladesh',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3: 1 (1983), 105 - 127; Niazi, *Betrayal of East Pakistan*, 232 - 251.

2 *Ekattorer Ghatok O Dalalra Ke Kothay* (Where Are the Killers and Collaborators of 1971 Today?) (Dhaka: Muktijuddho Chetona Bikash Kendro, 1987); Karim, *Sheikh Mujib*, 296 - 298.

3 Matiur Rahman and Naeem Hasan, *Iron Bars of Freedom* (London: News and Media Ltd, 1980), 10 - 34.

4 Eric Paulsen, 'The Citizenship of the Urdu-Speakers/Biharis in Bangladesh', *Refugee Survey Quarterly*, 25: 3 (2006), 54 - 69; Tazeen M. Murshid, 'The Forgotten Biharis: Policy Options for Their Repatri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in: Syed Saad Andaleeb (ed.), *Political Culture in Bangladesh:*

Perspectives and Analyses — Selections from the Journal of Bangladesh Studies (Dhaka: Bangladesh Development Initiatives/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2007), 331 – 356.

5 Rudolph J. Rummel, *Statistics of Democide: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 (Münster: Lit Verlag, 1998), 153 – 163.

6 Sukumar Biswas (ed.), *History from Below: Accounts of Participants and Eyewitness* (Dhaka: Muktijuddho Gobeshona Kendro, 2007); Afsan Chowdhury (ed.), *Bangladesh* 1971 (Dhaka: Mowla Brothers, 2007), 4 vols.

7 Neelima Ibrahim, *Ami Birangona Bolchhi* (This Is the War Heroine Speaking) (Dhaka: Jagroti Prokashon, 1998); Shahin Akhtar *et al.* (eds.), *Narir '71 O Juddhoporoborti Kotthokahini* (Women's Plain Stories of 1971 and the Aftermath of the War) (Dhaka: Ain O Shalish Kendro, 2001); Yasmin Saikia, 'History on the Line: Beyond the Archive of Silence: Narratives of Violence of the 1971 Liberation War of Bangladesh',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58 (2004), 275 – 287; Bina D'Costa,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 in Bangladesh: Naming Women's Truths', in: Luciana Ricciutelli *et al.* (eds.), *Feminist Politics, Activism and Vision: Local and Global Challenges* (London: Zed Books, 2005), 227 – 247; Nayanika Mookherjee, '"Remembering to Forget": Public Secrecy and Memory of Sexual Violence in the Bangladesh War of 1971',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S), 12 (2006), 433 – 450.

8 Thomas W. Oliver, *The United Nations in Banglades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xvi.

9 Rounaq Jahan, 'Bangladesh in 1972: Nation-Building in a New State', *Asian Survey*, 13: 2 (1973), 200; 同见其 *Bangladesh*

Politics: Problems and Issues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2005).

10 Karim, *Sheikh Mujib*, 249 – 255.

11 Talukder Maniruzzaman, *The Bangladesh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Dacca: Bangladesh Books International, 1980), 155.

12 *Gonoprojatontri Bangladesher Shongbidhan*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angladesh) (Dhaka: Bangladesh Gonoporishod, 1972), 12.

13 Zillur R. Khan, *Leadership Crisis in Bangladesh: Martial Law to Martial Law*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84), 106.

14 Nurul Islam,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Bangladesh: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C. Hurst and Company, 1977).

15 Maniruzzaman, *Bangladesh Revolution*, 159.

16 Karim, *Sheikh Mujib*, 272 – 273, 283 – 290.

17 Karim, *Sheikh Mujib*, 305.

18 Karim, *Sheikh Mujib*, 303 – 309.

19 Talukder Maniruzzaman, 'Bangladesh in 1974: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sian Survey*, 15: 2 (1975), 117 – 128.

20 Mohiuddin Alamgir, *Famine in South Asi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Starvation* (Cambridge, MA: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1980), 128 – 129.

21 Karim. *Sheikh Mujib*, 336, cf. 367.

22 Alamgir, *Famine in South Asia*, 143; Sen, *Poverty and Famines*, 131 – 153.

23 Bernard Weinraub, 'Bangladesh, at Age 3, Is Still a Disaster Area; A Worrisome Portent Key Enterprises Taken Over, Premier's Nephew Accused, Sluggish Bureaucracy, U. S. Leads

the Donors', *New York Times* (13 September 1974).

24 Karim, *Sheikh Mujib*, 345.

25 Jyoti Sengupta, *Bangladesh in Blood and Tears* (Calcutta: Naya Prakash, 1981), 91.

26 Talukder Maniruzzaman, 'Bangladesh in 1975: The Fall of the Mujib Regime and Its Aftermath', *Asian Survey*, 16: 2 (1976), 119 – 129; Lawrence Lifschultz, *Bangladesh: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London: Zed Books, 1979).

第十八章 梦想新社会

1 Rehman Sobhan (ed.), *Bangladesh-India Relations: Perspectives from Civil Society Dialogues* (Dhaka: Centre for Policy Dialogue/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2002); Avtar Singh Bhasin (ed.), *Indian — Bangladesh Relations: Documents — 1971 –2002* (New Delhi: Geetika Publishers, 2003), 5 vols.; Van Schendel, *Bengal Borderland*, 2005.

2 A. B. Chakma, 'Look Back from Exile: A Chakma Experience', in: Wolfgang Mey (ed.), *They Are Now Burning Village after Village: Genocide in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Bangladesh* (Copenhagen: International 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 1984), 58.

3 Syeda Rumnaz Imam,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Building Education in Bangladesh', *Comparative Education*, 41: 4 (2005), 471 – 486.

第十九章 创建政治制度

1 Maniruzzaman, 'Bangladesh in 1975'.

2 Tan Tai Yong, *The Garrison State: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Punjab, 1849 –1947* (New Delhi, etc:

Sage, 2005).

3 Christophe Jaffrelot (ed.), *A History of Pakistan and Its Origins* (London: Anthem Press, 2002), 69.

4 Emajuddin Ahamad, *Military Rule and the Myth of Democracy*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88); Golam Hossain, *General Ziaur Rahman and the BNP: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a Military Regime*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88); Rohul Amin (ed.), *Ziaur Rohman Smarok Grontho* (A Memento to Ziaur Rahman) (Dhaka: Hira Book Market, 1991); Ali Riaz, *State, Class and Military Rul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tial Law in Bangladesh* (Dhaka: Nadi New Press, 1994).

5 'Be Vigilant Against Self-Seekers: Zia. Martial Law Won't Outlive Its Utility', *Bangladesh Observer* (12 November 1975), 1.

6 *Bangladesh Observer*, 25 March 1982.

7 Yunus Muhammed (ed.), *Album — Gono Andolon (1982 - 1990)* (Album — People's Movement), vol. Ⅰ (Chittagong: Tolpar, 1993).

8 Jasimuddin, *Nokshi Kanthar Math* (Kolkata: Pabalisarsa, 1975 [1928]), translated as *The Field of the Embroidered Quilt*, 4th edn (Dhaka: Poet Jasim Uddin Academy, 1986).

9 Abdul Gaffar Choudhuri, *Amra Bangladeshi, na Bangali?* (Are We Bangladeshis Or Bengalis?) (Dhaka: Okkhorbritto, 1995); Uddin, *Constructing Bangladesh*.

10 Umar, *Emergence of Bangladesh*.

11 Muhammed (ed.), *Album*.

12 Ishtiaq Hossain and Noore Alam Siddiquee, 'Islam in Bangladesh Politics: The Role of Ghulam Azam of Jamaat-I-Islami',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5: 3 (2004), 384 - 399.

13 Deena Nargis and Faustina Pereira, 'Taking Cognizance of Illegal Fatwa',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4: 2 (2002), 215 – 219; *Eclipse*, directed by Shaheen Akhter and Shameem Akhtar (Dhaka: Ain O Shalish Kendro, 1994).

14 Taslima Nasrin, *Shame*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1997); Tazeen M. Murshid, 'The Rise of the Religious Right in Bangladesh: Taslima Nasrin and the Media', in: Ayesha Imam, Jenny Morgan and Nira Yuval-Davis, *Warning Signs of Fundamentalisms* (n. p.: Women Living under Muslim Laws, 2004), 99 – 105; M. Rashiduzzaman, 'The Liberals and the Religious Right in Bangladesh', *Asian Survey*, 34: 11 (1994), 974 – 990; Manmay Zafar, 'Under the Gaze of the State: Policing Literature and the Case of Taslima Nasr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6: 3 (2005), 410 – 421.

15 Heehs, *Bomb in Bengal*.

16 Ali Riaz, *Islamist Militancy in Bangladesh: A Complex Web* (Oxford: Routledge, 2008).

17 P. G. Rajamohan, 'Harkat-ul-Jihad-al-Islami Bangladesh (HuJI-BD)' (New Delhi: Institute of Conflict Management, 2002); K. P. S. Gill, *Brief on Islamist Extremism and Terrorism in South Asia* (New Delhi: Institute for Conflict Management, 2004).

18 Rajamohan, 'Harkat-ul-Jihad-al-Islami'; Bertil Lintner, 'Bangladesh: Breeding Ground for Muslim Terror', *Asia Times* (21 September 2002).

19 'Breach of Faith: Persecution of the Ahmadiyya Community in Bangladesh', *Human Rights Watch*, 17: 6 (2005), 1 – 44.

20 BHBCOP—Bangladesh Hindu Buddhist Christian Unity Council (www.bhbcop.org, accessed 5 October 2007).

21 Raja Devasish Roy *et al.*,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Life and Nature at Risk* (Dhaka: Society for Environ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2000).

22 Willem van Schendel, 'The Invention of the "Jummas": State Formation and Ethnicity in Southeastern Bangladesh', *Modern Asian Studies*, 26: 1 (1992), 95 - 128.

23 *'Life Is Not Ours': Land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Bangladesh — Update 4* (Amsterdam and Copenhagen: Chittagong Hill Tracts Commission, 2000).

24 Radhika Coomaraswamy,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Geneva: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1997); *'Life Is Not Ours': Land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Bangladesh — Update 3* (Amsterdam and Copenhagen: Chittagong Hill Tracts Commission, 1997). Cf. Amena Mohsin,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Bangladesh*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7).

25 Stanley A. Kochanek, 'Governance, Patronage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Bangladesh', *Asian Survey*, 40: 3 (2000), 547.

26 *Judge, Jury, and Executioner: Torture and Extrajudicial Killings by Bangladesh's Elite Security Force* (New York, etc.: Human Rights Watch, 2006).

27 Shahriar Kabir (ed.), *Resist Fundamentalism: Focus on Bangladesh* (Dhaka: Nirmul Committee, 1995); Shahriar Kabir, *Bangladeshe Moulobad O Shamprodayikota* (Fundamentalism and Communalism in Bangladesh) (Dhaka: Ononya, 1998); Borhanuddin Khan Jahangir, *Hotyar Rajniti O*

Bangladesh (The Politics of Killing and Bangladesh) (Dhaka: Shomoy Prokashon, 1998).

第二十章 跨国联系

1 Sobhan, *Crisis of External Dependence*, 7.

2 Just Faaland and J. R. Parkinson, *Bangladesh: The Test Case of Development* (London: C. Hurst & Company, 1976).

3 Earth Trends (http://earthtrends. wri. org/searchable_db/index. php? theme = 10&variable_ID = 655&action = select_countries, accessed 13 September 2007).

4 Anu Muhammad, 'Globalisation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a Peripheral Economy: The Bangladesh Experienc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5 April 2006), 1459 - 1464; Shahzad Uddin, 'Privatization in Bangladesh: The Emergence of "Family Capitalism"',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6: 1 (2005), 157 - 182.

5 Sobhan, *Crisis of External Dependence*; Geoffrey D. Wood, *Bangladesh: Whose Ideas, Whose Interests*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and London: IT Publications, 1994).

6 Shelley Feldman, 'Paradoxes of Institutionalisation: The Depoliticisation of Bangladeshi NGOs',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13: 1 (2003), 5 - 26; David Lewis, 'NGO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Institutional Sustainability',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90 (2003), 212 - 226.

7 BRAC (www. brac. net/about. htm, accessed 13 September 2007).

8 Grameen Bank (www. grameen-info. org/bank, accessed 13 September 2007).

9 Shapan Adnan, *People's Participation, NGOs, and the Flood Action Plan: An Independent Review* (Dhaka: Research & Advisory Services, 1992); Hugh Brammer, 'Floods in Bangladesh: Ⅱ. Flood Mitigation 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56: 2 (1990), 158 - 165; Brammer, *Can Bangladesh be Protected*.

10 Tom de Bruyn and Umbareen Kuddus, *Dynamics of Remittance Utilization in Bangladesh*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05);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K), 'Speech by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aking Globalisation Work for Bangladesh' (2006; www. dfid. gov. uk/news/files/Speeches/globalisation - ban-gladesh. asp, accessed 13 September 2007).

11 Caroline Adams, *Across Seven Seas and Thirteen Rivers: Life Stories of Pioneer Sylheti Settlers in Britain* (London: Tower Hamlets Arts Project, 1987); Katy Gardner, *Global Migrants, Local Lives: Travel and Transformation in Rural Banglades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Katy Gardner and Zahir Ahmed, *Place, Social Protection and Migration in Bangladesh: A Londoni Village in Biswanath* (Brighto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n Migration, Globalisation and Poverty, University of Sussex, 2006).

12 Tasneem Siddiqui,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from Bangladesh: A Decent Work Perspective*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05); Petra Dannecker,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nder Relations: The Case of Bangladeshi Labour Migrants', *Current Sociology*, 53: 4 (2005), 655 - 674.

13 *Deshantori* (The Migrant), directed by Sujan Mahmud and

Mridul Chowdhury (2006); *Licu's Holidays / Le Ferie di Licu*, directed by Vittorio Moroni (2007).

14 Tasneem Siddiqui, *Institutionalising Diaspora Linkage: The Emigrant Bangladeshis in UK and USA* (Dhaka: Ministry of Expatriates' Welfare and Overseas Employment, Government of Bangladesh,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04); Melanie Knights, 'Bangladeshi Immigrants in Italy: From Geopolitics to Micropolitic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21: 1 (1996), 105 - 123.

15 Farida Akhtar *et al.* (eds.), *Manush Niye Bechakena: Bangladesh Theke Nari Pachar O Shishu Pachar* (Selling People: Women and Child Trafficking from Bangladesh) (Dhaka: Narigrontho Probortona, 2001); Van Schendel, *Bengal Borderland*, 191 - 255; cf. Sanjoy Hazarika, *Rites of Passage: Border Crossings, Imagined Homelands, India's East and Bangladesh*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2000).

16 Sujata Ramachandran, 'Of Boundaries and Border Crossings: Undocumented Bangladeshi "Infiltrators" and the Hegemony of Hindu Nationalism in India',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1: 2 (1999), 235 - 253.

17 Van Schendel, *Bengal Borderland*.

18 Katy Gardner, 'The Transnational Work of Kinship and Caring: Bengali-British Marriag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Global Networks*, 6: 4 (2006), 373 - 387.

第二十一章　拥 挤 不 堪

1 M. G. Quibria (ed.), *The Bangladesh Economy in Transition*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Naila Kabeer, 'Ideas, Economics, and "the Sociology of

Supply": Explanations for Fertility Decline in Banglade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8: 1 (2001), 29 - 70.

3 Binayak Sen, 'Drivers of Escape and Descent: Changing Household Fortunes in Rural Bangladesh', *World Development*, 31: 3 (2003), 513 - 534; Naila Kabeer, *Snakes, Ladders and Traps: Changing Lives and Livelihoods in Rural Bangladesh (1994 - 2001)*, CPRC Working Paper 50(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Sussex, 2004).

4 Ben Rogaly *et al.* (eds.), *Sonar Bangla? Agricultural Growth and Agrarian Change in West Bengal and Bangladesh*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9); cf. Boyce, *Agrarian Impasse*; Abhijit Dasgupta, *Growth with Equity: The New Technology and Agrarian Change in Bengal* (Delhi: Manohar Publishers, 1998); Abu Muhammad Shajaat Ali, 'Population Pressure,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and Changes in Rural Systems in Bangladesh', *Geoforum*, 38 (2007), 720 - 738; Haroun er Rashid, *Economic Geography of Bangladesh*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2005), 55 - 78.

5 Van Schendel, *Peasant Mobiliy*.

6 Kevin Balcombe *et al.*, 'Examining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Rice Producers in Banglade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 (2007), 1 - 16.

7 Mohammed Nuruzzaman, 'Labor Resistance to Pro-market Economic Reforms in Bangladesh',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41: 4 (2006), 341 - 357.

8 Anjan Kumar Datta, *Land and Labour Relations in South-West Bangladesh: Resources, Power and Conflic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Meghna Guhathakurta, 'Globalization, Class and Gender Relations: The Shrimp Industry in South-

Western Bangladesh',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101 (2003), 1-15.

9 See also Rosie Majid Ahsan, 'Migration of Female Construction Labourers to Dhaka City, Banglades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3 (1997), 49-61.

10 Dina M. Siddiqi, 'Miracle Worker or Womanmachine? Tracking (Trans) national Realities in Bangladeshi Factori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7 May 2000), L11-L17; Naila Kabeer, *The Power to Choose: Bangladeshi Women Workers and Labour Market Decisions in London and Dhaka* (London: Verso, 2000).

11 Kamal Siddiqui *et al.*, *Social Formation in Dhaka City: A Study in Third World Urban Sociology*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0); Nazrul Islam and Rosie Majid Ahsan (eds.), *Urban Bangladesh: Geographical Studies* (Urban Studies Programm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Dhaka, 1996); Anwara Begum, 'Urban Housing as an Issue of Redistribution through Planning? The Case of Dhaka City',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41: 4 (2007), 410-418.

12 Alessandro Conticini and David Hulme, 'Escaping Violence, Seeking Freedom: Why Children in Bangladesh Migrate to the Stree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8: 2 (2007), 201-227.

13 Jane A. Pryer *et al.*, 'Livelihoods, Nutrition and Health in Dhaka Slums',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5: 5 (2002), 613-618; Bimal Kanti Paul, 'Fear of Eviction: The Case of Slum and Squatter Dwellers in Dhaka, Bangladesh', *Urban Geography*, 27: 6 (2006), 567-574.

14 Allan H. Smith *et al.*, 'Contamination of Drinking-Water by Arsenic in Bangladesh: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78: 9 (2000), 1093 – 1103. Cf. Peter Atkins, Manzurul Hassan and Christine Dunn, 'Environmental Irony: Summoning Death in Bangladesh',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9 (2007), 2699 – 2714; Ben Crow and Farhana Sultana, 'Gender, Class, and Access to Water: Three Cases in a Poor and Crowded Delta',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15 (2002), 709 – 724.

15 Ben Crow with Alan Lindquist and David Wilson, *Sharing the Ganges: The Politics and Technology of River Development* (New Delhi, etc.: Sage Publications, 1995); Ishtiaq Hossain, 'Bangladesh-India Relations: The Ganges Water Sharing Treaty and Beyond', *Asian Affairs* (1998), 131 – 150; Abu Raihan M. Khalid, 'The Interlinking of Rivers Project in India and International Water Law: An Overview',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 (2004), 553 – 570.

16 Ashok Swain, *The Environmental Trap: The Ganges River Diversion, Bangladeshi Migration and Conflicts in India* (Department of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 Uppsala University, 1996).

17 Nazrul Islam, 'Background to the Environment Movement in Bangladesh',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107 (2005), 69 – 86; Philip Gain, *The Last Forests of Bangladesh* (Dhaka: Society for Environ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SEHD), 2002 [1998]), 187 – 222.

18 Anwar Ali,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d Adaptation Assessment in Bangladesh', *Climate Research*, 12 (1999), 109 – 116; M. Monirul Qader Mirza, 'Global Warming and Changes in the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of Floods in Bangladesh and Implication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2 (2002), 127 – 138.

19 Mushfiqur Rahman, 'Energy', in: Islam and Miah (eds.), *Banglapedia*, Ⅲ, 480 - 483.

20 Rahman, 'Energy'.

21 Badrul Imam, 'Gas, Natural', in: Islam and Miah (eds.), *Banglapedia*, Ⅳ, 335 - 342.

2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fisheries in Bengal can be found in Bob Pokrant *et al.*, 'Bengal Fishers and Fisheries: A Historiographical Essay', in: Sekhar Bandyopadhyay (ed.), *Bengal: Rethinking History — Essays on Historiography* (Delhi: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Bengal Studies and Manohar Publications, 2001), 93 - 117.

23 Gain, *Last Forests of Bangladesh*, 101 - 186.

24 Shapan Adnan, *Migration, Land Alien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Causes of Poverty in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of Bangladesh* (Dhaka: Research & Advisory Services, 2004).

25 Islam, *Bengal Land Tenure*.

26 John F. Richards and Elizabeth P. Flint, 'Long-Term Transformations in the Sundarbans Wetlands Forests of Bengal',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7: 2 (1990), 27.

27 M. S. Iftekhar and M. R. Islam, 'Degeneration of Bangladesh Sundarbans Mangroves: A Management Issue',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view*, 6 (2004), 123 - 135; Mohammad Ali *et al.*, 'People's Attitude and Use of Forestland: Co-Evolution of Forest Administration in Bangladesh', *Small-scale Forest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Policy*, 5: 2 (2006), 271 - 286.

28 Richards and Flint, 'Long-Term Transformations', 30.

第二十二章　一种国家文化?

1 Almas Zakiuddin, *Corruption in Bangladesh: An Analytical*

and Sociological Study (Dhaka: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Bangladesh Chapter, n. d. (*c.* 2000)) (www. ti-bangladesh. org/ index. php? page_id=377, accessed 24 October 2007).

2 James R. Killingworth *et al.*, 'Unofficial Fees in Bangladesh: Price, Equity and Institutional Issues',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14: 2 (1999), 152 - 163; Shahaduz Zaman, *Broken Limbs, Broken Lives: Ethnography of a Hospital Ward in Bangladesh* (Amsterdam: Het Spinhuis, 2005), 196 - 200.

3 *Who Gets What and Why? Resource Allocation in a Bangladesh Village* (Dhaka: Bangladesh Rural Advancement Committee, n. d. [1979]); Wood, *Bangladesh*; Muntassir Mamoon and Jayanta Kumar Ray, *Civil Society in Bangladesh: Resilience and Retreat* (Dhaka: Subarna, 1998), 245 - 251.

4 Shahedul Anam Khan and Shaheen Afroze (eds.), *Chandabaji versus Entrepreneurship: Economic Liberalisation and Youth Force in Bangladesh* (Dhaka: Academic Press and Publishers Limited and Banglade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1999.

5 James M. Wilce, Jr, 'The Kalimah in the Kaleidophone: Ranges of Multivocality in Bangladeshi Muslim's Discourses', *Ethos*, 26: 2 (1998), 229 - 257; Peter J. Bertocci, 'A Sufi Movement in Bangladesh: The Maijbhandari *Tariqa* and Its Followers', *Contributions to Indian Sociology* (NS), 40: 1 (2006), 1 - 28; Alyson Callan, '"What Else Do We Bengalis Do?" Sorcery, Overseas Migration, and the New Inequalities in Sylhet, Bangladesh',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S), 13 (2007), 331 - 343.

6 Shelley Feldman, 'Exploring Theories of Patriarchy: A Perspective from Contemporary Bangladesh', *Signs*, 26: 4

(2001), 1116, and Santi Rozario, 'The New Burqa in Bangladesh: Empowerment or Violation of Women's Rights?',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9 (2006), 378.

7 Cf. Jeremy Seabrook, *Freedom Unfinished: Fundamentalism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Bangladesh Today*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2001).

8 Gain, *Last Forests of Bangladesh*, 187 - 222.

9 Firdous Azim, 'Women's Movements in Bangladesh', *Feminist Review*, 64 (2000), 119 - 121; Firdous Azim, 'Feminist Struggles in Bangladesh', *Feminist Review*, 80 (2005), 194 - 197. Cf. Naila Kabeer, 'The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Women, Islam and the State in Bangladesh', *Feminist Review*, 37 (1991), 38 - 58.

10 Nayanika Mookherjee, 'The "Dead and Their Double Duties": Mourning, Melancholia, and the Martyred Intellectual Memorials in Bangladesh', *Space and Culture*, 10 (2007), 271 - 291.

11 关于这些艺术形式的美学介绍,参见 Henry Glassie, *Art and Life in Bangladesh*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 Zakir Hossain Raju, 'Bangladesh: Native Resistance and Nationalist Discourse', in: Anne Tereska Ciecko (ed.), *Contemporary Asian Cinema: Popular Culture in a Global Frame*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2006), 120 - 132; Zeenat Huda Wahid, 'Emergence of Satellite Television and Enigmatic Geo-Political Strategy of Bangladesh Government', *Bangladesh e-Journal of Sociology*, 4: 1 (2007), 1 - 15.

13 参见促进人权组织(www. odhikar. org)、法律援助和人权组织(Ain o Salish Kendra, www. askbd. org)以及记者无国界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www.rsf.org)关于孟加拉国的年度报告。

14 Imtiaz Ahmed and Amena Mohsin, *The Birth of Minority: State, Society and the Hindu Women of Bangladesh* (Dhaka: Forum on Women i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Bangladesh Freedom Foundation, 2005); Kathinka Sinha-Kerkhoff, *Tyranny of Partition: Hindus in Bangladesh and Muslims in India* (New Delhi: Gyan Publishing House, 2006).

15 Greenough, *Prosperity and Misery*, 70 - 84.

16 I. Tetens *et al.*, 'Rice-Based Diets in Rural Bangladesh: How Do Different Age and Sex Groups Adapt to Seasonal Changes in Energy Intake?',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78 (2003), 406 - 413.

17 A. Haque *et al.*,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Lathyrism in Northwestern Districts of Bangladesh', *Neuroepidemiology*, 15: 2 (1996), 83 - 91.

参 考 文 献

Abbasi, Mustafa Zaman and Bashir Al Helal (eds.), *Folkloric Bangladesh* (Dacca: Bangladesh Folklore Parishad, 1979).

Adams, Caroline, *Across Seven Seas and Thirteen Rivers: Life Stories of Pioneer Sylheti Settlers in Britain* (London: Tower Hamlets Arts Project, 1987).

Adnan, Shapan, *People's Participation, NGOs, and the Flood Action Plan: An Independent Review* (Dhaka: Research & Advisory Services, 1992).

Migration, Land Alien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Causes of Poverty in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of Bangladesh (Dhaka: Research & Advisory Services, 2004).

Ahamad, Emajuddin, *Military Rule and the Myth of Democracy*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88).

Ahmad, Aftab, *Swadhinota Shonggrame Bangali* (Bengalis in their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Dhaka: Aftab Ahmad, 1998).

Ahmad, Kamruddin, *Labour Movement in East Pakistan* (Dhaka: Progoti Publishers, 1969).

Ahmed, Imtiaz, Abhijit Dasgupta and Kathinka Sinha-Kerkhoff

(eds.), *State, Society and Displaced People in South Asia*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2004).

Ahmed, Imtiaz and Amena Mohsin, *The Birth of Minority: State, Society and the Hindu Women of Bangladesh* (Dhaka: Forum on Women i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Bangladesh Freedom Foundation, 2005).

Ahmed, Rafiuddin, *The Bengal Muslims 1871 – 1906: A Quest for Identity*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Introduc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 Bengal Muslims'. in: Rafiuddin Ahmed (ed.), *Understanding the Bengal Muslims: Interpretative Essays*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 – 25.

Ahmed, Rafiuddin (ed.), *Understanding the Bengal Muslims: Interpretative Essays*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Ahmed, Reaz (comp. and ed.), *Gonomadhyome Bangladesher Muktijuddho Kartun, Prothom Khondo / Media and Liberation War of Bangladesh, Cartoons, vol.* Ⅰ (Dhaka: Centre for Bangladesh Studies, 2002).

Ahmed, Sharif Uddin, *Dacca: A Study in Urban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Curzon Press and Riverdale, MD: The Riverdale Company, 1986).

Ahmed, Wakil, 'Ālāol', In: Sirajul Islam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Ⅰ, 169.

'Pir', in: Sirajul Islam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Ⅷ, 89 – 90.

Ahsan, Rosie Majid, 'Migration of Female Construction Labourers

to Dhaka City, Banglades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3 (1997), 49 - 61.

Ahsan, Syed Mohammad Kamrul, 'Prehistory', In: Sirajul Islam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Ⅷ, 176 - 183.

Akhtar, Farida and Seema Das Sheemu (eds.), *Manush Niye Bechakena: Bangladesh Theke Nari Pachar O Shishu Pachar* (Selling People: Women and Child Trafficking from Bangladesh) (Dhaka: Narigrontho Probortona, 2001).

Akhtar, Shahin Suraya Begum, Hameeda Hossein, Sultana Kamal and Meghna Guhathakurta (eds.), *Narir '71 O Juddhoporoborti Kotthokahini* (Women's Plain Stories of 1971 and the Aftermath of the War) (Dhaka: Ain-O-Shalish Kendro, 2001).

Akmam, Wardatul, 'Atrocities against Humanity during the Liberation War of Bangladesh: A Case of Genocid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4: 4 (2002), 543 - 559.

Alamgir, Mohiuddin, *Famine in South Asi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Starvation* (Cambridge, MA: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1980).

Ali, Abu Muhammad Shajaat, 'Population Pressure,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and Changes in Rural Systems in Bangladesh', *Geoforum*, 38 (2007), 720 - 738.

Ali, Anwar,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d Adaptation Assessment in Bangladesh', *Climate Research*, 12 (1999), 109 - 116.

Ali, Mohammad, M. Alamgir Kabir and A. T. M. Rafiqul Hoque, 'People's Attitude and Use of Forestland: Co-Evolution of Forest Administration in Bangladesh', *Small-scale Forest*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Policy, 5: 2 (2006), 271 - 286.

Ali, Tariq, *Pakistan: Military Rule or People's Power*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0).

Allison, M. A., S. R. Khan, S. L. Goodbred, Jr and S. A. Kuehl, 'Stratigraphic Evolution of the Late Holocene Ganges-Brahmaputra Lower Delta Plain', *Sedimentary Geology*, 155: 3 (2003), 317 - 342.

Amin, Rohul (ed.), *Ziaur Rohman Smarok Grontho* (A Memento to Ziaur Rahman) (Dhaka: Hira Book Market, 1991).

Anam, Tahmima, *A Golden Age* (London: John Murray, 2007).

Andaleeb, Syed Saad (ed.), *Political Culture in Bangladesh: Perspectives and Analyses — Selections from the Journal of Bangladesh Studies* (Dhaka: Bangladesh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and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2007).

Andrus, J. Russell and Azizali F. Mohammed, *Trade,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in Pakistan* (Karachi, et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Andrus, J. R., Azizali F. Mohammed and Mohammed Afzal, 'State and Private Enterprise in Pakistan', *Far Eastern Survey*, 20: 7 (1951), 61 - 64.

Anisuzzaman, *Creativity, Reality and Identity* (Dhaka: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Bengal Studies, 1993).

Annual Report of the Varendra Research Society for 1932 - 1933 and 1933 - 1934 (Rajshahi: Varendra Research Society, 1934).

Atkins, Peter, Manzurul Hassan and Christine Dunn, 'Environmental Irony: Summoning Death in Bangladesh',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9 (2007), 2699 - 2714.

Azim, Firdous, 'Women's Movements in Bangladesh', *Feminist Review*, 64 (2000), 119 - 121.

'Feminist Struggles in Bangladesh', *Feminist Review*, 80 (2005), 194 - 197.

Azim, Firdous and Niaz Zaman (eds.), *Infinite Variety: Women in Society and Literature*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4).

Bajwa, Farooq Naseem, *Pakistan and the West: The First Decade 1947 —1957* (Karachi, et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Bal, Ellen, 'An Untold Story of the Partition: The Garos of Northern Mymensingh', In: Imtiaz Ahmed, Abhijit Dasgupta and Kathinka Sinha-Kerkhoff (eds.), *State, Society and Displaced People in South Asia*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2004), 245 - 279.

They Ask If We Eat Frogs: Garo Ethnicity in Bangladesh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7).

Balcombe, Kevin, Iain Fraser, Mizanur Rahman and Laurence Smith, 'Examining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Rice Producers in Banglade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 (2007), 1 - 16.

Bandyopadhyay, Jayanta, 'Water Management in the Ganges-Brahmaputra Basin: Emerging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11: 4 (1995), 411 - 442.

Bandyopadhyay, Sekhar, *Caste, Politics and the Raj: Bengal 1872 —1937* (Calcutta: K. P. Bagchi, 1990).

'A Namasudra — Muslim Riot in Jessore-Khulna, May 1911: A Case Study in Community Formation and Communal Conflict', in: Bidyut Chakrabarty (ed.), *Communal Identity in India: Its Construction and Articul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14 - 228.

Bandyopadhyay, Sekhar (ed.), *Bengal: Rethinking History — Essays on Historiography* (Delhi: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Bengal Studies and Manohar Publications, 2001).

Bangla Name Desh (A Country Named Bangla) (Kolkata: Anondo Publishers, 1972).

Bari, M. A., *Muktijuddher Roktim Smriti / Memoirs of a Blood Birth* (Dhaka: Banimahal Prokashoni, *c.* 1996).

Bautze, Joachim Karl, *Early Indian Terracottas* (Leiden, etc.: E. J. Brill, 1995).

Baxter, Craig, 'Pakistan Votes — 1970', *Asian Survey*, 11: 3 (1971), 197–218.

'Be Vigilant against Self-Seekers: Zia. Martial Law Won't Outlive Its Utility', *Bangladesh Observer* (12 November 1975), I.

Begum, Anwara, 'Urban Housing as an Issue of Redistribution through Planning? The Case of Dhaka City',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41: 4 (2007), 410–418.

Bernot, Lucien, *Les paysans arakanais du Pakistan Oriental: le monde végétal et l'organisation sociale des réfugiés Marma* (*Mog*) (Paris and The Hague: Mouton, 1967), 2 vols.

Bertocci, Peter J., 'Elusive Villages: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 in Rural East Pakistan', unpublished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70.

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and Culture in Bangladesh: Selected Essays (Dhaka: Centre for Social Studies, 1996).

'A Sufi Movement in Bangladesh: The Maijbhandari Tariqa and Its Followers', *Contributions to Indian Sociology* (NS), 40: 1 (2006), 1–28.

Bhasin, Avtar Singh (ed.), *Indian — Bangladesh Relations:*

Documents — 1971 — 2002 (New Delhi: Geetika Publishers, 2003), 5 vols.

Bhuiyan, Abul Hossain Ahmed, Aminul Haque Faraizi and Jim McAllister, 'Developmentalism as a Disciplinary Strategy in Bangladesh', *Modern Asian Studies*, 39: 2 (2005), 349 - 368.

Biswas, Sukumar (ed.), *The Bangladesh Liberation War: Mujibnagar Government Documents 1971* (Dhaka: Mowla Brothers, 2005).

(ed.), *History from Below: Accounts of Participants and Eyewitness* (Dhaka: Muktijuddho Gobeshona Kendro, 2007).

Bose, Sugata, *Peasant Labour and Colonial Capital: Rural Bengal since 17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Bose, Sugata and Ayesha Jalal, *Modern South Asia: History, Culture,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Bose, Swadesh R., 'Trend of Real Income of the Rural Poor in East Pakistan, 1949 - 1966',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8: 3 (1968), 452 - 488.

Boyce, James K., *Agrarian Impasse in Bengal: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to Technological Chan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Brammer, Hugh, 'Floods in Bangladesh: Ⅱ. Flood Mitigation 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56: 2 (1990), 158 - 165.

Can Bangladesh Be Protected from Floods?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2004).

Brauns, Claus-Dieter and Lorenz G. Löffler, *Mru: Hill People on the Border of Bangladesh* (Basle, etc.: Birkhäuser, 1990).

'Breach of Faith: Persecution of the Ahmadiyya Community in

Bangladesh', *Human Rights Watch*, 17: 6 (2005), 1-44.

Brecher, Irving and S. A. Abbas, *Foreign Aid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akis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Broomfield, J. H., *Elite Conflict in a Plural Society: Twentieth-Century Benga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Callan, Alyson, '"What Else Do We Bengalis Do?" Sorcery, Overseas Migration, and the New Inequalities in Sylhet, Bangladesh',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S), 13 (2007), 331-343.

Callard, Keith, *Pakistan: A Political Stud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and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Campos, J. J. A., *History of the Portuguese in Bengal* (Calcutta: Butterworth & Co., 1919).

Chakma, A. B., 'Look Back from Exile: A Chakma Experience', in: Wolfgang Mey (ed.), *They Are Now Burning Village after Village: Genocide in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Bangladesh* (Copenhagen: International 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 1984), 35-62.

Chakma, Harikishore, Tapash Chakma, Preyasi Dewan and Mahfuz Ullah, *Bara Parang: The Tale of the Developmental Refugees of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Dhaka: Centr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995).

Chakrabarti, Dilip K., *Ancient Bangladesh: A Study of the Archaeological Sources* (Delhi, et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krabarti, Prafulla K. *The Marginal Men: The Refugees and the Left Political Syndrome in West Bengal*, 2nd edn (Calcutta: Naya Udyog, 1999).

Chakrabarty, Bidyut (ed.), *Communal Identity in India: Its Construction and Articul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krabarty, Dipesh, 'Remembered Villages: Representation of Hindu-Bengali Memories in the Aftermath of Partiti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0 August 1996), 2143 - 2151.

'Romantic Archives: Litera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Bengal', *Critical Inquiry*, 30 (2004), 654 - 682.

Chakraborty, Ratan Lal, 'Chakma Resistance to Early British Rule', *Bangladesh Historical Studies, Journal of the Bangladesh Itihas Samiti*, 2 (1977), 133 - 156.

Chakravarti, Prithwis Chandra, 'Naval Warfare in Ancient India', *The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6: 4 (1930), 645 - 664.

Chakravarti, Ranabir, 'Trade and Commerce — Ancient Period', in: Sirajul Islam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X, 180 - 188.

Chatterjee, Partha, *A Princely Impostor?The Strange and Universal History of th Kumar of Bhawal*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atterji, Joya, *Bengal Divided: Hindu Communalism and Partition, 1932 — 1947* (New Delhi: Foundation Book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The Fashioning of a Frontier: The Radcliffe Line and Bengal's Border Landscape, 1947 - 1952', *Modern Asian Studies*, 33: 1 (1999), 185 - 242.

'"Dispersal" and the Failure of Rehabilitation: Refugee Camp-dwellers and Squatters in West Bengal', *Modern Asian Studies*, 41: 5 (2007), 995 - 1032.

The Spoils of Partition: Bengal and India, 1947 – 19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audhuri, Binay Bhushan, 'Commercialisation of Agriculture', In: Sirajul Islam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Ⅰ, 371 - 427.

Chaudhuri, K. N., *Asia before Europe: Economy and Civilis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udhuri, Nirad C.,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Unknown Indian* (Bombay: Jaico Publishing House, 1951).

Chaudhury, Sushil,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Eighteenth Century Bengal* (Delhi: Manohar,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in Bengal Silk and the Comparative Role of Asians and Europeans, circa 1700 - 1750', *Modern Asian Studies*, 29: 2 (1995), 373 - 386.

The Prelude to Empire: Plassey Revolution of 1757 (Delhi: Manohar, 2000).

'Trade and Commerce — Medieval Period', in: Sirajul Islam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Ⅹ, 188 - 191.

Chottogram Jubobidroho 1930 - 1934 Alekhyomala (Pictures of the 1930 - 1934 Youth Revolt in Chittagong) (Kolkata: Biplobtirtho Chottogram Smritishongstha Prokashon, 2001).

Choudhuri, Abdul Gaffar, *Amra Bangladeshi, na Bangali?* (Are We Bangladeshis Or Bengalis?) (Dhaka: Okkhorbritto, 1995).

Choudhury, Sujit, 'Badsah: A Hindu Godling with a Muslim Background', In: Mustafa Zaman Abbasi and Bashir Al Helal

(eds.), *Folkloric Bangladesh* (Dacca: Bangladesh Folklore Parishad, 1979), 61 - 69.

Chowdhury, A. M., 'History: Early Period', in: Sirajul Islam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Ⅴ, 104 - 111.

'Matsyanyayam', in: Sirajul Islam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Ⅵ, 446.

Chowdhury, Afsan (ed.), *Bangladesh 1971* (Dhaka: Mowla Brothers, 2007), 4 vols.

Ciecko, Anne Tereska (ed.), *Contemporary Asian Cinema: Popular Culture in a Global Frame*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2006).

Clark, T. W., 'Evolution of Hinduism in Medieval Bengali Literature: Siva, Candi, Manas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7: 3 (1955), 503 - 518.

Conticini, Alessandro and David Hulme, 'Escaping Violence, Seeking Freedom: Why Children in Bangladesh Migrate to the Stree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8: 2 (2007), 201 - 227.

Coomaraswamy, Radhika,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Geneva: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1997).

Cooper, Adrienne, *Sharecropping and Sharecroppers' Struggles in Bengal, 1930 - 1950* (Calcutta: K. P. Bagchi & Company, 1988).

Crow, Ben with Alan Lindquist and David Wilson, *Sharing the*

Ganges: The Politics and Technology of River Development (New Delhi, etc.: Sage Publications, 1995).

Crow, Ben and Farhana Sultana, 'Gender, Class, and Access to Water: Three Cases in a Poor and Crowded Delta',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15 (2002), 709 – 724.

Curley, David L., 'Marriage, Honor, Agency, and Trials by Ordeal: Women's Gender Roles in Caṇḍīmaṅgal', *Modern Asian Studies*, 35: 2 (2001), 315 – 348.

Dalton, Edward T., *Descriptive Ethnology of Bengal* (Calcutta: 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 1872).

Dannecker, Petra,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nder Relations: The Case of Bangladeshi Labour Migrants', *Current Sociology*, 53: 4 (2005), 655 – 674.

Darian, Steven G., *The Ganges in Myth and History*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8).

Das, Suranjan, *Communal Riots in Bengal, 1905 – 1947*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Dasgupta, Abhijit, *Growth with Equity: The New Technology and Agrarian Change in Bengal* (Delhi: Manohar Publishers, 1998).

Datta, Anjan Kumar, *Land and Labour Relations in South-West Bangladesh: Resources, Power and Conflic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Datta, Asok, 'Agricultural Communities (Early Period)', in: Sirajul Islam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I, 63 – 66.

D'Costa, Bina,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 in Bangladesh:

Naming Women's Truths', In: Luciana Ricciutelli, Angela Miles and Margaret McFadden (eds.), *Feminist Politics, Activism and Vision: Local and Global Challenges* (London: Zed Books, 2005), 227 - 247.

De, Harinath (trans.), *Ibn Batuta's Account of Bengal* (Dacca: Baikunta Nath Press, 1904).

De Bruyn, Tom and Umbareen Kuddus, *Dynamics of Remittance Utilization in Bangladesh*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05).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K), 'Speech by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aking Globalisation Work for Bangladesh' (2006) (www. dfid. gov. uk/news/files/Speeches/globalisation-bangladesh. asp, accessed 12 December 2007).

Dewey, Clive, 'The Rural Roots of Pakistani Militarism', In: D. A. Low (ed.), *The Political Inheritance of Pakis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55 - 283.

Dimock, Edward C., Jr (ed. and trans.), *The Thief of Love: Bengali Tales from Court and Villa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The Sound of Silent Guns and Other Essays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Dulal, Shaifullah Mahmud (ed.) *Muktijuddho: Nirbachito Kobita* (Liberation War: Selected Poems) (Dhaka: Nawroze Kitabistan, 1987).

Eaton, Richard M., 'Human Settlement and Colonization in the Sundarbans, 1200 - 1750',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7: 2 (1990), 6 - 16.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 - 1760

(Berkeley, et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Who Are the Bengal Muslims? Conversion and Islamization in Bengal', in: Rafiuddin Ahmed (ed.), *Understanding the Bengal Muslims: Interpretative Essays*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6 – 51.

Ekattorer Ghatok O Dalalra Ke Kothay (*Where Are the Killers and Collaborators of 1971 Today?*) (Dhaka: Muktijuddho Chetona Bikash Kendro, 1987).

The Events in East Pakistan, 1971: A Legal Study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72).

Faaland, Just and J. R. Parkinson, *Bangladesh: The Test Case of Development* (London: C. Hurst & Company, 1976).

Feldman, Shelley, 'Exploring Theories of Patriarchy: A Perspective from Contemporary Bangladesh', *Signs*, 26: 4 (2001), 1097 – 1127.

'Paradoxes of Institutionalisation: The Depoliticisation of Bangladeshi NGOs',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13: 1 (2003), 5 – 26.

Five Years of Pakistan (August 1947 — August 1952) (Karachi: Pakistan Publications, 1952).

Franda, Marcus F., 'Communism and Regional Politics in East Pakistan', *Asian Survey*, 10: 7 (1970), 588 – 606.

Gain, Philip, *The Last Forests of Bangladesh* (Dhaka: Society for Environ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SEHD), 2002 [1998]).

Gain, Philip (ed.), *Bangladesh: Land, Forest and Forest People* (Dhaka: Society for Environ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SEHD), 1995).

Gain, Philip, Lucille Sircar and Shamimul Islam, *The Case of Forests, Ethnic Communities and Tea Workers of Bangladesh* (Dhaka: Society for Environ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SEHD), 2005).

Gallagher, Rob, *The Rickshaws of Bangladesh*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2).

Gardner, Katy, *Global Migrants, Local Lives: Travel and Transformation in Rural Banglades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The Transnational Work of Kinship and Caring: Bengali — British Marriag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Global Networks*, 6: 4 (2006), 373 - 387.

Gardner, Katy, and Zahir Ahmed, *Place, Social Protection and Migration in Bangladesh: A Londoni Village in Biswanath* (Brightao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n Migration, Globalisation and Poverty, University of Sussex, 2006).

Geertz, Clifford,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et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Gill, John H., *An Atlas of the 1971 India-Pakistan War: The Creation of Bangladesh* (Washington, DC: Near East South Asi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3).

Gill, K. P. S., *Brief on Islamist Extremism and Terrorism in South Asia* (New Delhi: Institute for Conflict Management, 2004).

Glassie, Henry, *Art and Life in Bangladesh*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Gonoprojatontri Bangladesher Shongbidhan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angladesh) (Dhaka: Bangladesh Gonoporishod, 1972).

Goswami, Krishnapada, *Place Names of Bengal* (Calcutta: Jnan Prakasan, n. d. [1984]).

Greenough, Paul R., *Prosperity and Misery in Modern Bengal: The Famine of 1943 - 1944*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Guha, Ranajit, *A Rule of Property for Bengal* (Paris: Mouton, 1963).

Guhathakurta, Meghna, 'Globalization, Class and Gender Relations: The Shrimp Industry in South-Western Bangladesh',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101 (2003), 1–15.

Habib, Irfan, *An Atlas of the Mughal Empir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aps with Detailed Notes, Bibliography and Index* (Delhi, et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Hambly, Gavin, 'A Note on the Trade in Eunuchs in Mughal Beng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4: 1 (1974), 125–130.

Hamoodur Rahman Commission Report (n. p.: Government of Pakistan, 1974).

Haque, A., M. Hossain, G. Wouters and F. Lambein,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Lathyrism in Northwestern Districts of Bangladesh', *Neuroepidemiology*, 15: 2 (1996), 83–91.

Haque, Enamul (ed.), *Excavation at Wari-Bateshwar: A Preliminary Study* (Dhaka: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tudy of Bengal Art, 2001).

Hashmi, Taj ul-Islam, *Pakistan as a Peasant Utopia: The Communalization of Class Politics in East Bengal, 1920–1947* (Boulder, CO, etc.: Westview Press, 1992).

Hatley, Shaman, 'Mapping the Esoteric Body in the Islamic Yoga of Bengal', *History of Religions*, 46 (2007), 351–368.

Hazarika, Sanjoy, *Rites of Passage: Border Crossings, Imagined Homelands, India's East and Bangladesh*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2000).

Heehs, Peter, *The Bomb in Bengal: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Terrorism in India 1900 – 1910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Hersh, Seymour M., *The Price of Power: Kissinger in the Nixon White House*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3).

Hore, Somenath, *Tebhaga: An Artist's Diary and Sketchbook*; translated from the Bengali by Somnath Zutshi (Calcutta: Seagull Books, 1990).

Hossain, Golam, *General Ziaur Rahman and the BNP: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a Military Regime*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88).

Hossain, Ishtiaq, 'Bangladesh-India Relations: The Ganges Water Sharing Treaty and Beyond', *Asian Affairs* (September 1998), 131 – 150.

Hossain, Ishtiaq and Noore Alam Siddiquee, 'Islam in Bangladesh politics: The role of Ghulam Azam of Jamaat-l-Islami',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5: 3 (2004), 384 – 399.

Hossain, Rokeya Sakhawat, *Sultana's Dream and Padmarag: Two Feminist Utopia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Barnita Bagchi) (New Delhi, etc.: Penguin Books, 2005).

Hossein, Mrs R. S., *Sultana's Dream* (Calcutta: S. K. Lahiri & Co., 1908; facsimile edition, Dhaka: Liberation War Museum, 2005).

Hunter, W. W., *The Annals of Rural Bengal* (New York: Leypoldt and Holt, 1868).

Hunter, W. W., *A Statistical Account of Bengal* (London: Trübner and Co., 1876), 20 vols.

Huq, A. M., 'Reflections on Economic Planning in Pakistan', *Far Eastern Survey*, 27: 1 (1958), 1 – 6.

Ibrahim, Neelima, *Ami Birangona Bolchhi* (This Is the War Heroine

Speaking) (Dhaka: Jagroti Prokashon, 1998).

Iftekhar, M. S. and M. R. Islam, 'Degeneration of Bangladesh Sundarbans Mangroves: A Management Issue',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view*, 6 (2004), 123 - 135.

Iftikhar-ul-Awwal, 'State of Indigenous Industries', in: Sirajul Islam (ed.), *History of Bangladesh 1704 — 1971. Volume Two: Economic History*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1992), 272 - 370.

Imam, Abu, 'Archaeology (Bangladesh)', in: Sirajul Islam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I, 244 -250.

'Chinese Accounts — Ancient', in: Sirajul Islam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II, 481 - 483.

Imam, Ayesha, Jenny Morgan and Nira Yuval-Davis, *Warning Signs of Fundamentalisms* (n. p.: Women Living under Muslim Laws, 2004).

Imam, Badrul, 'Gas, Natural', in: Sirajul Islam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IV, 335 - 342.

Imam, Jahanara, *Ekattorer Dinguli* (Dhaka: Shondhani Prokashoni, 1986). English translation: *Of Blood and Fire: The Untold Story of Bangladesh's War of Independence*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0).

Imam, Syeda Rumnaz,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 -Building Education in Bangladesh', *Comparative Education*, 41: 4 (2005), 471 - 486.

Iqbal, Iftekhar, 'Ecolog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Bengal Delta,

c. 1840 – 1943',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5.

'Toward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olonial East Bengal: Paradigms and Praxis',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50 (2005), 501 – 518.

'Fighting with a Weed: Water Hyacinth and the State in Colonial Bengal, c. 1910 – 1947',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15: 1 (2009).

Islam, M. Mufakharul, 'Agriculture – History', in: Sirajul Islam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I, 71 – 82.

'The Great Bengal Famine and the Question of FAD Yet Again', *Modern Asian Studies*, 41: 2 (2007), 421 – 440.

Islam, Nazrul, 'Background to the Environment Movement in Bangladesh',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107 (2005), 69 – 86.

Islam, Nazrul and Rosie Majid Ahsan (eds.), *Urban Bangladesh: Geographical Studies* (Urban Studies Programm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Dhaka, 1996).

Islam, Nurul, '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Pakistan', *The Economic Journal*, 82: 325 (1972), 502 – 530.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Bangladesh: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C. Hurst & Company, 1977).

Islam, Sirajul, *The Permanent Settlement in Bengal: A Study of Its Operation* (Dacca: Bangla Academy, 1979).

Bengal Land Tenure: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Intermediate Interests in the 19th Century (Calcutta: K. P. Bagchi, 1988).

'Permanent Settlement', in: Sirajul Islam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Ⅷ, 34 - 42.

'State', in: Sirajul Islam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Ⅸ, 420 - 424.

'American Maritime Activities in Calcutta: Cases of Elephant and Ice',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Humanities)*, 49: 1 (2004), 41 - 59.

Islam, Sirajul (ed.), *History of Bangladesh 1704 - 1971*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1992), 3 vols. Bengali edition: *Bangladesher Itihash, 1704 - 1971*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1993).

Islam, Sirajul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10 vols.

Islam, Syed Serajul, 'Bengal Legislative Assembly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Sirajul Islam (ed.), *History of Bangladesh 1704 - 1971. Volume One: Political History*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1992), 276 - 306.

Jaffrelot, Christophe (ed.), *A History of Pakistan and Its Origins* (London: Anthem Press, 2002).

Jahan, Rounaq, *Pakistan: Failure in National Integ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Bangladesh in 1972: Nation-Building in a New State', *Asian Survey*, 13: 2 (1973), 199 - 210.

Bangladesh Politics: Problems and Issues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2005).

Jahangir, Burhanuddin Khan, *The Quest of Zainul Abedin*, trans. Meghna Guhathakurta (Dhaka: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Bengal Studies, 1993).

Jahangir, Borhanuddin Khan, *Hotyar Rajniti O Bangladesh* (The Politics of Killing and Bangladesh) (Dhaka: Shomoy Prokashon, 1998).

Jalal, Ayesha, *The Sole Spokesman: Jinnah, the Muslim League and the Demand for Pakis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The State of Martial Rule: The Origins of Pakistan's Political Economy of Def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South Asia: A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Conjuring Pakistan: History as Official Imagi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7: 1 1995), 73–89.

Jardine, William (ed.), *The Naturalist's Library, Vol.* Ⅶ: *Mammals, Whales, etc.* (by Robert Hamilton) (Edinburgh: W. H. Lizars, 1843).

Jasimuddin, *Nokshi Kanthar Math* (Kolkata: Pabalisarsa, 1975 [1928]), translated as *The Field of the Embroidered Quilt*, 4th edn (Dhaka: Poet Jasim Uddin Academy, 1986).

Judge, Jury, and Executioner: Torture and Extrajudicial Killings by Bangladesh's Elite Security Force (New York, etc.: Human Rights Watch, 2006).

Kabeer, Naila, 'The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Women, Islam and the State in Bangladesh', *Feminist Review*, 37 (1991), 38–58.

The Power to Choose: Bangladeshi Women Workers and Labour Market Decisions in London and Dhaka (London: Verso, 2000).

'Ideas, Economics, and "the Sociology of Supply": Explanations for Fertility Decline in Banglade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8: 1 (2001), 29 - 70.

Snakes, Ladders and Traps: Changing Lives and Livelihoods in Rural Bangladesh (1994 - 2001), CPRC Working Paper 50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Sussex, 2004).

Kabir, Alamgir, *Film in Bangladesh* (Dacca: Bangla Academy, 1979).

Kabir, Shahriar, *Bangladeshe Moulobad O Shamprodayikota* (Fundamentalism and Communalism in Bangladesh) (Dhaka: Ononya, 1998).

Kabir, Shahriar (ed.), *Resist Fundamentalism: Focus on Bangladesh* (Dhaka: Nirmul Committee, 1995).

Kapp, K. William, Luc Bigler, Brigitte Janik and Peter Wirth, *Neue Wege für Bangladesh: Sozio-ökonomische Analyse der Entwicklungsaufgaben und möglichkeiten des neuen Staates* (Hambur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1975).

Karim, Abdul, *Dacca: The Mughal Capital* (Dacca: Asiatic Society of Pakistan, 1964).

'Shah Jalal (R)', in: Sirajul Islam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Ⅸ, 196 - 198.

Karim, Lamia, 'Pushed to the Margins: Adivasi Peoples in Bangladesh and the Case of Kalpana Chakma',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7: 3 (1998), 301 - 316.

Karim, S. A., *Sheikh Mujib: Triumph and Tragedy*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2005).

Kasem, Abul, 'Nights and Days of Pakistani Butchers — Reminiscing this Bloody Day after Three Decades!' (http://humanists.net/avijit/26th_march/night-s_and_days.htm, accessed 29 December

2007).

Kawai, Akinobu, '*Landlords*' *and Imperial Rule: Change in Bengal Agrarian Society c. 1885 – 1940* (Tokyo: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1987).

Khalid, Abu Raihan M., 'The Interlinking of Rivers Project in India and International Water Law: An Overview',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 (2004), 553 – 570.

Khan, Akhter Hameed, 'The Public Works Programme and a Developmental Proposal for East Pakistan', in: *An Evaluation of the Rural Public Works Programme, East Pakistan, 1962 – 1963* (Comilla: Pakistan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 1963).

Khan, F. H., *Geology of Bangladesh*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1).

Khan, Mohammad Asghar, *Generals in Politics: Pakistan 1958 – 1982*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83).

Khan, Muazzam Hussain, 'Fakir-Sannyasi Resistance', in: Sirajul Islam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Ⅳ, 39 – 41.

Khan, Muhammad Ayub, *Friends Not Master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Khan, Muin-ud-Din Ahmad, 'The Arabs', in: Sirajul Islam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I, 240 – 241.

Khan, Roedad (ed.), *The American Papers: Secret and Confidential India — Pakistan — Bangladesh Documents 1965 – 1973*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9).

(ed.), *The British Papers: Secret and Confidential India — Pakistan — Bangladesh Documents 1958 – 196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Khan, Shahedul Anam and Shaheen Afroze (eds.), *Chandabaji versus Entrepreneurship: Economic Liberalisation and Youth Force in Bangladesh* (Dhaka: Academic Press and Publishers Limited and Banglade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1999).

Khan, Shamsuzzaman (ed.), *Folklore of Bangladesh* (Dhaka: Bangla Academy, 1987), 2 vols.

Khan, Taufiq M. and A. Bergan, 'Measurement of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Pakistan Economy: A Review of the National Income Estimates, 1949/50 to 1963/64',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6: 2 (1966), 168 – 175.

Khan, Zillur R., *Leadership Crisis in Bangladesh: Martial Law to Martial Law*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84).

Killingworth, James R., N. Hossain, Y. Hedrick-Wong, S. Thomas, A. Rahman and T. Begum 'Unofficial Fees in Bangladesh: Price, Equity and Institutional Issues',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14: 2 (1999), 152 – 163.

Kirkpatrick, Joanna, *Transports of Delight: The Ricksha Art of Bangladesh*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2003).

Knights, Melanie, 'Bangladeshi Immigrants in Italy: From Geopolitics to Micropolitic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21: 1 (1996), 105 – 123.

Kochanek, Stanley A., 'Governance, Patronage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Bangladesh', *Asian Survey*, 40: 3 (2000), 530 – 550.

Kopf, David (ed.), *Bengal: Regional Identity*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69).

Kumar, Vikrant and B. Mohan Reddy, 'Status of Austro-Asiatic Groups in the Peopling of India: An Exploratory Study Based on the Available Prehistoric, Linguistic and Biological Evidences', *Journal of Biosciences*, 28 (2003), 507 - 522.

Lambert, Richard D., 'Factors in Bengali Regionalism in Pakistan', *Far Eastern Survey*, 28: 4 (1959), 49 - 58.

Laushey, David M., *Bengal Terrorism and the Marxist Left: Aspects of Regional Nationalism in India, 1905 — 1942* (Calcutta: Firma K. L. Mukhopadhyay, 1975).

Leach, E. R., 'The Frontiers of "Burm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 1(1960), 49 - 68.

Lerski, George J., 'The American -Pakistan Alliance: A Reevaluation of the Past Decade', *Asian Survey*, 8: 5 (1968), 400 - 415.

Lewin, T. H., *The Hill Tracts of Chittagong and the Dwellers Therein, with Comparative Vocabularies of the Hill Dialects* (Calcutta: Bengal Printing Company, Ltd, 1869).

Lewis, David, 'NGO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Institutional Sustainability',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90 (2003), 212 - 226.

'Life Is Not Ours': Land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Bangladesh — Update 3 (Amsterdam and Copenhagen: Chittagong Hill Tracts Commission, 1997).

'Life Is Not Ours': Land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Bangladesh — Update 4 (Amsterdam and Copenhagen: Chittagong Hill Tracts Commission, 2000).

Lifschultz, Lawrence, *Bangladesh: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London: Zed Books, 1979).

Lintner, Bertil, 'Bangladesh: Breeding Ground for Muslim Terror', *Asia Times* (21 September 2002).

Low, D. A. (ed.), *The Political Inheritance of Pakis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Ludden, David, 'Investing in Nature around Sylhet: An Excursion into Geographical Histo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38: 48 (2003), 5080 – 5088.

'The First Boundary of Bangladesh on Sylhet's Northern Frontiers',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48, I (2003), 1 – 54.

Mackintosh-Smith, Tim (ed.), *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h* (London: Picador, 2002).

Mamoon, Muntassir, *Dhaka: Smriti Bismritir Nogori* (Dhaka: Recalling the Forgotten City) (Dhaka: Bangla Academy, 1993).

Unish Shotoker Bangladesher Songbad-Shamoyikpotro, 1847 – 1905 (Nineteenth-Century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f Bangladesh, 1847 – 1905) (Dhaka: Bangla Academy, 1985 – 2000), 9 vols.

'Bengal Partition (1905): Reaction in Eastern Bengal',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114 (2007), 1 – 32.

Mamoon, Muntassir and Jayanta Kumar Ray, *Civil Society in Bangladesh: Resilience and Retreat* (Dhaka: Subarna, 1998).

Maniruzzaman, Talukder,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Pakistan', *Asian Survey*, 7: 12 (1967), 876 – 885.

'Bangladesh in 1974: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sian Survey*, 15: 2 (1975), 117 – 128.

'Bangladesh in 1975: The Fall of the Mujib Regime and Its Aftermath', *Asian Survey*, 16: 2 (1976), 119 – 129.

The Bangladesh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Dacca: Bangladesh Books International, 1980).

Maswani, A. M. K., *Subversion in East Pakistan* (Lahore: Amir Publications, 1979).

Mazumdar, Shudha, *A Pattern of Life: The Memoirs of an Indian Woman*, Ed. Geraldine Forbes (New Delhi: Manohar Book Publications, 1977).

Memon, Muhammad Umar, 'Urdu Creative Writing on National Disintegration: The Case of Bangladesh',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3: 1 (1983), 105 - 127.

Messerli, Bruno and Thomas Hofer, *Floods in Bangladesh: History, Dynamics and 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e Himalayas*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Mevissen, Gerd J. R., 'Stone Image of Jina Ṛṣabhanātha with Aṣṭadikpālas in Dinajpur Museum', Golden Jubilee Volume (1956 — 2005),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Humanities)*, 50: 1 - 2 (2005), 83 - 96.

Mey, Wolfgang (ed.), *They Are Now Burning Village after Village: Genocide in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Bangladesh* (Copenhagen: International 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 1984).

Mirza, M. Monirul Qader, 'Global Warming and Changes in the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of Floods in Bangladesh and Implication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2 (2002), 127 - 138.

'Three Recent Extreme Floods in Bangladesh: A Hydro-Metereological Analysis', *Natural Hazards*, 28 (2003), 35 - 64.

Misra, K. P., 'Intra-State Imperialism: The Case of Pakista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9: 1 (1972), 27 - 39.

Mohsin, Amena,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Bangladesh*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7).

Mookherjee, Nayanika, '"Remembering to Forget": Public Secrecy and Memory of Sexual Violence in the Bangladesh War of 1971',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 S.), 12 (2006), 433 - 450.

'The "Dead and Their Double Duties": Mourning, Melancholia, and the Martyred Intellectual Memorials in Bangladesh', *Space and Culture*, 10 (2007), 271 - 291.

Moudud, Hasna Jasimuddin, *A Thousand Year Old Bengali Mystic Poetry*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2).

Muhammad, Anu, 'Globalisation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a Peripheral Economy: The Bangladesh Experienc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5 April 2006), 1459 - 1464.

Muhammed, Yunus (ed.), *Album — Gono Andolon (1982 — 1990)* (Album — People's Movement), vol. Ⅰ (Chittagong: Tolpar, 1993).

Mujahid, Sharif al, 'Pakistan: First General Elections', *Asian Survey*, 11: 2 (1971), 159 - 171.

Murshid, Tazeen M.,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Bengal Muslim Discourses, 1871 — 197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The Rise of the Religious Right in Bangladesh: Taslima Nasrin and the Media', in: Ayesha Imam, Jenny Morgan and Nira Yuval-Davis, *Warning Signs of Fundamentalisms* (n. p.: Women Living under Muslim Laws, 2004), 99 - 105.

'The Forgotten Biharis: Policy Options for Their Repatri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in: Syed Saad Andaleeb (ed.), *Political Culture in Bangladesh: Perspectives and Analyses — Selections from the Journal of Bangladesh Studies* (Dhaka: Bangladesh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and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2007), 331 - 356.

Nandy, Ashis, 'A Report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Health of the Gods and Goddesses in South Asia', *Postcolonial Studies*, 4: 2 (2001), 125 - 141.

Nargis, Deena and Faustina Pereira, 'Taking Cognizance of Illegal Fatwa',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4: 2 (2002), 215 - 219.

Nasrin, Taslima, *Behula Eka Bhasiyechila Bhela* (Behula Floated the Raft Alone) (Dhaka: Shikha Prakashani, 1993).

'Bhongo Bongodesh', in: *Ay Kosto Jhepe Jibon Debo Mepe* (Kolkata: Anondo Publishers,1995).

Shame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1997).

Nathan, Mīrzā, *Bahāristān-i-Ghaybī: A History of the Mughal Wars in Assam, Cooch Behar, Bengal, Bihar and Orissa during the Reign of Jahāngir and Shāhjahān*,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Persian by M. I. Borah (Gauhati: Narayani Handiqui Historical Institute, Department of Historical and Antiquarian Studies, Government of Assam, 1936), 2 vols.

Niazi, A. A. K., *The Betrayal of East Pakistan*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9).

Nicholas, Ralph W., 'The Goddess Sitala and Epidemic Smallpox in Benga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1: 1 (1981), 21 - 44.

'Islam and Vaishnavism in the Environment of Rural Bengal', in: Rafiuddin Ahmed (ed.), *Understanding the Bengal Muslims: Interpretative Essays*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52 – 7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David Kopf (ed.), *Bengal: Regional Identity*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69).

Fruits of Worship: Practical Religion in Bengal (New Delhi: Chronicle Books, 2003).

Nuruzzaman, Mohammed, 'Labor Resistance to Pro-market Economic Reforms in Bangladesh',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41: 4 (2006), 341 – 357.

Oldenburg, Philip, '"A Place Insufficiently Imagined": Language, Belief and the Pakistan Crisis of 1971',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 4 (1985), 711 – 733.

Oliver, Thomas W., *The United Nations in Banglades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Openshaw, Jeanne, *Seeking Bauls of Beng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anja, Sheena, 'Monuments in a Flood Zone: "Builders" and "Recipients" in Ancient Varendri (Eastern India and Bangladesh)', *Antiquity*, 77: 297 (2003), 497 – 504.

Park, Richard L. and Richard S. Wheeler, 'East Bengal under Governor's Rule', *Far Eastern Survey*, 23: 9 (1954), 129 – 134.

Paul, Bimal Kanti, 'Fear of Eviction: The Case of Slum and Squatter Dwellers in Dhaka, Bangladesh', *Urban Geography*, 27: 6 (2006), 567 – 574.

Paulsen, Eric, 'The Citizenship of the Urdu-Speakers/Biharis in Bangladesh', *Refugee Survey Quarterly*, 25: 3 (2006), 54 – 69.

Pokrant, Bob, Peter Reeves and John McGuire, 'Bengal Fishers and Fisheries: A Historiographical Essay', in: Sekhar

Bandyopadhyay (ed.), *Bengal: Rethinking History — Essays on Historiography* (Delhi: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Bengal Studies and Manohar Publications, 2001), 93 – 117.

'Political Activities Banned: Awami League is Outlawed — Defiance of Law Act of Treason — A. L. Insulted National Flag and Quaid — Transfer of Power Pledge Reiterated — President's Address to Nation', *Pakistan Times* (27 March 1971).

Prakash, Om,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Economy of Bengal*, 1630 – 172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The Indian Maritime Merchant, 1500 – 1800',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47: 3 (2004), 435 – 457.

'Presidential Address of M. A. Jinnah — Lahore, March 1940', in: Mushirul Hasan (ed.), *India's Partition: Process, Strategy and Mobilization*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44 – 58.

Pryer, Jane A., Stephen Rogers, Charles Normand and Ataur Rahman, 'Livelihoods, Nutrition and Health in Dhaka Slums',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5: 5 (2002), 613 – 618.

Quaderi, Fazlul Quader (comp. and ed.), *Bangladesh Genocide and World Press* (Dhaka: Begum Dilafroz Quaderi, 1972).

Quadir, Muhammad Nurul, *Dusho Chheshotti Dine Swadhinota* (Independence in 266 Days) (Dhaka: Mukto Publishers, 1997).

Quibria, M. G. (ed.), *The Bangladesh Economy in Transition*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Qureshi, Mahmud Shah (ed.), *Tribal Cultures in Bangladesh* (Rajshahi: Institute of Bangladesh Studies, 1984).

Rahman, Md Mahbubar, *Bangladesher Itihash*, 1947 – 1971 (History of Bangladesh, 1947 – 1971) (Dhaka: Shomoy

Prokashon, 1999).

Ekattore Gaibandha (Gaibandha District in 1971) (Dhaka: Bangladesh Chorcha, 2005).

Rahman, Md Mahbubar and Willem van Schendel, '"I Am Not a Refugee": Rethinking Partition Migrat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37: 3 (2003), 551 - 584.

Rahman, Matiur and Naeem Hasan, *Iron Bars of Freedom* (London: News and Media Ltd, 1980).

Rahman, Mushfiqur, 'Energy', in: Sirajul Islam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Ⅲ, 480 - 483.

Rahman, Pk Md Motiur, *Poverty Issues in Rural Bangladesh*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4).

Rajamohan, P. G., '*Harkat-ul-Jihad-al-Islami Bangladesh (HuJI-BD)*' (New Delhi: Institute of Conflict Management, 2002).

Raju, Zakir Hossain, 'Bangladesh: Native Resistance and Nationalist Discourse', in: Anne Tereska Ciecko (ed.), *Contemporary Asian Cinema: Popular Culture in a Global Frame*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2006), 120 - 132.

Ramachandran, Sujata, 'Of Boundaries and Border Crossings: Undocumented Bangladeshi "Infiltrators" and the Hegemony of Hindu Nationalism in India',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1: 2 (1999), 235 - 253.

Raper, Arthur F., *Rural Development in Action: Th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at Comilla, East Pakista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Rashid, Haroun er, *Economic Geography of Bangladesh*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2005).

Rashiduzzaman, M.,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Local*

Councils: A Study of Union and District Councils in East Pakistan (Karachi, et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The Awami League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Pakistan', *Asian Survey*, 10: 7 (1970), 574 - 587.

'The Liberals and the Religious Right in Bangladesh', *Asian Survey*, 34: 11 (1994), 974 - 990.

Ray, Aniruddha, 'Gaur', In: Sirajul Islam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Ⅳ, 345 - 349.

'The Portuguese', in: Sirajul Islam and Sajahan Miah (eds.),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Dhaka: Asiatic Society of Bangladesh, 2003), Ⅷ, 142 - 146.

Ray, Himangshu Prabha, *The Archaeology of Seafaring in Ancient South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The Archaeology of Bengal: Trading Networks, Cultural Identitie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49: 1 (2006), 68 - 95.

Ray, Manas, 'Growing Up Refugee: On Memory and Localit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53 (2002), 149 - 179.

Raychaudhuri, Tapan, *Bengal under Akbar and Jahangir: An Introductory Study in Social History*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69 [1953]).

Reza, C. M. Tarek, *Ekush: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Movement* (1947 —1956) (Dhaka: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2004).

Riaz, Ali, *State, Class and Military Rul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tial Law in Bangladesh* (Dhaka: Nadi New Press, 1994).

Islamist Militancy in Bangladesh: A Complex Web (Oxford: Routledge, 2008).

Ricciutelli, Luciana, Angela Miles and Margaret McFadden (eds.), *Feminist Politics, Activism and Vision: Local and Global Challenges* (London: Zed Books, 2005).

Richards, John F. and Elizabeth P. Flint, 'Long-Term Transformations in the Sundarbans Wetlands Forests of Bengal',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7: 2 (1990), 17–33.

Ridley, Glynis, *Clara's Grand Tour: Travels with an Eighteenth-Century Rhinoceros*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4).

Roy, Asim, 'Being and Becoming A Muslim: A Historiographic Perspective On The Search For Muslim Identity in Bengal', in: Sekhar Bandyopadhyay (ed.), *Bengal: Rethinking History — Essays on Historiography* (Delhi: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Bengal Studies and Manohar Publications, 2001), 167–229.

Roy, Raja Devasish, Amena Mohsin, Meghna Guhathakurta, Prashanta Tripura and Philip Gain,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Life and Nature at Risk* (Dhaka: Society for Environ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2000).

Roy, Raja Tridiv, *The Departed Melody (Memoirs)* (Islamabad: PPA Publications, 2003).

Roy, Samaren, *The Roots of Bengali Culture* (Calcutta: Firma K. L. Mukhopadhyay, 1981).

Roy, Suprakash, *Bharoter Krishok-Bidroho o Gonotontrik Songgram* (Calcutta: DBNA Brothers, 1980).

Peasant Revolts and Democratic Struggles in India, tr. Rita Banerjee (Calcutta: Naya Udyog, for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Bengal Studies, 1999).

Rozario, Santi, 'The New Burqa in Bangladesh: Empowerment or Violation of Women's Rights?',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9 (2006), 368–380.

Rural Life in Bengal Illustrative of Anglo-Indian Suburban Life; More Particularl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lanter and Peasantry, the Varied Produce of the Soil and Seasons; With Copious Details of the Culture and Manufacture of Indigo — Letters from an Artist in India to His Sisters in England... (London: W. Thacker & Co., 1860).

Saikia, Yasmin, 'History on the Line: Beyond the Archive of Silence: Narratives of Violence of the 1971 Liberation War of Bangladesh',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58 (2004), 275 – 287.

Saleem, Ahmad (comp. and ed.), *It Is My Mother's Face: Selected Readings on Bengali Language Movement* (Lahore: Sanjh Publications, n. d. [2006]).

Salik, Siddiq, *The Wounded Pride: Reminiscences of a Pakistani Prisoner of War in India* (1971 — 1973) (Lahore: Wajidalis, 1984).

Witness to Surrender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77]).

Salim, Ahmad (comp. and ed.), *Ten Days That Dismembered Pakistan: March 15 — March 25, 1971: The Real Story of the Yahya-Mujib-Bhutto Talks* (Islamabad: Dost Publications, 2001).

Sarkar, Jadunath (ed.), *The History of Bengal. Volume* Ⅱ: Muslim Period, 1200 – 1757 (Dacca: University of Dacca, 1976 [1948]).

Sarkar, Nikhil, *A Matter of Conscience: Artists Bear Witness to the Great Bengal Famine of 1943*, tr. Satyabrata Dutta (Calcutta: Punascha, 1998).

Sarkar, Sumit, *The Swadeshi Movement in Bengal, 1903 — 1908* (New Delh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3).

Schoff, Wilfred H. (trans and ed.), *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Travel and Trade in the Indian Ocean by a Merchant of the First Century*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12).

Schouten, Wouter, *Reistogt naar en door Oostindiën*, 4th edn (Utrecht and Amsterdam, 1775 [1676]).

Seabrook, Jeremy, *Freedom Unfinished: Fundamentalism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Bangladesh Today*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2001).

Sen, Amartya,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Sen, Binayak, 'Drivers of Escape and Descent: Changing Household Fortunes in Rural Bangladesh', *World Development*, 31: 3 (2003), 513 – 534.

Sen, Sukumar, *History of Bengali Literature* (New Delhi: Sahitya Akademi, 1960).

Sen, Swadhin, 'Community Boundary, Secularized Religion and Imagined Past in Bangladesh: Archaeology and Historiography of Unequal Encounter', *World Archaeology*, 34: 2 (2002), 346 – 362.

Sengupta, Gautam, Sima Roy Chowdhury and Sharmi Chakraborty, *Eloquent Earth: Early Terracottas in the State Archaeological Museum, West Bengal* (Kolkata: Directorate of Archaeology and Museums, West Bengal, 2007).

Sengupta, Jyoti, *Bangladesh in Blood and Tears* (Calcutta: Naya Prakash, 1981).

Shurjo Sen Smriti (*Surya Sen Memento*) (Kolkata: Biplobtirtho Chottogram Smritishongstha Prokashon, 2003 [1971]).

Siddiqi, Abdul Rahman, *East Pakistan — The End Game: An Onlooker's Journal 1969 — 1971* (Karachi, et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Siddiqi, Dina M., 'Miracle Worker or Womanmachine? Tracking (Trans) national Realities in Bangladeshi Factori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May 27, 2000), L11—L17.

Siddiqui, Kamal, Sayeda Rowshan Qadir, Sitara Alamgir and Sayeedul Huq, *Social Formation in Dhaka City: A Study in Third World Urban Sociology*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0).

Siddiqui, Tasneem, *Institutionalising Diaspora Linkage: The Emigrant Bangladeshis in UK and USA* (Dhaka: Ministry of Expatriates' Welfare and Overseas Employment, Government of Bangladesh,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04).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from Bangladesh: A Decent Work Perspective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05).

Siddiqui, Zillur Rahman, *Visions and Revisions: Higher Education in Bangladesh, 1947 —1992*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7).

Singhal, D. P., 'The New Constitution of Pakistan', *Asian Survey*, 2: 6 (1962), 15 - 23.

Sinha-Kerkhoff, Kathinka, *Tyranny of Partition: Hindus in Bangladesh and Muslims in India* (New Delhi: Gyan Publishing House, 2006).

Sisson, Richard and Leo E. Rose, *War and Secession: Pakistan, India and the Creation of Bangladesh* (Berkeley, et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Smith, Allan H., Elena O. Lingas and Mahfuzar Rahman, 'Contamination of Drinking-Water by Arsenic in Bangladesh: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78: 9 (2000), 1093 - 1103.

Smith, W. L., *The One-Eyed Goddess: A Study of the Manasā Maṅgal* (Stockholm: Almqvist and Wiksell, 1980).

Sobhan, Rehman, *Basic Democracies, Works Programm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East Pakistan* (Dac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Who Pays for Development?', *Pakistan Forum*, 1: 4 (1971), 6 - 7.

The Crisis of External Dependen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Aid to Bangladesh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82).

Sobhan, Rehman (ed.), *Bangladesh-India Relations: Perspectives from Civil Society Dialogues* (Dhaka: Centre for Policy Dialogue and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2002.

Solvyns, François Balthazar, *The Costume of Hindostan, Elucidated by Sixty Coloured Engravings: With Descriptions in English and French* (London: Edward Orme, 1804).

Sommer, Alfred and W. Henry Mosley, 'The Cyclone: Medical Assessment and Determination of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Needs', in: Lincoln C. Chen (ed.), *Disaster in Bangladesh* (New York, et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19 - 132.

Sopher, David E., 'The Swidden/Wet-Rice Transition Zone in the Chittagong Hill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4: 1 (1964), 107 - 126.

Stewart, Tony K., 'In Search of Equivalence: Conceiving Muslim-Hindu Encounter through Translation Theory', *History of Religions*, 40: 3 (2001), 261 - 288.

Fabulous Females and Peerless Pīrs: Tales of Mad Adventure in

Old Bengal (New York, etc.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Sultana, Razia, 'Women's Occupation in Medieval Bengal', in: Firdous Azim and Niaz Zaman (eds.), *Infinite Variety: Women in Society and Literature*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4), 55 - 82.
Swain, Ashok, *The Environmental Trap: The Ganges River Diversion, Bangladeshi Migration and Conflicts in India* (Department of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 Uppsala University, 1996).
Tagore, Rabindranath, *The Home and the World* (London: Macmillan, 1919).
Talbot, Ian, *Pakistan: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Hurst & Company, 1998).
Tan Tai Yong, *The Garrison State: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Punjab, 1849 – 1947* (New Delhi, etc: Sage, 2005).
Taniguchi, Sinkichi, Masahiko Togawa and Tetsuya Nakatani (eds.), *Grambangla: Itihash, Shomaj O Orthoniti* (Rural Bengal: History, Society and Economy) (Kolkata: K. P. Bagchi and Company, for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Bengal Studies, Delhi Branch, 2007).
Tarafdar, Momtazur Rahman, *Husain Shahi Bengal, 1494 - 1538 A. D. : A Socio-Political Study* (Dacca: Asiatic Society of Pakistan, 1965).
Tetens, I., Ole Hels, Nazrul I. Khan, Shakuntala H. Thilsted and Nazmul Hassan, 'Rice-Based Diets in Rural Bangladesh: How Do Different Age and Sex Groups Adapt to Seasonal Changes in Energy Intake?',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78 (2003), 406 - 413.

Uddin, Shahzad, 'Privatization in Bangladesh: The Emergence of "Family Capitalism"',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6: 1 (2005), 157 - 182.

Uddin, Sufia M., *Constructing Bangladesh: Religion, Ethnicity, and Language in an Islamic Na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Umar, Badruddin, *The Emergence of Bangladesh: Class Struggles in East Pakistan (1947 – 1958)*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Van der Heijden, Frans Jansz, *Relation du Naufrage d'un Vaisseau Hollandois nommé Ter Schelling vers la Côte de Bengala...* (Amsterdam: La veuve de Jacob van Meurs, 1681).

Van Schendel, Willem, *Peasant Mobility: The Odds of Life in Rural Bangladesh* (Assen: Van Gorcum, 1981 and Delhi: Manohar, 1982).

'Madmen of Mymensingh: Peasant Resistance and the Colonial Process in Eastern India, 1824 - 1833',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22: 2 (1985), 139 - 173. 'Self-Rescue and Survival: The Rural Poor in Bangladesh', *South As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9: 1 (1986), 41 - 60.

Three Deltas: Accumulation and Poverty in Rural Burma, Bengal and South India (Delhi, etc.: Sage Publications, 1991).

'The Invention of the "Jummas": State Formation and Ethnicity in Southeastern Bangladesh', *Modern Asian Studies*, 26: 1 (1992), 95 - 128.

Reviving a Rural Industry: Silk Producers and Officials in India and Bangladesh, 1880s to 1980s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5).

'Modern Times in Bangladesh', in: Willem van Schendel and

Henk Schulte Nordholt (eds.), *Time Matters: Global and Local Time in Asian Societies*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2001), 37 - 55.

'Stateless in South Asia: The Making of the India-Bangladesh *Enclav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 1 (2002), 115 - 47.

The Bengal Borderland: Beyond State and Nation in South Asia (London: Anthem Press, 2005).

Van Schendel, Willem (ed.), *Francis Buchanan in Southeast Bengal (1798): His Journey to Chittagong,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Noakhali and Comilla*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2); Bengali translation: *Dokkhinpurbo Banglay Francis Buchanan (1798): Kumilla, Noakhali, Chottogram, Parbotyo Chottograme Tanr Bhromon* (Dhaka: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Bengal Studies, 1994).

Van Schendel, Willem and Aminul Haque Faraizi, *Rural Labourers in Bengal, 1880 —1980* (Rotterdam: Comparative Asian Studies Programme,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1984).

Van Schendel, Willem and Henk Schulte Nordholt (eds.), *Time Matters: Global and Local Time in Asian Societies*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2001).

Van Schendel, Willem, Wolfgang Mey and Aditya Kumar Dewan, *The Chitagong Hill Tracts: Living in a Borderland* (Bangkok: White Lotus, 2000).

Wahid, Zeenat Huda, 'Emergence of Satellite Television and Enigmatic Geo-Political Strategy of Bangladesh Government', *Bangladesh e-Journal of Sociology*, 4: 1 (2007), 1 - 15.

Weinraub, Bernard, 'Bangladesh, at Age 3, Is Still a Disaster Area; A Worrisome Portent Key Enterprises Taken Over, Premier's

Nephew Accused, Sluggish Bureaucracy, U. S. Leads the Donors', *New York Times* (13 September 1974).

Who Gets What and Why? Resource Allocation in a Bangladesh Village (Dhaka: Bangladesh Rural Advancement Committee, n. d. [1979]).

Wilce, James M., Jr, 'The Kalimah in the Kaleidophone: Ranges of Multivocality in Bangladeshi Muslim's Discourses', *Ethos*, 26: 2 (1998), 229 - 257.

Wilcox, Wayne, 'Pakistan: A Decade of Ayub', *Asian Survey*, 9: 2 (1969), 87 - 93.

Wood, Geoffrey D., *Bangladesh: Whose Ideas, Whose Interests*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and London: IT Publications, 1994).

Zafar, Manmay, 'Under the Gaze of the State: Policing Literature and the Case of Taslima Nasr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6: 3 (2005), 410 - 421.

Zaheer, Hasan, *The Separation of East Pakistan: The Rise and Realization of Bengali Muslim Nationalism*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4).

Zaidi, Z. H. (ed.-in-chief), *Jinnah Papers: Pakistan — Struggling for Survival, 1 January -30 September 1948*; vol. Ⅶ, Quaid-i-Azam Papers Project, Government of Pakistan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Zakiuddin, Almas, *Corruption in Bangladesh: An Analytical and Sociological Study* (Dhaka: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Bangladesh Chapter, n. d. (*c.* 2000)).

Zaman, Niaz (ed.), *1971 and After: Selected Stories*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2001).

(ed.), *Under the Krishnachura: Fifty Years of Bangladeshi*

Writing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2003).

Zaman, Shahaduz, *Broken Limbs, Broken Lives: Ethnography of a Hospital Ward in Bangladesh* (Amsterdam: Her Spinhuis, 2005).

电　影

Deshantori (The Migrant), directed by Sujan Mahmud and Mridul Chowdhury (2006).

Eclipse, directed by Shaheen Akhter and Shameem Akhtar (Dhaka: Ain O Shalish Kendro, 1994).

Ghare-Baire (Home and the World), directed by Satyajit Ray (1984).

Licu's Holidays / Le Ferie di Licu, directed by Vittorio Moroni (2007).

Muktir Gan (Song of Freedom) (1995) and *Muktir Kotha* (Words of Freedom) (1998), directed by Tareque and Catherine Masud.

网　站

Ain-O-Salish Kendra (www. askbd. org).

Banglapedia —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in English and Bengali; http://banglapedia. search. com. bd).

BHBCOP — Bangladesh Hindu Buddhist Christian Unity Council (www. bhbcop. org/).

BRAC (www. brac. net/about. htm).

FOBANA — Federation of Bangladeshi Associations of North America (www. fobana2007ks. com/).

Grameen Bank (www. grameen-info. org/bank/).

Liberation War Museum, Dhaka (www. liberationmuseum. org. bd/).

Odhikar (www. odhikar. org).

索　　引

316

（索引条目后数字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B

C

F

J

K

* 原文误作"114"。——译者注

L

M

N

* 原文误作"Bangladesh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译者注

R

S

* 原文误作“126”。——译者注

* 原文漏此页码。——译者注

① 原文误作"30"。——译者注

T

---

① 原文误作"UNICEF"。——译者注

V

W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孟加拉国史
作者=作者:（荷）申德尔著
页数=407
SS号=13157003
出版日期=2011.11
出版社=上海市：东方出版中心